

序

傅 高 义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教授)

中国自 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终于走上了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这场改革被邓小平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在改革中 中国致力于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渡到以市场为主的较为开放的商品交换经济的转型，这是现代世界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如何采取更大的灵活措施，既减少改革引起的阵痛 又加快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这正是许多社会主义国家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努力的方向。然而在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骤然间解体了 经济却迅速地开放了。在中国 共产党坚如磐石 经济像野火一样迅猛地发展，已经顺利地纳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 我每年都要到中国访问数次 改革的成功的确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正在向世界性大国挺进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改革使经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改善与提高 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也日益加深和扩大 并且加快了与世界接轨的速度 但这一过程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正如我在美国出版的《与中国

共处 21 世纪的美中关系》一书前言中所说：“中国现在还不不是一个超级大国 即使用购买力平价来衡量 中国的经济也远远落后于美国。如果用目前的汇率来衡量（它有助于判断一个国家的国际经济影响）中国落后于日本几十年 更不用说美国了。它的对外投资和国际贸易也落后于欧洲大国，人均年收入低于 1 000 美元，中国内地的贫困状况很可能会延续到 21 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基础设施 包括公路、铁路、港口、通信和电力设施 即使按最好的情况估计，也落后于先进国家几十年。它的机构还没有按照先进国家和全球市场经济的需要来进行体制改革。”但是 其他国家不能不认真看待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它们也必须考虑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影响，特别是中国因拥有巨大的人口资源而使其影响更大。

对所有国家来说 任何强国的崛起都会引起世界的注意 而正在崛起的强国与已经形成的强国之间的关系，则是一个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早在公元前 4 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在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指出 伯罗奔尼撒同盟各邦对雅典势力兴起的关切和担忧是战争爆发的最基本原因。人们也可以产生这样一种看法 即认为 20 世纪上半叶世界发生的最严重事件，是由德、日这两个崛起中的强权势力与其他已经形成的强国之间的关系失调与利益冲突所致。然而，崛起中的大国力量与已经形成的强国之间的矛盾，并不必然地如此不可调和。例如美国在 1812 年对英进行‘第二次独立战争’后 英国确认了美国的独立 美国从此作为新兴大国而崛起，它与其他已经形成的强国之间只存在过不多的摩擦。

我认为 世界在 21 世纪初期所面临的最重大问题之一，将是崛起的中国与诸如美国、日本这样一些现存强国的关系问题。美国和日本 作为老牌的发达国家 由于对中国发展的良好态势和巨大前景抱有戒心 因此对中国持有严重的误解。同样 中国由于在 19 和 20 世纪曾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蹂躏，也对西方国家极不放心 甚至过度敏感。现在 中国与西方国家间的关系仍存在着许多基于不同利益而存在的问题与紧张。西方强国，如果能适应中国的崛起 就像 19 世纪末美国迅速发展时英国所做的那样，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就能较好地相互了解，就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双边关系中存在的摩擦与紧张 并能在 21 世纪一起走向和平共处与合作发展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成功地调节崛起中的国家力量与已经形成的强国之间的关系，无疑将要求领导人具有卓越的协调应变能力和渊博的学识才情。

通过介绍西方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改革开放研究的论著和观点 以促进相互间的了解 张敏杰教授主编的这本著作发挥了很有建设性的作用。当这些西方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被呈现在中国学者面前时，中国人就有了机会来较好地了解外国专家对他们国家所持有的理念和看法，同时也使中国人有机会通过阅读这些文章作出反馈，以便使西方人能改正他们的偏见和误解。

张敏杰教授曾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先后在美国、德国、荷兰等国的大学、研究院作过与中国当代发展问题有关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他对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诸多文献进行过广泛而认真的研究，是一位对美国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状况颇具发言资格的学者。他在精深了解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论著的

基础上，邀请了西方一批在中国研究方面颇有名望的学者撰写论文 并挑选出了一批具有代表性和重要性的论著进行译介 从而增加了本书的学术分量。本书的出版不但将使中国读者有机会扩大自己的认识视野 也有利于外国学者提高他们的研究水平 使他们对中国的分析判断更符合实际。此外，本书还有助于中美两国人民减少因过度感情冲动而产生的误解。

最后，我要对张敏杰和商务印书馆为这项建设性的工作所作的贡献和付出的努力，表示由衷的感谢。

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国际经验的启示

劳伦斯·R. 克莱因

编者按 劳伦斯·R. 克莱因 (Lawrence Robert Klein)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经济计量学的先驱者，诺贝尔奖获得者，现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他于 1944 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是该院第一个经济学博士，先后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密歇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著名学府。曾任加拿大政府顾问，布鲁金斯研究所研究计量模型计划的主要研究员，沃顿经济计量预测公司董事会主席，美国经济计量学会主席，美国经济学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美国文学及科学院院士。他的第一部代表作《凯恩斯革命》，首次把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完整地表述为数学形式，他最早把凯恩斯的理论用国民收入统计等方法加以具体化，并与经济计量技术结合起来进行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研究。他的其他主要著作还有：《美国的一个经济计量模型，1929~1952 年》(合著)《生活费用的不变效用指数》(合著)等。由于在建立克莱因计量经济模型方面的突出贡献，1980 年他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

1997年9月2日至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对外贸易经济与合作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单位联合在广西北海市召开了《中国经济适度快速稳定增长理论与政策国际研讨会》，邀请了包括克莱因教授在内的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克莱因教授在会议上作了题为《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国际经验的启示》的精彩发言。现经作者修改后，授权将此译文在本书正式发表。

中国自1978年改革以来，除一些短暂的曲折外，经济一直非常稳定地增长。过去的20年虽然不长，但对世界经济长期增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提高中国庞大人口的生活水平意义深远。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之一，但还未迈入工业最发达国家的行列，也未达到工业发展的成熟阶段。

从历史上看，应该指出的是，早在二战以后不久，就出现了两次发展“奇迹”：“德国奇迹”和“日本奇迹”。是从战后的废墟中重建原来就已经相当发达的产业经济（德国比日本要发达一些），但是强大的发展势头并不持久。两国经济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发展迅猛，但是到了1970年代则在食物和燃料方面陷入了异常的困境，发展速度日趋缓慢，目前的年实际增长率仅为2%。两国目前都还很难从1990年代的衰退中恢复过来。

当然，德国和日本都是经济强国，他们目前的经济困境无损于他们历史悠久的作为“经济奇迹”范例的形象。他们完全无愧于“经济奇迹”的称号，而且，他们将来也一定会给他们的人民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平。

另一“经济奇迹”发生在东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日本经验的启发。开始，创造这一奇迹的成员国并非将精力完全集中在工业化上，但是不久之后，一些成员国很快就转向了工业，工业是日本战后早期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太平洋周边地区的亚洲经济增长点，除了少数例外，在1970年代出现了石油危机后，都已控制住通货膨胀，并在一段比德国和日本的增长时期都长的时期内，使其经济保持不断增长。

在过去的一两年中，一些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点已经开始出现了速度放慢、汇率下跌、收支平衡逆差，有些地区甚至还出现了金融危机。然而，增长的速度仍不低于2%，这是目前德国和日本的增长水平。“东亚奇迹”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典型，因为它已经持续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在一些地区已经持续了30年。

国际上其他经济区域羡慕地关注着东亚的动向，但是它们都未能仿照东亚的做法，未能找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可能仅有少数一两个小国家除外。一些国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长期以来在诸如矿物燃料或其他基础资源方面做得相当出色，但还未完全建立起工业化的运行体系。

为了对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运行进行正确的评价，无疑应该从亚太地区的经验中得到一些启示，同时也应该从德国和日本的经验中得到一些启迪。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状况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有：(1)农业改革；(2)开放政

策 ;(3)引进市场价格体系 ;(4)改善基础设施 交通、通讯、能源、教育);(5)计划生育 ;(6)宏观经济政策。

为了介绍经济发展状况及评价其可持续性，有必要对上述各点进行详细阐述。

(1) 农业改革

在一个必须养活十多亿人口的国家中，农业显然是极其重要的。早在 1970 年代末期就有一些访问中国的经济学家看到，中国农业产值至少必须保持每年 3—4% 的增长速度。中国的大多数人口在农村，而农业产值却并不很高。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和农业带来的创伤，使改革成为迫在眉睫的需要。人民公社的体制迅速瓦解，农民们在土地使用问题上被赋予了极大的个人自主权。这样，农业产值以比想象的还要快的速度迅速增长。改革初期农业的高增长率并不持久 但是 农业政策的改革使这一产业的发展超过了仅仅维持生计的需要 并且 从某种意义上说 解决了未来一段时期的食物问题，尽管还不能说永远解决了这一问题。

同样应该指出的是 土地的所有权并未完全私有化 只是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而不是根据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将生产自主权赋予了个人 并且引进了竞争。

另外还须指出的是 农村的土地改革在战后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台湾省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是亚太地区经验的重要所在之一。

(2) 开放政策

1978 年以前，在失去了大部分曾经有过的与苏联之间的小量贸易之后，中国经济几乎完全封闭，很少有对外贸易。逐步实施的开放政策给中国的经济活动带来了许多变化，逐渐使中国的价格接近于国际上的价格。无论是在当年还是现在，都未能证明‘单一价格规律’起到了什么作用，而中国的价格曾经与国际上的价格相差很大，因为中国几乎多年都未进行过价格调整。中国已经开始逐步与国际价格接轨，并保持着富于竞争力的潜力。

由于具有竞争优势的价格，尤其是具有廉价的劳动力市场，中国得以在国际出口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进出口总额从少量上升到约 2 000 亿美元。与东亚其他主要国家取得的经验相比较，要取得如此辉煌的以出口为主导的成就，除了低廉的价格外，还必须相应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

取得上述成就还与开放政策有关。外国投资提供了大量金融资本，并在带来资金的同时，带来了大量的技术转让。开放的另一个具体表现为海外华人企业的转移，尤其是香港同胞的企业。

综上所述，中国已经放开了市场价格、贸易往来、资金流动以及技能交流（技术上的和企业上的）。

(3) 引进市场价格体系

正如在上面阐述的那样，中国在国际方面已经实行了市场价格，而在国内也实行了市场价格。价格波动带来了市场上货物、服务、劳动力和资金等资源较有效的分配。金融市场在运行方面比

其他市场要滞后一些，因为有许多机构在职能和观念方面还有待开发并付诸实施。

上海和深圳等地在不断向前发展，大量的香港资金已经对金融市场机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今后还将继续有更多的资金从这一来源涌入。

农业、其他第一产业的活动以及中小型企业市场也一直在起着作用并将继续发展。但是与国有大型企业比较起来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而国有大型企业的经济效益显得比较差。这一点将在下面进行讨论。

(4) 改善基础设施

交通、通讯和能源方面的瓶颈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它们持续阻碍着整体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的新公路正在建设，新设备正在得到应用，作运输计划的软件正在安装，可用的新能源也越来越多。简而言之，中国正在全面采取措施避免大规模出现瓶颈现象。虽然这些国内的不利因素还将继续阻碍现代经济的进步，但是总的状况正在好转。

除了物质设施外，机构建设也是一项迫切的需要——商业法制、无效益的企业的破产程序以及尤为重要的是必须改善教育设施以尽可能地利用物质资本建立人力资本。

经历文化大革命后，教育体制遭到了摧残。成千上万的成年人未能得到适当的普通教育和技术教育。但是这种状况如今正在被能够‘培养自己的’学者的学术群体所取代，而1978年时高等教育机构的情况则不一样。现在，中国拥有了一大批培养和发展新

一代学者的经济学家 而在 1978 年则没有。

(5) 计划生育

在 1978~1980 年间的转折后 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强大增长势头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成功地控制了人口的增长。新增人口不会完全抵消产值的增长。

中国没有马尔萨斯理论的问题，因为她有她的人口政策——一个家庭只生育一个孩子，特殊情况除外——这样就保持了每年 1% 左右的人口增长率，使按人均推算的结果都很好。

虽然在改革的现阶段人口政策确实已经很好地服务于经济政策 但是将来还会出现一些问题 除非对将来的工作进行通盘、周密地预计和规划，使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的增长。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人口发展出现了出乎意料的转折。在没有任何特别的人口政策的情况下 日本的出生率急剧下降 大大低于其传统的规律 当时日本人口的年增长率也维持在 1% 左右。最终的结果是，40 或 50 年后，日本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非常突出。持续的低出生率以及越来越长寿的趋势（饮食的改善 公众健康的提高 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使日本成为拥有 60 岁以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日本人相当年轻就退休，将经济负担压在了相当有限的劳动力的身上。日本人口的老龄化给日本 1990 年代的经济带来了储蓄率下降、生产力增长速度下降的问题 并且是前面提到的 1990 年代日本经济增长呆滞现象的主要成因。低出生率在持续几十年后，最终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障碍。中国是否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呢？必须要有一个

长期的人口发展计划，以避免类似日本现象的发生。

(6) 宏观经济政策

最后，让我们考虑一下总体宏观经济政策。中国目前还不能像西方工业化国家一样对其财政、货币和商业政策进行总体的微观调整。这个问题在货币政策方面由于规章制度的不健全而尤为突出。

然而，随着中国以创世界纪录的速度发展了几年后（年增长 10% 或更高）通胀的趋势日趋明显。经济部门尝试过采用较为直接的紧缩信贷的办法，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以及一些积极的产业 / 商业政策和一些较为平稳的财政政策，以实现“软着陆”，即稍微放慢增长的速度，更大幅度地降低通胀率。这么做并没有马上见效，也没有逐步平稳地见效，而 1996~1997 年的运行结果看起来非常好，实现了无通胀的持续快速增长的既定目标。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了增长，但是中国目前的状况比东亚的其他国家要好得多。

中国的商业政策运作良好，营造了良好的外汇储备环境，同时对货币的浮动进行了更为直接的控制，使中国能比其他东盟国家更好地杜绝给亚洲经济发展带来极大问题的外汇投机商。^①

这并不是说中国目前已经没有重大的经济问题和困难，但是这些都不是其他经济转轨的国家或其他亚洲国家所面临的纯宏观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在的财力已经能够提供一笔为数不少的资金支持泰国的金融市场。

经济的问题。

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

中国目前也和美国、英国以及一些较小的国家（如挪威、爱尔兰）一样，宏观的经济平衡很好。但仍然存在两个重要问题，主要是微观经济或分配的不均衡与宏观经济的平衡共存。而且，宏观经济的平衡也是近来才出现的。同时还存在着商业周期波动，这种现象在过去的十年中一直在大多数国家中出现，因此良好的宏观经济状况的持久性仍然是一个问题。

美国和英国已成功地将良好的劳动力市场条件成为宏观经济平衡的一部分。在中国，劳动力的有效雇佣还有待实现，尤其是在引人注目的大都市。农业和大型国有企业存在着隐性失业，这两个领域的人们生产效率低下。在一些大城市也存在着公开的失业现象，为了达到更完全的宏观经济平衡，中国必须改善劳动力市场状况。

在分配方面，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当不平衡。沿海地区比内地要繁荣，中国的西部需要加速发展。小型企业和乡镇企业（一些是小型的，一些并不太小）的生产率较为令人满意，利润也比国有大型企业的好，补贴使国有大型企业的低生产率泛滥成灾。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为人类基本需要提供了许多人道的社会服务，这样当然很好。但是，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收入的分配变得越来越不平等。取消中央直接计划后，这种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变化的程度大小而已。“东亚奇迹”的一

个标志是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很平等 带来了经济上的高度民主。高度平等促进了社会和政治的稳定，这些都是短期成就转变成长期行为，使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的重要的基本因素。

1994~1996 年墨西哥出现的困境是由政治的不稳定和日益恶化的经济不平等造成的。这些都是中国需要避免的问题，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别于墨西哥模式。

最近几个月 发生了两件重大的政治事件 即邓小平逝世及香港回归。但迄今为止，这两个转折都处理得很好，实现了平稳过渡。毫无疑问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 必须保持稳定的局势。

基础设施无疑正在得到逐步改善，但是，1978 年改革之初就已经注意到的瓶颈问题——交通、通讯、能源、教育——至今仍然存在。时间过了 20 年，原来的瓶颈问题现在仍然是瓶颈问题，这并不足为奇。问题是，这些方面的阻力依然存在。

中国的经济前景

中国经济在过去近 20 年的高速发展是否还可以持续 10 年、20 年、30 年或更长的时间？无人可以指望 8-10% 的年经济增长率能够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在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增长的速度将会放慢 然而 中国前面的道路还很长 还需要有好几十年的高速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考虑可持续性问题的原因。

对中国经济模式的归纳表明，中国经济将以 8-10% 的幅度

持续增长，通胀率将维持在一位数以内，并且保持良好的外部平衡。而且前面提到的一些问题即使不能消除的话，也将会得到改进。但是除了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的归纳外，从性质方面我们怎样才能评价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呢？

农业已经在以稳步的速度增长，年增长率为 4—5%，但是其增长率比工业和服务业要慢得多。农业对中国将来的经济影响相对较小，但是在近期内，应该不会出现粮食危机。为了保证养活世界上最多的（并且增长着的）人口，必须对农业进行投资，引进先进的技术。这就需要扩大农业的固定资本和人力资本，同时还要保证大量的中间性投入（水、肥料、种子、饲料、农药）。

农业向更高效的方向转变，不可避免地会需要较少的人，剩余劳动力将很可能会离开农业而被其他经济成分吸收，否则将会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这些都是棘手的问题，有待寻求解决的办法。

在某种程度上，乡镇企业在为农村地区提供农业以外的高效生产率方面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乡镇企业生产效率高，发展速度很快。这是提高工业产量、为非农业劳动力提供更多职业的最好途径。

在有限的程度上，经济特区代表着中国经济的一个强大力量。事实已经证明，经济特区过去是将来无疑还将继续是一种成功的做法。它们以自己的实力解决了许多问题，但是它们也导致了另外一种问题，主要是区域大集中的问题。第一代经济特区都靠近港口，大部分是沿海地区受益，然而主要发达地区以外的经济发展需要加大力度。由于出口贸易对特区的产值相当重要，将经济特区设在海运港口是有其利处的，但这并不是根本所在。中国的计划

者们应该考虑毫不犹豫地将一些新的经济特区设在地理上更偏远的地区，改善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基础设施也是中国持续发展的一个综合成分。因此，必须仔细协调好经济特区的选址。同时还要大力发展基础设施，使之成为可以同时解决一系列问题的一揽子事业，指明还需要进行的工作，使经济发展的成熟时间更趋合理，使需求状况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在制定发展规划时，必须明确牢记墨西哥最近的危机，不惜任何代价避免出现类似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1997年其他一些东亚国家已经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虽然势头要缓和一些。

上述问题使人回想起，在1978年，中国刚刚开始进行经济改革时，国际上对此普遍存在关注，也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当时，一支由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及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派出的代表团到中国访问。他们与谷牧副总理会面，开始了经济方面的接触。那次会议极力主张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要谨慎行事，千万别掉入巨额外债的陷阱。当时波兰正处于这种情况，这一局面逐渐向许多发展中国家蔓延，导致了世界性的债务危机。中国并未陷入那种金融困境，并且能够在较健康的经济水平上执行其发展政策。

现在又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中国必须避免墨西哥、韩国、泰国和其他东盟国家出现的问题。这就意味着要谨慎借贷、使用充足的担保、重视外国直接投资、注重与技术更强的伙伴联营、减少被动的证券投资。这些也都是国际政策的重要举措，由此可以使发展沿着良好、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前进。

看起来中国已经将流入的外国资本多样化，使类似墨西哥或

东盟国家的危机在中国不可能成为严重问题。而且，储备充足的外汇，足以对投机商设置难以克服的障碍。外国投资流向、金融活动和汇率完全在控制之下，并能快速采取决定性的行动。香港“圆滑”的国际金融对中国的帮助也很大。迄今为止，港市几乎没有受到东盟国家货币变动的影响。

开放已经使中国受益匪浅，但是如果开放成为一种压抑的负担，我建议中国最好还是暂时将眼光放在国内，直至国外的麻烦都已经得到解决。国内市场很大，有很多可以进行高水平经济活动的空间。现在政府已经采取措施，为将西方国家的大量先进技术技能引进中国扫除障碍。

然而，中国仍应该沿着放开金融市场的路子走下去，在总的趋势上不能走回头路（出现短期的紧急情况时除外）。作为世界贸易、世界金融和世界运输的主要参与国，要解决的问题是建设好基础设施，了解如何才能使开放的经济顺利发展。在初始阶段，要克服加入到瞬息万变的世界贸易和金融活动中遇到的种种困难。这些困难都是现在困扰着东盟国家和韩国的现实困难。解决的办法是继续逐步对世界上这些新地区的其他国家保持开放，在进入一个新阶段之前，首先要清除前一阶段的障碍。这样将会最终达到高度的开放，从而增强可持续性。

在国内市场，中国经济寻求可持续性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是提高生产力水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不断地补贴缺乏利润和效益的大型国有企业。一些人认为私有化是迈向成功的钥匙。这可能起一点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竞争。还应该重新考虑规模的问题。毫无疑问，庞大的机构通常都会变得难以管理，而且效益也

不是最好的。必须对大型生产机构进行有系统的管理，进行市场和财务分析 以便提高生产率。

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必会出现工人下岗的问题。从好的方面说 这样可以使人们到别处从事其他经济活动 但这样也会增加失业的压力 尤其是在城市。这需要通过财政、货币和商业政策仔细作好需求计划，以便吸纳从生产活动下岗的工人。需要有供需管理的技能。可能国有企业的精简机构、提高效益的进程太慢 这并不是说他们必须马上完全彻底改革，那样做很可能导致经济混乱。然而 必须迈出有活力的一大步 使国有企业成为有效益的实体。在建立需求的同时，要完善劳保制度、培训计划和扩大教育，以便吸纳下岗工人。

衡量中国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 的有关问题

中国的经济规模有多大？经济发展速度有多快？这些都是难以确切回答的问题。这不是纯粹的客观描述，而是一个分析上的问题，它会对将来的发展产生重大作用。

我们 1979 年访华团的主要成员之一是欧文·克拉维斯 (Irving Kravis) 先生。在我们访问期间，他收集到了许多价格和商品 / 服务的规定。这些资料对于我们手头的工作来说还是太少——怎样才能将中国的经济与国际上信息交流和衡量技术都比较先进的国家进行比较呢？尽管收集到的资料很有限，却是客观衡量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其他有关方面的第一步 有助于制定政策 评价成

就。

总的来说，采用克拉维斯的方法，以购买力平价汇率为依据，而不是以市场汇率为依据，以某种具有代表性的货币（例如美元）表示的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估算呈上升的趋势，而发达工业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估算则呈下降趋势。当然，以某种不变的货币单位表示的国民生产总值例外。1979 年代表团访华后 我们提交了一份访问报告，报告中附上了克拉维斯先生对中国的预测，这一预测认为，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接近菲律宾的水平，相当于美国的 13%^①。

中国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认为，克拉维斯的预测太高。我就此问题与他进行过多次深入认真的探讨，最终认为可以将他预测的百分比降低一两个百分点（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除此之外，他的预测基本上是正确的。大量廉价的住房以及许多社会服务使这一高预测显得合理。

国际组织继续采用以市场汇率为基础的方法进行预测，并在他们的官方议程中将中国作为非常贫穷的国家来对待。随着 1978 年以后中国统计方面的服务水平提高，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 随着经济改革的步步深入 许多多国组织的经济学家、统计学

克拉维斯 (Kravis) 于 1979 年收集到价格方面的数据。可能于 1980 年又收集到一些补充材料 但是他原来的国民生产总值预测是对 1975 年所作的。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特邀经济学代表团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 (*Report of the CSCPRC Economics Delegation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Washington, DC, 1980, appendix by Irving B. Kravis, "An Approximation of the Relative Real Per Capita GDP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美国国家科学院 华盛顿特区 ,1980 第 64 - 86 页。

家以及官员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开始从发展水平和汇率两个方面进行反思。

按最近的国际价格水平，可以相信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可以达到或超过 2 000 美元，并且其总额将以每年 10% 的速度递增。人均值可以减掉 1.25 个百分点。

克拉维斯对中国作的预测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引起了人们对中国经济潜力的极大兴趣。他的助手，罗伯特·萨默斯 (Robert Summers) 和艾伦·赫斯顿 (Alan Heston) 对中国的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并且根据购买力平价汇率对国际 PENN 表^①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在从 1960 年开始至 1990 年的这段时期内，他们估计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 5-7%。在最近的几年里，他们预测了快速的发展，1995 年预测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美国的 10%。更为有趣的是，他们对菲律宾 1995 年的预测数字是人均 2 622 美元，接近于他们预测的中国的人均 2 823 美元的数字。如前文所述，1980 年克拉维斯结合美国的水准对中国作出了预测，结果是中国与菲律宾的水平不相上下。

关于实际增长，萨默斯和赫斯顿估算 60 年代、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实际增长率在 2-4% 之间。对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估算肯定比很多其他的估算要低，但是要使其发展在 1995 年达到相当于美国的 10% 的水平，就必须在 1990 年以后有迅猛的发展。

正确的观点是，1997 年的《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

^① 国际 PENN 的数据是《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的资料来源。

ment Report) 中估算,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GNP) 总增长率为 9.6%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率为 8.2%。虽然通常情况下都采用 GDP 值 但是《人类发展报告》的统计数据却以 GNP 值来表述这一特定的数字。工业化国家 GDP 和 GNP 的数字分别为 2.5% 和 1.9%。

中国的许多预测都试图说明, 生产的实际总增长 (GDP 或 GNP 保持在 10% 左右 扣除 1 个百分点以考虑人口的增长。但是, 作为目标的工业化国家也是不断变化着的。美国和欧洲的决策者们对 2.5% 的潜在增长率感到相当满意。日本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决策者们很可能会选择 3% 作为他们的潜在增长率。我个人认为, 发达工业化国家的保守的数字是低估的结果。在任何情况下 无论增长率为 2.0-2.5% 或 3.0-3.5% 它都是一个变动着的数字。

假设中国 8% 的年增长速度能保持 30 年——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假设 人均 GDP 将会扩大 10 倍 但是 如果美国 2% 的年增长率保持 30 年——这是一个非常悲观的假设——人均 GDP 将会提高近两倍。如果美国的 GDP 已经至少是中国的 10 倍 显然, 要赶上美国是不可能的。很可能中国的人均 GDP 增长不会达到 10 倍 因为 用国际价格 购买力平价 算出的增长率要比用“自己的”价格计算出的增长率低。例如 根据《人类发展报告》(1997), 1960~1997 年间中国的 GDP 增长率, 按 1987 年美元计算为 5.3% 但是, 按实际购买力平价计算出的同一时期的增长率仅为 3.8% 这就是为什么在做这次比较计算时 认为在 30 年的时间里保持 8% 的人均 GDP 增长率的假设是相当乐观的。

还应该注意到，“自己的”价格实际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法应用于世界上所有国家，用购买力平价作为国际 GDP 的权重得出的国际增长率高于用不变美元市场交换率作为国际 GDP 权重得出的结果。这是因为发展速度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在以购买力平价作为换算因素时，占的份额高于以市场交换率作为换算因素时的份额。然而，中国却是唯一一个按购买力平价算出的 GDP 增长率低于市场交换率算出的增长率的 国家。

显而易见 国与国之间的增长率要么采用‘自己的’价格数据 (可变价) 要么采用购买力平价数据 不变价 进行 而我们假设在进行国与国之间的 GDP 水平比较时 购买力平价是普遍采用的数值。在这方面，赫斯顿、纳舍尔和萨默斯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①

根据 1991 年的一组国际 PENN 表的数据 可惜的是 未包括中国在内)他们作出了全国范围的回归预测：

$$r_3 - r_6 = 2.057 - 0.229 \log(DA) \quad (\text{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 (0.794) \quad (0.102)$$

在上等式中，

r_3 = 采用国内价格权数的人均国内吸收能力增长率

r_6 = 采用国际环比价格权数的人均国内吸收能力增长率

^① 见 Alan Heston, Daniel A. Nuxoll, and Robert Summers, “Comparative Country Performance at Own-Prices or Common International Prices” *Economics, Econometrics, and The LINK*. ed. By M. Dutta, et. al. (Amsterdam: Elsevier, 1995) ,第 345 - 361 页。

DA = 按 1985 年国际价格测算的 1985 年人均国内吸收能力

结果表明,一个国家越繁荣(即 DA 的值越高)其采用国际权数算出的增长率就要比采用国内权数算出的增长率高。换言之,对较富裕的国家来说,采用国际 PENN 表的数据算出的增长率比采用自己的价格权数算出的增长率高,而对较贫穷的国家则相反。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像中国这样的较贫穷的国家(按 1985 年国际人均吸收能力数值测算)在赫斯顿和萨默斯的计算表中显示的增长率比采用国内价格计算出的增长率要低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这与我们进行水平测算而不是做变化率预测时正好相反。^①

在评价中国 GDP 数字时还要考虑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对质量的公正评判。毫无疑问,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GDP 所含的货物及服务的质量已经得到了大幅提高。步几个发达工业国的后尘,中国应该提高发展水平或降低物价上涨水平。众所周知,美国和其他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基本价格指数夸大了通胀率,因此实际的增长率应该高于公布的数字。中国的情况也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生产力的提高也可能被低估了,因为服务业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服务业的生产力是难以估量的。如果这些棘手的问题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我们将可以更好地描绘出一幅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经济情况在统计上的全景图。

(刘志慧译)

在上述引用的赫斯顿、纳舍尔和萨默斯所著一章中,有一段就等式结果进行文字说明的编者按。

中国自改革以来的发展之谜

苏耀昌 张恒豪

编者按 苏耀昌(Alvin Y. So) 社会学教授。1982 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博士,先后担任美国夏威夷大学的社会学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自 1998 年起任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社会科学部主任并担任《当代发展分析》、《当代社会学》、《亚洲概览》等国际学术杂志编辑委员会编委等。主要著作有《华南的丝区:地方史的转变和世界体系理论》、《社会变迁与发展 现代化与世界体系理论》、《亚洲与世界经济》(合著)《比较视野中的亚洲环境运动》等。张恒豪(Heng-Hao Chang) 美国夏威夷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

本文认为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在改革过程中都没有能够解决根深蒂固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领导的改革却既能稳定地掌握政权,又能成功地促进社会由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作者以五种因素来解释强大的共产党领导与市场经济模式同时存在这个中国的发展之谜。这五种因素包括 历史遗产、改革次序、海外华侨、时机

和亚洲地区背景以及安抚社会力量。最后，文章探讨了中国的发展能维持多久，以及中国发展之谜能否在亚洲其他地方重演的问题。

1990年代初期，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相继瓦解或失势，共产主义思想也受到质疑。自由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许多国有企业都卖给了私人或外国投资者。在西方国家，这些现象被颂扬为冷战结束后时代的资本主义的胜利。

然而在中国，共产党不仅承受了来自下面和内部的挑战而继续执政，更有能力促进市场经济蓬勃发展。首先，中国共产党抵住了1989年事件的挑战，尽管在1990年代后期，不同政见人士的活动有所增加，但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依然十分稳固。

第二，中国共产党承受了来自外部的挑战。1980年代初，当英国拒绝将香港交还时，中国共产党在主权问题上立场强硬。在进行了两年多的激烈谈判之后，英国最终被迫于1984年与中国签署联合声明，并在1997年将香港主权顺利地交还给了中国。此外，1990年代初，当香港末任总督彭定康在未事先告知北京的情况下，尝试推行自己的政制改革方案时，中国共产党极为愤怒。中国在香港的政制改革事件上立场再度强硬，并因而与英国进行了半年多的激烈谈判，最后声明于1997年7月1日，主权回归当日，废除彭定康的政制改革方案。香港事件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掌握政权，更强大到足以从英国的手上收回香港主权。

第三，中国共产党在统一问题上态度积极。自1978年起，中国共产党便提倡以“一国两制”的模式来与台湾国民党讨论国家统

一问题。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在外交上孤立台湾政府，并阻止台湾重返联合国。1996年初在台湾举行第一次“总统”选举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台湾海峡进行了导弹演习，用以警告国民党不得与美国发展任何正式关系及不要支持台湾独立运动。

最后，中国共产党承受了来自党内的挑战。1997年初，当中共元老邓小平逝世时，分析家都担心中国会出现政权交接危机。然而，中国共产党顺利地把领导权从开国元勋过渡到年轻一代的科技专家手中。1997年秋天的第十五届党代表大会使以江泽民为首的集体领导层的地位更加巩固。由于有一个团结的领导层，中国共产党应可领导中国进入21世纪。

总而言之，与东欧的共产党不同，中国共产党承受住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统一问题上态度积极并能够建立一个团结的领导层。然而，中国共产党与东欧共产党最大的区别是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使中国发展出蓬勃的市场经济。

虽然东欧和苏联（俄罗斯）在1980和1990年代一直处于经济衰退之中，但中国在同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却相当可观。在1978-1994年期间，平均每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超过9%。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6810亿元人民币增加至1994年的29350亿元人民币（以1990年的价格计算）。1990年代初，世界银行认为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迅速的地区。经济学家的情报部门（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预计，尽管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中国在1997年、1998年和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可达到9%、8%和8.5%的大幅增长。^①

^①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1997, "Country Report: China, Mongolia".

在社会指标方面，中国国民的人均收入由 1979 年的 316 元人民币增至 1995 年的 3 893 元人民币（11.3 倍），平均工资由 1978 年的 615 元增至 1995 年的 5 500 元，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为 4.4%。在粮食消费方面，中国城市居民用于购买粮食的支出，在 1995 年，只占收入的 50% 以下，而在 1978 年则是 57.5%，因而有较多的收入可用于购买其他日用品和服务。^①基于上述那些大有希望的经济数据，瓦尔德（Walder）指出：“中国看来像是一头全速奔跑着的东亚猛虎，而非一只在过渡期的泥沼中蹒跚而行的苏联式恐龙。”^②

令人惊讶的不仅有经济的高增长率，更有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自 1978 年以来，有几个指标可以显示中国正在发展市场经济关系。首先，农村废除了公社制度。农民家庭分得耕地，还要自负盈亏。政府鼓励农民把农产品拿到乡村集市出售，鼓励他们从事农村工业或到邻近的乡镇企业中找工作。结果，有些农民脱离了土地。过剩的农民，成了本地乡村工厂和附近小城镇企业中挣工资的劳工。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涌入深圳、广州等大城市，成为“流动民工”。如同世界上其他大城市一样，中国的城市第一次出现大规模的“绝对贫民”，因为这些“流动民工”只能够找到计件工作或临时工作，收取很低的工资，并且居住在恶劣的环境中。

第二，私人企业和集体企业都有所增长。城市居民如果不能在国家部门中找到工作，就被鼓励去建立自己的私人企业。国有

^① China Development Briefing, 1997, “Social Indicator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② Andrew Walder, 1996,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Interpreting its Significance*.

和集体企业也被要求将没有利润的业务交给私人企业承包。然而私人企业有时会登记为乡镇企业(所谓戴“红帽子”)以便享有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特权。另一方面,一些农村干部则成立自己的私人企业,挪用公家税款作为私人收入。在1990年代初,工业产量有一半并不是由国有企业生产的。^①

第三在国有企业中,有越来越多的劳资关系。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生产力,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下的企业改革:减少国有企业的冗员和逐步以合同制来取代终身雇用;引进劳务市场,减低国有企业工人的津贴;废除八级工资制来扩大薪级差距;赋予管理人员更多权力以将党和管理层分开,同时要求企业自负盈亏。工作时间的纪律收紧了,也不再有所当然的社会主义福利。因此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开始雇用农村外出劳作的临时工(没有职业保障和津贴)以节省开支。^②

最后,专制的工厂管理制度被移植到中国的外资和私人企业中。陈氏指出,亚洲人投资的外资公司中存在着使人回想起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劳资关系。工人被迫每天工作10-12小时或更多,没有周末休假。以4小时为一更,除了在已安排好的一两分钟内上厕所外,工人必须不停地以使人喘不过气的速度来执行重复而无技术的工序。他们的工资极低,工作环境恶劣而不安全,

^① Andrew Walder, 1996,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Interpreting its Significance*.

^② Dorothy J. Solinger, 1995, "The Chinese Work Unit and Transient Labor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Modern China* 21: 155-183

^③ Anita Chan, 1995, "The Emerging Pattern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China and the Rise of Two New Labor Movements", *China Information*, 9(#4): 36-59.

工伤事故比率很高。众所周知，有些韩国人和台湾人投资的企业把工厂当军营运作。工人早上上班要出操、立正，在工作地点和宿舍里要服从严格的纪律。

目睹中国经济在过去 20 年的巨变，读者不禁会为中国之谜提出以下的疑问：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抵得住来自下面、外部和内部的挑战，而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在 1990 年代初则全部被推翻？当苏联、俄罗斯和东欧的经济迅速下滑时，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却能够促使私营经济和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为什么中国在发展私营经济和市场经济时没有释放出足够的政治力量来破坏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中国之谜可以在亚洲其他地区重演吗？换句话说，其他东亚地区的共产党可以学习中国的经验而延续他们的统治并发展市场经济吗？最后中国之谜会持续多久？在 21 世纪，中国共产党会不会仍然握有统治权？中国的市场经济会不会依然蓬勃发展？

为了解释强大的共产党和蓬勃的市场经济发展这个中国之谜，我们首先要审视以下五种因素：历史遗产、改革次序、华侨、时机和亚洲地区背景并存及安抚社会力量。然后，我们会论及中国之谜可不可以在亚洲其他地区重演，并得出结论：中国之谜可以维持多久。

历史遗产

经常有人指出，中国的共产主义试验是一场灾祸。1958 年的反右运动导致知识分子和社会科学家的异化。1950 年代后期的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引发了饥荒，并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死亡。十年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社会完全颠倒并使中国处于无政府状态。从这些景象来看，中国的现代化是从 1978 年邓小平上台才开始的，实用主义者很少注意毛的激进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因此，邓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英雄，而毛则需要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第一个阶段的经济落后和政治混乱负责。

然而 以上的论述遗漏了一点 目前共产党能够成功壮大 经济能够蓬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遗产。尽管有很多缺点，毛为中国近期的发展留下了以下的有利条件。

首先，毛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政治上的可接受性。大多数的东欧共产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外面移植的，而毛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则是一个进行过多年革命战争的本土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高级领导人都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击败日本帝国主义及在 1940 年代后期击败国民党而取得政治上的认可。毛的民族主义使命，土地改革政策和工人阶级领导计划在社会上获得知识分子、农民和工人的广泛支持，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可以在 1950 年代将社会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即使在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后 农民和工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依然强烈 因此 中国共产党在 1978 年提倡‘实现四个现代化’时没有受到多大阻力。

第二，毛为中国共产党留下了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毛泽东建立了一个列宁式的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政府，将权力集中在共产党手中。只有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倡的政治组织（如农民协会和工会）才可以活动；其他组织不是无法称职地运作就是被禁止活动。党的权力可以由上至下、事无巨细垂直地和水平地伸展到中

国社会每一个角落。从这方面来看，这个列宁式的政府的权力十分巨大。由上至下，这个政府是第一个可以将政治控制施行到乡村、家庭和个人层面的中国政府。事无巨细 政府的功能膨胀了很多 不单是收集税款和维持社会秩序 更负起了教育、医疗保健、婚姻、文化、经济策略等项功能。1978 年以后 虽然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不再是列宁主义的，但它继续以强大的一党专政的政府的运作模式来推行现代化政策。

第三，毛留下了很多必要的乡村基础建设和地方机构来实行经济改革。在毛泽东时代 政府修筑了大量的水库 强化了灌溉系统 改进了排水网络。在大跃进期间 中国共产党动员了数百万农民为人民公社修筑水坝、水库和大规模的灌溉系统。也是在毛泽东时代 不少人民公社成立了乡村工业和企业 地方官员接受培训去经营这些工厂，而地方政府也被要求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毛式人民公社及权力下放的政策为开发地方资源、培训地方领导和唤起地方积极性提供了渠道。如果不是有了这些在毛泽东时代修筑的基础设施和建立的基本制度 农业生产率在 1980 年代初能否那么迅速地增长 以及从 1978 年来，乡镇企业能否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肩负起主导作用，都将成为疑问。

第四 毛泽东时代的‘自力更生’政策使中国在改革前经济上并无负债。在促进国家发展方面 毛强调的是一个‘自力更生’的模式 强调国家要自立 认为贫穷并不可怕 白纸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动员群众加入劳工密集工业，而不是依靠外国的支持（如苏联的援助、技术和专家），因此 当中国共产党在 1978 年开始经济改革时，中国几乎完全没有外债。与东欧国家和苏联形成

鲜明对照的是 中国不需要把大量资源用于偿还外债 中国也不需要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些条件苛刻的解困方案来支撑经济。

最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留下来的落后经济也造就了 1970 年代后期经济改革的 优势。正如瓦尔德指出的，在改革初期 75% 的中国就业人口从事农业生产，而苏联则有 75% 的就业人口从事工业生产，因为苏联已经是都市化了的工业社会。因此，苏联的经济改革必须依赖工艺和组织结构方面的革新来加强城市的工业生产力。另一方面 由于中国仍然以农业为主 中国共产党仅需要把部分劳动力由农业生产转移到工业生产，用于提高生产力 就可以达到高速的增长。

改 革 次 序

改革的次序是重要的。苏联在未推行经济改革前先进行政治改革，并希望民主化可以为共产党带来必要的支持以克服经济改革的阻力。苏联的改革主要是在城市地区进行，原因是农村存在着很多根深蒂固的问题。然而，政治改革不经意地释放出新的反共产党的政治力量，城市动乱最终导致苏联的共产主义政府垮台。

相对而言，中国共产党在推行政治改革前先进行经济改革。1970 年代后期，人民公社制度被废除，而农民也被要求自谋生路。1980 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尝试推行企业改革以增大管理人员的权

① Andrew Walder, 1996,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Interpreting its Significance*.

力。1980年代中，中国又开放 14 个沿海城市来吸引外国投资。虽然在进行改革期间，中国共产党对不同政见表现出较大的容忍度 给予中国人更多自由并允许在乡村进行地方民主选举 但中国共产党仍没有推行任何重大的政治改革，如允许在省和全国的层面上进行多党派选举。结果 中国共产党仍是一个强大的政党 无须与其他政党分享权力，也无须担忧民间社会的激进民主声音和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由于没有政治改革分散注意力，中国共产党可以集中精力在经济层面上推行现代化。

此外，首先在农村进行经济改革对中国共产党也是有利的。农村改革远没有城市改革那样复杂。1970年代后期 中国共产党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鼓励农民生产商品农作物和乡村工业产品，并允许农民到附近的市镇和远方的城市去工作。在农村改革中取得成果之后 中国共产党在 1980 年代处理复杂的城市改革时更有信心。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农村的劳动力出现过剩 从而为城市的工厂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再有，中国共产党在引进经济改革时采取了渐进的方式。麦克米兰 McMillan 与诺顿 Naughton 曾指出“改革是以试错法来进行的 时常在中途进行纠正和政策逆转。换句话说 经济改革一开始并没有一套完整的计划，而是在改革过程中不断进行调整。中国没有迅速跳向价格自由、货币自由兑换，或者削减国家补贴；国有企业也没有被快速出售和大量私有化。”^①中国共产党实行的

^① McMillan John and Barry Naughton. 1992. “How to Reform a Planned Economy”.

渐进方式与东欧为希望尽快消除中央计划经济而实行的“大冲激”和“震荡疗法”非常不同。正如瓦尔德的评论指出的，“在欧洲震荡疗法和大量的私有化的部分目的是消灭共产党，剥夺以前共产党的权力和特权 而在中国 渐进的改革的目的是让共产党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件工具而继续存在。”^①

华 侨

在东欧 宗教冲突和国家冲突造成了种族分裂 并导致种族暴乱和种族分离成为高度爆炸性的问题。少数民族地区频繁的叛乱削弱了共产党政权，最终导致这些政权逐一垮台和苏联的全面瓦解。

然而 在中国 民族特质对经济发展是有价值的资源 而不是政治不稳定的来源。在 1978 年前 华裔资本家在香港、台湾、新加坡及海外华侨社区中成长起来。当中国共产党在 1978 年对外国投资采取了开放政策之后，大部分的外国投资和对外贸易都来自香港。到了 1980 年代末期，台湾成为中国大陆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投资者。在 1990 年代，东南亚华侨企业家对与中国进行贸易和到中国投资明显富有兴趣。^②

香港和台湾的华裔资本家在中国南方非常活跃，因为大多数

^① Andrew Walder, 1996,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Interpreting its Significance*.

^② Harry Harding, 1993, “The Concept of Greater China: Themes, Variations, and Reserv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136: 661 - 686.

华侨都来自这个地区。华裔资本家利用以前的社会联系，如同学、同事、同乡和亲属等关系，省却商业交易上的麻烦。最早期的华裔资本家主要是利用自己原籍乡镇的亲戚关系。后期的华裔资本家则经常通过先前已经在那里建立了生产基地的朋友的推荐而被介绍到投资地点。一旦在中国南方建立了社会“关系”，就可以利用这些“关系”而获得引见地方官员的机会，避开低效率的官僚主义，并解决材料缺乏的问题。

尽管美国的跨国公司经常谴责中国大陆的贪污腐败，华裔资本家却习惯于通过所谓“礼品经济”的活动来结识和加强社会联系。这种礼品交换可以采用物质形式（例如进口香烟、衣服、高价海味、法国美酒、宴会和卡拉 OK 聚会、腕表、计算机、电视等），也可以采用服务形式（为官员的亲友找工作，安排他们到香港旅游，资助他们的孩子到美国留学，或者捐助乡村计划如建筑学校等）。传统中国节日为大量送礼提供了借口，礼品的价值是根据受礼者的官阶和公司对他们的信赖程度而精心选配的。一旦中国官员收了礼品，他们就欠了送礼的华裔资本家的人情而需要有些表示，以恢复送礼者和受礼者之间权责上的平衡。其后，华裔资本家可能收到一些信息作为“回报”，例如他们应该找谁提出要求才会有用，或扩大生产和商业管理的合作，或在与地方官员谈判投资事项时可以更快有结果。

通过礼品经济和信任，中国地方官员与华裔资本家之间发展出主客关系，使后者可以绕过中央政府的规定，也可以避开地方政府对生产活动的干扰。李青宜（音）在一篇有关深圳工厂的实地研

究报告^①中指出 地方政府在选择生产和投资项目时 完全着眼于“客户”至上。因为村书记与该工厂一个高级管理人员有亲戚关系 从而为避开官方对工厂管理的限制提供了许多方便。例如 虽然官方有禁止雇用‘外省’民工的规定 负责执行这一政策的劳动局官员都避免使这规定成为一条绝对的规则。其他许多生产要素的成本 包括土地租金、付给劳动局的劳务合约费和付给村委会的处理费，都可以灵活谈判。在那里，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对口的人”。通过礼品经济和客户至上 华裔资本家得到高度自主的管理权将他们认为合适的政策加之于工人身上。

中国地方官员也会主动改善电力供应、公路交通和港口设施，确保华裔资本家可以感觉到官员的殷勤和诚意。中国地方官员在执行一些诸如劳务规则、外汇政策和关税等事务时 对华裔资本家都作出较有弹性的处理，因为这种偏袒的取向可以辩称是向台湾和香港的人民发出民族统一的呼吁。假如对西方商人采取同样的偏袒态度，地方官员就会被指责为出卖国家利益。

时机和亚洲地区背景

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计划得以成功，除了得到华裔资本家的支持外，还因为它发生在恰当的时机和恰当的地方。当苏联在

^① Lee Ching-Kwan, 1993. "Engendering the Worlds of Labour: Women Workers, Production Politics, and Workplace Culture in the South China Economic Miracl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n Gender Issu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ies, Miami, August 11 - 12, 1993.

1990年代发展市场经济时，东欧正处于经济衰退期，相反，当中国在1970年代后期开始致力于发展市场经济时，东亚地区正处于经济转型期。

在1970年代后期，当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南韩的经济地位已成长为新兴工业经济，他们逐渐失去了美国给予的地理政治优惠，他们也必须要面对较早前美国已向日本实施的贸易限制（关税、配额、汇率上升），此外，由于经济繁荣，区内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劳资纠纷增加、土地价格上涨和环保争执——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东亚新兴工业经济的生产成本上涨。因此，为了确保可以稳定地获得廉价而听话的劳工供应，东亚新兴工业经济迅速将他们的生产网络扩展至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结果，在生产和销售的管理上，东亚、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之间产生了一个复杂的分工系统。

由于时间上和地理上的贴近，中国共产党可以在东亚新兴工业经济进行重组和重新部署时取得利益。中国和亚洲新兴工业经济在经济上的整合可以说是互补性的，因为双方都可以在这种整合中获益。这种经济上的互补可见于香港在中国大陆的投资。以“外包加工”的形式，香港资本家负责提供机器、材料、技术、产品设计和销售服务，而中国的伙伴则负责供应厂房、劳工、水电及其他基本设施，并根据香港的设计来装配这些产品。香港资本家付给大陆合作方以“加工费”，包括中方所付出的工资和上述花费。

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看来，香港商人的流水作业式工业可以协助解决中国严重的失业问题，而从香港输入的原材料也可以协助舒缓中国大陆市场上原材料短缺的情况。更有甚者，透过这样

的联系，香港已经逐渐变为中国大陆的服务中心。香港已发展成大陆在贸易和投资上的助理人（或者中间人），负责向中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渠道，充当中国贸易的一个接触点，为中国的贸易现代化提供集资途径，担当技术转移的传送管，也提供了一个训练场地，以便中国可以在市场环境中学习和训练利用资本的技术。

社会力量的安抚

尽管中国共产党成功地促进了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为什么市场力量没有释放出社会力量来挑战，甚至推翻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呢？中国共产党仍然宣称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

经历了 20 年的市场经济之后，1990 年代后期，中国涌现了许多新的社会活动者和民间组织。这些新的社会活动者包括私人企业的拥有者、雇主、经营者，以及那些在外资和私人企业中工作的雇员和劳工。比起毛泽东时期，这些新的社会活动者在改革年代享有很多的自由和自主，主要因为现在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这个口号：“通过个人的努力而致富是光荣的。”随着这些新的社会活动者的出现，沿海省份涌现出许多新的半自主的社会组织，例如私人企业协会、企业拥有者民间协会、工商业地方联合会等等。这些新的社会组织对扩大不同的社会单位和个人的联系和联盟很有帮助。

然而 尽管出现了这些新的社会活动者和民间组织 中国的商业政治仍未要求民主的形式。在 1989 年事件期间 万科 (Wank)

发现大多数接受采访的商人对于学生运动都显露出不安。^①商人对学生运动通常的反应是学生的要求太多、太快。商人支持一个有秩序的政治改革而非在混乱的情势下，受公众压力而施行的政策急转。商人担心学生的民主抗争会导致政府对市场经济活动严加限制，从而损害了他们的商业利益，也破坏了官僚机构对他们的保护。商人争辩说，学生的反贪污腐化运动会将地方层面的商人（如他们自己）置于最困难的境地，由于他们没有高层人士撑腰，他们对官员的贪污腐化无能为力。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也意识到这些新近冒出的商人的潜在势力。于是便以共同负责制的名义，安排这些新的商业协会成为社团组织的一分子，以便可以维持对商人的控制。这个共同负责制的架构的本质是使国家在哪些商业协会可以正式成立，以及哪些商业协会可以得到官方嘉许的问题上有最后的决定权。例如在厦门，当一些企业想成立一个新的厦门私营工商业协会的民间组织时，市政府宣布这个协会为非法组织，因为市工商局已经成立了由它监管的个体户协会。由于已经存在了这个官方的个体户的“民间组织”，市政府难以接受有另一个同类型的民间组织成为它的对手。^②

为什么商人阶层没有就政府压制民间组织进行抗争或反击？这是因为中国的商业活动全都是通过政府机构来调控的。商人阶层采取了关系、礼品经济和客户至上的手段与地方政府结成联盟。

^① David L. Wank, 1995. "Private Busines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Alliance in a Chinese City",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33: 55-74.

^② 同上书。

在考虑到地方政府几乎全面地控制了经济这种实况之下，官商联结可以被看成是商人阶级在生存与自卫上务实的政治智能。私营商业享有的空间是由地方政府‘决定下来’的，而商人也必须知道他们的政治界限。另一方面，商人采取了客户至上的手段来与政府官员打交道，以便在企业的管理上取得高度的自主权，而不是向政府的权威挑战。因此，客户至上使商人可以在中国南方再次采用 19 世纪专横的工厂管理制度（例如无酬的超时工作、无礼、咒骂、克扣工资和分红、随意解雇、搜身、不提供医疗或工业意外保险、禁止工会组织）尽管中央政府已经订立了规则以保障中国劳工免受资本家的虐待。

总而言之，虽然市场经济的动力已经使中国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活动者和民间组织，这些新生的市场势力对与地方政府机构合作的兴趣比改变它更大。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地方政府没有为市场的动力所削弱，因而它们实行了‘共同负责制’来监管民间社会，吸纳新生的社会力量进入现存的政府机构以维持政治秩序和促进经济发展。

中国之谜能否在亚洲 其他地方重演？

1970 年代后期，东欧各国和中国的共产党都盘算着经济改革的问题。在实行中央计划经济多年后，各国共产党在开展经济改革之初都面对着类似的经济难题：原材料和消费品匮乏、资源浪费、生产力疲弱、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出口业绩不佳等等。它们也

面对着民间社会要求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日益升高的呼声。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因无法解决这些经济和政治问题而被迫下台，但中国共产党则不单能保有统治权，更能促进市场经济蓬勃发展。

本文的目的是要说明这个由强大的共产党统治而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中国之谜。本文认为中国之谜是五种因素的产物。首先，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政治上的可接受性，强大的政府，扎实的乡村基层组织，有效率的地方机构和无负债的经济状况来推行‘四个现代化’的计划。毛遗留下的农村经济也使经济改革比较容易成功。第二，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改革上采取了渐进的方式，而不追求‘大冲激’开始时先进行比较简单的农村改革，然后才处理复杂的城市改革，而且在经济改革时没有将中央政府民主化。第三，中国共产党也得益于华裔资本家的关系网。大部分的外国投资都来自华裔资本家，他们凭借亲属关系和社会联系在中国做生意。华裔资本家也产生出‘礼品经济’并与地方官员建立了主客关系，因而克服了官僚主义的障碍，也得以完全自主地在他们的工厂内实施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第四，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改革的时机和地区环境都很有利。中国的改革是在 1970 年代后期开展的，当时东亚新兴工业经济正进行工业重组和重新部署。结果，香港、台湾和韩国的资本家把劳动力密集工业转移到中国，并且在合作计划中与他们的中国伙伴分享资本和管理技术，将中国引入全球的生产和销售网络中。最后，由于中国共产党仍然掌握着一个强大的政府，它不仅有能力推行改革政策，更有能力将新的社会力量（例如雇主协会）融入政府的运作体系中。结果，中国的民间社会仍是紧紧地控制在中国共产党手中。

上面所述的中国经验可以在其他地方重演吗？其他亚洲各国的共产党（北朝鲜和越南）可以仿效中国的模式吗？在刚开始时，其他亚洲共产党政权大都像中国一样享有历史的遗产。与东欧的共产党不同，北朝鲜和越南的共产党都经历过几十年的革命战争，而对共产党统治的认可在民间也很牢固。他们也建立了强大的政府 组成了实用的乡村基层组织和严密的地方组织 也享有相对无负债的经济。因而，北朝鲜和越南的共产党政权也拥有有利于发展市场经济和使国家富强的条件。

至于中国改革的次序，其他亚洲共产党很容易便可以照办。在目睹苏联的失败之后，越南和北朝鲜是否采用‘大冲激’的模式和民主政策作为改革的方针，实在值得怀疑。另外，其他亚洲共产党也可以仿效中国的共同负责制的经验来安抚由市场经济发展而衍生的新的社会力量。从这方面来看，亚洲共产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将不采用自由市场经济的形式，而采用由共产党控制的“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形式。此外，其他亚洲共产党也可以借用中国的华裔资本家关系网的经验。在投资和贸易上，北朝鲜可以求助于韩国、美国和日本的资本家，而越南则可以求助于越南裔的中国和美国资本家。

然而，其他亚洲共产党却不能重获中国共产党在改革上的时机。在 1970 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抓住了亚洲工业重组的黄金机会而把中国融入全球的生产和销售网络中。北朝鲜和越南的共产党则难以做出同样的事，因为在 1990 年代后期，当他们再尝试将经济融入到全球的经济体系时，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在这段经济困难时期，东亚新兴工业经济，或者那些朝鲜或越南裔的资本

家，是否会愿意到北朝鲜和越南进行投资和技术转移，还是个问题。因此，其他亚洲共产党的经济改革的前景将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改革那么有希望。

中国之谜可否持续到 21 世纪？

中国之谜可以持续多久？在 21 世纪 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掌握政权并且促进蓬勃的市场经济发展？尽管仍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并有高速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并非没有严重的问题和挑战。首先，中国共产党还需要订立一个计划来处理大量亏损的国有企业。每三至四年，中国共产党都要发出让亏损的国有企业破产的呼吁 然而 破产的威胁和解雇数百万国有企业工人的行动从未彻底执行过，因为中国共产党不希望冒工人罢工抗议和政治不稳的政治风险。例如，1998 年朱镕基接任总理时 他曾尝试加快企业改革和解雇国有企业工人。然而，当工人的抗议浪潮蔓延至全国各地后 有迹象表明 政府官员正尝试放慢把国有企业出售给私人商家的速度。^①虽然中国经济的动力主要来自城市私人企业和乡镇企业，中国共产党仍需要找出处理国有企业改革的办法。

第二 1990 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一项挑战。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 外国投资和出口将会下跌 导致中国经济放慢，失业增加。为了保持在亚洲和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

^①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30, 1998.

中国共产党可能被迫使人民币贬值，从而增加了进口商品的价格并使人民的生活较为困苦。由于要争夺不断收缩的资源，各种冲突可能会不断强化。

第三，虽然中国共产党已成功地将新的社会力量融入政府的体制中并推迟了民主改革，但这些政治问题一旦与失业和企业破产等经济问题连在一起就会变得更具爆炸性。此外，美国一直利用人权问题作为谈判的筹码，试图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而民主的风气也可能从台湾扩散到大陆，使地下的中国民主运动复苏。从这方面看来，中国共产党似乎不可能将政治改革无限期延后。

中国之谜是否会持续到 21 世纪？这主要看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国有企业改革、亚洲金融危机和民主化等问题。中国共产党自 1978 年以来，已成功地处理过来自下面、外部和内部的挑战。照此记录来看，中国共产党似乎有能力继续保持政权并促进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然而，如果中国共产党想在 21 世纪继续扮演关键性角色，它将需要把政府体制转为邻近的东亚新兴工业经济的模式，例如实行更多的价格调控、外汇管制、规范国有企业的出售并在工业规划中起更积极的作用。如果中国共产党听从世界银行的劝告而将经济自由化，将政治制度民主化，中国之谜就会很快结束。

（钟少凤译）

中国的开放政策在能源领域 获得成功的原因

劳伦斯·塞斯

编者按 劳伦斯·塞斯 (Lawrence Saez), 1999 年获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 现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讲师。美国政治学学会、美国亚洲研究会等学会会员, 主要从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比较研究。有《南亚的人权与伦理发展》、《民主的多元化》、《亚洲国家政府的权力分散化》等论文发表。

本文是作者为本书所写的专题分析报告。他着重分析了中国的外资战略以及把外国直接投资引向能源基础设施领域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包括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适当的融资结构、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和海外华人社会的可靠投资等。

当代新古典经济思想的基本信条之一认为, 政府导向的发展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必然是低效率的。自从冷战结束以来, 国际开发机构已在鼓励前指令性的和混合型的各国经济放弃政府导向的产业政策, 而代之以寻求从短期稳定到与长期财政结

构改革相联系的一揽子宏观经济调整，以促进经济自由化的实施。不过在结构调整过程中，政府的重点从最初为产业增长而引导内部发展逐步转变为促进消费品或服务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令人困惑的是，在低收入国家中，既能使经济自由化又能实现争取外国增加基础设施直接投资目标的国家非常少。另一方面，有些在经济自由化方面采取较具限制性政策的国家，却能够增加或引导外国直接投资流向基础设施领域。没有哪个国家能比中国的开放政策更成功地体现出这种矛盾之处了。

尽管一直存在着结构上的障碍，中国在最近五年里却持续吸引了大量的各种外国直接投资。1995年，中国获得了38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而且，中国政府在努力吸引基础设施领域，特别是能源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尤其引人注目。中国在引导外资投向能源基础设施方面已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外国公司在该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自1990年以来，能源领域的外资占了能源总投资的1/3多。而且，外国合作的这种水平看来还会提高，因为朱镕基总理最近宣布了一项基础设施领域，尤其是能源领域，利用8000亿美元的计划。

在本文中，我将通过检验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文献来演绎我的分析。这些文献提供了关于政府在公司投资决策中的作用的两个与直觉相左的观点。首先，中国的情况看来证实了这样一种推测，即有关政治制度类型或政府政策对一个公司在某一国家的消费品或服务部门进行投资的决策而言主要是外生变量的看法。同时，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理论文献也指出，政府政策对增加基础设

施项目中的外国直接投资起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的情况证实了这后一观点。我把中国的成功之处归纳为三大因素，即：富有中国特色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结构，以及来自非内地居民社会的投资作用。

是形成中的市场还是发展中的国家？

在探讨决定外国直接投资因素的各种方法中，被认为最有影响的学派是纯新古典的方法。纯新古典的方法是建立在完善市场的假设之上的，其关键的前提是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将会使世界的产出达到最大化。小岛 Kiyoshi Kojima 是一位纯新古典方法的主要倡导者。他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关键决定因素是（给定要素禀赋条件下）利润的最大化和预期收益率。^① 小岛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应来源于投资国不具比较优势的（或边缘的）产业（或活动）而该项产业在东道国则是潜在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其他有关外国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有影响的模型是建立在市场不完善的假设之上的，其中之一称为“内部化或寡头垄断理论”。内部化或寡头垄断理论认为，公司获得的相对于东道国公司的垄断优势是决定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个关键因素。这一观点的一些倡导者如鲁格曼 (Alan Rugman) 认为“由跨国公司进行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表明，公司是通过使其优势内部化而非通过特许使其

^① Kiyoshi Kojima, “Macroeconomic versu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pproach to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Hitotsubashi Journal of Economics* 23 (June 1982):2-19.

外部化来获取利益的。例如，巴克理 (Buckley) 和卡森 (Casson) 认为对于关键的中间产品公司乐于用它们自身的内部市场代替外部市场。鲁格曼把公司的行为概括为‘跨国公司’从事的是具有内部化的外部性的经营。^①按照鲁格曼的看法，跨国公司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是由‘产品和要素的外部市场的失效和不完善’引起的一个内部市场。最后，外国直接投资的扩大被认为与一家公司的净所有权优势有关，要使外国企业在要素投入方面的那些优势达到最大化。这一被称为折衷理论的观点的主要倡导者是邓宁 (J. H. Dunning)。顾名思义，外国直接投资的折衷理论是其他研究外国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各种方法的综合结果。按照邓宁的观点，外国直接投资的三大要素之一包括某公司相对于其他公司的所有权优势。邓宁认为“拥有所有权优势是外国投资的一个必要前提”；^②而公司则会发现直接利用这些优势比把它们出租或出售更为有利。最后，邓宁还认为必须有一个利润优势，这种优势通过延续除国外一种要素投入外的前两种因素使在当地生产比向东道国出口更能获取利润。

有关外国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新古典文献中还有其他一些内容，关注其他一些变量，其中最重要的是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这是一个已被认为对进口替代型的外国直接投资尤为重要的因素。^③

① Rugman, “Internalization as a General Theory,” p. 376.

② John H. Dunn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London: Allen & Unwin, 1981), p. 32.

③ Anthony Scaperlanda and Laurence Mauer, “The Determinants of US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EEC,”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9(1969): 558 - 568; John H. Dunning, “The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Oxford Economic Papers*, 25 (1973): 289 - 336.

类似地，要素价格如工资和资本成本已被认为是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此外，其他一些经验研究已表明，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依赖国外产值，并与国内利率呈反向关系。最后，有些研究已扩大了决定公司从事外国直接投资决策的变量的范围。例如，罗尔夫 Rolfe 等人发现，一个外国投资者的偏好包括范围广泛的衡量标准。这些标准与公司规模、市场导向（出口还是内销）、投资类型（新投资还是扩资）及产业类型（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投资）有关。纯新古典方法的这些不同内容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看法，即东道国政府的政策会产生市场的不完善，这会使外国直接投资变成一种国家的经济策略选择。然而，这些市场的不完善性会鼓励还是阻碍这类外国投资是不确定的。在 1970 年代，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的经典论述对政府政策与公司国外投资决策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问题作了较为清晰的探讨。25 年后，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文献仍在试图确认政府鼓励措施与公司在某个国家的投资选择之间难以捉摸的关系。按照布鲁尔（Thomas Brewer）最近的一个研究结果，公司对在某个国家进行投资选择的反应可以与预料的有所不同。例如，布鲁尔认为有选择的自由化可能会降低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或公司会选择采取一种出口策略而不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式以占领新开放的市场。布鲁尔认为，另一种情形则是广泛的自由化可能会因外国公司对总体上得到改善的商业气候作出积极反应而增加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

尽管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单是政府政策实际上就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但政府经常试图直接通过资本控制和其他限制国际资金转移的措施或间接地通过有关货币供应、汇率及利率的货币政

策影响外国直接投资。并不令人惊奇的是，已有证据表明，这些类型的政府鼓励措施对外国投资者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预测的。对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实证研究表明，大多数财政上的鼓励措施在外国直接投资的许多决定因素中并不居于显要的位置。例如，早在 1961 年，罗宾逊 Harry Robinson 就证明了东道国的税收优惠并不构成外国公司在这些国家进行投资的一个诱因。而在罗宾逊开创性的研究中，认为吸引投资的主要因素为有效的发展计划及其实施、自由的资本和利润返回、不歧视外国所有权、对企业的一视同仁，以及最少的官僚主义障碍。沙赫 Shah 和托伊 Toye 也对对 28 个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比较研究中得出结论，认为财政鼓励措施在提高外国投资的档次方面的作用是“微小的或是无法察觉的”。^①更近一些的实证研究甚至证明，政治上的不稳定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并没有负面的影响。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新古典理论文献提出了与直觉相反的观点，即东道国的政治制度类型或政府的政策措施对公司投资于该国的决策而言主要是外生的，尤其是在消费品和服务领域。鉴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属于中央集权类型，看来它为这种观点提供了一个佐证。

中国在实施市场经济体制前的宏观经济指标是引人注目的。中国有过滞缓的经济增长率，尽管中国的工业增长率要略高一些。1980 年中国的人均 GDP 为 246 美元。十年以后，中国的人均 GDP 更低了（见表 1）

^① S. M. S. Shah and John F. T. Toye, "Fiscal Incentives for Firms in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Survey and Critique," in *Tax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d. John F. T. Toye (London: Frank Cass, 1978), p. 284.

表 1 中国的人均 GDP(1980~1990 年)

	1980 年	1985 年	1990 年
中国	246 美元	209 美元	244 美元

资料来源 联合国。

中国的情况表明 对一个部分市场化了的指令性经济而言 既有可能吸引大规模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也有可能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资本投资的增长。中国遵循了一种循序渐进的外国投资战略。从 1979 年到 1985 年,邓小平总理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有关中外合资企业的法律 在广东建立了三个经济特区 在福建建立了一个经济特区。这些经济特区向外国投资者提供了优惠的条件,所得税率仅为 15%,还保留了某些有限的外汇优惠,土地使用费也比较低。

然而,中国试验性的开放政策在实施初期并未能成功地吸引到高档次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国遇到的主要问题在于允诺的外国直接投资额与实际流入量之间存在很大差距。这种已获批准的外国直接投资额与实际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量之间的差距,在 1985 年外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出现急剧下降后更为明显了。

为了弥补已获批准的和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额之间的差额 中国中央政府制定了《鼓励外国投资条例》。这些条例主要以合资企业为对象 简化了合资企业的审批程序 提供了补充的税收优惠条件,并允许合资企业与其他合资企业进行外汇交易。

中国第二轮的有限制的外国投资条例比第一轮要成功得多。中国通过保持一个强调渐进的技术转让和扩大出口的中央计划的

外资战略，使外国直接投资额有了大幅度的增长。^①1986年《鼓励外国投资条例》的成功实施使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有了大幅度的增加，批准的项目与实际收到的外国直接投资额之间的差距也大大缩小了（见表2）

表2 1985~1990年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百万美元）

	批准的	实际收到的
1985~1986	2 800	600
1986~1987	3 600	2 300
1987~1988	5 200	3 100
1988~1989	5 600	3 300
1989~1990	6 500	3 300

大多数的合资企业已参与了自然资源的开采和房地产的开发。中国政府已限制了在消费品和服务部门的投资。根据卡曼斯（Shyam Kammath）所作的一项研究，在1985~1990年之间，外国投资的部门分布在农业部门增加了8%，制造业增加了65%，在服务部门却下降了27%。^②

从实施第二轮经济自由化政策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及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能力的指标已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1995年全世界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约为3150亿

① Susan Shirk, *How China Opened its Door: The Political Success of the PRC's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Reforms*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4).

② Shyam Kammat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 Centrally Planned Developing Econom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39 (1990): 107-130.

美元。亚洲发展中市场接收约 20% (约为 650 亿美元) 其中大多数流向了中国 (接收约 380 亿美元 比 1994 年增加 11%)。^①类似地从 1990 年以来 中国实际 GDP 的增长与其他国家相比是惊人的。(见 表 3)

表 3 1990~1995 年中国实际 GDP 增长百分比

	1990 年	1991 年	1992 年	1993 年	1994 年	1995 年
中国	3.9	9.3	14.2	13.5	11.8	10.2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

表明中国成功之处的其他宏观经济指标也很有启发意义。1995 年中国的 GDP 达到 8 370 亿美元。类似地,1995 年中国人均 GDP 为 687 美元 (以 1990 年的价格水平计) 而且 人均外国投资额也有了非常大的不同。中国的人均外国投资额估计为 26 美元。^②

跨国公司和国家政策的重要性

与外国在消费品和服务部门的投资不同的是,基础设施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与政府的稳定性及其政策是高度相关的。基础设施的定义比较广泛 包括公共设施 电力、管道、水的供应及污水处理设施)公共工程 道路及水坝 及运输部门的其他形式 铁路及

^① Ravi Velloor, "Investors, Investment and India," *The Statesman Weekly*, 26 October 1996, p. 15.

^② Dominic Ziegler, "Ready to Face the World? A Survey of China," *Economist*, March 1997, 4, 10.

港口筹。在这些较广的范围内，一个公司作出到国外建设生产设施的决策往往是充满风险的。由于这个原因，实证研究已证明与基础设施有关的工业比其他类型的工业对政治风险更为敏感。

外国对基础设施项目或资源加工工业的直接投资与其他类型的在消费品或服务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基础设施项目由于固定在某一具体的地点而不可能实行许可证管理或从事出口。而且，尽管跨国公司往往发现自己处于寡头垄断的地位，但投资于高成本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公司有一个很长的时间跨度，很高的资本成本，往往需要对一家外资企业进行更严格的控制以使其在该国的收益最大化。

卡尔维特 (A. L. Calvet) 认为，跨国公司在基础设施项目上最初的竞争优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蚀，最终甚至可能完全丧失。最后，那种认为基础设施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会危及东道国国家主权的观念使基础设施项目成了反对外国投资者的一个突出的靶子。弗农 (Raymond Vernon) 在其有关跨国公司的经典研究中指出，在原材料开采业和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从以下意义上说是一种“逐渐废弃的交易”，即“几乎从文件上的签字墨水刚刚干了的那刻起，强大的势力就悄悄地试图使该协议在政府的眼中变成为陈腐过时的工作了。”^①

中国的外国投资战略在有关基础设施发展战略方面的特点是值得注意的。这些特点可以解释中国把外国投资引向能源基础设施领域的能力。在中国，中央政府仍在对基本建设投资进行指令

^① Raymond Vernon, *Sovereignty at Ba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1).

性计划目标管理，尤其是在能源生产方面。根据有关中国公共部门投资的一个研究结果，能源部门的投资占工业中基建总投资的 53%。^①从 1990 年以来，外国投资者和外资企业占能源部门投资的 1/3。而中央政府投资在能源部门总投资中的比重却逐渐从 1990 年的 65% 下降到了 1993 年的 61%。^②

能源部门的外国投资的影响是值得注意的。中国能源生产总量的年均增长率已达 4.8% 从 1980 年的 63 735 标准煤增加到 1990 年的 103 922 标准煤。从 1990 年以来，中国的能源生产总量到 1996 年已达 131 557 标准煤。类似地，工业发电量已从 1980 年的 30 亿千瓦时增加到 1985 年的 120 亿千瓦时，1990 年的 130 亿千瓦时，1995 年的 150 亿千瓦时。^③ 中国发电量的大部分来自火力发电厂 这里煤炭生产仍起着突出的作用 占中国能源生产总量的近 3/4。(见表 4)

表 4 中国各种能源在能源生产总量中的百分比 (1980~1996 年)

	煤	原油	天然气	水力发电
1980 年	69.4	23.8	3	3.8
1990 年	74.2	19	2	4.8
1996 年	74.8	17.1	1.9	6.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7)。

① Kang Wu and Bisheng Li, "Energy Development in China," *Energy Policy*, 23 (1995): 167-178.

② Lin Gan, "Energy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in China," *Energy Policy*, 26 (1998): 121.

③ 《中国统计年鉴》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6 第 24 页。

此外,1986年以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战略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把投资引向在华南的开发区域。^①由于开放政策的“六·五”和“七·五”计划在地理上的倾斜政策,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在地域上已有确定的方向,目标为广东省和福建省的四个最早的经济特区。据估计,1985年进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中有近58.42%被引到了广东省和福建省。十年后,外国直接投资集中到广东和福建的程度下降到了38.5%。^②类似地,技术制造业已集中在华南经济开放的沿海地区和沿海省份。中国商用能源快速增长的地区性集中程度及其能源生产对煤炭的持续依赖性已在环境的可持续性方面产生了严重的问题。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将贸易关系集中在东亚邻邦这一情况产生了问题。朱镕基总理大胆的经济改革措施能否保持快速经济增长在中国国内日益引起了关注,尤其是在预测到对东亚的纺织品和鞋类出口将放慢的情况下。此外朱总理还作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12000亿美元的国内投资计划,这意味着国有银行大规模的资本调整,对经营状况不佳的国有企业进行改组,以及在未来三年中把公共工程项目的投资增加到至少8500亿美元。这一大胆的计划旨在提高中国水力发电和火力发电的能力。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陈锦华宣布,在未来三年中中国计划安装2亿门电话,把发电能力增加到近2亿兆瓦。^③

① Y. Y. Kueh,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31 (1992): 637-690.

② 《中国统计年鉴》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6 第 36 页。

③ MOFTEC, “Three Principles,” accessed April 1998 and available at <http://www.moftec.gov.cn>.

中国成功的因素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外资战略的若干因素是与众不同的，可以解释其成功的原因。这些因素包括：(1) 中央计划与中央向地方放权的作用；(2) 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的适当的融资结构；(3) 来自海外华人社会的可靠投资。

中央与省政府间的联合协调关系

中国经历的成功之处首先可归结为中央集权体制与中央向地方放权的举措。中国开放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央政府把其外资政策与选择的省政府的的行为协调起来的能力。蒙蒂诺拉 (Montinola) 等人近来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经济上的成功主要应归因于其独特的中央与地方的结构 他们称之为“维护市场的体制”。^①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维护市场的体制”的一个例证是贸易权力从对外经济和贸易合作部向省和直辖市政府的转移。蒙蒂诺拉等人认为 只要与国家的计划指导相一致 省和直辖市政府就有权通过它们自己的立法，并且实际上对其所辖范围内的经济掌握着基本的权力。尽管有一定程度的自治，省和直辖市在这方面的立法还是有助于加强中央政府的计划指导，如 1986 年的《鼓励外国投资条例》。

^① Gabriella Montinola, Yingyi Qian, and Barry Weingast, “Federalism-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8 (1995): 50-81.

在此体制中，中央计划与各省的协调关系已成为把外资引向能源基础设施领域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自 1993 年以来 电力工业部接受了改组 以控制 30 个省级电力公司 并且从 30 个政府电力公司中选出 21 个形成了六大电力集团。电力工业部与国家其他政府机构一道，制定统一的价格政策和统一的投资额度。

尽管有着中央的集中管理，各省政府仍被允许直接批准小于 50 兆瓦或 3 000 万美元的电力项目。其他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需经电力部协调国家计委及国家经贸委批准。根据中国电力工业管理部门的一项研究，省级和国家级的政府之间的联合协调关系已产生了“使地方政府和电力公司日益关心当地电力发展”^①的影响。尽管在能源部门也存在较高程度的权力分散化倾向，但是国家和地方的能源政策仍有助于与它们减缓需求的途径保持一致。

中国中央政府和各省之间相对较少的磨擦已经促进了外国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参与。然而 近来有一些研究也指出 中国分散化的贸易体制已产生出日益增长的官僚腐败现象。

融资结构

除了中央计划与行政权力分散化的结合之外，中国电力部门战略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其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结构。为了给这类高投入发展项目融通资金，中国政府通过一家自然电力公司——中国电力投资公司熟练地在海外筹集资金，与外国政府和国

^① Ming Yang and Xin Yu, “China’s Power Management,” *Energy Policy*, 24 (1996):746.

际组织商谈贷款事宜。

中国最初的外国直接投资采用契约性的合资企业的形式，外国投资者提供技术和一定的资本份额，而东道国政府则提供土地、劳动力及实物设施。然而，从 1991 年起，已实现的一些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采用了股份制的合资企业形式。例如，在大亚湾经济开发区内 25 亿美元的中国南海石化项目 是国有企业众多部门与外国投资者之间股份合资的一个突出例子。类似地，预计成为世界最大水电站的三峡大坝工程 估计成本为 300 亿美元 正从日本、瑞士和德国获得资金。但中国也已开始探索外国投资以建设—运营—转让 (BOT) 方式投入电力项目。

中国省级政府的积极参与改善了基建工程项目的融资结构。中国的省级政府可以进入合资企业或者甚至独自筹集股份资本。而且 中国中央政府已给了国有企业大量补贴 并能够通过制定统一的基价和几乎不给各省提高税率的灵活性而减少传递和分配中的亏损。

非大陆居民的投资

与种族关联的团体在投资方面的忠诚度往往胜过其他地方提供的更佳的投资机会。非大陆居民的作用有助于中国把外资引入能源基础设施的战略取得成功。除了对外国跨国公司的主动游说努力之外，中国一些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得到了香港、澳门、台湾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大量资金帮助才得以完成。在为大亚湾核电站和大连、福州、南通及石家庄的火电厂提供融资方面 非大陆华人的贡献是非常显著的。

根据世界银行一项中国对外贸易的研究，已批准的在华外国直接投资项目中有 3/4 涉及合资企业中的香港合作伙伴。这些合资企业的近 90% 集中在华南的广东省一带。台湾和香港的投资者已成为华南基础设施项目的经常性投资者，即使台湾投资者面临对从事这类投资的严厉的限制措施。工业企业资本金总额的 10% 以上来自香港、澳门、台湾和海外华人。^① 海外的、非内地居民的华人对中国的总体投资额 1996 年估计达到了 1 360 亿美元。^②

结 论

在本文中，我已着重分析了中国的外资战略以及与之有关的把外国直接投资引向能源基础设施领域的努力。中国已成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把外资引向能源基础设施领域的成功典范。

通过检验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文献，我认为中国的情况看来证实了这种看法：即政治制度类型和政府政策对一家跨国公司投资于某一国家，尤其投资于消费品和服务业的决策而言是外生的。而我也说明了东道国国内的政府政策在使所需的外资最大限度地流向基础设施领域方面能够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样，中国的情况就对新古典经济理论有关政府导向的发展在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中必然是低效率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① 《中国统计年鉴》，1996 第 409 页。

② Batuk Vora, "NRCs vs. NRIs: Why China Fares Better," *Times of India*, 1 December 1997, p. 12.

我把中国政策效果的成功归因于三个变量：

第一，我认为，中国富有特色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结构可能表明了其外资战略成功的真正与众不同之处。在中国，中央和各省政府致力于共同努力以把外国直接投资引向基础设施项目，尤其是能源领域。

第二，我也说明了中国政府的股份投入，可能是其对巨额的发电项目进行融资取得成功的一个因素。中国偏向股份制合资企业的经历增强了外国投资者对能源项目的信心。

第三，我认为来自非大陆和海外华人社会的资本流入，也可解释中国把外国直接投资引向基础设施领域的比较成功的原因。海外华人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极为重要的。

(周翼 译)

中国的企业制度改革

罗纳德·M. 格拉斯曼

编者按 罗纳德·M. 格拉斯曼(Ronald M. Glassman) 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威廉·佩特森学院的社会学教授。他撰写和主编的主要著作有《马克思·韦伯的政治社会学》、《民主与平等》、《中产阶级与民主》、《变化中的中国 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与民主》等。

本文选自罗纳德·M. 格拉斯曼教授所著《变化中的中国：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与民主》一书的第六章。作者在文中全面探讨了现代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特别关注从以斯大林模式为主导的中央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的过程；他运用大量例证，较为详尽地说明了中国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历史经验、教训，着重阐明了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政策的现实选择，以及所存在的某些问题。文中所表达的西方学者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些观点，对于我们了解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立场、方法不无启发之处。

中国的工业化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始于殖民统治时期。在外国人的控制下，上海及其他港口城市先后创办了一些资本主义企业。中国的工商企业资本家没有自己完整的工业生产流程，他们依附于外国企业，但只起金融掮客或经纪人的作用。殖民主义色彩浓厚的工业化进程在中国并没有走得太远，1930 年代的内战及 1937 年紧接而来的日军入侵，使进展缓慢的工业化进程停止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和共产党掌握了政权，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追随苏联的模式发展。由于英国势力的退出，日本也已成了仇敌，美国则封锁了台湾海峡并继续支持蒋介石，苏俄便成为中国人唯一能获取建议和得到支持的国家。不过，便利并不是中国共产主义者追随苏俄领导的主要原因。众所周知，还在巴黎成为社会主义思想‘据点’的时候，周恩来、邓小平和其他一些中国党的领导人都曾到过巴黎；而毛泽东等领导人则到过莫斯科，对人类第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考察和学习。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看到了苏联怎样由一个落后的军事弱国转变成了拥有世界上最强大军事力量的工业化国家；而许多美国人，在 1948 年至 1958 年之间开始对苏俄的军事力量心怀忧虑，他们重视苏俄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并接受了苏联已初步完成工业化这一事实。

因此，由于意识形态的相似，国际形势的需要和对苏联表面成功的理性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很快着手在中国重建苏联奇迹。

的努力。他们尽可能仿效苏联的工业结构，聘请了一大批苏联专家来帮助自己建立工厂和基础设施，同时也沿袭了苏联那套通过党和国家官僚机构对经济进行政治控制的蓝本。

在原有制度方面，中、苏两国历史上曾有相类似的政治经验。^①这就是在建立共产主义政治结构之前，中、苏两国都已经形成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通过忠于国家中央权力的层层官僚机构网，把权力的触角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中国古代的高官们具有不可逾越的权力，而俄国的政府官员则缺乏良好的组织，也不大受到尊重。

在此，我想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在中国和苏联，中央指导的“指令经济”的制度化，首先是因为它与这两个国家的传统非常协调。但是，随着现代等级结构的出现，这种协调已成为阻力。然而，在工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它却容易被人接受。事实上，在中国与苏联，正是资本主义工业结构才似乎是格格不入的。

正因如此，在中国的第一个工业发展的十年计划期间，以苏联为模式的国家集权的、指令性的经济制度的建立，得到了许多市民和大部分共产党领导人的热烈支持，特别是朝鲜战争后，军事上的相对成功更使人们对这一模式奉若神明。

然而，正如安德鲁·纳森（Andrew Nathan）指出的，中国试图建立起一种计划经济，却缺乏任何训练有素的计划专家。^②这就是说，从 1948 年到 1958 年，中国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有所长的

^① Ronald M. Glassman and William Swatos, *Charisma, Hist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3).

^② Andrew Nathan, *China's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经济学家、企业家和工商管理者 他们有的只是一个没有专长的计划委员会。中国人所能做的只是完全忠实地仿效苏联领导。苏联制度的成功之处 使中国有可能取得相对成功 而苏联制度的失败之处 则使中国有可能遭到失败。

仿效苏联的计划经济，使中国的确为重工业生产打下了初步基础。他们开始生产钢铁和机械工具 建立工厂 并把所获得的利润用于军工生产。他们建立起了经济基础设施的初步架构，包括道路、桥梁、电气化、排污系统、电话和其他通讯网络的建设等 他们还创办了学校，为现代工业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培养受过教育的劳动力。

我们不应低估中国在苏联模式下所取得的成就，中国确实在此期间从一个由于无政府和军阀混战而四分五裂、积贫积弱、令人同情的文明古国变成一个强大的、受人尊重的国家 中央集权下的中国，正缓慢而有序地发展成为现代国家。尽管结构并不完善，但至少部分地为工业化进程打开了方便之门。虽然其工业制度是低效率的 且与其自身极不协调 但它生产了大量的化工、钢材、塑料、机器工具、重工业产品和军需品。

因此，许多观察家都认为苏联模式使中国走上了工业化的进程 尽管这或许并不是最佳的发展道路 而且在 20 年后 它还会被证明是过时的。中国是否会通过仿效日本或战前德国而走上法西斯的发展道路 目前尚不得而知。在日本入侵中国之前 蒋介石正在学习法西斯的那一套东西，他的卫队甚至也已开始穿戴法西斯式的服装 然而这仅是他的军队的姿态。战后 蒋介石又重新接受美国的影响。如果蒋介石取得了胜利，并且有美国人作他的顾问，

中国是否可能已走上一条纯粹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也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因为蒋介石失败后 美国与中国为敌 在共产党政权建立之初，共产主义的胜利不可能给资本主义的发展留下任何空间。因此 我们可以思考中国可选择的开端 但是最好是在历史发展中去分析现实。

总之 正如我们所说 在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苏联模式也被中国人暂时弃置一边了。随着这两次运动的相继失败 两个不同的发展计划同时在中国产生。第一 中国领导人急于重建‘苏联模式’制订一个新的五年计划 重新由大型的工厂联合体来生产工业品 由党的干部再次牢牢控制经济过程等等 第二 中国领导人寻求建立起一些在新加坡、香港地区、台湾地区、韩国和日本已取得明显成效的资本主义的因素，以及那些促进西方和日本的生产力发展进入新阶段 高技术阶段 的东西。

由于积极追随列宁主义的经济和政治路线，同时也使中国向资本主义及其相应的政治理念开放，邓小平体制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困惑，这种困惑体现于政治与经济政策两个方面。我们首先来研究当代中国的新经济政策，随后再探讨其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意义。

亚洲‘四小虎’和日本： 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可选择模式

正当中国的国内事件 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迫使中国党的领导人回过头来重建列宁主义的政党和苏联模式的指

令经济时，外部世界的事态发展却促使中国转向建立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制度。

1970 年代，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边境战争也开始在两个大国间爆发，苏联专家被永久地驱除出中国。此时，越南战争已告结束，美国开始向中国提议政治结盟和开展贸易。但最为主要的是，在 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间 新加坡、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和韩国（以“四小虎”或“四小龙”著称于世 作为世界资本主义成功的新中心脱颖而出，而日本则成为世界上最具生产力的工业经济。

海外华人和韩国人的成就，给中国党的领导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资本主义不再被视为格格不入的制度。亚洲“四小虎”的经济发展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这一现象建立在以下三个支持因素的基础之上：美国的资本投资和商品市场、日本的技术和管理上的帮助、中国的商业优势和勤奋工作的劳动力。

如果这一模式能用于中国，就表明有可能出现同样的经济奇迹。因此 作为试点 中国在沿海地区着手搞起了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将利用“四小虎”的三大成功要素 能迅速投入使用的中国劳动力，日本人热切期盼的中国市场和随时准备提供的技术帮助 美国人也受到中国投资前景的鼓舞 中国对美国产品（如食品、服装和高技术产品等开放）。然而，中国工商业者的思想观念、市场定价、市场流通以及资本家的用工方式都使共产党领导人感到不安。最主要的是 中国企业从党的控制下独立开来 不再依靠党的干部来实行管理，这一做法使党的干部为失去控制和秩序而忧虑。然而 亚洲资本主义经济的突飞猛进 仍把中国领导人引进了这场熊熊大火之中 他们会被这场大火毁掉呢 或是会因提高了生

产力而巩固其地位呢？

经济特区

中国领导人决定通过在平行于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中国沿海地区建立“经济特区”来与“四小虎”展开竞争。一些“经济特区”已先后在广东和福建沿海地区建立起来，其中最成功的当属与香港北部毗邻的深圳特区。这些特区从政府手中得到了令人羡慕的税收优惠、特许的利润返还，还有其他一些诱人的条件，从而吸引了众多的外国投资者。如今，类似的优惠条件已经扩展到上海、广州、天津和大连等一些重要的沿海城市。

这些经济特区已经获得了成功，尤其是在重建香港和新加坡式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方面。这就是说，利用国内廉价的劳动力，通过来料加工方式生产日本和韩国的“组装产品”（或者生产美国设计的产品，从便宜的钟表、玩具到牛仔服，应有尽有），然后再把产品销往海外市场，赚取可观的利润。一船船的商品运往海外，远远多于运往中国的商品。这也给中国带来了一个严重问题，因为一旦开始在自己的家门口大批量生产，取得这些消费品对中国人来说就成了巨大的诱惑。

事实上，共产党领导人虽然满怀激情地鼓励经济特区的发展，他们也害怕随之而来的消费主义及其资本主义导向。因此，正如瑞思金（Carl Riskin）指出的：

“中国共产党把特区的外国资本主义因素与其国内经济

隔离开来（非特区仍由中央集权体制控制），允许特区以自己的方式去发展，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框架，并面向世界市场。

‘经济特区’确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概念，它有别于国内其他地区，可按自己的规则行事。虽然，设立‘经济特区’的出发点，是为国内主体经济打开引进先进技术的大门，但在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这类特区却由于缺乏传导辐射作用而声名狼藉。特区通常由为组装和再出口而进口设备、零件和原料的‘螺丝刀工厂’组成。除了带不走的附加值，特区对国内经济来说帮助甚少。’^①

中国人十分担心来自特区的消费品的诱惑，于是想方设法把特区与国内广大人口隔离开来。

“事实上，深圳特区的关键部位有 85 公里的边界环绕着，包括 1 个入境通道、6 个边检站、13 个乡村检查站和 30 个防止免税物品走私的哨卡——这是一个国内的边界（把资本主义经济特区与国内其他地区截然隔离开来）。”^②

就这样，经济特区成了“准外国”，小心翼翼地把那些现代技术、方法和工业诀窍封锁在区内，不向国内其他地区传播。如果仅此而已，那就没必要谈特区了。事实上，经济特区并不是真的被困

^①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30.

^② 同上书 第 330 页。

于一隅 它冲击着中国的整个经济 资本主义的现代技术与方法很快地越过了特区并向沿海城市扩散 现在 那里正成为工业生产的重要中心。

合资经济与沿海 工业城市的成长

邓小平对经济特区的生产力发展感到满意，虽然他对其孳生出来的消费主义腐败倾向感到震惊，并采取了种种措施阻止其蔓延。然而，他仍然鼓励这种合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突破特区狭小的圈子向沿海大城市扩展。这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已经直接影响到中国农村人口，沿海城市不能被阻止在这一进程之外。

由于以往的经济制度、陈旧的基础设施和党的政治控制依然占有主导优势，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在这些大城市进展缓慢。在解释这新、旧两种经济制度之间的碰撞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怎样突破隔离开来的特区界线而向外扩展的。

“中国鼓励与外国伙伴实行合资经营、共享权益的合作形式，特别是一些关键部门含有高深复杂技术的大工业项目。……到 1984 年 许多世界上最知名的大企业 从德国大众、美国通用、IBM、日本三菱到吉利、可口可乐 都已在中国开展了

经营业务。’^①

这些公司起初均仅限于在特区内经营 随着‘大量的国外投资者 特别是一些大型项目 纷纷在特区外选址 那些地方基本上倾向于吸引来自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海外华人 并投资于相对较小的事业...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已在中国的整个工业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中国人的迫切愿望是 使外资集中发展沿海城市 这些城市有较好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础，有较丰富的与国外开展经济和技术交流的经验。他们的想法是要让沿海城市先消化吸收新的技术与方法，然后逐渐将这些技术和方法传递到国内其他地方去。’^②

这后一种情况能否发生 我们不得而知。但是 让大城市首先实现现代化 这在世界上并非独一无二的现象。其实 沿海城市本身也在一直相当缓慢地吸收着经济现代化因素。但“至今只有四个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 即上海、广州、天津和大连 可以说已经有效地达到现代化的目标。”^③

1989 年的动乱造成了政治紧张，并阻碍了经济发展，虽然这种紧张气氛还没有被完全消除，但中国的现行领导人已开始再次为经济现代化鼓劲 继续实行“对外开放”至少在吸引外资和合资经营方面来说是这样的，但整个工业化进程的步子谨慎得多了。

①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25.

② 同上书 第 331 页。

③ 同上书 第 331 页。

“四小虎”的成功经验以及沿海经济特区的相对成功鼓舞了中国领导人向工业化世界开放中国的决心，以便获得更多的技术知识和生产方法。当然，经济和技术的对外开放必将导致政治和哲学的对外开放。虽然在目前的中国，对外开放仍只是开启了一条门缝，但在不久的将来，这条门缝有可能被拉大。

对 外 贸 易

与中国进行贸易，虽然是工业强国和中国所切盼的，但开展起来却实属不易。“1978~1982年间，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曾走过许多弯路。选择不当的进口或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支持，特别是交通与电力系统的落后，在中国造成了大量无谓的浪费。”^①而且，外国企业很难与中国中央集权的、官僚作风浓重的、政治化了的经济制度打交道。例如，中国有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对外贸易部，是个充满着典型官僚作风的机构，靠一帮好用权力而非专家的干部的指令来行事。这种体制造成了“令人沮丧的低效率。”因此，它的权力被授予了各部委和地方政府。为使国内的客户和供应商能直接与国外的相应机构接触，它把权力移交得更远，以便让更多的公司、企业或工厂有权与外商决定生意。令人遗憾的是，让人无所适从的一大批政府代理机构又扮演了批准、指导和协调经济关系的角色。”^②

^①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19.

^② 同上书 第 319 页。

直到 1991 年外贸经营权下放和地方化后，这些困难依然存在。中央政府也还是过多地介入到贸易活动中，而且，它并不总是起到促进作用，相反，倒是经常起着阻碍作用，或出于政治上的原因、道德哲学上的理由，或出于一种更为广泛的经济原因，譬如控制通货膨胀和失业等等。然而，无论困难存在与否，对外贸易仍在继续扩大。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粮食、化肥、金属材料、机器设备的重要购买者……1985 年上半年，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依次是日本、香港和美国（与韩国的贸易也不断上升并开始占有很大份额 1987~1990）。”^①

随着与日本、香港地区、美国和韩国贸易的不断增长，在进口工业品和农产品等“必需品”的同时，消费品的进口也日渐升温。中国人曾花费了大量精力试图阻止这些消费品从经济特区走私到内地，但是，随着日益增长的贸易往来，他们最终放松了对这类商品的限制。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一旦解除其贸易限制，消费品就大量流入中国了。

^①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25.

消费主义的放纵和党政官员的腐败

贸易活动的分散化 确实有助于贸易往来 使各地区、地方银行、地方公司可以在贸易活动中自主决策。这也放宽了对一些额外资本的控制 使之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加以利用 也就是说 它 能被用来再投资以扩大工业产品的生产。然而，因为中国人渴望 得到消费品，他们知道在沿海地区立即可得到大量可用的消费品， 而且由于许多外国企业急于敲开这一新的巨大的中国消费市场， 地方单位开始用一些额外资本和外汇去购买消费品。

“1984 年和 1985 年，开始允许地方单位使用外汇；银行 也开始提供大额信贷，其中的许多贷款是不安全的、无限制的， 而且利率也很低；中国各银行往往在与客户订立限制条款 前就盲目地开具信用证，结果在 1984 年末至 1995 年初 各地 大肆进口外国消费品 特别是日本的电视机、收音机、录相机、 手表、照相机等等。”^①

这些商品都是合法购买的 也就是说 它们是从与日本和香港 的合法贸易中正当地取得的。为换取这些消费品，

^①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20.

“中国人出口石油、煤炭、纺织品、轻工产品 以及一种正在生产的新型系列武器产品，仅在 1983 年 出口额就达 15 亿美元！随着一项雄心勃勃的海上石油开采计划（与美国合资）的实施，石油出口也持续为中国重点进口项目的继续进行提供外汇。”^①

我们已经讨论过消费主义对于共产主义国家的影响，它削弱了以往共产主义领导人的艰苦朴素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但是，我们也曾提及，共产主义体制内在结构中党政官员占有消费品的腐败趋向。这种情势至今已在共产主义国家里延续了好多年。德吉拉斯（Milovan Djilas）在南斯拉夫痛骂过它，^②波兰的知识界也对这一现象哀叹连天；^③在苏联，普通的苏维埃市民已经对此习以为常了 因而常付之以轻蔑的一笑。

现在，像这类消费主义者的巧取豪夺在中国也已变得越来越普遍。这种现象既大大地激怒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普遍严厉斥责。正如瑞思金所述：

“中央下放对外贸易的控制权后产生的混乱，已引发了腐败问题。对外开放也带来了大量西方消极陈腐的价值观念，

^①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23.

^② Milovan Djilas, *The New Class* (New York: Praeger, 1974).

^③ Sranislaw Ossoski, *Lass Structure in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 trans. Sheila Patters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并与国内固有的落后的东西结合到一起。（事实上，腐败已非常普遍，以致中国人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纪律检查委员会’。但是，无论他们把目光投向哪里，似乎都能发现党政组织及其官员在滥用权力。’^①

“很多掌握利益部门权力的官员们，在与外界交往中吃回扣、参与诈骗……走私和贪污受贿——云南省有一位高级官员用公费进口黄色录像带，甚至企图从深圳走私鸦片到香港——这些丑闻在中国已屡见于报端。”^②

“1985年夏，一个突出的案例在海南岛这个开放特区被曝光。那里的地方政府首脑和地方党委的副书记带领同僚们利用掌握外汇之便，大肆进口免税商品。他们进口了286万台彩电、25.2万台卡式收录机、12.2万辆摩托车、1万辆小轿车和微型巴士，并以高于进价二倍或三倍的高价转卖到全国各地。海南岛的大部分人口似乎都已参与了这一活动。”^③

如果能仔细地去观察，特别是在海南事件中，人们能看到这些活动都已成为企业家经营活动的一个合法部分了。然而，由于中国仍奉行共产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和经济权力体制，处于权力顶端的共产党官员控制着经营运作，并为他们自己攫取财政和商业盈利中的主要部分。由共产主义结构与新型的资本主义因

^①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36.

^② 同上书 第 336 页。

^③ 同上书 第 336 页。

素之间的混合交织所导致的模棱两可，产生了一个难以克服的结构性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市场社会主义”在共产主义国家中一直难以实现的原因，也是像匈牙利的科尔奈之类的理论家对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感到怀疑的理由。人们必须认识到，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乃是基于凯恩斯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它独立于政府的控制之外。实际上，瑞典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功部分地依赖于政府与社团间的伙伴关系；瑞典有一个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但是这一体制基本上是具有某些社会主义干预因素的资本主义而不是独裁的、中央控制的国家官僚在干预瑞典经济的各个活动、各个方面。这无疑也是匈牙利人和捷克人为什么都已共同选择逐步取消共产党及其官僚机构并且逐步采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行类似瑞典的福利国家体制的原因——至少这是他们当前的目标。

然而在中国庞大的国家官僚系统依然存在并已与新生的资本主义结构结合在一起，产生了角色的混乱和花样百出的貌似合法的经济行为。

“在个人所得是合法的但行政命令仍基本上主宰一切的地方，私人利益和公共责任之间的差别往往很容易被模糊。例如在海南岛事件中，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在正当范围内依靠市场‘致富’（口号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毕竟是市场与海南掌握外汇和进口免税的特权相结合，才给那些以权谋私者创造了黄金机遇。”^①

^①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36.

纳森 Nathan 曾对这些问题作过这样的描述：

“快速的经济增长引发了通货膨胀 而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产生的价格双轨制，使腐败现象应运而生。政府工资不能赶上通货膨胀的物价上涨，导致了政府官员和职能部门利用工作之便索取贿赂。到 1988 年 在一些大城市中 从安装电话到提供电力服务 甚至投递邮件或接受医疗服务 索贿受贿都已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诸如此类的行贿受贿已经制度化和半合法化了，有些办公室或同事组织甚至发展到公开索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共产党在全社会所鼓励的新的企业伦理，已经使合法与非法的经济和社会行为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 并导致社会处于失范状态之中。”^①

中国政府试图在不放慢经济改革的同时，对腐败现象进行严惩。“据传 中国警察官员曾访问波兰和智利 学习他们的反腐败做法。以下做法被广泛宣传 不仅暴力犯罪者通常被处以极刑 受贿、私吞公款、欺诈、走私和贪污腐败等经济犯罪也可处以极刑。”^②

因此 中国在官僚政治经济中引入市场经济 并不导致诸如市场社会主义那样的简单混合。事实上，这里存在着一条难以克服

^① Andrew Nathan, *China's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08.

^②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27.

的鸿沟。例如，不仅干部的消费（或干部攫取消费品，从其变卖中获取财富）是一个问题，而且撇开这一特殊问题不谈，中央直接控制的官僚式的计划经济，就其整体而言，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大结构性障碍。

官僚体制阻碍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

正如科尔奈对匈牙利曾描述过的，瑞思金也对中国的官僚控制和市场发展之间的冲突作了评述，他认为：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与国际商业惯例之间存在着两个明显的矛盾。其一是 在这种僵硬的行政计划体制下 由于牵涉到官僚权力和特权，使人很难捕捉到市场需求。……其二是，在一个多年来任何规模的私人企业都被非法化的国家中引起了价值冲突。”^①

确实，有些外国企业对与中国官僚打交道有难上加难之感。对于内在于中国的仍占主导地位的官僚经济结构的阻碍和低效，甚至连日本和韩国的企业家也说遇到了不少的挫折。

“对许多外国企业来说 对外开放已经显露出许多错综复

^①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27.

杂的官僚障碍，以至在每轮商业谈判中都不得不专门提出来交涉。例如，在合资企业或在经济特区里，这些市场企业和中央计划经济两者之间的关系，就颇成问题……为了弄清合资企业和计划经济两者之间的关系，1983年合资经营管理条例实际上给了前者相当大的自主权，包括自主经营权。可是在事实上，合资企业仍受制于行政管理部門的指导和监督；更糟糕的是，他们所需的原料和其他供应也仰仗于政府的行政供应网和商业部門。”^①

中央官僚体制下对供应与原料的依赖形成了科尔奈所称的“短缺经济”即一种为了赢利而快速生产但事实上却完全不能指望其按时、保质、保量并确保盈利生产的经济。“经济特区里的企业已经抱怨无法在短短的预订期内得到所需的原料。而且，它们受制于曾使工厂普遍感到苦恼的相同的瓶颈问题与短缺例如有时它们会发现自己没有电、水泥或其他重要的基础设施及必需的材料。”^②

当外资企业发现自己往往被政府官僚一时兴致所左右时，它们就开始要求从政府那里得到某种保证，以便使其合资企业能像谈判的那样继续进行。它们开始需要法律保护。我们讨论了市场经济引发了对合同法的需要这一基本社会现实。外资企业所坚持的合同法，正可用于抵制各种行政干预和不当规章制度的干扰，因

^① Janos Kornai, *Economics of Shortage* (New York: Elsevier, 1980).

^②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32.

为不能指望这些政令规章营造出利润导向的生产方式所必需的合理的商业合作的环境。

中国计划框架下的合同法

中国领导人很快就不得不屈从于在与外国人的经济交往中对具有约束力的合法合同的需求。外国商人要求保障，而他们却已逐渐认识到官僚政令通常导致繁琐拖拉的障碍，而不是法律保障。于是“为了满足国外投资者的需要，立法和行政机器就很快行动起来，但这仅局限于一种计划框架中。这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通常是对外资企业表示不愿在一个比他们所习惯的、更缺乏特殊的法律保护的环境中转让资源的回应……例如，缺乏专利法使技术转让存在着重大障碍，直到 1984 年 3 月，专利法才被最后制订通过。”^①

中国的体制现在正生长出一个法律与官僚规范的混合体，但在外资企业的压力下，已明确地倚重于法律的规范。“目前（1987 年）约有 40 部与外国人投资有关的法律和法规条例被制订通过，包括与合资经营、经济特区、外汇管理、联合开采海上石油和专利保护等等相关的法律法规等。”^②

由于缺乏明确的“合同法”，外资企业仍不敢大量投资。在美国、日本、韩国和海外华人等企业的压力下，中国开始加大法律保

^①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34.

^② 同上书 第 325 页。

护的力度。继专利法之后，又制订了一批法律法规管理“进口关税、中外合资企业所得税、外汇管理和经济合同仲裁。一部商标法已于 1983 年 3 月生效，人们期待已久的专利法于 1984 年制定通过，与外国人利益相关的涉外经济合同法也已于 1985 年制定生效；目前（1987 年）制订涉外经济关系的支持性法律框架的过程，正进展迅速。”^①

然而中央甚至地方的政府官僚仍阻碍着经济活动。“在自由发展的国际资本主义和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之间的交接点上，行政改革反映出这场不轻松竞赛中所固有的一切矛盾。”^②正如科尔奈已经在匈牙利所揭示的那样，瑞思金认为中国“庞大的党和国家官僚体制对于管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乃是糟糕的设置。”他接着说，“因此在一种改革经济的氛围里，党和国家的官僚体制将丧失许多现有的职能、地位和权力。”^③这正是我们已在东欧所见证的情形。不过，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都是从国内产生的，并且其结构与被它们所取代的社会历史政治结构较为协调，因此，其消亡过程将会是更为痛苦和艰难的过程。像匈牙利或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的小国需要复杂的中央行政集权结构吗？但巨大而复杂的俄罗斯和中国社会没有它们能够生存下去吗？能用如“辉格党”所梦想的最少法律的民主国家和自我调整的经济体制有效运行吗？

^①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32.

^② 同上书 第 332 页。

^③ 同上书 第 337 页。

美国当然也是一个巨大的、多样化的大陆国家。这正是中国人如此向往我们制度的原因。然而，我们的制度是从法律权威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中国却一直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同样，有着大量复杂情况、人口负担沉重的美国，确曾形成了一套广泛的为国民服务的官僚体系、一支有效的地方和国家警察力量以及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所有这些，都远远超出了 18 世纪的小政府的理念。但是，他们如此做的时候，却没有否定民主议会国家所确立的法律权威。

尽管时间将会告诉人们中国能否摆脱其历史框框和文化传统的束缚，有一点可以肯定：随着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在中国不断扩展，必将带来一种反官僚政治的推动力，并经历一种结构上的内在法制化进程。

劳动力使用：社会主义背景下的 市场经济难题

共产主义经济的核心是充分就业。共产主义政体或许不是“无产阶级所有的或者无产阶级所治的”，但它们肯定一直是以其自身无效的方式而“为无产阶级所享的”。资本主义以利润为导向的劳动效率引发的失业幽灵困扰着党的领导者们，而这个问题最令人惊讶之处在于，它给强调意识形态的领导者带来的麻烦比给工人自身带来的麻烦还大。工人们已经非常厌倦他们那贫乏、单调的生活方式，以至他们为了实现潜在的生活方式的提升而不惜冒失业的风险。如果一旦发生大规模失业，如在菲律宾那样，他们

是否还会有这样的感受尚需观察。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愿意让失业队伍大规模的发展 从长远的眼光来看 这是一个明智的政策 但从短期来看 它又给市场经济的制度化制造了障碍。

“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对待无产阶级的态度更敏感地体现出社会主义的自我形象了 例如 正是担心失业而不是其他因素 限制了匈牙利市场改革的规模。”^① 中国的人口规模比匈牙利大得多，因此 它对失业的担忧也大得多 又由于涉及到外国资本 便更进一步加剧了对失业的忧虑。

“因此 在外资公司及其中国主人之间 在合资经营的中外伙伴之间，争论焦点始终集中在劳动力成本以及录用与解雇工人的权力问题上。”^② “尽管在经济特区条例中有特殊规定，但合资企业发现自由录用工人是困难的；他们通常必须在劳动服务公司获得所需的劳动力。与此类似 解雇工人是极其罕见的 虽然在特殊情形下可以这样做。”^③

因此，虽然中共领导人所希望的保持充分就业的方针是值得赞赏的 但它可能导致工作缺乏动力和效率低下 导致新发展的非国有经济企业无利可图。这对任何一个正在从共产主义充分就业（却无效率）的经济到市场经济效率为先的经济 但不得不像美国在 1980 年代那样承受 10 - 14% 的高失业率）转轨中的国家来说 都是两难的境地。

^①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27.

^② 同上书 第 327 页。

^③ 同上书 第 327 页。

而且，中国的充分就业政策也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并不像它向世人昭示的那样低廉，因为这些成本包括劳动者的薪金和各种各样的津贴与补贴。这些高于市场价格的劳动力成本的产生是基于以下良好的道德前提 即确保工人正当消费、工作的安全防护以及提供全面的社会福利。所有这些都是好的，而且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也已包括这些内容 除了极端的‘娇生惯养’或工人的超员之外。虽然后者是好的社会主义，但比之于中国大陆以外的其他亚洲国家更廉价的劳动力，却削弱了外国资本家在中国投资生产的动力。

中国的消费品市场作为一块尚未开发的处女地，仍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它鼓励外国企业去妥善对待中国的劳动力成本问题——如对韩国来说 相对于澳门或泰国的劳动力而言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仍很低廉——以便最终为自己的商品打开中国市场。例如：在 1982 年 国营企业总共支付了 15.4 亿元（5.20 亿元人民币折合 1 美元）的劳动保险费和福利费（这个数字相当于支付全年职工工资总额的 21.7%）。这些基金积聚起来，形成一笔财政年金，用来支付工伤、残疾和福利救济、死亡抚恤金、娱乐、教育和日常医疗服务设施及诊所。^①这些成本，无疑抬高了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但也为中国的工人们提供了安全保障。就这样，外资企业既对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感到失望；又常常被政府有关部门关于雇佣和解雇工人的干预 以及工人的低工作效率搞得心烦意乱。然而 他们

^①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32.

也感激中国稳定的劳动力，并迫切希望中国工人成为自己产品的潜在消费者。

显然 当资本主义工作效率逐渐在中国企业扩展时 失业率无疑将会提高。消费革命最终将会压倒无产阶级革命，而处理失业问题将成为中国从共产主义向市场社会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过渡的一个主要的结构性难题。然而 我们曾提议 失业问题可以通过在城乡大力发展小企业来减轻。

正如瑞思金对这一进程描述的：

“在工厂劳动者的关系中 已开始强调劳动纪律和拉大工资差距。毛泽东式的工人参与管理的理念（而干部则参与普通劳动 已被淡化 由‘科学管理’和‘责任制’取而代之。”

“一个许多人参观的典型是位于北京郊区的首都钢铁公司 那里推行以‘工作评分制’决定工人的工资。勤恳工作者得到奖赏 工作懒散者受到处罚。简单地说 中国当前推行的‘科学管理’与弗里德里克·泰勒在 1910 年左右倡导的‘科学管理’相距甚微。计件工资和津贴现在是联系收入与工作的实际方法。在 1984 年，偿付给上述计件工作的津贴和奖金达到了基本工资的 16% 比 1983 年增加了 48%。”^①

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失业可能

^①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53.

像菲律宾或巴西所发生的那样成为普遍现象。

“自从 197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重新出现了大规模的公开失业。一些资料证实，在 1979 年初中国的城市失业人口即达 2 000 万，换句话说，即超过了城市劳动力总人口 9 500 万的 20%。在失业大军中，有许多是刚从农村返城的知青或刚从中学毕业的学生。然而，政府在 1983 年声称，已为超过 3 800 万人安排了就业，包括那些已待业一段时期的人员和刚步入社会的就业新军。”^①

但是，中国的城市失业人口仍在继续上升。事实上，政府已不再统包每个人的工作，并且，现在已公开使用“失业”这个词。

小企业：失业人员的消化器

“由于不愿在已经人满为患的国营单位为失业者安排工作，政府鼓励他们建立从事服务与手艺的集体企业，或经商成为个体户。那些凭自己的智慧和勤俭、通过开餐馆或提供其他服务快速富裕起来的人物故事充斥于报端，而那些为赚取基本生活费而工作的小商贩、街头巷尾的补鞋匠、磨刀匠等，则很少报道。”^②

^①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53.

^② 同上书 第 353—354 页。

在典型的资本主义小作坊里出现了雇主和“帮工”；在一则广泛报道的典型里，一个个体雇主的收入是其帮工们的 20 倍。”^①而且这些“帮工”无法享受国营企业工人们所享受的免费医疗服务、退休金和各种各样的补助津贴。

政府正在研究对这些“帮工者”予以援助的计划，最近1990年已开始为正在增长的私营部门中就业的那些“帮工者”提供福利项目。当然，所有这些都是需要一定的成本，这是由正在成长中的私营工商部门相对较高的税率来补偿的，并且，为了防止城市游民的出现，这部分的税率非常高。无业游民的增多，像殖民时代的旧上海，伤透了年长中国人的心，并且他们已为阻止低人一等的“苦力”的出现做了巨大的努力。中国的这种政策是明智的，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被压迫的、受犯罪侵扰的成群结队的下层人民出现。然而，在城市和农村，贫困阶层已经逐渐出现，正像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过程中曾经历过的那样。

工厂的管理与所有权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工厂沿袭了斯大林主义的结构模式，其发展相当封闭。即使在“大跃进”时代，斯大林主义的大工厂也被保留着。什么是“斯大林主义”的工业模式？我们在这里尤指那些中央集权的、由党直接指导的经济模式，特别适合于重工业和军事

^①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53 - 354.

工业的发展(而不适合消费品生产),虽然诸如房子、食物、衣服等生活必需品的产量足以维持有效的生活需要,但其产品的质量却一直简朴如初,从来没有得到多大改善。因此,尽管时刻威胁着人们生活的贫困消失了,可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尤其是对在赤贫状态下开展革命的中国人和俄国人来说,甚至可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将穷苦人民的生活改善和提升到中产阶级的舒适水平却远没有完成,而且事实上,这已不再成为斯大林主义导向的领导者们所追求的一个目标。

在此,让我们关注一下这种工业结构。为什么我要把中国在改革前,大约是1948~1980年形成的发展模式称作“斯大林主义”而非“列宁主义”?为什么我们通常不把苏维埃和中国共产主义归类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呢?贴上“斯大林主义”的标签,是因为列宁时代的苏联经济的培育和发展是不定型的,它充满了实验性。列宁对其所继承的经济发展不充分的苏联怎样实现工业化并没有确切的把握,他所推行的工厂制度是在美国、英国、法国甚至德国的顾问帮助下制订的。美国泰勒主义者所奉行的高效流水生产线也在列宁主义者的工厂里运作。在新经济政策时代,由于缺乏经济计划的苏维埃专家,引进了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新经济政策在一个相当自由发展、随心所欲的氛围里,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结合起来。最后,虽然期望农村实现集体化,并极力诋毁小资产阶级富农在农业生产上所取得的成就,但列宁和他的同僚们把从苏联贵族手中缴没的土地分给农民后,却在苏联农村有限的选择了本不希望看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列宁的突然逝世也导致了列宁主义经济模式的死亡。斯大林

经济而不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成为世界共产主义竞相仿效的模式。所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结构均被废弃，泰勒制也被斥之为小资产阶级的阴谋。在农村，世人共知的是强制性的集体化，那些富农们被处决或被充军到西伯利亚；工业经济被斯大林搞得非常革命化。他强制推行了一种我们现在所称的“指令经济”，他向经济生产的方方面面都延伸出党的触角。他一改列宁过去那广泛的、大杂烩式的发展试验，集中发展重工业成为典型的苏联经济。最后，随着德国军国主义势力的飙升和反犹太、反斯拉夫种族主义的日益猖獗，斯大林极大地关注并警觉着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抬头。众所周知，德国人在历史上一直凯觞着斯拉夫地区，梦想着有一天把它据为己有，成为德国人居住的地方（历史上的这种冲动始于条顿骑士和神圣罗马帝国时代，并一直持续到奥地利和普鲁士皇帝向东欧的近代扩张）。斯大林把苏联的经济发展目标从一般的工业发展转向特别重视军事工业的发展。

在中央集权的官僚式的政治化的指令安排下，着重发展重工业和军需工业，还有集体化的农民阶级（仅仅是作为工业军事经济的一个支持系统而存在），这就是斯大林主义经济模式。它在二战前开始在苏联出现，二战后延续了下来。这个模式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而是“斯大林主义”的。

斯大林主义模式成为中国的主要模式有几个恰当的理由。其一，因为斯大林在二战前后一直与中国保持友好。进一步说，许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年轻时代是在莫斯科度过的。斯大林关于“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很适合中国领导人，他们渴望在中国也是如此。

其二 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一点 中国追随斯大林主义模式是由于美国军事力量的威胁。美国的舰队布防在台湾海峡；美国拒绝承认共产主义政权的合法性。最后，导致美国直接反对中国的朝鲜战争，使中国极不情愿地匆匆卷入了那场战争。面对着家门口的美国军事存在的严重威胁，中国人自然而然要集中精力去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因此，在苏联专家的直接帮助下完成这些工作后，中国也就顺理成章地模仿起苏联其他斯大林主义的建设方案 并在农村同样推行集体化。

斯大林主义模式 在农业生产上是个低能儿 但它在重工业体系 and 结构的建立上却相对较为有效。如果与第三世界国家（而不是工业化国家 相比 它在军事武器和军工用品的生产上也非常有效。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比他们自己想象的干得还要漂亮。请记住 同样是这个中国 过去几乎派不出一支军队抗击日本 而如今却拥有了一支很好的能在战场上与美国佬对阵的军队。他们打得太好了，以至麦克阿瑟还没来得及重新集结他的部队和组织反攻就不得不从朝鲜撤兵了。

朝鲜战争后，中国在追随工业现代化的斯大林主义模式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反对意见。事实上 当赫鲁晓夫痛斥斯大林时 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行动在中国却受到了强烈的抵制。中国人仍敬仰斯大林。在中国受到抵制的并不是斯大林，而是赫鲁晓夫。

然而 毛泽东打破了这一模式。随着‘大跃进’的开始 毛泽东领导着中国人民脱离了斯大林主义模式的轨道，转向更符合中国人传统同时也更纯粹的共产主义模式。前已论及，毛泽东的运动给全国人民和农民鼓足了干劲，转向其全面公社化的宏伟规划。

“大跃进”不但使工业生产严重受挫，也使一贯效仿的斯大林主义生产模式脱离了常轨。

“大跃进”过后，中国党的领导人试图恢复到正常状态，并重建斯大林主义的工业模式。但是，现实已发生了很多变化，因而开始提出有关经济体制的问题。没等这些问题得到回答，毛泽东又把整个国家拉进了“文化大革命”，并跨越了那笨重而又缓慢的斯大林主义模式，转向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工业、农业组织。“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及失败，导致了非毛主义的中共领导人抛弃浪漫的社会主义。更有甚者，它引起了人们对以前奉若神明的斯大林主义工业生产模式展开了深层探讨并产生了怀疑。

“文化大革命”后，不但中国国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而且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到 1970 年后期，苏联的经济奇迹已成了昨日黄花，根本无法与五、六十年代第三世界国家争相效仿时期相比；而欧共体国家与日本开始带领世界的工业成长。美国虽然已不再是在主宰世界的工业强国，但通过计算机、自动化和高科技产业技术方式领导了革命化的工业生产。

整个世界的工业制度以优于苏联制度的面目出现，并且它们都是资本主义的或者是修正了的资本主义经济。吸引中国领导人新亮点的最终灯塔的是作为亚洲资本主义成功典范出现的“亚洲四小虎”。在斯大林主义模式取得缓慢进步后，中国也许可能再沉重缓慢地前行下一个 20 年，但是，因为毛泽东的内政方针，也因为中国现在所观察到的外部世界的新变化，中国最终摆脱了斯大林主义模式。最令人感兴趣的是，邓小平希望维持和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党与国家的政治秩序，在他的领导下，在重新确保党的官

员牢牢控制的前提下，中国开始实行经济改革。

我们已经提及从 1978 年到 1985 年，一种列宁主义的模式在中国重新出现，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被移植到以共产主义为基础的政治结构里。这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时代相类似。但列宁主义没能在中国延续多久，因为日本人、海外华人、韩国人，还有欧共体经济的非凡成就，完全压倒了苏联经济的不稳定成长。虽然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列宁主义者和毛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内仍大有人在，但就工业进步中竞争的未来模式而言，他们都已无法左右局势。

中国不得不引进和建立高技术产业，并使之制度化、一体化，否则中国将不仅会在工业进步中失败，也会在军事上落后。斯大林主义者和毛主义者总是教导人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因此，建立最现代的经济，即使是资本主义经济，既是经济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军事建设的需要。

当中国跨入 1990 年代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接受市场经济作为未来经济的模式，尽管市场经济在中国是勉强勉强、慢慢悠悠、磕磕碰碰地形成的。

从中央集权的政治控制 到企业的自主权

国家控制的斯大林主义的重工业经济，正像在前苏联与东欧所出现的那样，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成长的一个障碍。它带来的成就就是重工业建设和军事硬件的快速发展，但其成本巨大，工业化早

期阶段一旦完成，一味排斥消费品生产的做法就令人无法忍受了。

由于看到了斯大林主义模式在中国的低能无效，同时也看到了亚洲“四小虎”和日本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下的经济快速攀升，邓小平决定朝着市场经济道路快速调头前进。在 1984 年邓小平大力推行“政府不干预企业经营管理，企业自主经营，减少中央计划指令的成分，最终着手进行价格体制改革的做法。”^①

对于靠斯大林主义经济概念支撑起来的政体来说，这是非凡的一步。把政府控制从中国的工业单位中分离出来，这是很不容易的。然而，政企分开已经开始，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也开始落实。

“最初，扩大企业自主权意味着分享企业利润的权力，但到后来也包括更大的超计划的自主权、原料和机器设备的采购供应、产品的销售和其他经营权，随之扩大为消费者引导下的日用品生产。

政府控制的货币与资金供应被缓慢取消，以利于半独立的银行机构的出现。以前由企业编制所有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预算的做法，已被企业应承担银行贷款利息的办法所取代。这是一个有效的措施，旨在防止存货的积压和投资建设资金的浪费。^②

政府鼓励新的自主企业“加强物质刺激方案，形成严格的劳

^①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42.

^② 同上书 第 343 页。

动纪律，并不断提高职工的教育水平和技术训练水平。’^①这些改革措施的提出，目的是为了提_高劳动生产率，奖励人们努力工作和促进教育成果，进而创造出全社会更高的经济效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通过完全就业来提供工作保障，已经不知不觉地降低了工作效率。

推动经济从政府控制中独立出来，并继续创立一种更有效率的、高技术的经济。

“1980 年代的主题是充分利用市场，减少对行政计划的依赖性。允许国营企业保持利润分成，允许它们行使包括产品生产和原料采购等在内的更大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并且小私营企业也从 1950 年代以来首次登上商业、服务业和手工业的舞台……随着个人和企业购买股份的发展，合股公司也开始形成；国内合资经营冲垮了条块分割的行政壁垒，在不同的区域间形成了值得称赞的横向联系或独立的垂直管理链条。’^②

证券交易所在上海出现，与华尔街的标准相比，它显得很小，但对于一个在不久前仍把资本主义拒之门外而醉心于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说，这就显得_格外不平常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处理着刚刚获得自主权的中国公司的股票，甚至还_有一些国外股东的股票投

①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43.

② 同上书 第 341 - 342 页。

资。交易量仍非常小，但它成长的潜力却很大，特别是它拥有一批日本和香港的股票专家作为顾问在提供帮助。

把政府权力从经济控制中分离出来的过程在快速推进。“1985年，国家给企业以最大限度的自主权，让经理和董事长来负责经营，以便使党委从企业的日常行政管理中脱身，只保留指导与监督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这一极为重要的作用。”^①

然而，从党支配一切的指令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并不是平坦无阻的。事实上，其结果如何至今仍无法断言。虽然“邓小平等领导人似乎陶醉于市场的许诺，并决定推进改革，……但他们不能预料并阻止其负面后果的发生。”^②

例如，“当出现中央政府对优先投资权失去控制（在那里，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仍被放在首位，而消费品和轻工业产品的生产却一直受冷遇）而通货膨胀率又持续升高无法控制（美国经济顾问还没有警告中国人，的时候，严格的价格管制又被恢复了（先是在1980年，继而在1987年）投资急剧下降，企业刚获得的为混合投资筹措资金的银行贷款权被暂缓执行，并中止了利润保留权的扩展。”^③

不仅是政府在他们看起来合适的地方或觉得国家的优先权没能被贯彻的地方延缓推行市场经济的“规则”，就连自主的企业本身也常对市场经济程序抱有疑问，或仅在有利之处运用它们，而把

^①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50-351.

^② 同上书，第342页。

^③ 同上书，第345页。

那些不利之处弃之一边。这也就是说，正像科尔奈在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评中所警告的那样，这些有自主权的新企业一有盈利就很快地四处邀功请赏 而对企业的亏损却概不负责。而且 正在中国发生的 也是科尔奈所描述的 党的中央特权与资本主义的自主经营的企业相结合产生了‘一种以非理性的价格体制、大量过剩与短缺并存为标志的更不均衡的经济。这里决不是释放市场威力的良好土壤。’^①

后者的这些不均衡和相互脱节的经济活动，预计将会在主要经济转轨期内持续。这些纯粹经济上的力量无疑最终能够克服。然而 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依然大量存在。仍然存在着‘一个抵制改革的强大而又坚固的官僚机构，而改革将无疑会消除这一官僚机构实际存在的理由。’^②

尽管力促高技术生产以获得极丰厚的回报（消费品和尖端军事设备）中国共产党并不想放弃它的政治控制 也不愿放弃经济目标的制定权。不仅仅是上层领导，而且一般官员也都急于保持其力量与权威。

“部分官僚不愿放弃对经济财源的直接控制已成为企业行使自主权的潜在障碍。在企业背后真正掌握实权的仍是经济部门或各级地方政府，企业只是它们的一个分支机构，并支配着技术上由企业所支持的大量的保留利润。母体主管部门

^①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42.

^② 同上书 第 342 页。

（它们是政府政治单位而不是经济单位）掌握着利润合同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它们往往不顾真实的供需条件和国家需求，并以建立新的工业为借口。”^①

后者的任何活动都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但它仍然作为党的政治体制的一部分而继续存在。因此，市场经济的内容与行政控制的手段都在中国各自为用。“企业的自主权和市场已经被扩展了但是它们仍明确地从属于邓小平所称的‘开明管理’。”^②

必须记住 德国和日本为了追赶英国和美国的工业成就 曾经极其有效地运作政府的行政管理部门，以支持其资本主义工业化飞跃。因此 中国人正在做的事决非前无古人。然而 法西斯国家基本上是扶持和帮助它们本土的在工业和贸易上尽心尽力的资本家 而共产主义中国却缺乏一个被人民接受的工业资本家阶层 提供这样的支持作用也就根本无从谈起。相反，共产主义国家倒是更倾向于对工业的自主发展进行干预、破坏、反对并层层设置障碍。积极的一面是，国家的干预有助于防止失控的通货膨胀和大规模失业的发生。

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想借鉴资本主义，但仍希望保持其中央的、方向性的政治作用和权威。事实上，“邓有一个新的标志词 叫作代表国家、企业和工厂的‘工业联合’。它标明了内在于探索自我

^①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46.

^② 同上书 第 351 页。

激励的经济作用的生产动力，而没有放弃直接控制其活动的矛盾。”^①

共产党控制下的共产主义国家能否完成向自由企业经济的过渡，目前尚不明朗。在东欧，共产党政权已经被废除，这些国家将在民主政体下完成制度的变迁，但它们也得到了西欧、美国和日本的投资及技术支持。然而，俄国与中国的情形大不相同，因为这两个大国的权力和秩序是有问题的，并且，那里的共产主义是土生土长的，而不是外力强加的。

只要共产党国家政权继续存在，政府就一定要监督经济的变化。从目前的经验来判断，政府对自由企业经济是支持和干预兼而有之。正是在共产党政府的支持和干预下，经济改革继续在中国进行。

向自主企业继续迈进：价格改革

价格改革是共产主义政体面临的一个最为困难的经济转型问题。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价格与房租、交通费、假日补贴、工薪等等一起被牢牢地管制，某些日用品的价格被压得很低，而食品的价格往往被人为地定得很高。无论如何，引进不受管制的市场价格是困难的，因为它直接诱发了短期的通货膨胀。消费品价格的上扬，导致了重工业品的价格也随之暴涨。

^①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51.

然而在 1988 年中国的一批经济学家^①，以吴敬琏为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经济、社会和技术发展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们赞成首先实行价格体制改革。这些经济学家论辩说，实现价格由政府管制到由市场决定的转变是使企业经营更具效率的必由之路。由于了解价格改革将承受通货膨胀的某种恶化，吴敬琏列举了阿登纳 (Adenauer) 在战后德国一夜之间放开价格作为例子，说明随着国内市场的建立，这种通货膨胀将会得到有效的自我限制。^①

吴先生举了一个很不恰当的例子！二战以后的德国没有消费品可资利用 那是消费品短缺 而不是过剩 并且当时德国已有了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战后的它所需要的仅仅是重建而已，而不是在发育不完全的基础上新建。更佳的对比可能是巴西。在巴西 失控的价格制度和消费品的泛滥引起了 1980 年代后期高达 300% 的通货膨胀率。对于巴西所发生的情况 中国的‘另一些经济专家警告说，由价格改革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可能比吴敬琏和他的支持者们预期的要严重得多、持久得多。1988 年 通货膨胀达到了自 1950 年代采取稳定价格政策以来的最高水平。1988 年底，官方公布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 18.5% 而实际的通货膨胀率肯定比这还要高。’^②

市场定价在中国失灵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工业仍没有资本主义企业 它们仍然是由政府官僚控制的垄断性企业。因此“，市场

^① Andrew Nathan, *China's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02 - 103.

^② 同上书 第 103 - 104 页。

无法去规范企业，因为它们……继续被其官员保护着并利用价格改革的机遇去抬高产品价格以谋求垄断利润。”^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某些企业自主权方面的改革已经对这些行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这些企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式的自主经营单位。所有这些再一次证明了科尔奈的论点，即“市场社会主义”是一个使人困惑的概念，它导致了一系列稀奇古怪且令人无法接受的经济行为。

吴敬琏提出来的价格改革理念实际上是很理性的。

“他的计划要求逐步提高主要工业原材料、运输、电力和粮食的价格。大约经过五年左右时间运行，可逐步缩小政府指令价和市场主导价之间的距离，随着政府指令价接近或等于市场主导价，价格转轨期遂告结束……其目标是使国家能为通过信用、货币供应和投资等经济杠杆控制经济创造条件（即‘国家调节市场 市场指导企业’）”^②

这就产生了突发性的通货膨胀问题，“人们纷纷前往银行提取他们的存款，又纷纷前往商店购买一切对他们有用的东西。也许比这流行性的恐慌更为严重的是，无法控制的工业企业一轮高于一轮的哄抬物价，因为企业利用了改革的新环境为自己寻求更

^① Andrew Nathan, *China's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04.

^② 同上书 第 105-106 页。

大利益。’^①这种突发性的通货膨胀式的恐慌必须采取措施予以制止，于是价格改革又被停了下来。“中央政治局做出进行价格体制改革的决定还不到两周，政策又开始逆转了。”^②

然而，中国人没有完全放弃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价格改革的尝试。他们又重新回复到 1984 年采纳过的方案，即“沿着匈牙利采用过的‘价格三轨制’对最重要的商品实行固定价，对消费品和小生产者的产品实行自由浮动价，对介于以上两者之间的商品制定了某一指导价并允许其在规定的幅度内上下浮动。”^③遗憾的是，正像瑞思金指出的，匈牙利的方法遗留下了工业权力无法解决的问题。^④并且，匈牙利本身正开始放弃这一方法。毫无疑问，在中国向市场价格体制的转变将困难重重，而某种涉及到通货膨胀的国家调节将是必需的。一种瑞典式或澳大利亚式的价格调节体制是否能够对日益增长的利润导向的生产部门用价格规则体系加以约束，能够为现阶段的发展所用，我无法确知。但有一点是明确无疑的，即不出现暂时性的通货膨胀，自由竞争就不能被引入市场定价。

最后，不应该得出“中国没有进行任何价格调整”的结论。事实上，中国在市场价格为上已取得一些进展，例如，“中国取消了对肉、禽、鱼、蛋和蔬菜等的价格管制，在北京，消费品的价格曾一下

^① Andrew Nathan, *China's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06.

^② 同上书 第 106 页。

^③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52.

^④ 同上书 第 356 页。

子飙升了 30% 但这是尝试构建国家价格体系的开始。’^①到 1990 年 大部分价格又已经被政府牢牢控制住了 虽然现在中国政府已开始再次放松了价格控制。

银行、信贷、利息、股票和税收

为了在工业化进程中确保建立有效的市场，中国着手尝试的措施之一是 政府取消了对工业单位所需资金的分配 取而代之以资本主义方式的银行贷款，贷款必须偿还并支付利息。许多种类不同的银行已经在中国出现，旨在投资于不同种类的行业。专业银行“如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专门经营外汇交易 和中国投资银行 处理对中国企业的国外投资)已经随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一起产生了。”^② 随着这些专业银行的出现，政府对投资的中央控制权已开始减弱。然而，银行仍时刻担心中央的决定会冲击其自主权。

科尔奈认为，过去的银行贷款制度不利于鼓励资本主义经济效率 因为各企业都知道 即使自己不能赢利 政府也会想法救助它们。他称之为“预算软约束”^③。迄今为止 就企业必须创造利润效率而言 科尔奈是正确的。然而 银行的存在及日益成长的独特作用 随着银行改由专家管理 已经为转向市场经济的财务与核

^①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48.

^② 同上书 第 349 页。

^③ 同上书 第 349 页。

算提供了基础。越来越多的各专业银行的出现，使企业摆脱指令经济的最终转变也较容易。毕竟，这些银行已经开始熟悉利息成本、国际利率、资本主义政府机构对利率实行调整以及运用所赚取的利息收入来为其他项目提供财务资本等。这是中国的银行家正在学习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程式。

随着银行的组建，中国也已开始缓慢而又谨慎地发行股票并允许这些股票在证券市场上市交易。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家厉以宁相信，管理自主权和股票发行将推动价格体制的改革。^①

“厉以宁建议实行‘股份制’即把企业资产股份化 然后将这些股份的一部分给予或卖给企业的雇员（有点像美国、尤其是像瑞典的股份优先购买权），或者其他个人（那些赚取了巨额利润的新企业家），或者其他公司，而国家也保持相应的股份。厉以宁声称，一旦企业的所有者发生变化，企业将能够抵制官方的干预，从而自主地去回应市场发出的信号以追求利润和效率。厉以宁还说，联合股份公司将仍是社会主义的，因为每个公司的股份将被社会上各阶层广泛的公民所拥有，特别是企业的职员和工人。”^②

前苏联已经在后来的晚些时候开始了这一尝试。然而迄今为止，共产党官员的担忧阻止了企业的管理者和所有者们在企业中

① Andrew Nathan, *China's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04.

② 同上书 第 104 - 105 页。

推动资本主义车轮的自由运转。但是，小规模的股票市场和企业股票份额的少量存在，无疑再一次为市场经济打下基础。比如股票市场在日本也是慢慢生根，最后才形成制度化的。随着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周边环太平洋地区的扩展，中国也可能会走上日本式的道路。须知，今天是亚洲的时代，而决不是西欧的时代。

我要强调的是，目前中国的股票交易规模还非常小，也非常原始。然而，随着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日本等地的金融家的涌入，它有可能快速扩张。并且，今天中国已能很好地利用计算机技术，因此实现操作计算机化也是很容易的事情。

就税收来说，根据中国经济向市场方向的改革，有一个现象需要注意。鉴于在经济发展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企业都是采取低税率，但中国目前所执行的却是高税率。政府利用“税收”直接扣留经营成功的企业所取得的一部分利润。中国政府已经利用税收来有效地发展基础设施和教育，并继续对人民提供国家福利。人们不应该去挑剔共产主义国家所提供的这些服务，也不能批评共产党转移大量的税金去发展军事，因为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也正在这样做。然而，高税收政策，虽然这些税收已被很好的使用，当然有碍于“利润为先”资本主义生产，也不利于企业对所取得的利润收入的使用。政府将不得不降低税率，否则，拥有经济自主权的工业企业将会失去追求更多利润的积极性。如果政府把超过一半的企业利润拿走，企业何必操那么多心思？这再一

①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61 - 362.

次证明了，自由竞争和政府控制特权在中国必须取得某种平衡。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市场和社会主义矛盾的结合衍生了不少的混乱与冲突，但也产生了一些非常积极的结果。否则，我也不会如此费神地描述一个明显注定失败的过程了。这就是说，中国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从 1984 年开始，工业总产量以每年 23% 的速度增长。”^①因此，虽然存在着通货膨胀、预算赤字增加、党的官僚继续对经济产生干扰和官员腐败等等诸多问题，但在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下，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追随“四小虎”日本和美国的冲动依然强烈。

学生、教授、专家、管理人员 和旅游者的交流

为了打破由“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发展僵局，并赶上世界潮流，中国派出了“许多留学生和专家代表出国，并接受大量类似的国外代表和留学生来中国”。^②这种开放门户的新做法的结果已经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政治文化。换句话说，即留学生、专家和教授们为中国带来了西方的民主和资本主义理念。就资本主义商业诀窍、管理经验和专家治国的扩展而言，其交流结果相对积极。但从政治上说，这一过程也导致了政治异质性的产生。

观光旅游当然大大有助于政治和经济文化的多样化，因为不

^①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66.

^② 同上书 第 375 页。

仅带来了思想观念(中国人几乎没有感到有语言上的障碍)而且还带来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外国的衣饰、行李、照相机、手表、首饰以及现金和信用卡等物品大量涌入。旅游者豪奢的生活方式引起了都市人极大的羡慕和向往。“在 1984 年, 1 285 万旅游者, 包括 1 172 万海外华人和香港、澳门同胞到中国内地旅游观光, 花费了近 1.13 亿美元的外汇。”^①

这些事情在东欧所产生的影响甚至更大。在那里, 西欧人带来了他们的小汽车和所有其他消费品, 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生活方式也常在地方电视台上展播(他们也可不受干扰地正常收听西欧的电台)

随着资本主义风格的企业单位的发展, 技术官僚和管理人员的海外培训也产生了日渐重要的影响。

“特别是, 行政管理人员的特性(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企业的管理人员)已经发生了变化, 对省一级以及省以下的领导位置进行周密调查, 使许多新的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这批年届 50 或 60 岁左右的新领导, 均受过良好的教育。这样一批在技术和管理上有专长的专家有助于解决面临的一些技术问题。据报道, 全国有 45 的国营企业已经由更年富力强的的人担任第一把手。”^②

^①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26.

^② 同上书 第 367 页。

由此可见 在文化和技术方面 也像中国的结构条件一样 正在发生变化。中国人把它们称作为‘蛋壳与蛋’的现象。正像纳森所说：“虽然这蛋表面上看去仍是同一个蛋 但在壳子里面正在发生着奇迹般的变化。有朝一日，全新的生活就会破壳而出。”^① 中国的内部正悄然发生变化 但共产党机构之‘壳’仍紧裹着它 难以分辨中国已发生多大变化。

中国农村 从公社到家庭农庄

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中国农村曾以斯大林主义为导向介入现代化的潮流。这就是说 将土地从封建地主手中夺回分给农民 然后逐渐集体化。然而，中国领导人试图避免标志着斯大林集体化道路的大屠杀。因此 他们逐渐集体化 允许生产性农民仍保有一定的私有权。

毛泽东以其“大跃进”改变了这一谨慎的道路。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的集体化是通过完善的理想主义与浪漫的社会主义来实现的。农民们被集体化于一个民族团结的伟大洪流和兄弟般的友情之中。即便是西方观察家也对此激情及最初两年的表面成就心驰神往。最重要的是，实现群众公社化并无其对应于苏联所伴随的可怕暴乱。虽然中国农民希望拥有自己的土地，但他们在群众动员中感到了一种文化上的协调性，类似于他们消逝的荣耀帝

^① Andrew Nathan, *China's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20.

国；他们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心甘情愿地以某种激情投身于群众动员之中。

如果大跃进和公社化使农业生产得到大大改善，那么农民们或许会对此感到心满意足，即便它违背了自己拥有家庭农庄的意愿。然而，由于引进化学肥料、改善灌溉和扩大饲养鸭鸡，在农业生产的最初收成后，大跃进陷入了灾难性的农业衰退中，并导致了数以千计的农民饿死。

公社化并不是发生可怕饥荒的主要原因。它实际上主要是徭役工程过度的自然结果。田地与山坡被滥耕而导致了大量植被流失 就像 1920 年代的美国西南部一样。在中国大江河上游修建灌溉与库坝工程，减少了几百年来曾为下游土地提供肥力的自然淤泥。砍伐森林使大量土地成为无树的荒地，减少了降雨量，导致了生态不平衡。这些情况还有许多 但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大跃进”的失败，其原因在于徭役工程并没有经过农业专家或了解地方的农民的仔细论证，而是由浪漫的理想所推进，官僚所感兴趣的只是直接的生产收成，却完全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是从不关心其行为的近期后果。

因此，“大饥荒”及“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很快就停止了“大跃进”的进程。这种情形一旦出现，集体化农业单位的无效性也就提上了批评议程。它痛苦地表明，集体化本身并没有改善农业生产，事实上还减少了农业生产。无论农民还是改革主义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大跃进”灾难后的 1970 年代期间都曾希望取消集体化。然而，毛仍通过军队和红卫兵掌握着对国家的控制，并在全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于是，农村改革被阻挠了，农村的结构不是回到

“大跃进”前的集体与家庭农业的结合 而是更加集体化了。

由于“文化革命”带来的是混乱而不是进步 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者最终掌权。在 1980 年代期间 他们开始复归到建国初的家庭农业—集体化的模式。然后 在 1980 年代中期，他们开始大规模地过渡到私人农业所有制和市场化生产。从农业生产实践来看 这一过程已被证明是成功的 并因此而被改革者认真培育与推广。总的来说 农民们为这一转向而高兴 尽管有些人并未从中受益。

然而，一个政治上的主要事实是 农业集体化被消除了 并朝向市场经济的农业发展，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为市场生产的农业者并不是农民，传统农民向农业—商业者的转化是中国最终民主化的好兆头。这一转变也有消极后果，这与大量失业和其他收入因素相关。我们将讨论这些正在中国发生的农村转向的消极和积极因素。

大跃进和集体化时期的某些积极效果

人们必须认识到 尽管“大跃进”和集体化由于其推动农业进步的过度努力而伤害了数以千计的中国人，但一个现代农业的基础正是建立于这一英雄—悲剧的时期。如 K. N.拉吉 (K. N. Raj) 所说：

“集体化时期的农田建设和主要结构规划带来了家庭农业成功的‘适合条件’。与此相反 家庭农业体制下的印度农

业，土地不平均、不完整及非理性的土地利用阻碍了效益的改善。正是这些‘非理性条件’如 J. L. 布克对 1930 年代的中国农田条件所作的描述，通过集体化和大规模的劳动力投入的农田改造而得以消除。^①

我们应认真对待拉吉的分析，因为如果传统印度农业相对于中国传统农业来说更加非理性，布克仍认为如果没有其先前的集体化—现代阶段，直接导入家庭农业可能证明是无效的。比印度的情形更好的一个比较例子是墨西哥，那里的部落分立与阶级差别使社会关系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为“非理性”。在墨西哥没有任何现代化或是共产主义类型的集体化时期 墨西哥革命后就 把土地从封建地主手中夺过来直接分配给农民。然而，小家庭农庄制是一个完全的失败，因为农民们以非现代的农业技术耕种个人田地 而没有大规模的灌溉工程、化肥、农业装备或动物饲养的帮助。墨西哥私人家庭农业的经验是灾难性的。农业生产衰退，土地变得零乱不堪，农业现代化简直无从说起。^②

因此 在我们完全摒弃中国集体化规划前 让我们至少了解其实现作为成功的家庭农业能够从中产生的一种阶段。然而，在我看来“大跃进”之前的集体化与现代化工程 为现代家庭农业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如果植被流失、洪水和饥荒并没有发生 那么“大

^① K. N. Raj,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January 15, 1983.

^② Elyer N. Simpson, *The Ejido, Mexico's Way Out*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37).

跃进”将可能被视为一个成功的现代化阶段。然而，既然它们确实发生了，人们就不能简单地把死难者一笔勾销，并说为了进步那是值得的。

我的观点是，大跃进前后时期的集体化和现代化工程要被看作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人们必须记住墨西哥和印度作为比较，以便理解从“封建”到资本主义农业的直接运动可能是一个粗糙、无效的过程，而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过程则给人印象相当深刻，尽管也是悲剧性的。

我认为，这里所谈对于进行比较实在是必需的，由此我们可以进入中国农业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到 1980 年代，它变得很清楚，集体对于更进一步的现代化是一个“脚镣”，而非集体化、家庭农业和市场生产则是农业增长的下一个逻辑阶段。当然，这一逻辑处于马克思的历史“之前”，因为中国将从封建主义进入共产主义再到资本主义，而不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共产主义。这些情形正像俄国流行的一个玩笑：“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前的一个历史阶段”。

逐步进入家庭农业与私有商业

大跃进期间大规模建立起来的公社以及许多不联合的村落，到 1980 年代在大多数农业地区被取消了。然而，小规模的生产队仍被保留。这些生产队仍然集体拥有耕作牲畜与农具，并且仍由党的干部管理。生产队的党的干部仍然决定着劳动工分，并支配着分红与农产品分配。直到 1980 年代，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逐

渐脱离生产队、公社、党的控制并转而向个体家庭私有发展。

“1978~1980年，提出了自留地的规模限制……并鼓励生产多样化（不同于粮食生产）。家庭副业和可以买卖自留地农作物的农贸市场大量增加……副业生产，如动物饲养，经济作物特别是蔗糖和棉花急剧扩大。”^①

在1980年代，出现了一个生产组织转向非集体化的持续运动。公社作为政治、经济权力联合体的作用结束了，^②但仍部分保留着一种过渡性结构。其中种植计划、灌溉、耕作牲畜和机械的使用仍由生产队控制。工分的价值对于公社劳动力来说仍取决于生产大队的产量。^③

个体私有家庭仍依附于当地公社的生产队，但在完成了出售公粮、纳税义务以及交纳生产队保持某些集体服务的留成后，家庭可以自由处理其产品。它可以高于配额定价的“议价”出售给国家，或者在自由市场上出售。^④这通常意味着把产品运到最近的城市以相对高一些的价格出售给城市居民。

中央政府仍制定粮食配额和价格，但一旦达到配额，家庭农业可以运用其他生产方式，并在日益发展的自由市场体系中为了利润而生产更多的粮食。人们也应细心地注意到，生产超过配额的粮食和副业生产的动机是巨大的，因为它将直接导致家庭农业的

^①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92-307.

^② ^③ ^④ 同上书 第 292-307 页。

利润。

因此 随着 1980 年代私有农业的形成，农业生产得以极大增长。随着当时邓小平政策的实施 我们毫不惊讶地发现‘家庭责任制很快成为压倒多数的农业组织形式。到 1981 年 10 月 中国基本核算单位的 97.8% 都实现了某种责任制形式，而先前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是公社生产队。’^①尽管有巨大权力的政府官员的集体单位仍在中国农村占主导地位 并持续到 80 年代末。家庭单位仍直接与他们必须交纳配额的集体生产队相关联，仍从中租借或购买农业牲畜、机械和肥料。因此 党的政治控制仍在日益增长的自由市场农业的背景下存在着。

1980 年代末，家庭农业的不断成功，开始迫使农业体制朝企业化管理发展，个体农户通过多种经营提高了农业生产。

“甘肃省的一项调查表明 有着 100 - 200 只鸡的专业户可在一年内收回其投资 并在第二年得到 1 000 - 2 000 元的纯收入。养鸡成为走向富裕的一个途径；确实有很多报道说，大量农民通过饲养几百只鸡或鸭很快致富。然而，粮食生产继续以合理的速度增长。”^②

这一现象清楚地说明，党政官员并不了解如何引导多种经营或激励农民。像其他大机关一样 他们能提出一些‘组织化目标’，

^① ^②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292 - 307.

诸如提高粮食产量 然后试图管理这一过程。后者不是专家的“经济计划”而是“官僚统治与管理”。

由于私有农业发展的成功“，过去的集体化现在被视为是一种严重的错误 既内在地刺激了国家干预集体决定 又削弱了个体生产与收入之间的联系 干部们不得不解散甚至很强的、能生存的生产队 使家庭责任制几乎普遍推行。”^①

然而 资本在个体家庭农业中仍处于短缺之中。因此“，基于自愿联合的新的合作形式在农村得以提倡。不同家庭共同出资购买昂贵的农具或支付种植保护及选种子的费用；他们可以出劳力或现金建立小型企业 如砖瓦窑、建筑队或米粉厂 取得工资和分红。县或集体可能也是组织力量。河南省的一个县建立了一个 2 000 人的联合矿山冶炼厂 生产琉璃瓦 每年出口量达 3.5 亿美元。”^②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 1940~1950 年代美国西部的合作运动。这种合作联合体正在增长，尽管其规模仍相对较小。它们可能在农村地区成为典型的企业联合单位。有一点是确定的“，过去的公社实际上已经消失 公社企业已经被吸收进新型的、由以前的生产队持股的联合公司。”^③——也就是说 独立于党的官员之外。

^① ^② ^③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92 - 307.

农村企业大发展

随着家庭农业的出现，农村非农企业已发展成为农村地区收入与雇工的来源。它们包括乡镇和村所有的企业（从公社继承下来），以及个体家庭与几个家庭所有的企业。这些企业在 1984 年的生产总值达 1 700 亿元，超过农村农业生产总值中工业产量的一半以上。雇工达 5 206 万人，约等于农业劳动力的 16%。所有这些企业中有 71% 是工业，最通常的是生产机械、建筑材料和纺织，13% 是建筑业，其余的分别为运输业（4%）、农业（4%）和服务贸易（8%）。^①

这里的关键在于，这些农村企业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外在于中央计划与分配。从市场上取得原料，通过多种渠道出售其产品，包括供应商、消费者和农村贸易网直接签订合同。这些都代表着多数农村人口的未来出路。”^②

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发展，与其他农村工业一样，在较大的城镇出现了农村旅馆与酒店。无论如何，虽然党对生产队的控制仍然存在，但人们可以看到一种企业化的自由市场经济发展正在农村地区迅速增长。在一个长时期内，这一农民到商业文化的转化将使中国脱离其过去的传统文化而转向一个更“理性化的”未来。事实上，正如纳森指出的，在最近的一部文献片中，一群中国知识分

^{① ②}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92 - 307.

子悲叹中国文化的落后性 并把其失败与中国基于河流农业、过去传统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联系起来。^①由于农民占人口的 70% 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 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 中国不可能摆脱其自身文化传统的陷阱。

因而 脱离公社集中控制的生产队 并转向一个企业化的农村 中国 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一转变以其目前的步伐继续下去 中国的农村人口必将从其过去的“亚细亚生产”^② 陷阱中摆脱出来。事实上 随着中国农业向小商业转变 整个中国文化将进入一个新的理性化阶段。城市中的各阶层人士已经受到良好教育，沉迷于现代通讯网 深受理性科学世界观的影响 并渴望追求西方世界的消费品。随着这些过程渗透到中国农村，中国社会结构的这一主要阶层可能成为支持一种新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现实的基础部分。

如果读者同意一种临时性的理论探讨，我们决不认为“文化”仅仅是一种既定的结构现实性的表面现象。这将对马克思立场的一种非常肤浅的粗俗化。我们正在提出一种韦伯式的、现代马克思主义式关于社会变迁的分析，它们允许文化与结构要素二者的因果独立，以及对于决定其实际分量的一种因果要素的历史独特经验分析。更进一步说，韦伯式的、现代马克思主义式的分析，包括了在社会变迁中作为另一种独立因果要素^③的政治国家的控

① Robert J. Antonio and Ronald M. Glassman, *A Weber-Marx Dialogue*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1985).

② Andrew Nathan, *China's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③ Ralph Miliband, *Marxism and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制和权力。因此 国家政策 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 明显成为推进变迁 或阻碍变迁 的重要因素。

中国农村非集体化的问题

人口增长

回到家庭农业单位的一个消极影响是它鼓励扩大家庭规模。

“家庭责任制注重家庭劳动力。家庭劳动力在十分劳动密集型的农村经济中仍然是家庭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特别是当家庭活动多元化成为可能时，孩子们在农业、副业或非农业活动中的经济效用提高了。出于这一理由，入学率在引进家庭责任制后开始下降。”^①

人们必须记住“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都有利于农村出生率的提高 只有加强政府人口政策 通过教育、物质刺激和强制措施相结合来推行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 才能反对这些因素。”^②

这一处境变得如此严峻，以至溺死女婴的习俗（因为女孩子要嫁出去而男孩子会娶妻进来）已在中国某些农村地区复活。“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表明，男女性别比为 1.085。而正常的比

①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02.

② 同上书 第 304 页。

值则为 1.06。”^①

剩余劳力流入城市

资本主义家庭农业能比集体农业更有效地利用劳力，这是好事情。但是劳动力退出农业生产后怎么办？请记住，中国人口是巨大的。因此 如果几百万农民离开土地并聚集到大城市 将形成类似于里约热内卢、马尼拉或曼谷所面临的困境 聚集着几百万无法在城市找到工作的贫困人口，最终在悲惨的贫民窟成为低人一等的“无产阶级”，^②有可能走上犯罪、邪恶、吸毒和骚乱。从这些社会化非组织环境下生发的破碎家庭，可能导致贫困与犯罪的永恒循环。

我并未预言中国会发生这些问题。中国领导人已经极为重视这一难题。他们对上海、广州“苦力”的悲惨仍然记忆犹新 正谨慎地把农村人与城市经济合为整体。他们也制定了城市可吸纳从农村流入人口的数量限度。然而 随着农村的非集体化和市场化 过剩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必将发生。这些流动的个体必须被尽快地雇用 以防形成曾在中国出现的悲惨的贫困苦力阶层 而这些苦力今天在菲律宾、巴西都存在着。

资本主义农业对劳动力有着直接的影响。“家庭责任制的建立很快显示出，相当大百分比的农村劳动力可以离开农业而不减

^①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04.

^② Ronald Glassma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New York: Funk and Wagnalls, 1969).

少产量。产量的迅速增长确实伴随着较少的农业劳动力。^①这是由于农民现在以其能够使用的最有效方法种植庄稼，解放了过去困在公社土地上的过剩劳力。更进一步说，家庭农业单位中的成员除经营好自己的土地外，还被鼓励从事那些开始迅速兴起的农村商业、企业等非农业活动。

到目前为止，为了阻止大量非雇用劳力流入城市，许多过剩劳力已被快速增长的农村企业单位吸纳。由于城市经济的企业单位正在迅速增长，城市移民也被低收入工作，有时甚至是奴仆工作所吸纳。然而，这总比失业要好，并防止低人一等者的出现。由于这些劳动者收入低，有时被解雇，他们中许多年轻人感到愤怒，并时常在农村及城市组成青年帮。帮派问题将是一个长期问题，但它的确不像典型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无产阶级问题那样糟糕。帮派此时在中国并不是一个主要问题。

农村的财富不均

资本主义带来财富不均。成功的企业主将比那些为他们工作的劳动者赚更多的钱，而那些不太成功的企业主则几乎只能糊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了解这些情况，但仍在鼓励企业发展。事实上，为了鼓励企业的生产动机，党试图使财富不均合法化，宣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一句响亮的口号，因为它表明如果有些

^①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05.

人先富起来，那么其他人也可在后来得到好处。这是用中国的口号形式表达的‘滴入说 (trickle down)’”。

共产党甚至强调说，“平均主义实行得太早了 因此他们必须帮助一些农民先富起来。如为有着特殊或高超技能的农民提供资金、技术支持和原材料以发展生产 从木匠到管理诊所、托儿所或学校。他们的收入应该比平均收入提升得更快一些。”^①

随着从卡车到企业股份的私有产权的发展，“积累财富的机会在增加。1983年3月 威廉·希顿在安徽凤阳县发现一个拥有两辆卡车的农民 每辆卡车月收益为1000元 在购车六个月内就还清了成本。这个农民利用汽车跑运输，把当地生产的草席运到东北的购买者手中。他一年可赚2万元 在交了3/4的所得税后 他的最后收入仍为该县平均收入的14倍。希顿指出 这个农民商人可以把他赚到的钱进行再投资 存入银行收利息 或者在一些新开的工厂购买股份……无论他做什么，从其投资中所产生的收入最终积累成为相当可观的持有资本……希顿指出，如今遍及市场的商业自由确实预示着某些‘商业王子’的诞生。”^②

肯尼特·莱伯特指出，“一个新的农村精英阶层将出现……新政策允许农民家庭运用其多余资本谋取更多土地，建立运输公司，投资地方企业等等。这些广泛的经济活动将不可避免地对社会和政治地位产生压力。”^③

然而 共产党减弱了这种压力 并不是新的富裕的和有能力的

^①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06.

^{②③} 同上书 第 307 页。

农民都能通过其商业才智进入精英阶层。许多人致富是因为他们曾是控制公社及其机械、牲畜、肥料和其他生产性企业的党政官员。

“虽然报刊上时常见到穷困农民钻研新技术，借钱买鸡仔并在一年内脱贫致富的报道，但对陕西省一个县内 2.1 万个致富家庭的调查却显示了不同的情形。在那里，43% 的致富家庭由村、队干部或前任干部所组成，另外 42% 由返乡知识青年和复员军人所组成。工厂或商贸中的技术工人构成另外的 9%，只剩下 5 个百分点才是那些在经营管理中有技术的农民。”^①

比党政干部和新的受教育阶层可以主导经商机会更糟糕的事情是农村贫困的再次出现。以前的党员干部和新近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逐渐攫取农村的商业机会，这并不是固有的灾难。然而，可怕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农民不能利用他们的新机会，因为他们的土地贫瘠，或者他们地处偏僻，远离工业和乡镇市场。尽管他们分到了自己私有的土地，但最后仍可能陷于贫困。^②这正是墨西哥革命后小庄园经验所产生的问题。^③一些农民离开条件不理想的地方成为乞丐，再次在火车站、城镇及城市的大街上公开乞

①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07.

② 同上书 第 308 页。

③ Glassman, *Political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讨。民政部在 1985 年 1 月估计 约占农村人口的 8% 即有 7 000 万人尚处于贫困之中 需要救济。’^①

当然 后者这一现象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后果 尽管在毛的公社体制下农村贫困确实也大量存在。然而，中国共产党政府虽然鼓励市场经济 但并不是一个自由放任的政府。就此而言 这是好事情。邓小平政府对于农村贫困采取了人道政策，帮助农村贫困者减免税收 提供低息贷款 优先收购农产品、供应种子和其他农业设施 帮助购置这些农业设施 并提供技术教育与建议。^② 这是中国政府相当人道的反应。地方干部虽然通过家庭责任制确实使自己致富了 但在希顿看来“，在某些情形下 他们至少承担着帮助勤劳家庭制订脱贫计划的责任。”^③

中国共产党政府如何担负救济贫困农民工程的费用呢？通过对经营成功企业征收很高的所得税。现在任何一个优秀的古典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 如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Friedrich Hayek) 都坚持认为 对更为富有的商人征收高所得税妨碍了其企业的创造性，阻止其大量商业投资，并普遍束缚市场经济的扩张。这些古典论断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是真确的。另一方面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相信 即使税收水平比古典所限定的水平要高一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将会得到极大

①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08.

② 同上书 第 308 页。

③ 同上书 第 308 页。

的扩张；^①而且更进一步说，政府对投资过程的干预是必要的，以便改善收入较低阶级的问题。凯恩斯称之为“投资的部分社会化”。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并不是凯恩斯式的政府而且其税收政策以凯恩斯的标准来看目前也是太高了。然而高税收的增加部分是农村贫困人口“转化工程”的经费。正如我所警告的，这一工程在中国是迫切需要的，那里大量农村低收入阶层的潜在增加是迫在眉睫的问题。“简而言之，邓小平领导下的党的政策已经为处于有利环境下的农民向前迈进铺平了道路，同时正在为最落后的农民提供帮助。”^②

（陈永革 译）

^①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Harbinger Edition, 1965); see also Ronald Glassman, *Democracy and Equality* (New York: Praeger, 1989).

^②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08.

私营企业利益的增长*

白 桂 娴

编者按 白桂娴 (Kristen Parris), 1991 年获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 同年起在西华盛顿大学任教, 现为政治学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的地方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国家与企业关系问题等。发表有《中国的企业家与市民意识》、《作为公民的私营企业家 从列宁主义到社团主义》、《国家改革与地方主动性 温州模式的发展》、《中国经济特区的劳动力与妇女》等论文。

本文主要讨论了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私营经济增长问题。文章首先讨论了国内有关公私变迁的理论演变, 着重阐述了从个体经济到民营经济这一私有利益再合法化的历史进程及其思想斗争, 深入探讨了私营经济的政治地位, 及其社团组织的功能与作用, 说明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私营经济的增长, 私营企业主正逐渐成为地方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利益存在。

* 译自 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 合编的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一书, Copyright ©1999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 of Harvard College. 经哈佛大学出版社许可重印于本书。

中国经济改革最主要的成果之一，是私有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曾由一小批边缘的小商品经营者构成的私有经济，现在已是一种充满活力、日益增长的经济成分，它吸引了公有经济的工人、经理、党员 甚至是期待个人财富积累和追求自立的大学毕业生。时下流行的成功者形象 往往是拥有移动电话、驾驶自备小车和居住城郊别墅的个体老板 这为许多人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可选择的生活方式。这种形象 与共产主义者的榜样、永远献身于公众利益、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年轻解放军战士雷锋的形象 形成了强烈对比。它标志着社会从公众生活到私有利益的一个重大转变。

当西方社会周期性地从专注于富有公益性的事业转向热衷追求个人所得和回报时，与人们的价值观从公共利益向私人利益转向相伴随 产生了自利行为不仅具有合法性、而且有助于公共利益的观点。^①然而 在中国 这种从公共利益到私人利益的“转变着的相关性”却是较成问题的。从整体上看 直到最近 中国共产党仍否认私人利益的合法性 坚持认为个别公民应拒绝私利 并应完全献身于党的意识形态所界定的公共利益。因此，随着经济改革过程中私有企业的增长，人们对于从前所接受的有关公与私的观念以及二者之间界线的认识 发生了许多困惑。因此 有必要重新思考私有企业发展对一个政治社会成员的意义之所在。对私有企业变化着的角色以及围绕着它的公众舆论环境的分析，表明了当今

^① Albert Hirschman, *Shifting Involvement: Private Interests and Public A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中国公与私之间变化着的权力平衡，及其复杂的理论阐释。

扩大公有和否认私有

中国共产党对公私关系的理解既吸收了中国传统又与中国传统不同。正如儒家学派一样，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也宣称拥有终极真理 努力参与公共利益 并无视私有利益的合法性。然而 不同于先前的定式，中国共产党把阶级分析法引入到它对美好未来社会的憧憬和理解中。马列主义确实为党声称是公有利益的唯一仲裁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而公共利益现在被视同为社会主义。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正如传统的儒家学者一样 是公有利益的捍卫者 并与国家一同管理共同构成为‘人民’的无产阶级及其阶级同盟的利益。

当儒家学说把私有利益置于公有利益之下时，家庭、家族关系、商业、宗教等可扩展的私人领域 就作为国家和个人之间的缓冲存在。与之不同的是 中国共产主义力图在党、国家与个体公民之间建立一种直接的联系，取消所有不直接在党控制下的社会调节组织。的确 从整体上来看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力求消除私有利益，并以消除私有企业为开端。马列主义认为私有企业有害于公共利益，并废除其最主要的形式：私有生产与交换。到1950年代后期，共产党实际上控制了所有工商业。一种边缘性的小商品经济仍然保存着 但它处于低下的社会地位 在法律上很微弱 在政治上却有很大的风险。因此 在不间断的群众运动和政治斗争中 个体经营者遭到不断的批判 直至关闭消失。

毛泽东发表过一篇不仅仅针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和不平等，而且还针对物质利益本身的评论文章。^①繁荣已成为共产主义的一种障碍，而不是共产主义的一个理想目标。尽管在群众中否认私有利益，但党认识到人民确实需要私有利益。通过其层级再分配系统和工作单位，党和国家明确表示并努力提供公民的基本必需品。而一旦考虑到私人事务，如分配住房、教育、购买紧缺的消费品、决定婚嫁、离婚和是否要孩子等，全都要得到单位领导的批准，并因此而成了公众关心的事情。

尽管国家支配公共领域的范围扩大了，官员对私人事务的介入权力也越来越大，但人们实际上仍在追求私人利益。为了满足家庭需要与个体利益，有些人便致力于以不当手段维系个人与官员的关系，进行定量分配票证的交易，业余兼职赚钱，或者从事走私活动等。尽管官方对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解释并没有变化，但以上行为和追求甚至已渗透到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和机构之中。正如洛厄尔·迪特默 Lowell Dittmer 所指出，其结果与其说是以公灭私，不如说是在公私之间形成了一个十分巨大的裂缝，一方面是由空洞的意识形态宣传和循规蹈矩的行为所主导的公共领域日益扩大，另一方面是在公有制体系的后院，人们热烈地讨论着如何增进私人利益及其他与私人利益有关的问题。^②

^① Lowell Dittmer, *The Continuing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 40-43.

^② Dittmer, *The Continuing Revolution*, p. 78; Andrew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私有利益的再合法化

在推进经济改革的过程中，邓小平对追求私人利益的愿望表示了支持，并试图通过促进商品的空前丰富实现经济繁荣和提升民族力量 修补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裂缝 而不光是激励抽象的革命幻想。1978 年 12 月，中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改革的开始。邓小平抛弃了党内一部分人对贫穷的盲目膜拜 鼓励个人为物质利益而努力工作 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 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率先收入多一些 生活好起来”。^① 如今，通过个人努力而使自己和家庭的经济利益获得改善在中国已经成为可能。邓号召人们“实事求是”。那些先富起来的人证明了党的改革政策是行之有效的。邓及其同事在中国进行的经济改革 目的是重新激活经济和增强党的力量 而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则是重要的检验标准。在这个努力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减少对国营经济的依赖性和鼓励私有经济的创造力。经济改革之初，改革的重点并不是要发展私有企业。然而，1970 年代末和 1980 年代初 当改革者面临工人失业和消费品供应不足的问题时，他们开始制订使私有生产和私营商业合法化的政策。于是 个体户和少于八名雇工的小企业经营者 开始获得一系列政策和法规的正式支持。过去，个体经营者一直被

^① 邓小平：《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选集》（1975～1982）北京 外语出版社，1984。

许多人认为是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残余力量。现在，个体经济被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将在长时期内继续存在”^①，个体经营者“被认为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他们将不再像过去一样受到政治歧视。这就是说，他们的劳动将受到社会的尊重，其合法的经营将受到保护”。^②

虽然 1981 年颁布的个体经济条例允许私营企业可雇用八名以下的员工，但许多个体企业和家庭企业却已大大超出了这个限制。还存在着许多“假集体”企业或“红帽子”企业，即企业的资金和管理虽然都是私人的，却以集体的名义加以注册。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大报告中，这些规模超出国家规定的私有企业的存在得到了正视。于是，在 1988 年第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起草了一个允许私有企业可以雇用多于八名员工的法律修正案，这自 1950 年代以来尚属首次。这种企业被正式称为“私营企业”。宪法第 11 条规定私营企业作为公有经济的一个补充，在法律规定的限制之内允许存在和发展，国家保护私营企业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并对它们实行监督和控制。宪法修正几个月后，国务院于 1988 年 6 月颁布了第一部关于私营企业的国家条例，规定了私营企业的投资者享有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③ 这些改革不仅保护了一部分企业家的合法权益，而且至少在理论上对国家的权力作出了一些

^① 《大公报》，1980 年 8 月 3 日，译自《国外广播资料服务》，1980 年 8 月 15 日，第 17 页。

新华社，1980 年 8 月 20 日电讯。

有关私营企业的国家和一些地方法规见于《中国私营经济年鉴（1996）》北京，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

限制。1990 年代，在报纸杂志上曾刊登过一些文章和来信，反映私营企业主的权利和利益得不到合法保护，还时常遭受侵犯的问题。诸如此类的抱怨被公开报道的事实，充分表明了当事人及其在大学与新闻界的支持者们对中国私有经济发展所面临问题进行的思考。

随着私营企业的合法性得到肯定 私营企业的数量增加了 企业所有者的特征也发生了变化。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初 从事个体经营的人员往往被认为是没有其他出路的人，他们要么年纪较大、文化程度较低或文盲 要么是“社会闲杂人员”再就是那些从监狱或劳改营中释放的人员。由于个体经营者阶层代表了较低的社会地位，注册私营企业的年轻人相当少，通常不到总数的 5%。例如在上海，1980 年注册个体经营的人员中有 80% 的经营者年龄超过了 50 岁。^①到了 1990 年代，私营企业主已成为多元化的群体，包括从国营单位出来的一些具有干部和工人身份的人员。根据 1995 年国家私营企业主的一份调查，45% 的人在 35 岁至 45 岁之间，属于红卫兵一代。几乎有 30% 的人是高中毕业生 还有 5% 是大学毕业生。^② 尽管绝大多数私营企业仍是规模非常小的生意人、理发师和杂货店主，但私有企业的规模正逐步扩大 其重要性也日益显现。在 1995 年 几乎有 10% 接受调查的私营企业主的注册资金超过了 500 万 有超过 19% 的私营企业雇用不止 100 名员工。虽然有一些私营企业主长年累月经营却几乎无

蔡北华音),《论个体经济》载于《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第15-16页。

② 《1995 年中国第二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及分析》，《中国私营经济年鉴(1996)》第 157 页。

利可图，而有些人却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如在 1990 年 城市国有企业工人人均年收入是 2 500 元，有 11% 的个体户收入低于 1 000 元，但有 9% 的私营企业主年收入已达 8 万元。^① 根据最新报道，有 2—5% 的私营企业主收入已超出 1 000 万元。^②

私有经济成分在 1990 年代有了快速增长。到 1995 年 全国已有 2 528 万家个体户及 65 万家私营企业注册，“非公有经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4.6%。1996 年 国家统计局称 每 12 名中国劳动者中就有一名被私营企业雇用。私营企业在 1990 年代早期为城乡提供了 1 400 万个新的工作岗位，占城市所有新工作岗位的 40%。^③ 尤其是在中国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私有经济成分在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94 年 浙江省个体/私营企业生产总值约占全省生产总值的 20%。温州以私有经济成分的增长而闻名全国，私有经济现在是经济的主体，但它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河北省清河县 有北方温州之称 仅 1994 年就有 85% 的财政收入来自私营企业。现在，经济改革正朝着促进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1996 年在苏州 以家庭为主的“苏南模式”的集体工业已经开始把乡镇企业出售给个体企业或民营经济集团 官员、企业主和普通市民都认为“苏南模式”有必要进行调整，“温州模式”有借鉴的价值。此外 虽然 1997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十五大谨慎地

潘世雍 音），《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收入情况分析 & 政策建议》，《经济研究参考》，1995 年第 13/14 期 第 33—34 页。

② 《私营企业主的消费心态》，《中国经济信息》，1996 年第 9 期 第 25 页；《中国市场经济报》，1996 年 3 月 20 日。

新华社，1996 年 4 月 25 日电讯。

避免使用‘私有化’的措辞，却宣布了一批国有企业将被解散、合并或改组为股份制公司。

随着私有经济成分的迅速增长和转变，对于私有经济的实际规模众说纷纭。然而，观察家认为，官方公布的有关统计数字令人信服地反映了私营经济在当今中国的实际比重及其存在的重大意义。但是，城镇企业的分类和登记仍缺乏清晰度，有些企业从所有制性质上难以分清究竟是公有企业、私营企业还是新的混合型企业，这使许多企业主和官员对企业的发展走向困惑不已。这种困惑的情形反映了经营私营企业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障碍，也反映了反对发展私有经济势力的一贯偏见。事实上，集体企业比私有企业更可能得到税收减免、银行贷款、土地使用权和进出口权的优惠。在政治上，私营企业主不时面临着被公开批判的危险，他们对自己的财产安全也存在着担忧被没收的心理。在意识形态狂复活期间，大大小小的私营企业曾被攻击为投机倒把、牟取暴利、逃税、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淫秽物品和散布其他社会毒害。

在 1989 年的风波后，出现了自 1978 年以来首次发生的大量私有经济企业撤销登记的问题。但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私有经济又开始复苏，接着召开的十四大为经济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许多国有职工弃职下海，中国大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商热潮。但针对私营企业的意识形态矛盾仍然存在。

于是，企业所有者和把私营企业看作是当地财政税收、就业安置与经济增长一个来源的地方干部，使用各种办法隐瞒或变更私营企业的私有性质。另有些人则巧妙地将私营企业与公有企业结合起来，众所周知的一个策略就是给私营企业戴上“红帽子”，成为

“假集体”企业。这些企业向挂靠的公共机构支付一定的管理费用，以换取集体企业名称的使用权。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可以享受相当多的税收优待和其他激励优惠政策，因此戴“洋帽子”或“假合资”的企业数量也增加了，企业主借用在香港或海外注册的相关企业的名义，建立一个合资企业。在某些情形下，有些企业主自己先在香港获得永久居住权，然后作为外商投资企业回到家乡做生意。这些类型的企业并不包括在私营经济的统计里。

假集体企业确实可以使企业主减少某些投资成本和政治风险，但这些企业也给自己带来了麻烦。一些案例表明，当这些企业的经营者企图把企业利润占为己有的时候，便有可能被指控涉嫌经济犯罪，如挪用公款或滥用公有资金。另一些例子则表明，假集体企业的经营者发现自己被与其相关的集体企业撤去了领导职务，有关部门声称，尽管企业主或厂长为企业提供了资金，但由于企业是以集体的名义注册，并享受减免税收或其他优惠政策，因此企业是公有的，有关部门在必要时有权重新任免经理。

另一种类型是“股份合作制企业”，它最早出现于 1980 年代中期。这类企业被官方认为是国有企业，并因此而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有些股份制企业明显是公有性质的，比如那些股份被城乡永久居民持有的企业，其经营决策权则属于地方政府或政府机构掌握的股份制企业。另有一些股份制企业则代表一种混合形式的所有权，重大股份既为公共机构同时也为个体户或私营企业所共同持有。还有一些股份制企业实际上就是私有企业，它们的股份由经营者及其亲戚朋友持有，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仅由个人以私有资本建立或购买。股份合作制企业最早形成于 1980 年代中期的

温州 随后扩展到其他地区。如今 股份合作制企业已成为一种普遍形式。1995 年 温州有 3 989 家私营企业 却有大约 47 000 家股份合作企业。据一些人估计 在温州 至少有 2/3 的股份合作企业实际上属于私有性质。^①

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探索农村企业和家庭企业理顺财产关系、扩大规模和进行标准化管理的一种制度创新。它的产生旨在把私有企业重新包装为国有企业，从而为官方的社会主义词汇增添一种新的表达。一位来自温州的改革者官员断然声称，“合作化”的提法就是为了迎合社会主义体制下进行商业活动的政治需要。“合作制的标签 给股份制公司一个集体化的身份 成为占主流地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合法部分。因此，它们的发展是不受限制的。”与此相反 私营企业因被认为是具有剥削成分的 所以只能作为公有经济的一种“补充”而困难重重。^②

私营企业经营所面临的困难以及逐渐增多的混合企业的出现 产生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民营经济”领域。民营经济这一提法是在 1980 年代中期出现的 当时温州及其他地方的官员们正着手“更名”的尝试 藉此 所有的私营和准私营企业 都以与社会主义规范相一致的方式重新命名。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在“人民经营（民营）”的标签下 组成为股份制、联合制或其他混合型的公司。这些企业既非私有 也非完全公有 更非国有，“民”这个词具有一种社会主义的血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人民”明显一致 并因此

马建汉（音）：《个体私营经济与乡镇企业的发展——温州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调查报告》，《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1期 第77-83页。

② 马津龙（音），《温州股份合作制》第4页。

具有公共的性质。在毛泽东时期，“民”被用于描绘农民的革命自信心，并没有涉及到个体利益、私人劳动报酬或剥削。^①邓小平虽然大大地削弱了毛泽东所界定的公共利益的思想意义，但革命的遗产仍继续为政治词汇的形成推波助澜。“民营”与合作制等词汇的出现是企业家首创精神的表现，是将私有利益与公共利益及公共精神相融合的一种尝试，并左右着当前中国公众对此进行热烈讨论的过程。

对私营企业作用的公开讨论

经济改革之初，对于私有企业的性质和作用的讨论就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对立与冲突，有关讨论一直持续着。如果把公共利益界定为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而社会主义是与公共财产相一致的，那么，中国私营企业的作用是什么呢？对于这一在公开讨论中提出的问题，有三种不同的回答。第一种回答持有比较温和的观点，试图在改革者与强硬派之间寻找一个中间基础，并以这种观点来代表官方的立场。根据这一观点，私营企业是公有经济的一个必要补充，其作用在于刺激生产、搞活市场、扩大就业、满足人民的需要。总之，私营企业的存在是必要的，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特征，私营企业的作用被认为既是边缘性的又是过渡性的。公有的社会主义成分仍将保持主导地位，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

^① Kristen Parris, *Local Initiative and National Reform: The Wenzhou Model of Development*, *China quarterly*, No. 134, (6, 1993) p. 258.

的主体。确实 起初使私有经济成分合法化的努力 乃是集中于其规模小和边缘性 这使它似乎是无害的 并同时也把它留在社会主义经济之外。根据这一温和的观点，主要依靠自己劳动经营的小个体企业主也属于社会主义的工人范畴，但较大的私营企业主却并非如此。

作为对 1989 年风波的一种反应，中国共产党颁发了第九号文件 正式禁止私营企业主加入共产党组织 因为他们不属于无产阶级，其收入来自剥削。尽管私营企业主被官方认为对公共利益作出了贡献 但他们的利益是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目标相对立的。因此 私营企业主仍然只有一个含糊的、颇不稳定的政治地位 他们不再是敌人 但也不是享有充分资格的‘人民’的一员。作为政府的立场 这个观点缺少理论上的连贯性 几乎没有使观察家感到满意过。

讨论中的第二种回答反映了改革者的声音，他们认为官方对私营经济的解释 并不适应中国的现实 而且限制了私有经济成分在公有经济疲软的同时作为经济增长推动器的潜力。他们宣称，私有经济成分已经并应该更多地补充社会主义经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国有经济的‘组成部分’和‘有机部分’。虽然私营企业主也榨取剩余价值 进行剥削 但私有经济的支持者特别指出，共享的利益一致性使劳动者、雇主、国家和社会能和谐共存。这种观点 强调了私有企业为提供就业机会、向国家财政纳税和参与慈善捐款等方面作出的贡献。私营企业主和新的富人代表着不仅为他们自己，同时也为整个社会创造财富的爱国的和勤劳的创新者。改革者还讨论了更为复杂的对社会主义和公有利益的理解

问题。与晚清时期的改革者不同，当代中国的改革者主张私有化并不损害公有制，而是公有制的必要部分。

讨论中的第三种回答代表了政治强硬派的观点。像改革者一样，他们认为，官方对私有成分的理论阐述不符合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实际。他们运用毛泽东的辞句，声称私营企业是逐步削弱社会主义的“糖衣炮弹”，这已被国营企业所受到的冲击和面临的困境所证实。但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重新鼓舞了改革，随即平息了强硬派人士的批评。在1995年，又出现了新一轮对私有经济和改革过程的攻击，这种攻击以左倾理论为色彩，怀疑整个改革过程，并警告新的资产阶级正在出现，私有企业已经逐渐削弱了公有经济，而且还声称在某些地区，私营企业已成为公共财政的主要来源，而地方政府却为损害公共利益的私人利益服务。^①强硬派的立场，基于公众对腐败的普遍愤怒和不满心理，以及对造成失业人员增加的财富分配差距日益扩大问题的关切。这种心理和关切，可以在1996年秋季发表的有关文件中得到反映，党因此而号召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②

然而，对改革的强硬批评，在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上失去了立足之地。江泽民在会上探求开始新一轮的改革。尽管江泽民反复强调公有制必须占主导地位的政府立场，但他对公有制成分的“全面理解”作了论述，公有制成分不仅包括国有和集

^① 代表作是《影响我们国家安全的几个因素》见《亚洲周刊》(This essay was published as “Sever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Security of Our Country”, *Asiaweek*), 1996年1月14日第22-28页。

^② 《人民日报》，1996年10月14日。

体企业 也包括那些混合的所有制形式。而且 由于认识到越来越多的地区和部门被私营企业所支配的事实 他提出 在一些地区可以有合法的差异 并表明公有制经济成分的支配地位 应根据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来理解。

党明确希望，私有经济成分将吸收那些来自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下岗人员。江泽民的报告采用了改革者的语言，并以先前有关非公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府公式来结束。党的十五大并没有解决增长的私有经济成分对党的意识形态所提出的问题。尽管讨论仍将继续，但私有企业不仅被允许继续存在，而且其为公有利益服务的作用也越来越得到肯定。显而易见的是 在私有经济活动的合法化过程中 党已愿意让私营企业主加入到政治社团中来。

在政治社团中的私营企业

能有论坛就公众所关心的话题进行讨论与辩论，是公共生活领域中最具象征性的重要特征。那些被排除于参与公共活动之外的人，几乎不可能成为在政治社团中具有充分资格的成员。近几年来，有数量不断增加的私有企业主成为中国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虽然他们的人数在总体上还是少数。现在 想要参加各种政治社团组织的私营企业主的人数还在增加，他们加入各地的工商业联合会 或成为八个民主党派之一的民主促进会会员 从而介入到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据统计，1993 年有 5 400 多名私营企业主当选为县一级或县级以上的人大代表，有 8 人当选为第八

次全国人大代表 还有 8 600 名私营企业主当选为影响相对较小的县或县级以上的政协委员，有 23 人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①

在谈及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地位得到改善和他们的影响正在扩大时，许多接受我访问的人都提到了私营企业主积极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虽然人民代表大会的威望和权力不如共产党的代表大会 具有一定的边缘性质 但私营企业主在历经多年的受歧视之后 已开始被各级人大和政协所吸纳 他们已成为各种政治社团和组织的重要成员。而且，正如唐纳 (Murray Scot Tanner) 所说 人大在近几年变得比较活跃和富有生气了，各级人大代表有选举政府主要官员的正式权力。^②正是基于人大代表的权力在扩大，有一些置身基层的私营企业主试图通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程序促成自己成为被提名的人大代表候选人。还有一些人则试图以不正当的手段购买选票 企图使自己能被选人村民委员会、镇政府 甚至成为党委委员。在一个村子里，一位私营企业主为了使自己成为村领导人而进行贿选活动 他安排一些村民填写选票 每张选票支付十元钱 他的竞选发言也非常简单 称“如果每个人都选我 我将给你们更多的钱。”^③这种现象显示了东部沿海地区一些私营企业主的影响和信心，这些地区的私有经济成分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正在扩大。

张厚毅 音),《私营企业主群体在我国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中国私营经济年鉴 1996》第 95 页。

② Kevin J. O'Brien, "Agents and Remonstrators: Role Accumulation by Chinese People's Congress Deputies", *China Quarterly*, no. 138(6, 1994): 359 - 380.

③ (警惕农村 贿选),《人民日报》,1996 年 5 月 21 日。

私营企业主当选为人民代表，标志着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的提高。然而在中国，共产党仍是政治权力的核心组织。作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个体户现在已允许加入共产党，但 1989 年后私营企业主加入党的门被关闭了。这个不许私营企业主入党的规定甚至在一些不想入党的人中间也引起了不满，因为它被视为是一种不公正的偏见。尽管党现在拒绝接纳私营企业主，但是那些在 1989 年以前被批准入党的人仍保持着党员的身份，并继续发展着他们的私营经济或准私营经济。在 1995 年，有 17.1% 的私营企业主是共产党员。^① 正当党重申私营企业主不能加入共产党的时候，他们对那些成功的非共产党员的股份制企业法人情有独钟，而这些人中的一些人却不想入党。一些在成功的股份制企业里持有控股权，有时是唯一的，的企业主，以及那些明确认为自己是私营企业主的人，发现自己难以抵挡住当地党组织要发展他们入党的努力。有些地方干部为这些企业主起草入党申请书，甚至为他们交纳党费。^②

以上这些例子反映了某些地方的党组织，在面对私营企业主这一新出现的社会阶层时所产生的困惑，而那些企业主则提供了一套与党的基本意识形态相反的成功模式。从原则上说，把私营企业主吸收进党组织是明显成问题的，因为这样做可能导致共产党被‘剥削者’所领导。然而，让一个潜在的强有力的群体留在党外，则会使合作和控制变得更困难。当社会部门失去其先前稳固

^① 《中国私营经济年鉴（1996）》，第 162 页。
访问温州，杭州，1996。

地附属国家就业体系与权威的正式等级制度时，这个问题就愈加尖锐了。

公共团体和私有利益

对于具有实力和发展潜力的私营企业，中国共产党寻求建立新的社团组织来联合它们、控制它们。这些社团组织的出现部分地反映了当前中国的制度变迁和意识形态调整，反映了中国向国家社团主义方向的发展。在国家社团主义制度下，党和国家是公共利益的捍卫者，公共利益超越了个体、群体、阶级中的自私欲望；但与列宁主义不同的是，国家社团主义制度下的公共利益不再与无产阶级的利益相一致，却与国家的强大相一致。私有利益得到了承认，阶级阶层差异被认为是自然的现象，那些获得当局批准的、有等级分层结构的组织团体在国家领导下，受到友善的对待，而不是遭受被取缔的厄运。这些团体，是联系国家和社会的中介，尽管在权力至上的处境下，它们经常受到国家的支配。公民参与这些公共团体的活动以一定形式介入到现实政治生活中，倒不是追逐个人利益，也不是从事反对国家的活动，影响国家对公共政策的阐述。他们参加这些团体，主要是为了促进公共利益的发展。这些团体不仅是政策的倡导者，同时也在履行公共职责。当前在中国代表个体经济成分的主要社团组织是个体劳动者协会、私营企业会和工商联合会。

在 1980 年代中期，个体劳动者协会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下成立，它是个体经营者保持列宁主义传统的一个群众组织或联系纽

带。尽管官方称它是一个“非政府性的”或“民间的”组织，但个体劳动者协会是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一个分支，而工商行政管理局是负责审核和发放企业营业执照、制定有关管理规章的国家机构。个体劳动者协会的干部同时也是工商管理局在个体与私营企业部门工作的官员。在私营经济正式合法化后，某些地区的工商行政管理局为私营企业主建立了私营企业会，他们想把自己和规模较小的个体户区分开来。个体劳动者协会的任务是教育私营企业经营者的政策、法律，遵守适当的经商惯例，并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官方致力于使个体劳动者协会具有如同其他社会团体一样的政治功能，个体劳动者协会结合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它维护市场治安，努力执行独生子女政策，是组织学习新法律、党的政策甚至雷锋的学习单位。它也组织产品交易会，并参加慈善活动、演讲比赛、运动会等。^① 这些活动意味着自主经营者声誉的改善和社会地位的提高。

除了这些活动，个体劳动者协会还宣称，为那些由于其他政府机构或因伤病而感到自身处于困境的个体企业主充当支持者。地方和省级个体户组织的刊物与干部，曾自豪地讨论他们援助其成员的方法。虽然这些活动的例子经常被报道，但其真实程度却不为人所知。一些企业主在协会中成了积极分子，担任诸如“理事”或“副会长”之类的正式职务，参加会议，参与协会活动，甚至帮助执行独生子女政策。这种策略赋予他们一种准官方的身份，并使个人的修养和威信相关联。然而，最重要的是，会员身份也意味着

访问杭州、温州，1989和1996。

获得执照和支付必要的费用。

代表私营企业利益的一个独立但又重叠的官方组织是工商联。以一种多少有些混淆的排列，工商联也会被称作中华商会。工商联的官员解释说，他们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工商联是用于国内名称，而商会则主要是用于国际活动的，因为它是一个其他国家与对应的机构所熟悉的名称。在党的统战部门支持下，工商联作为官方管理私营企业主的群众组织，最初在1950年代成立，工商联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十几年里失去了作用，但在1977年被统战部门重新恢复。自1991年起，工商联已主要集中于私营企业。

在1993年，工商联组织功能的特征是，在非公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起桥梁作用。工商联的官员和出版物也把这个组织描述为桥梁或娘家。工商联的绝大多数成员是成功的私营企业，并且确实找到了不同规模的形象高大的成功的私营企业作为成员。工商联的中心任务是保护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例如，当与其他政府部门发生冲突时，他们代表私营企业主解决冲突；同时为那些被当地权力机构没收财产的成员提供合法支持。在一些地区，工商联已在私营企业中组织了互助经济会和民营信用社，以帮助私营企业获得取得所需资金的更多途径。工商联还开始在许多镇和城市组织了市、区一级的贸易联合组织（同业公会或行业会）。

尽管许多这些团体看起来做得还不如出版报纸和为慈善事业募捐，但其中有些团体已经为保护其成员利益起着准公共的作用。如在温州鹿城区的轻工产品生产者协会，已经为区内轻工产品生

产者提供的新产品设计和生产建立了一套登记和保护制度。其成员都是私营与准私营企业。至少有一个事例，协会理事中的厂长、所有企业主在安全局和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帮助下，突击搜查了一个违反新产品保护规定的工厂。在温州，其他工厂的一些企业主指出，协会作为商会的一个实体，实际上要做的是保护其成员的私有利益。最后，在一片争议中，工商联合会在许多地区都建立了自己的企业。^① 这被解释为解决资金限制问题的自力更生的方法，是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工作方法，以便更好的为其成员服务。

作为党和国家为监督和倡导私有成分，并在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起中介作用而设立的组织，工商联合会和个体劳动者协会或私营企业会存在着某些重叠的功能。它们的一个差别在于，个体劳动者协会最主要的成员是部分小商品经营者，而工商联合会倾向于顾及一些较大的和产值更多的私营企业，而且作为工商联合会的一部分，个体劳动者协会有政府正规机构的支持，可以批准和关闭企业。工商联合会的官员说他们自己和个体劳动者协会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属于批准和管理组织，而工商联合会则是没有任何管理功能的志愿者协会。一位工商联合会官员指出：“我们不是政府，我们不管理，我们只引导并反映他们的意见。”^② 很可能是这一缺乏直接法规和许可的权力，使工商联合会作为一个专业协会更加引人注目。在近年对私营企业主的调查中，有 77% 是工商联合会成员，而只有 43.79% 和 24.6% 分别是私营企业协会和

① 《温州日报》(1994 年 7 月 4 日)访问温州,1996。

② 访问苏州,1996。

个体劳动者协会的成员。^①

据上所述 如果没有个体劳动者协会 工商联合会看来似乎是可以透过私有企业主发表观点，追求利益和帮忙影响公共政策和公众意见的传播工具。尽管据说工商联合会是一个群众或民间组织，而不是官方组织，但它没有也不可能宣称自己独立于国家之外。工商联合会作为一个试图在私营企业利益与党和国家之间充当桥梁的组织 它可能逐渐占据公有与私有之间的中间领域 其作用令人想起清代的商会。清代的商会正如工商联合会也是由国家为推动私有利益所建立，并承担着具有新的合法化的私营企业的功能的公共职责。然而，虽然工商联合会的一些干部和成员表达了将其恢复的愿望，但工商联合会仍然没有恢复清朝商会的声望和权力。

成员们充其量给工商联合会以混杂的审议，极少看到它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位曾在个体劳动者协会和工商联合会中较活跃的面馆经营主就承认 自己遭到过挫折 当所在社区的政府领导人决定取消当地一个大众市场时，他作为一名社团的负责人和代表要发表不同意见，却发现自己不能得到市或区政府领导的重视。“他们恰恰忽略了我。我被认为是一座联系政府与私营业主的桥梁 但当政府方面不愿意利用这桥梁时 我怎么能发挥作用呢？”^②有些私营企业主便认为，工商联合会只是一个空架子而已。另有一些人则认为工商联合会有一个有效的作用，即通过与其他企业

^①《中国私营经济年鉴(1996)》第 162 页。

访问杭州，1996。

主以及政府官员进行联络并交换信息，提供了一个联系的渠道。还有的人提到 当一个人与当地政府官员的交往陷入困境时 工商联合会能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此外 还有一些企业主指出 工商联合会之所以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原因与企业主自身也有关系 私营企业主们有着一一种低层次的组织意识，与试图促进群体利益相比 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多赚钱。^①

当前的现实导致了工商联合会更接近国民政府时代的商会，而不是晚清时期的商会。约瑟夫·费斯密 (Joseph Fewsmith) 指出，国民党统治时期曾谨慎地建立过各种商会，但这类商会并没有产生什么作用。国家社团主义结构的确是权力至上国家的典型产物 国家要先发制人 并驯服这些社团 使它们不至于对政权及民族利益构成威胁。^②然而 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 国民党在寻求扩大国家的作用时否认了私有利益，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的国家社团主义结构 则是对党和国家的权力提出一种新的限制 承认私有利益的合法性以及为超官僚行为提供一个更大空间。它同样是一个权力至上的设置。因此，企业主认为工商联合会的作用受到限制 并发现培养私人关系和构建各种社会网络 对于追求私人利益和影响当地各级官员的行为来说，是更为有效的策略。如一位工商联合会的官员所表达的那样 把私营经济称为‘关系经济’似乎更加合适 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 许多工商联的官员曾一度也是政府行政管理人员或企业干部 像许多企业主一样 他们在体制运

① 访问常州、温州，1996。

② Fewsmith, *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p. 191.

转中处于一种特别好的工作岗位 有着许多良好的地方关系、信息途径，并已经确立了声望。私有利益正是以这种方式影响在地方上执行的公共政策。

企业利益对公共政策的间接影响，通过企业在地方经济中的结构性的权力 尽管仍然是间接的 但在某些地方或许会感到意义更加重大。对此，意识形态的强硬派会赞成多元主义理论家查尔斯·林德伯龙 Charles Lindblom 的观点 他指出 在私营企业能提供就业位置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地区，由于整个社团的经济安全和社会长久稳定是与私营企业的支撑分不开的，所以私营企业能从政府方面获得特殊的地位。^①因此，尽管在温州或清河县的企业主事实上可能不参加集体性活动，可能只是以一种秘密而特殊的方式保守地去影响公共政策，但通过他们在当地经济中的结构性地位，其影响仍可强有力地感觉到。这种结构性的影响虽然只局限于中国东部地区 并正处于早期阶段 但它并不意味着私营企业不能被组织起来，并向社会施加其影响。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地方政府致力于吸纳那些对本地就业和财政收入有贡献的企业，使它们要么被接管为‘假集体’企业 要么成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一员的原因。

大多数企业主对如何去影响公共政策是心不在焉的，却更留心于培养市民的角色——工作、娱乐和养家糊口。生活对现今那些 35 岁到 50 岁的城市人来说，与他们在青年时期经常被政治动

^① Charles E. Lindblom, *Politics and Markets: The World's Political Economic System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p. 161 - 222.

员的历史相比，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反差。一个市场调查发现，不仅大多数成功的私营老板每天工作 11 小时以上，而且他们也是经历中国 1990 年代消费热的先锋。在 1995 年他们的消费支出达到 7 个百分点。私营企业主买房子、买汽车，也买名牌服装，经常下昂贵的餐馆和时髦的茶馆。他们通过各种方式的消费接洽生意业务和扩大关系网络。他们还花大笔钱于子女的学费，以保证他们的孩子获得自己所缺乏的受教育机会。尽管增加收入是办私营企业的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动机，但许多企业主说，自我实现也是创建一个企业的主要目标。在中国共产党曾是唯一的社会动力的社会里，私营企业主的成功为社会提供了一个有示范性的可供选择的发展路子。

结 论

经济改革的推进和私营企业的增长，伴随着一场曾导致了把私有利益重新界定为公有利益的一部分而不与公有利益相对立的斗争。尽管党对于改革的方向仍有分歧，但私营经济的扩大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公有利益不再被认为是革命性的公共情操，或是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是对物质福利和国家力量的更工具性的注解。改革者们把私营企业主看成是实现这些公共目标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如何对私营企业主这一新社会阶层的出现与发展作相关的意识形态理论阐述，却被马列主义的某些教条所约束，马列主义所拒绝的不只是私有财产，还有私人利益。共产党没有任何道义的责任来调整自己的地位。党为了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困

境而推动国家社团主义做法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在党希望国有经济成分向市场经济方向发展的时候，这种好处就更加突出。有关国家和社会的有机理论 人民群众对“自然的”不公平现象的接受，以及努力建立社团组织作为联系私有经济和公有经济的桥梁 是权力至上的社团主义随中国传统复活的证明。然而 中国共产党使社会中层领域制度化的努力，已受到更不正式且通常是非法的权钱交易、公私混合和各种腐败形式的冲击。虽然私营企业的权利充其量是不完整和不直接的，但这标志着私营企业主在公私之间不断进行交换的特殊的地方社区中正成为有影响的个体公民。

（黄桂兰 译）

私营领域的从业状况：个体经营者、企业主和雇员群体

王 海

编者按 王海 Thomas Heberer 先后获德国法兰克福、格廷根和海德堡大学政治学、民族学和汉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1977年获博士学位。1989年取得教授资格，现为德国杜伊斯堡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及东亚研究所所长；曾任德国德中友协的联邦主席多年，现是波恩德中文化论坛的顾问委员会主席。

王海教授在坚持对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完成了一系列主要的科研项目，如凉山彝族自治州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政策研究、中国四省 1500 名个体经营者的考察研究、中国农村城市化和社会变迁研究等。他发表了 150 多篇学术论文和专著，近年来发表有关中国改革发展问题的主要论著有《中国及其少数民族自治或同化》、《中国走向 2000 年 现代化政策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含意》、《中国城市个体经济对就业市场和城市经济所起的作用》、《现代化的尝试 中国的发展问题》（合著）、《中国的腐败 对此现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分

析》、《变革中的中国农村社会 农村城市化和社会经济转变》（合著）等。本文根据作者提供的德文原稿翻译。针对西方人认为私有化首先要使国家财产变成私人财产的观点，作者从中国私营领域的统计数字出发，力图分析其飞速发展的背景、结构和对就业所起的作用，指出私营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一种重要推动力。

中国的私营经济自 1970 年代末重新获得承认以来 私营领域已被证明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推动力。这个进程以前在西方几乎没有得到认识 因为西方人认为 私有化就是将国家的财产变成私人的财产。但是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发生的主要是自下而上由老百姓创建新的私人企业这一现象。实际上，中国的统计数字掩盖了其私营经济的真实状况。本文将从私营领域的统计数字出发 力图分析其飞速发展的背景和结构问题、从业人员的非均一性及其对就业所起的作用。

一、定量问题

要对私营经济做定量分析是困难的，尽管中国正在朝以市场经济为特色的结构过渡，但所有制形式并不很明晰。根据官方公布的有关数据，^① 1996~1997 年期间注册的私营经济领域包括以

^① 《中国工商报》，1997年 4月 25日，1998年 1月 27日，1998年 3月 20日；《人民日报》，1997年 4月 10日，1998年 3月 10日。

下企业类型：

- 2 851 万个含 8 个以下雇员的“个体企业”(个体户)其从业总人数为 5 442 万(1997)；

- 大约 96.1 万个含 7 个以上雇员的“私人企业”其从业总人数为 1 349 万(1997)；

- 2 583 个私人的村乡办企业，其从业人数为 7 278 万(1996)；

- 约 12 万个民营科技实体 其总人数为 210 万(1996)；

- 约 22 万个合资或外国独资企业，其从业总人数为 2 501 万。

尽管以上统计数字看似具体，但鉴于当前不可靠的数据状况，还是让人无法准确掌握私营经济发展的真实状况。首先，由于地方信息发布机构仍照搬计划经济时代的功利思维，导致官方的统计数字在很大程度上不可信。其次，分类和重分类问题及定义上的不确定性也给清晰的归类带来了困难。第三，很大一部分私营企业隐蔽在其他所有制名下，很多经营活动未被注册或属于不体面或非法的。而且教育、文化和卫生保健领域内的机构如私立学校、医院、医生、出版社、文化群体未被统计在内。自 1993 年起 小企业得先经过三个月的试行期才能注册 而它们是否在试行期之后真正被批准注册 实际上是难以核对的。因此 统计数据并不能表明私有化的真实规模。

根据中方的调查，大中型城市里的未注册企业数至少是那些注册了的企业数的两倍。在小城市，这个比例甚至达 4:1 而未注

册的农村的企业数可能还要更高。^① 据负责私营领域的各级（从国家到地区和地方）工商管理局估计，无证经营者的数字平均来说同有证经营者的一样多。地方调查证实了这个估计，尽管有些估计隐性经济领域内要显著高的报道。浙江省一管理局的领导声称，在他的辖区内实际上每个居民都以某种方式从事第一或第二职业的私营经济活动。因此，他估计最多只有 5% 的个体经营者注了册。^② 这种情况在大的私营地区也不例外，例如浙江省的温州是一个私营经济活动的样板城市。在 1990 年代的头五年里，1.2 万多个“私人企业”中只有 40 个作为私人企业在官方注了册，其他的则挂名于各种集体所有制部门下，如“街道企业”、“劳务公司”或“乡镇企业”。^③ 对中国隐性经济有深入研究的黄苇町估计，视地区而定，“假集体企业”占有集体企业的 50—90%。其他地方调查表明，1/3 多的大一些的企业名义上是集体企业，但实际上是私人企业。

此外，还有地下作坊，对其做定量估测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它们的数量应当相当大。另外，还有“投机倒把者”和“倒爷”（他们贩卖紧俏的、享受国家财政补贴的、违法的物品，如古董、毒品、外币、证件、含色情内容的产品，或从事非法服务，如看风水、算命、卖淫、赌博）。

黄苇町，《中国的隐性经济》，1996 北京 中国商业出版社 第 90 页。

江泽中，《新潮一族：当代中国个体户》，1993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第 128 页。

刘纪兴，“我国的非公有制企业家群体基本现状分析”，《社会学研究》，1992 年第 6 期 第 13—20 页。

把私营企业归为集体所有制，从这一现象可看出造成中国私有化真实状况被遮盖起来的主要原因。这首先与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在企业等级制度中享受的级别待遇有关，在这种企业等级制度里 国有企业居最高地位 私人企业则最低下。一个企业的级别越高 它就越容易享有进口权 越低则越难。虽然等级越高也表明将受到官方的更多干预，但同时 在进口和开拓市场方面占便宜。因此 归为‘集体单位’可给私营企业带来很多好处 如在原料、原材料、用地、技术和开拓市场方面。它们要付的管理费减少了 还可享受免税以及国家补贴的电、气和水。这样 支出和费用就降低了 集体企业申请银行贷款也方便些。另外还有关键因素‘政治安全感’因为集体企业被认为没有私人企业那么具轰动效应 尤其因为集体企业不同于私营企业，它能享受地方政府的保护。

私营领域的从业人数也让人难以估计。为了能被划定为个体户而不是更大些的私人企业 企业主申报的雇员人数通常偏低 要不他们就把雇员登记成帮工的家庭成员或临时工，这样就不被列入统计数字。

基于上列各因素，在数量上对私营领域应作出远远高于官方统计数字的估测。因此，如果我们说至少有 25 000 万而不是 16 800 万人在非农业的私营领域内从业，私营从业人员在 1996 年大约占总就业人数的 36% 此数字看来决非夸张。

二、私营经济发展的原因

在 1950 年代 中国几乎所有的私人企业都被转为国营或集体

所有私人经济被认为是属于敌对的资本主义范畴。自 1960 年代中期起，任何形式的个体经营也遭到了禁止。直到 1979 年 3 月，个体经济才重新获得政治领导层的允许。1981 年 7 月的一份文件称，局限在少量雇工范围内的个体经济是国营和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个体经济的从业者被宣布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这样，在形式上他们就与工人和农民同等了。1987 年 8 月通过了关于农村的个体工贸企业的文件，按此文件允许最多雇佣 7 人。时隔将近一年之后，国务院又公布了“关于私人企业的暂行条例”，使拥有 7 个雇工以上的私人企业在法律和政治上得到了合法化，还取消了对雇佣性质的工作的限制。从那时起，雇用 8 人以下职员的所有企业被定为个体企业，而 7 人以上的则为私人企业。

私营领域很快被证明是最具活力的领域，并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支柱。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对其政治评价能发生一系列急速改变的一个原因。1995 年党的领导阶层作出以下声明：各种所有制形式都应该能平等并列地发展。繁荣的东部省份首先把私营领域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动机”。私营领域在 1997 年 9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党代会上甚至被宣布为“社会主义”领域的一部分。

私营领域的发展源于农村家庭经营的复起，根据中方的报道，它释放出了约 1.5-2.0 亿无法进入城市工作市场和国营领域的劳动力，他们唯一的吸收源只能是非正式的领域，即在贸易和手工行业内自主经营。私有化必须首先理解为企业家私有化，这意味着它是一个创办企业的自发过程，它源于农村和农民。对此，除了改革前农村普遍贫穷外，还有其他几个原因：农民对私有财产和家

庭经营的迫切要求 相对于国家 农民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 农村不在国家的社会网络里 按政治领导层的观点)以及政治领导层对私人经营的容忍和在思想上的接受 , 另外它还不存在雇佣劳动力及由此导致的剥削问题 ,^①最后一点被证明是潘多拉之盒 , 因为私人经济行为可以说是自己雇佣自己。

在社会主义国家 , 农民的私人经济活动可以被政治最上层容忍 因为农民阶层被认为不是革命阶层 因此他们也就不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阶层 相对于工人阶层 他们被认为有‘小生产’倾向。政治最初的目标是在城市里实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化 , 照此推论 , 农业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必须逐渐失去其地位。城市和城市经济 , 首先是大工业企业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统治地位的决定性力量。因此 , 从农村开始的自由化和私有化进程同样可被接受 , 尤其是它看上去没有削弱共产党 工业和城市里的 原来的权力基础。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实行的完全集体主义在 1970 年代中期伴随着‘学大寨’的口号到达了高潮。该口号的内容是把所有形式的经济活动都压缩为集体的 在此期间自发产生的‘非法’市场和私人经济活动都遭到谴责 , 由此导致的农村普遍贫穷是私人经济活动得以重新出现的明显信号。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倒台后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导致了私人经济活动的瞬时增加及对个体经济活动最终的许可 但起初不含对雇佣的许可。

^① Heberer, Thomas, *The Power of the Fait Accompli: The Peasantry as the Motive Force of Chang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96, Trier.

因为越来越多的个体经营者雇用‘家庭成员’或‘亲戚’因此雇佣劳动迅速成了既成事实。1980年代前半期国家在犹豫中最初允许雇用两个 然后五个 最后七个劳工 私营领域在此期间的实际发展总是先行于官方政策。因为私营领域利于就业、需求品的供应及社区收入，因此政治领导层对此发展没有表示出多少反对。1988年，雇佣人数不再受到限制，因而消除了私营领域发展的最大障碍。最终还是城市和农村中的就业问题促使了私营领域和雇佣就业的扩展。

三、私营企业的结构和问题

私营领域发展的起点在农村，但在这期间，城市中的私营比例相对于农村在持续增加。

表 1 私营和个体领域在城市和农村的分布比例 单位：%

		1991年	1996年
私 营 领 域	城市企业	47.3	59.4
	农村企业	52.7	40.6
个 体 领 域	城市中的从业人口	41.8	51.4
	农村中的从业人口	58.2	48.6
个 体 领 域	城市企业	31.1	34.6
	农村企业	68.9	65.4
	城市中的从业人口	30.0	34.1
	农村中的从业人口	70.0	65.9

资料来源：《工商行政管理》，1993：38-46,56-64；1997：64/65,71。

1997年私营领域在城市所占的比例达到 62.19% 首次超过了

60% 农村的比例则从 37.9% 降到 40% 以下,^① 因为越来越多的农村企业家为了扩大其经营而落户在离市场近的城市。在城市里 原材料供应方便 开拓市场的机会更佳 受官僚控制的程度也没有农村那么严重。中国的发展证明了东亚农民企业家的理论, 即农业生产力繁荣 如在过去的农村改革和结构调整进程中 造就了一批企业家 他们利用农业的新潜力办工业(例如 加工厂的形式)并通过这种方式把农业与现代工业和城市市场联系起来。农村办工业的生产潜力得以实现的基础是传统的共同联系(家族, 村)它有利于把费用降至最低。同时 农村的工业化还使收入增长不仅集中在城市 而且也涉及到农村 因而能把农民背井离乡涌入城市及由此产生的城市贫困(形成贫民窟)控制在界限内。另外, 农民企业家使私营领域和城市区域交织渗透在一起。

私营领域主要由劳动力密集的小型 and 中型企业构成, 这些企业对每个工作位置的投资要少于国营的大企业。私营领域创造了国家一分钱不需掏的就业位置, 并使国营和集体企业的从业人员分流成为可能。总的来看 投资正在转向私营领域 国有领域的设备投资从 1980 年的 81.9% 降至 1990 年代中期的 52.2% 私营领域的设备投资则由 13.1% 增加到 33.0%。^② 多数企业从事小工业和手工业、运输业、建筑业、贸易、餐饮业及其他服务行业 更大的企业还正处于飞速发展的阶段。

与能享受到国家保护和补贴的国有企业不同, 私营企业开始

^① 《中国工商报》,1998 年 3 月 20 日。

^② 陈东奇、秦海,《中国大陆经济制度之变迁》 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报》,1997 年第 4 期,第 24-40 页。

只集中在经济的小范围内，全靠自己白手起家，同占压倒性优势的国有领域相比，似乎是作为第二经济而存在。但决不是说它作为第二经济就与国营和集体领域毫无联系，而是有着众多错综交织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在非正式的范畴内（两领域人员之间本着互利目的的私人关系网）而且也以供货商、买主或资金提供者的方式体现出来。同时，私营领域还作为竞争对手出现，它在个别领域里已开始排挤国营和集体企业。在就业市场上也笼罩着不同的所有制形式的竞争，国有领域有能力的职工被吸引到那些工资和报酬比较高的私营企业。更好的赚钱机会、日益增长的对国有企业发展前途的担忧，促使越来越多有能力的职工从国营和集体领域独立出来。针对这种转到私营领域现象而产生了“下海”这一脍炙人口的语词。

在私营领域里，按照行业来看，1996年制造业（43.8%的企业和53.7%的职工）领先于贸易和饮食业（40.9%的企业和30.3%的职工），私营领域中的工业部分在农村（67.3%的企业，71.9%职工）的发展要比在城市（27.7%，36.5%）强劲，而在城市里，贸易和饮食业占优势（55.1%，45.9%）（见表2）。这可能是由于私营领域源于农村，其中农产品加工占显著的一部分，但是这首先是由于农村可为工业生产提供更多的场地，以及农村人对私营领域的顾虑没有城里人那么厉害，城市里国营领域占有绝对优势。在个体经济领域内，贸易/餐饮业（60%企业，58.3%职工）是最重要的部分，它领先于服务业、制农业及交通运输业（12.1%，11.7%，11.0%）。城市和农村在个体经济领域内所占的比重大体相当。

表 2 各产业里的私营企业比例(1997) 单位 : %

	私营经济	个体经济
第一产业	1.7	2.7
第二产业	44.8	12.3
第三产业	53.8	85.0
合计	100	100

资料来源:《中国工商报》,1998年3月20日。

从区域上来看,私营领域集中在具备更好的市场机会及健全的基础设施的东部发达地区。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6年9月公布的数据,私营经济在中国东部占69.8%,中部占19.0%,西部占11.21%。

- 私营领域尽管有相对迅速的发展,但还面临很多问题。例如:
- 受到有别于国有企业的区别对待及处于竞争劣势(在原材料供应、贷款、用地等方面);
 - 缺乏法律保障;
 - 官方的干预(其中通过高支出和高征税的方式)以及官方机构的腐败现象;
 - 私营企业家对政府的政策缺乏信心,因此把盈利用于消费,而不去再投资;
 - 资金紧缺,贷款受到限制;
 - 缺乏人才;
 - 私营企业家的社会形象不佳。

四、私营领域从业人员的分类

私营从业人员可以比较清楚地分为企业主和雇员两大类，这两大群体还可分别作进一步的划分。例如企业主内包括：个体经营者（小商贩、单干或得到家人协助的手工业者）、小企业所有者（他们雇了有限数量的职员；大一些的企业所有者；投资者或持股者，他们虽然作为资产所有者，但并不在相关的企业工作。雇员内包括：原国营或大的集体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亲戚或家族成员、朋友和有着同事关系的人、通过关系聘用的职工、通过工作市场招聘的本地的职员；流动职员。

我们将对企业所有者和雇员这两大群体进行具体的探讨。

1、企业所有者

企业所有者并不是一个均匀统一的群体。有大、中、小企业所有者，有来自基层的党或国家机关的掌握着众多关系的或没有这种关系的企业所有者（其成分为“干部”），沃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把后一种企业主又进一步划分为“有势力的强人”和“有手腕的能人”：“有势力的强人”来自于公务员群体，他们可以利用其原有的势力关系（文化资本、关系网）而“有手腕的能人”作为“征服者”主要凭借其具有的贸易经营能力。^①有对原单位的工作

^① Sombart, Werner, *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3 Bde., 1987, Muenchen, Berlin.

条件不满意而自立出去的‘被推型’的企业所有者，还有由于受到企业效益及其社会和经济机会诱惑而辞掉了原工作的‘被拉型’的企业所有者。

另外还可根据其从事私营行业的原因来分类，如：(a) 利用市场机会和市场诱惑（首先在城市和发达地区）；(b) 升迁受到挫折（把自立出去作为升迁的替代路径）；(c) 由于家庭成员的政治权势（主要是在当地拥有机会优势、特权、社会关系）；(d) 为了生存（无业者、退休职工），最后，还不应该忽视企业家内部的社会阶层。还可以根据行业或出身来对其分类：来自企业世家、官吏大家庭或经济领域（经济企业或经济管理），上面列的每一个群体都具有自己的社会地位，对于企业主来说，这种社会地位视其经营成就、受教育状况、社会关系和对社区（主要针对农村）的贡献（创造就业位置、出资公共项目、提高当地的生活水平）来定。

个体经营者主要是那些无法在国营、集体领域或农村经营中谋得职业和收入的人员。他们是城市个体经济的失业者、退休职工、残疾人、有前科的人、农村里的农民。在总体上，这些人员来自社会下层，受教育程度低。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非常类似，在非正式的领域自我组织起来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在过去的十年里，既不能给职工付工资又不能保证职工社会最低生存水平的国营集体困难企业日益增加。一部分个体经营者构成了一个经济上强大的群体，该群体把其收入主要用于挥霍性的消费。政治的难以预测性阻止这一部分人进行更大的投资。作了再投资的一小部分个体经营者则朝大实业方向发展。

而私营领域内的大一些的企业所有者的情况则不同于个体经

营者。中国官方第二次的百分之一私营企业（1995 年抽样调查表明了以下趋势：

- 2/3 的企业主的年龄介于 31 - 45 岁之间。

- 18.4% 的人有大学或大专文凭（据 1990 年的人口普查 整个社会的大学或大专比例为 1.9%）只有 0.3% 的人为文盲 而整个社会的文盲率约为 22%）。

- 基本资金主要来自于自己的（90.6%）或亲戚朋友的（70.6%）收入和积蓄。多数企业是由一个（56.1%）或两到三个（28.8%）出资者创建的。

- 24.2% 来自城市和 17.3% 来自农村的企业所有者曾是原单位决策集团的成员。

- 58.6% 的城市企业所有者和 35.3% 的农村企业家来自国有领域（国营和集体企业）。

- 22.3% 的城市企业所有者和 11.2% 的农村私营企业所有者的父亲曾是单位决策集团的成员；23.3% 的城市企业所有者和 13.3% 的农村企业所有者的配偶曾是单位决策集团的成员；26.0% 的城市企业所有者和 19.2% 的农村企业所有者的孩子是干部；39.1% 的城市企业所有者和 26.4% 的农村企业所有者的近亲是干部；46.2% 的城市企业所有者和 42.2% 的农村企业所有者的朋友是干部。^①

- 看来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父亲的职业对孩子的择业并不是不重要。调查表明：相当可观的一部分私营企业所有者的孩子

^① 张绪武、李定、谢明干，《中国私营经济年鉴 1996》北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像他们的父亲一样从事私营业。

- 60.7%的私营企业家年收入在 1 万到 10 万元之间,12.7%的人收入在 10 万元以上 1995 年城市人均收入为 3 893 元 农村为 1 578 元^①。

- 党员占 17.1% 高于全国的平均数(5%)。

农村的大企业经营者主要是各领域原先领导集团里的成员、技术员、专业人员、学历相对较高或经历丰富以及同官员私交深厚的人。这主要是一个经济地位较好的阶层,该阶层为了企业经济上的生存已不得不进行再投资。每个企业的职工数和企业数持续增长,因此产生了这个富裕的企业主阶层。

与个体经营者不同,新工业的企业所有者不是来自社会下层,他们主要来自地方上较优秀的人物集团(原先国营或集体企业的领导 农村党支部成员)地方的精英圈子(干部家属)中下阶层(技术工人,国有企业的售货员或采购员,业有所成的个体经营者)部分是在社会上没有上升机会的政治上“靠边站”人物(阶级敌人或其家属),这与西方社会学者的见解(即土匪和海盗是“最初”的企业所有者类型相矛盾。这种观点认为,在后社会主义社会,在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富起来的天才往往出自社会下层 他们决不只通过合法手段积聚财产 而往往是通过把国有财产据为己有。这种观点只是局部切合中国的情况。这类人主要分布在贸易、个体经济或隐性经济领域内。实际上 必须把个体经济的小领域及隐性经济领域理解为培养更大的私营企业所有

^① 《中国工商年鉴 1997》第 291 页。

者的场地。各国的比较表明，社会上层地方上也如此的家庭成员在经济、社会 and 价值观变革时期成为企业所有者，因为一方面基于他们的社会认知状况，他们理解这种转变；另一方面，即使变革，他们还希望维持他们的传统角色。第三，则由于完全市场定向的经济。在中国，正是通过这些上层领导集团的成员及其家属以这种方式促进了社会变革和政治经济化。

2、雇员

如我们前面已提到过的，私营企业里的雇员是一个成分非常复杂的群体。据统计，1997 年的个体领域内每个小企业拥有不到一个雇员，每个私营企业大概有 13 个雇员。虽然也有雇员数超过几千的私营企业，但是平均下来的私营企业还是小型的。这与私营企业的历史比较短（70 年代末获得许可）及出于政治的原因雇用职员长时间受到限制有关。根据前面提到的 1% 抽样调查，雇员的情况如下：

表 3 1995 年 1% 抽样调查的私营企业的雇员状况：

雇员	8-10 人	10-20 人	20-50 人	50-100 人	100 人以上	平均人数
创建年 (%)	28.7	28.9	26.3	9.4	6.7	18
1994 年底 (%)	31.8	28.6	17.0	19.4	3.2	38

资料来源：《中国私营经济年鉴 1996》北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第 147 页。

分布在工业的雇员平均数（68.8 - 47.6%）高于农业的（40.3%）或服务业的（18.8 - 40.0）。如表 3 和表 4 所示，不仅企业的雇员数增加，而且合格的雇员数也增加。

表 4 私营企业中的雇员结构 单位：%

	1992 年	1994 年
管理人员	6.6	8.9
技术人员	4.1	8.8
工人	89.3	82.3

资料来源：《中国私营经济年鉴 1996》北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第 147 页。

就群体从属性来看，存在着各种聘用渠道。大部分地方劳动力不是通过劳动市场，而是通过关系被聘用的。他们要么是亲戚或家族成员、同乡（出自同村、同镇、同县）要么是经亲戚、朋友或有其他关系的人推荐。如今通过劳动市场雇用流动打工人员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农村也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国营集体企业一样 私营企业也用外来便宜劳动力 因为相对于通过关系雇佣的劳动力而言 外来劳动力可以更严格地加以处置 而且对外来劳动力不存在什么社会责任。因此关系户或本地人占据企业中较重要的位置 不太重要的位置给来自周边的人 差的位置则轮到外来打工者。同样 雇员异质性取决于同老板的关系（亲戚 同乡）来源 或专业内行程度。

据中国私营企业的 1% 抽样调查以及其他调查，雇员阶层具有以下特征：

- 85% 的人员年龄在 25 岁以下。
- 多数人员就业于私营企业之前是农村户口（城市：58.9%，农村：87.7%）或无业者（城市：18.9% 农村 8.4%）。
- 管理和技术人员主要来自国有领域（国企或集体企业）。
- 雇员的受教育程度低于其他领域：10.5% 小学文化 / 文盲

(国企 : 5.3% 集体 : 8.5% , 合资 : 4.8%) 相当高的是其 9% 大学毕业生比例 (国企 : 24.2% 集体 7.4% 合资 : 15.6%) ,^① 这是由于较大私营企业的优厚的物质待遇和高薪越来越吸引合格的专业人员。

- 36.3% 的雇员签有书面的工作合同。

- 1995 年的年均收入为 3 572 元 月平均收入则为 297 元 (国企 : 239 元 集体 : 195 元 合资 : 376 元)

- 企业主通常借助于无限期的解聘来解决工作纠纷 , 不存在解决工作纠纷的渠道。统计资料表明 : 以这种方式被解聘的人中 59.7% 是由于违反工作纪律或得罪了上司 , 24.2% 对工作不再感兴趣 , 8.1% 则是未完成生产定额的。

- 流动性很大 (10%) 跳槽者中的 20% 跳到另外的私营企业 20% 返回到村里 , 7% 则做个体经营者。对私营企业作的调查^② 证明了其雇员的高流动性。在城市打工的农村劳工经常随意旷工 , 不打招呼就擅自换工作或出于一时冲动就打道回府。在河南漯河的几个企业里 , 雇员每三个月就能完全更新一次。对此 , 私营企业家认为合同几乎没什么用。这样的高流动性归根到底是低待遇、高工作压力、歧视、没有权利、孤独、陌生的结果 这正是社

据中国的调查 , 期间愿到私营企业工作的高校毕业生比例明显增加。 1998 年的比例为 : 15% , 这是至今的最高比例 (愿到国有企业的为 : 40.9% , 愿到外资企业的为 : 44.1% 见《中国工商报》1998 年 4 月 24 日。

这是由大众基金会资助的一个关于农村在贵州、河北、黑龙江、江苏、宁夏、四川诸省 城市化和 社会变革的调查项目 1993/1994 (见 : Heberer / Taubnam 1998) 以及由德国科研基金会资助的关于中国和越南的私有化进程和它们的社会和政治状况 1996/1997 (在中国甘肃 河南 浙江的实地考察 出版正在筹备中)

会学者艾尔伯·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所称的‘脱离’和最简单的反抗形式。^①

- 经常受到违反劳动法以体罚、侮辱、下班后的软禁形式的对待。有 5.6% 的被调查者承认曾被企业主侮辱或殴打, 2.4% 的女工承认曾受到性骚扰。雇员则以破坏机器、设施、原材料和产品、磨洋工、偷窃等集体行动进行回击。

- 虽然从 1995 年起, 省里已规定各种所有制企业(也包括私营企业)必须把最低报酬写进合同。即使在私营领域有这样的合同和协议, 也只能在城市里, 农村则几乎没有。雇员很少知道他们应有的权力。

鉴于本地劳工了解当地情况, 不那么容易受私营老板随意摆布, 与此相反, 外来劳工则经常受到各种形式的歧视。中国新闻界曾报道过虐待、体罚、罚钱、性骚扰、强奸以及严重违反事实上仅在国有企业得以实施的生产安全和劳动法规定的事件。私营企业的工作境况经常就像解放前的私营企业里的一样。据中国的一个调查, 1995 年 81% 的雇员就住在企业自己的宿舍里, 这样的宿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又黑又脏, 挤满了人, 而且房租昂贵。防热、防粉尘、防危险品、防有毒物品的工作保护措施仍旧不为人知。加班常常没有报酬。工作的临时性(季节工)、赚钱愿望、缺乏比较的可能性以及国家对此管理不严, 都导致了多数工人不得不接受这种状况。企业还经常要求流动打工族交入股金或押金(袋子)以阻止

^① Hirschman, Albert O.,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197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他们随意一走了之 另一方面 这通常还是一种只有在原定的工作时间到期后才能得以偿还的无息和低息贷款。“撕毁合同”即出于某种原因提前结束原定的工作时间通常得以押金做代价。虽然这种交款是不允许的，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在各种所有制的企业里一直屡见不鲜，在私营企业里尤其难以控制。根据作者的调查表明 大约 31% 的农村企业（私营和村办）的雇员在被雇佣前都交了押金。78% 的人交的押金超过 500 元，1/5 的人则超过 2 000 元。与集体或其他类型企业相比起来，这种筹集资金的方式更多见于私营企业，因为它们贷款较难。^①

企业理解、工作机构和对待雇员方式因地点和企业而不同。作者的研究表明，企业领导的家长制作风仍旧占统治地位。89% 的接受采访的企业所有者表示，他们领导他们的企业就像领导他们的家庭一样 因此 他们明白他们对其雇员的照料责任 另一方面 他们也希望能享有企业家的和家庭的权威 并得到其雇员为企业目标忘我贡献的回报。中国西北的甘肃省 1/5 多的人认为 对企业必须应像对军队那么领导 对此 雇员必须严格地遵守纪律和接受等级制度。他们在此往往只是强调雇员的责任，而雇员的权力却极少得到考虑。因此 虽然有规定 但是工作合同在城市也并不是广为人知，在农村几乎没有。总共只有 36.3% 的企业签了书面合同 32.3% 的企业自称已达成口头协议 另外的 1/3 企业则是 什么协议都没有。而且 在 2/3 的“合同”中既没有确定双方的权

^① Heberer, Thomas/Taubmann, Wolfgang, *Chinas Laendliche Gesellschaft im Umbruch-Urbanisierung und Sozio-oekonomischer Wandel auf dem Land*, 1998,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力又没有确定双方的责任。多数只是对押金的期限和偿还作出规定的押金合同。还有这样的情况，原先签的正式合同视当前的实际情况被忽略、更改或取消。这大概是由于到目前为止合同还不起什么大作用。协议通常是口头达成的。另一方面，不仅文盲比例较高的雇员群体，而且农村私营企业所有者对合同也同样缺乏基本认识。企业销路不佳时工资有时可被拖欠好几个月，在新企业里并不少见，职工无报酬地工作，直到企业盈利他们才能拿到工资。季度末或一年到底才付工资是普遍的。几个较大的模范企业例外。这主要是由于它们受到的公众关注。例如四川省琼莱县平乐的一家拥有 106 个职工的酒厂，它的所有者被评为省级模范私营企业家。该企业付的工资要比村办酒厂高。该厂有三种类型的工作合同：(a) 有固定医疗金和养老金的正式工，勤奋守纪工作三年以上的职员便可享受此待遇；(b) 新聘用的享受医疗金的合同工，他们今后可以成为正式工；(c) 不享受以上补助金的临时工。

根据上面提到过的 1% 抽样调查，给雇员付社会保障金的私营企业比例应该相当高。据称，46.3% 的企业支付病假津贴或医疗保险，15.3% 支付退休金，22.9% 支付人身保险，12.4% 提供房贴。此比例对城市和农村来说，差别不应该大，但两者支出总额的差别可能较大。根据我的调查，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企业为其职员提供社会保障金。虽然在私营企业所有者进行的调查中，多数人明显地表示应该向雇员提供社会保障金，实际做起来则是另外一回事。

表 6 私营企业主问卷调查：
私营企业家应至少为其雇员提供部分社会保障金吗？

保障项目	应该提供		不应该提供	
	人数	%	人数	%
失业保险金	130	73.0	48	27.0
养老保险金	153	86.0	25	14.0
医疗保险金	170	95.5	8	4.5

根据我的调查，在工伤事故情况下，70%的雇员只能拿部分工资或者不再有工资。1/4的雇员必须自己承担治疗费用。只有12.9%的私营企业给雇员支付医疗费。养老措施非常个别，就算有也只提供给少数的专用人员。

就算表6中的回答是策略性的（为了不给人造成‘剥削’的印象）但这种回答的态度也表明了大多数企业家意识到社会保障的必要性，即原则上存在着国家出面干预处理的必要性。

就工资而言，发达地区的部分私营企业的名义工资比国有企业要高，但实际工资却低，因为私营企业里没有由国有企业支付的社会保障金（医疗、养老金、住房或幼儿园补贴以及其他补贴）而且部分私营企业的工作时间要明显地长。在发达地区并不少见，私营企业付较高的工资，为了招到主要来自本地的劳力或比本地人便宜、权力更少、自我意识更差的外来劳动力。在不能或难于进入集体企业的落后地区，私营企业占优势，部分私营企业付的工资就比相应的非私营企业的要低。

工资额通常取决于职员在企业里的地位。和老板有私人关系的职员和本地职员拿的工资要比流动职员高，合同工的工资要比

临时工的高。根据作者的调查，只有 22% 的流动打工者的月薪金在 300 元以上，相比之下，本地打工者的这一比例则为 33%。只有 17.1% 的临时工（主要是流动工）月薪超过 300 元，合同工的这一比例则为 38.1%。^① 管理和技术部门的专业人员享受高薪，这些主要是来自原国有企业的退休人员或停薪留职者，还有一部分是被私营企业高薪所吸引的大学毕业生。

在劳动力密集的轻工企业里工作的主要是年轻女孩，她们的年龄多数都不超过 20-22 岁，因为年轻人工作熟练敏捷，但同时也如一个四川企业主说的，这个年龄的女孩子只想着挣钱，不会抵触反抗。她们通常每周工作 7 天，每天达 16 小时。不再有工作能力时或生病时即被无期限地解聘是家常事，即使是由于工伤事故。童工主要常见于更贫困的地区，其工作条件可让人想起从前的资本家工厂。

仍旧处于观望姿态的国家对此作出呼吁和评论，但贯彻起来并不得力，这样就给人以越来越强烈的印象，即国家政治领导层为了经济发展、加强私营和集体的农业领域、减少贫困、出口价廉产品，完全容忍了从前的资本主义状况。因此，看起来，中国要加入“东亚道路”，即为了劳动领域的“发展”，不得不付出高昂的社会和人的代价。

虽然为了更好地对剥削和压迫形式进行监控，在私营企业里建立工会和党组织，多年来一直受到宣传，但是到目前为止这类组

^① Heberer, Thomas/Taubmann, Wolfgang, *Chinas Laendliche Gesellschaft im Umbruch-Urbanisierung und Sozio-oekonomischer Wandel auf dem Land*, 1998,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织仍只有很小的比例。就算存在这些组织，它们也是按照企业所有者的意愿来行事。企业所有者要么亲自任党委书记，要么给党委书记一个安静舒适或高薪的工作（笔者曾亲身见到过一个党委书记据他自称他认为他的职责主要是把雇员间的冲突在其刚露出苗头时及时解决，以保障企业平稳的生产活动。由于很好地履行了这一职责他得到了很高的奖励）根据对私营企业雇员的一个问卷调查，54%的雇员认为，工会仅负责文体活动的组织安排；23%的人认为，工会的任务是协助企业所有者组织生产；15%的人答不出工会的职能；只有8%的人认为工会本应代表职工的利益。同时，71%的被采访者认为在私营企业里建立工会没意义。对党组织的认识有相似的调查结果：55%的人认为该组织起支持企业所有者或生产活动的作用；19%的人看不出党员与其他职员的区别；13%的人认为党委的职责是做党的宣传；5%认为党委能把职员的想法传达给企业所有者；仅8%的认为党委应该保护工人的利益。^①

在私营领域内雇员有组织的反抗剥削和压迫的运动尚不存在。没有权力、零星性（主要指流动工）不须考虑法律后果而干脆到大街上静坐抗议的不可能性及对此的普遍偏见都是其原因；本来就少的集体拒绝和抗议遭到企业主的惩罚（通过无限期解聘的方式）。在城市里就业的农村劳工和农村里的流动工人使人想到被社会学家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称为“沉默受苦的”。

^① 戴建中，《私营企业雇工及劳资关系调查报告》载于《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6期第32-33页。

“被遗忘的群体”的社会群体。他是指这些没有组织和没有代言人的群体，这些群体自己既不进行集体反抗又不组织成利益共同体。^①

这样给其加标签未免太简单化了。实际上在流动工人中已建有同乡会组织，它作为利益代表组织同企业所有者谈判，该组织在不得已时通过武力或武力威胁来实现其成员的愿望。在部分流动工集中的地区（如特区）产生了地下工会，它们为其成员提供一定的保护，并被企业所有者视为磋商对象，因为它们能疏通矛盾。大多数游民的群居性（家乡村或乡）高流动性和常常害怕失去紧缺的工作位置，都给在私营企业里的雇员组织和利益维护造成了实际困难。在有更多就业位置的城里，情况则与此不同，类似于同乡会的这类利益代表组织能给其成员提供保护，甚至还能帮助介绍新的工作。无论如何总有新的发展。在大城市里已经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雇员，也包括私营企业的雇员及流动工，知道采取法律的手段，控告伤害了他们的劳动权利或个人权利的企业所有者或企业。

这又证明了奥尔森的论断，即开始只是一些小的群体，这些小群体联合起来进行反抗。另一方面，这些表面上的“被遗忘的群体”表现了它们的呐喊和行动决心，这在中国当代的政治大环境下不是什么令人惊奇的事——首先从非正式的结构开始。私营企业的雇员，只是部分满足组织社会学对组织能力的评判标准，因为他

^① Olson, Mancur, *Die Logik des kollektiven Handelns. Kollektivgüter und die Theorie der Gruppen*, 1968, Tübingen, J. C. B. Mohr.

们经常只是临时就业的流动工,大多数仍系着他们的乡土。也就是说,一段时间后他们还想返回家乡。此外,企业内的雇员等级制度也给组织性制造了附加的困难。

雇员的组成主要是农民,实际上表明,私营领域的就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问题。那些离开乡土在私营领域谋职的多数人属于能人和受过一定教育的人。他们平均上过 8.8 年的学,远超过农村的平均水平。作者本人的调查证明,农村的私营企业在这一期间也根据文化程度来挑选职员。

五、私营经济对促进 就业所起的作用

中国当前有五种主要的就业渠道:(a) 家庭(主要是在农业和私营领域);(b) 国家(国家和大集体企业);(c) 地方团体企业(乡和村办企业,由居民和街道办的企业);(d) 个体户;(e) 含外资的私营企业。其中有三种就业可算在私营领域内。各就业渠道一方面还是由计划经济决定的(大学生的分配),另一方面汇合到未被规范的自由市场(街道市场),向面向市场的结构过渡的过程造成了各单个渠道的融合和交织(比如以第二职业或一身兼工人农民两职的形式)并产生了农村流动人口,尤其是城市里给这些人提供了各种就业领域:(a) 一部分人在城市里作为或成为自主经营的手工业者和商人;(b) 一部分人在各种所有制的企业里做临时工;(c) 第三类作为有固定合同,主要在建筑业,的进城包工队,他们在工程完成后就回去或应该回去。此外,这种就业市场还往

往促进了为私营企业在农村招募劳动力的私人中介服务业。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农村就业压力是私营经济重新获得许可的一个关键因素。出于就业压力，私营企业在 1990 年代发展成最重要的就业渠道之一。根据官方报道，城市里国营企业就业的比例从 76.2% (1980) 下降到 64.9%，同期内就业于 (官方登记的) 私营企业的比例则由 0.8% 上升到 17.0%。每年新聘人的比例在国营企业内由 63.6% (1980) 降至 36.1% (1995)，在私营企业则由 5.5% 上升到 40.3%。^① 由于国营企业人满为患，所以非国有企业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将继续是其首要任务 (表 7)。

表 7 各所有制企业提供的就业机会 单位: 百万

	1992	1993	1994	1995
私营企业	0.78	2.78	4.42	4.88
外资企业	0.57	0.66	1.18	1.07
国营企业	2.25	0.31	2.94	0.47
集体企业	-0.07	-2.28	-1.08	-1.38

这期间私营企业还被看作是今后吸收国营企业和农业的过剩劳动力的最重要渠道。中国社会学家估计，农业中过剩的 1.2 - 1.5 亿及国营企业过剩的 2 - 3 千万劳动力必须转移到其他企业去。原国营企业职工的安置在当前享有优先权，因为这是一个能诱发显著矛盾和抗议的群体。在几乎所有的省里不断增多的反对企业关闭、解雇和‘释放’劳动力的劳动示威和罢工潮尤其说明了

① 陈东奇、秦海，《中国大陆经济制度之变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年第4期，第24-40页。

这个问题。1996 年仅国营企业就有 892 万人下岗，占城市国营企业从业人数的 6.2%。鉴于上面的数字以及国有企业的结构调整，这个问题仍将是一个火药筒。私有化或企业关闭还会使失业人数上升。1998 年仅在纺织业就有 60 万人丧失了工作 在 1998-2000 年期间，整个国营企业总计将有 120 万人失业。^① 中国已经认识到 失业问题不是暂时性的问题 而是持久性的。因此私营企业在就业政策上将继续获得重视。尽管现在很多国营企业的职员对个体经营仍持抵触态度，因为它意味着失去（在国营企业享受的 社会保障和今后保险的工作职位 并且个体经营的社会形象仍旧不佳。

为了缓解国营企业的困境和抑制失业率的增长，很多省在过去的几年里在县级设置了私营企业发展领导小组。为了鼓励到私营企业就业 地处中国南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决定 私营大小企业所有者有雇用自主决策权 在遵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 他们自己有权决定雇用形式、雇用时间、雇用职工人数、工作条件和报酬。唯一的条件是合法的工作合同。对这种自主权的侵害始终阻碍了私营领域的发展 但同时 通过省政府授予这项权利的举措也表明了就业压力。这种压力应通过发展私营企业来缓解。

但是，快速发展私营企业的愿望有时却同类似于计划经济的观念结合在一起。这可以从广西省定的指标窥见一斑。该省宣布，1998 年私营领域的目标是 企业数增加 25% 从业人员上升

^①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997. 12. 29.

10% 销售额增加 20% 或零售额上升 16%。^① 作者从 1996 年秋天在河南漯河做的一个实地考察发现，负责私营领域管理的机关 工商局 鉴于高失业率和国营企业不景气 就给每个工作人员都定了“任务指标”。没完成指标要扣工资 超额完成的则给予奖励。这样就造成了工作人员催促失业者去干个体经营，并要求个体经营者创办更大的企业，即使缺乏对应的专业和经济的前提条件。后果就是 很多私营企业必须重新关闭 但机关的工作人员毕竟完成了其“任务指标”。

对国营企业职工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他们明确拒绝瓦解国营就业渠道。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家和经理对此的看法也各不相同。总的来看，国营企业的领导仍以相对高的比例赞成通过国家或和国家一起解决这一问题，而绝大多数的私营企业家则明确希望把过剩的劳动力交给劳动力市场。实际上，所有的被采访者都首先倾向于社会解决这一方式：把过剩的劳动力转移到仍旧相对不发达的第三产业（国有或私营）培训他们胜任新的工作 并鼓励他们从事个体经营。国家对这些活动都应该给予启动资助。问卷回答中始终表明了社会的因素。工人被解雇流入劳动市场，但没有相应的经济或者职业培训的支持 就会使社会不稳定 要么在必要时把失业者重新扔回到他们原先的企业社会网里，这也不是个解决办法。

个别省和城市已经通过了社会措施。例如，1998 年初山东省批准，给那些尝试自主经营的停薪留职人员保留三年的基本工资

^① 《中国工商报》，1998 年 4 月 3 日。

(工资的 60% 及补贴和社会保障金)。三年之后他们可以选择再回到原企业或辞职。有时还可以通过提供优惠贷款作为启动资助。在武汉,1997 年差不多有 40% 的国营企业“下岗”劳动力已自谋到出路(62 500 人中的 24 785 人)对于这些选择自谋出路的人,城市提前给他们付清总的失业救济金,另外他们还得到国家的经济补助。^①

六、 结 论

私营企业里的从业带有显著的不均匀性,尤其是它包括了所有的各阶层。私营企业里的就业已发展成为最重要的就业渠道之一,同时也是减少城市和农村贫困的手段。对其定量的困难意味着它的难以把握性、高流动性及多层次性。私营企业的发展决不是平稳的,要取决于政治气候和经济发展。例如 1989 年它就产生了急剧的逆转。每一次逆转都激化了城市和农村的就业。私营企业不仅对社会和政治系统起改变性作用,同时还能使之稳定,通过它有利于解决社会的核心问题,因为它提供了替代性的就业和收入渠道,并以这种方式促进国营企业的改革和工业化及城市化进程。因此它已必不可少。就算中国经济能部分地返回到较多的计划经济,那也将付出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代价。系统变化和系统稳定的两重性提供了朝着有指导的市场经济软过渡的机会,因为它缓冲了变化进程,而且正好是在就业政策范围内。因此说私

^① 《中国工商报》,1998 年 4 月 4 日。

营企业中的从业有一个暂时的功能，这一功能在非官方领域的作用明显超过其他发展中国家。

(蒋琳虹译)

非经济因素与中国的改革

葛德曼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编者按 葛德曼 (Merle Goldman) 1964 年获美国哈佛大学远东史和远东语言博士学位,1966 年起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现任波士顿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德曼教授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和政治,著有《对鲁迅的政治利用》、《中国的知识分子 看法和歧见》、《历史在党内斗争中的作用》、《知识分子待遇中的曲折》、《在中国播撒民主的种子 邓小平时代的政治改革》等 并且和已故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合著过《中国新的历史》一书。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Roderick Macfarquhar)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和政治学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他最新的一套著作是三卷本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1999 年春,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葛德曼与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改革悖论》一书 共收集了 15 篇论文分析中国改革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后果。本文为该书的前言,中文翻译获得了作者与哈佛大学出版社的授权*。

* 译自 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 合编的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一书 ,Copyright ©1999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 of Harvard College。经哈佛大学出版社许可重印于此。

毛泽东时代以后 邓小平推动被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改革。这项改革仅仅是自鸦片战争 1840~1842 年以来试图使中国走上现代化之路的诸多努力的继续 或许 它能使中国真正走上现代化的发展之路。过去 150 年来，中国的改革者为中国的“富强”为使中国重新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懈地奋斗。为此，他们在各种信条的指导下发动过一连串令人感到困惑的改革：自强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百日维新 宪政主义“，五四”运动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1950 年代初的“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大跃进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这些运动有些具有保守主义的倾向 有些具有极端主义的倾向 有些打算去挽救既存的政治社会秩序 有些试图从根本上实现社会的转型 甚至重建中国。在改革者的这些努力中，实现经济发展是最重要的目标。虽然外国的发展经验常常被作为借鉴和学习的样本，但改革者往往以一种理论的架构来解释他们为之奋斗的文明。

所有这些改革的努力都先后失败了，有些改革甚至以悲惨的结局而告终。直到 1978 年 12 月，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改革才翻开了新的一页，这项改革把市场经济与列宁主义的党和国家结合在一起。邓小平与其先前的领导人不同，他没有高不可测的先见。他运用掌握的党和国家的权力，制定和实施能使中国摆脱贫困的策略。他说：“不管白猫黑猫 能抓老鼠就是好猫。”他的改革方案在经济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实行改革的 20 年时间里以年平均 9% 的速度增长。在 20 世纪末，中国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即使亚洲经济危机在

未来几年中有可能减缓中国的发展速度 但曾被拿破仑称为“睡着的巨人”的中国毫无疑问地已经觉醒过来了。

邓小平的改革已被江泽民继承下来，并且已经使国家和社会引发了较之以往各种改革项目要更为剧烈的变动。被改革释放出来的力量不仅对中国的计划经济，而且对党和国家自身都已经提出了挑战。巴里·诺顿 Barry Naughton 认为 经济改革为中国快速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铺平了道路，但市场经济在激发了经济活力的同时只进行了有限的政治改革 而且法制建设落后 缺乏相关的法规 从而产生了好几轮的通货膨胀 导致了腐败蔓延、社会发展不平衡与地区差异扩大、经济与政治上出现中央控制削弱等方面的问题。虽然改革带来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人民收入的提高 在理论上意味着会增强党和国家的权威 但在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然而 毛以后的中国领导人实行了大胆的改革 终止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动乱和经济停滞不前局面，使中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与其他幸存的元老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鉴于文化大革命（1966~1976）对党和国家造成的巨大破坏，1978年12月举行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绝大多数的老一代领导人不仅对诸如大跃进的乌托邦理想、文化大革命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平均主义的社会模式表示了反对的态度 而且也拒绝了斯大林主义的国家控制经济的模式、农业集体化道路 以及自 1950年代以来一直实行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发展方向——到 1970年代末，斯大林的模式已经使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陷入了困境。

由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失败，邓小平认为只有减少党对经济的指令性干预才能促进经济发展，改善大多数人口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受迫害的老干部和他们的家人曾被遣送到农村劳动和生活。他们目睹过农民生活的困苦和艰难，所以他们决定要在农村进行改革。在 1970 年代末，中国的领导人也已经知道了他们在东亚的近邻——韩国、香港地区、新加坡和日本在经济上的成功发展。随着中国不再坚持斯大林的发展模式，它对东亚模式越来越感兴趣。于是，中国的领导人开始大力鼓励建立家庭农场、推动市场经济、促进轻工业和消费产品的生产，参与国际贸易。

然而，正当领导人比较团结一致地推进农村改革的时候，对改革的速度及改革目标的分歧也逐渐显现出来了。那些保守的老领导人希望能对渐进式的改革加以控制，并将改革局限在经济领域；而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人士，则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开始实行若干有限的政治改革。政治改革使中国较之 20 世纪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对外开放，而且使中国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候被分散化了。这是自 1949 年革命胜利后，个人、集体和地方当局第一次被允许为追求自身利益而有权利自己作出决定。1989 年事件后，保守的老领导人的权力曾一度上升，经济改革实际上被终止了。但随着 1991 年苏联的崩溃，邓小平在 1992 年初对中国南方进行了被高度宣扬的巡视活动，为了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他号召要使经济改革再次振兴起来。

邓小平以“经济挂帅”替代了毛泽东的“政治挂帅”，使中国走上了一条为许多领导人不曾预料到的发展道路。随着改革的推

进北京作为国家经济决策中心的地位下降了。这种下降部分地反映了改革领导人试图减少中央政府对经济事务进行直接干预的意图，使地方能有更多的自主权，而中央则采用非直接的杠杆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然而，党和国家放松了对经济的控制后，在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也引起了连锁的反应，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失控情况。与此同时，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西方对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的影响增强。这种影响对官方推行的价值观与占主流的文化形态都是一种挑战。通过广播、电视、电话、传真、电影以至电子邮件等工具，这种影响从都市扩大到农村。

在绝大多数非政治性的领域，党不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发挥全能的作用了，除了在诸如计划生育、政治这些方面外。邓小平还放松了党对个人领域和文化生活的控制——这不仅由于社会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而且由于他想修复毛泽东时代下因人民生活被高度政治化所造成的损害。即使在政治领域中，毛泽东之后的时代的控制较之其他领域还是坚固的，但党内的关系、党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受到经济改革、外来思潮及有限的政治改革的影响。虽然列宁主义的党和国家的结构依然存在，领导保证其指令得到不折不扣执行的能力却减弱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不再是“橡皮图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依然被作为指导思想，但实践马列主义的人却正在减少。中国社会已经变得多元化了，社会文化也变得五颜六色了。

被经济改革释放的力量

对于毛泽东之后时代的经济改革，邓小平与他的战友们并没有具体的蓝图。面对文化大革命的恶果，他们首先对人民的呼声作出了反应。他们最初所实行的改革政策，事实上在毛泽东时代，甚至在晚清的维新中就已有人进行尝试了。随着大跃进经济灾难的发生，要求将农业生产的决定权从公社下放到家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已经在若干地区出现了。到 1962 年 9 月，这一农业承包制度已经对人民公社产生了威胁，并出现了市场取向和物质刺激的趋势，于是毛泽东对此进行了干预，使之终止。但在毛泽东去世后，农民又一次回复到家庭责任制，特别是安徽省和四川省的农民在承包后，那里的生产力有了快速的提高。同时，邓小平及其同事们通过对东亚邻国进行土地改革和农民因此而富裕的观察，在中国加快了消费品工业和外贸业的发展进程。结果到 1980 年代初，邓小平使家庭责任制成为全国性的政策。在随后数年时间里，人民公社解散了，千百万的中国农民又回到了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路子上。

同样的情况，也表现在乡镇工业的发展上。在大跃进时期，农村就已出现工业了，但在毛以后的时代，乡镇工业被恢复，并得到迅速的发展。在改革前，人民公社内就有集体性质的工业单位了，这些企业不受国家计划的控制，也得不到国有经济享有的津贴。随着中国走向市场经济，乡镇企业因其灵活性高，劳动力成本低，无职工住房、医疗保健、退休养老和教育培训等额外负担，而对市

场压力能作出比国有企业更好的反应。而且集体企业上缴税收较少，也较少受到行政规矩的支配。在毛泽东之后的时代，集体企业尤其是乡镇集体企业将农村的过剩劳动力转变为一种现实的生产力量。起初，他们主要是开设一些农业机械维修厂，搞一些运输，或发展面向国内市场的小型轻工业，但他们逐渐将小企业扩大为大型工厂，以至生产供应国际市场的消费商品。

邓小平“致富光荣”的口号鼓舞了个体企业的发展。个体企业最初也是小型的，仅仅涉及到零售业与维修服务业而已。随着私营企业所有者不断寻求自身发展，他们开始在技术上改进自己，并通常将企业变成集体性质。虽然这类集体企业有许多仍然在事实上为个人所有，但在土地、建房、市场、资源、贷款等方面却可以多少获得地方政府的帮助和支持。尽管这些企业的经营充满了风险，非国有的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越来越成为中国改革经济的主要动力。直到1990年代末，它们的年增长率为20—30%。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这是我们以前没有想到的。”^①对此，改革者把他们的战略形象地描述为“摸着石头过河”。

到目前为止，改革已经导致中国经济的加速增长。随着地方政府自主作出本地的经济发展方针，使用税收于地方经济建设项目，也产生了国家政治与经济权力的分散化问题。而且，随着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那些能给本地增加收入的集体—私营企业，地方政府便与这些企业形成一定的关系而使双方都能从中获利。于是，

邓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38页。

地方当局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便有可能无视中央政府关于反对腐败、反对假冒伪劣产品、反对乱收费的指令。当地方政府的利益与中央政府发生矛盾的时候，地方当局与非国有性质的企业所有者便会形成一个反对中央指令的联盟。

经济结构中的集体—私营成分的增长不仅提高了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扩大了省与地方的政治权力及经济权力。邓小平与他的同事们已经意识到，一定程度地分散中央权力并对最高层的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有所限制，这是使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必要一步，但分散权力可能会削弱党和政府的权威，影响地方向中央缴纳的税收，因此，他们并没有预先确定应该把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分散到何种程度。

在减少党和政府对经济进行直接控制的同时，建立经济特区和中外合资企业也加速了经济现代化进程。经济特区最早是在 1980 年代初建立起来的，其目的是通过提供比中国其他地区更为优惠的税收政策、减少官僚主义的繁琐程序来吸引外国投资。起初，对特区的建立曾有过不同的声音，但在邓小平的推动下，经济特区终于在 1980 年代末起飞了，并向工业化发展。邓小平又不失时机地鼓励在香港、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台湾的华商社团与中国大陆进行贸易，向大陆投资发展。这些华人拥有的巨大资本、作为企业家的天赋、气质和丰富的管理经验，无疑有助于使沿海诸省成为中国以及亚洲最有发展活力的区域。

与数量约占 60% 的效益不好、面临破产的国有企业相比，经济特区与中外合资企业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它们和私营企业与集

体企业一样有极大的经营灵活性。虽然国有企业的职工占劳动力的 2/3 以上，国有企业在经济活动中所占的产值比重却在逐年减少，到 1990 年代中期，国有企业的经济产出不到全国统计的一半，并且还在继续减少之中。由于中央政府的税收有 60% 来自国有企业，^①所以中央政府返回省里的税收出现了递减的问题，国家的经济基础受到了破坏。可以认为，不仅中央政府的经济力量，而且其政治权威都因此而减弱了。

有限政治改革的影响

有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在开始时并不包括政治改革，而仅限于经济方面，这与前苏联的经济改革根本不同。这种分析并不完全正确。在 1980 年代，中国的改革领导人已经推进了一些政治改革的内容，从而使中国的党和国家发生了一些预料不到的变化。尽管改革后，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有所削弱，但其结构仍然是完整的，任何被党的领导人视为对政治体制构成威胁的挑战都受到抑制。尽管当江泽民在 1997 年秋天的中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号召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许多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再次提出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要进行政治改革。但在本世纪即将落幕之际，中国的政治改革仍然远远落后于经济改革。

确实，邓小平最关心的是经济，但他与助手们在 1980 年

^① “China’s Lost Savings”,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editorial, March 21 - 27, 1997, p. 10.

代推动的一系列有限的政治改革方面还是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对毛泽东时代过度政治化的控制、法制不全、经济停滞以及文化大革命引发了不断动乱和暴力的情况，邓小平深恶痛绝，屡加批评。因此，邓小平身体力行，辞去了党内的最高职务，尽管他在政治方面仍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他强调党的集体领导，改革政治体制，致力于重建党的纪律，要求一切依法行事。他还号召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虽然民主与法制的定义并不十分清楚，但十分明显的是，进行政治改革就要对领导人拥有极大政治权力的状况进行限制和监督。正如邓小平 1980 年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所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失败并不仅仅是领导人的错误，而是党的结构给了领导人以无限的权力”，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①

在毛泽东之后的时代初期，邓小平和他的助手们就在体制和程序上进行改革，对一些领导人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进行限制。他们改革了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职务终身制，建立干部任期制。他们对党和政府的活动进行了分离，党的任务是确定国家总体发展目标与发展次序，政府则制定并实施政策。虽然邓小平没有对党的领导地位及党的全能作用提出过质疑，党政分开的做法已经使党的一部分权力和作用逐渐地分散到政府行政机构中了。这一过程从 1986 年年中开始，但在 1989 年后被停止了，随后又出现了党

^①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293 页。

政机构重叠的情况。但在 1997 年党的十五大后 江泽民又重新把党政分开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同样具有意义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也开始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了。邓小平反复提出，要重视中国宪法第 57 条，它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默里·斯科特·坦纳 Murray Scot Tanner 认为全国人大权力的增加 与其先后就任的三位委员长、重要的老一代领导人彭真、万里、乔石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们为加强全国人大的权力和机能而努力，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中增加了技术型的干部和专家，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制度来支持常务委员会的工作 从而不仅增强了人大的权力 也提高了人大的权威性。虽然全国人大应办的事项与议程往往是由党的领导来确定的，但人大确实可以对某些事项提出修改、修正意见。即使在 1990 年代，江泽民在政府行政机关中重新建立了党委制度，全国人大及各级地方人大继续在党的控制下推进人大的独立性工作。

逐渐地，中央及地方的人大被授予了立法的权力。1980 年开始 人大代表由党任命的做法被取代了，一些地方的人大代表经差额直接选举产生。虽然所有的代表候选人都要接受党的考察，但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使地方上的选民有机会选择自己的代表。虽然在 1980 年选举后 农村的差额直接选举工作曾停顿过一段时候 但在 1989 年事件后，差额直接选举工作还是继续并加快了。在农村，人大的威望在大跃进和灾荒时期受到了破坏 文化大革命时期又进一步恶化了 以至其影响力随着毛泽东之后的时代人民公社被解散而几乎消失；为了重建农村地区人大和

行政机构的权威 在彭真、薄一波等党的领导人的促动下 开始了农村基层选举改革的试点。

1980 年代末，一些地方的农民获得了以差额形式选举村级领导人和村民委员会的权力。尽管候选人需要通过官方的民政部门考察 差额选举村领导人而不是由上级直接任命的做法 使中央的权力在基层地区得到了巩固和发展。虽然有些地方的选举并不成功或流于形式，但还是使村民们通过选举撤换了那些贪婪腐败的领导人，而且使新当选的地方领导人对他们的选民更加负责任。有证据表明 民主选举村干部是比较成功的 它使农民与国家政策保持了一致 捍卫了农民的民主权利 那些为非作歹的地方干部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监督。但是 对于参与地方选举的村民数量 存在着一些争议。据一位高级干部的说法，参与选举的人数约为村民总数的 $1/10$ ；另一估计为 $1/3$ 的村民参加了选举 但直接负责村民选举的民政部估计 有 80% 的村民参加了选举。^①

虽然差额选举还没有在省级选举中实行，但政治权力向地方的加速转移使人不仅想起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情况。当时，省和省以下地方的权力也出现增长的趋势，中央的权利遭到很大的削弱 尤其是世纪交替之际 许多县和省的当权者中都产生了一些新人 他们中的一些人逐渐地进入了中央的权力圈子。当前 中国也主要因经济的原因而出现了类似的发展，在经济发展快速的沿海省 那里的领导人不仅被本地看好 也被中央看好。即使有的人被推选进了中央政治局，也仍然关心着地方的利益。

李岚清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演讲，1996 年 9 月。

1980年代中期，被胡耀邦解放出来的一些知识分子及技术干部得到了使用，成为政府机关、宣传部门、学术机构的领导人。他们提出了对国家行政机构进行改革的建议。1986年开始的通过考试进行公务员的选拔，就是改革行政制度的一种尝试。虽然考试选拔公务员似乎又回复到中国的科举选拔官僚传统，但公务员考试无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对公务员的选拔不仅要看其成绩，更主要的还是考察他们对政治的忠诚。改革国家机关制度的另一项举措是1990年10月生效的行政诉讼法。这项法律使普通群众有权利起诉那些为非作歹的官员。例如，有些农村的土地被地方干部侵占用于其他建设项目，农民便向法院提起上诉，控告侵犯他们利益的干部。据说光是1995年一年就有7万人向法院告政府机关和官员。^①

然而，尽管有这一法律，尽管公务员制度的改革正在缓慢进行之中，而且在制定其他有关法律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但伴随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而日益蔓延的官员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解决腐败问题的举措也越来越徒劳。无论发起了多少次反对腐败的运动，但在没有形成经常性的反腐败制度、没有相关的法律、没有独立的司法，以及党可以干预司法的情况下，官方反对腐败的运动只能产生很少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负有领导反腐败运动责任的干部本人恰恰就是腐败分子。有人认为，某些腐败行为对市场经济有促进作用；但也有人认为，腐败的广泛存在会有亡国的危险。

^① Tony Saich, "Most Chinese Enjoy More Personal Freedom than Ever Befor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February 1-2, 1997, p. 6.

1997年2月邓小平的去世标志着老一代革命家的领导权传给了新一代。在邓小平生前，改革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分散最高层的政治权力，虽然邓小平仍以他的个人威望影响着其政策的继续执行，但江泽民早在邓小平去世前七年就已经在党政军方面掌握了领导权，所以邓小平的去世并没有出现正式的领导权真空。在中国走向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艰难道路上，邓小平虽然没能走完全程，但他在历史上将被认为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

当前，没有哪个中国领导人发挥过像邓小平那样巨大的历史性作用。而且，由于现今的领导人在军队里缺乏像邓小平那样深的根基，邓小平的支持对于掌握领导中国的权力是至关重要的。江泽民和他的同事们是技术型的领导人，他们通过对国家工业和行政的领导获得政治权力和向上发展的机会，他们的权力最主要来自邓小平的安排。在军队方面，由于在邓小平领导的年代就已经大幅度地削减了军费，正如保罗·戈德温(Paul Godwin)所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些单位开始生产为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商品，以创收增收来支持预算和有关开支。人民解放军部队建立了各种面向国内外市场而生产的企业。在毛泽东之后的时代，军队或许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经商集团。但是，从1998年开始，军队的经商王国开始被要求与部队脱钩。戈德温认为，随着老一代军队领导人的过世，以及裁军和军队加速专业化进程，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政治作用也可能受到限制。然而，尽管上述因素有可能使军队对政治的涉入减少，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20世纪末仍是能对中国发挥主要政治影响力的仅次于党的国家组织。

在1980年代，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和原先的红卫兵分子曾十

分关心国家的政治事态发展 并导致了 1989 年事件的发生。有些人士曾认为 1989 年事件本来是对中国的党政架构进行改革，并逐渐推进政治民主化的机会。但是，他们忘记了中国不是 1980 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 也不是波兰 任何在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之外建立独立工会或组织的企图都注定是要落空的。尽管 1990 年代开始出现了一些非政府组织 它们介入到社会、环境、知识分子等问题的改革与讨论之中 但它们都不能触及政治性的问题。如今 中国人可以选择或变换自己的工作 可以到外国去旅游 可以在电台的谈话类节目中发表自己的批评意见，可以通过投票选举把不称职的村干部赶下台 但他们还不能公开地对党、国家及其领导人进行政治性的批评。转型时期的中国正处于公民社会的初级阶段，它是不同质的、由诸多成分组成的、变动的社会 这个社会潜在着一些不稳定的力量。即使是那些企图分享到更多民主政治变化的人，也对社会的不安定深存恐惧。他们害怕太快的政治变动可能会导致出现如前苏联那样的社会动乱，从而使生活水平的继续提高受到影响。

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敢于公开地表达这样的观点，即认为政治改革滞后的结果 是不能及时解决中央政府职能被弱化的问题 从而也可能导致社会的不安定。而且，国家缺乏像邓小平那样至高无上的强人领袖 会影响党和国家的控制力 并加快中央政治权力向地方的转移，而地方力量的扩大将继续削弱中央的权威。毛泽东去世后 某种非正式的联邦主义已经在中国出现 但尚无政治性组织或群众团体对此作正式的宣言。在毛泽东之后的时代的中国，只要持续的充满活力的经济发展与党—国家权力的加速分散

之间的矛盾继续存在，使中国社会保持稳定就始终是领导人所追求的重要政治目标。

分化中的社会

现在中国一方面在强调加强中央领导，另一方面是各级领导都存在不得力的问题；一方面强调社会的整合一致，另一方面却出现了社会多元化的趋向。社会科学家戈登·怀特（Gordon White）把毛泽东之后的时代出现的这种社会变动现象被称为“分化与破裂”。^①引进市场的力量，鼓励私营和集体经济的发展，使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向地方转移，已经对整个中国的社会变动产生了深远的作用。这种变动可以从一些地方形成的地方官员与地方企业所有者的联盟中看出苗头。这种联盟提高了非国有企业及其职工的生活水平，加强了地方官员的权力和控制。在某些方面，这种联盟看起来还恢复了传统的社会形态，如晚清时期的“官督、商办”的企业结构。

当前，官员和企业所有者之间已经出现了一种结盟的关系，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限被模糊了。社会中新产生的富人或者是从市场上涌出来的，或者是官员的亲属，他们一般都能保持住自己的政治地位，而不会参与对官方权威的挑战。迄今为止，中国不断扩大中的企业所有者阶层对政治改革并不感兴趣，因为只有维持

^① Gordon White, Jude Howell, and Shang Xiaoyuan, *In Search of Civi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p.213.

住他们与官员的目前关系，他们才能保住已获得的利益。他们的经济力量在扩大，但他们并不具有支配性的社会地位——这些规模不等、往往实行家族性管理控制的私营企业或集体企业——已经被党所认同和强化，他们成为一种挑战的屏障，对现行政治体制起保护作用。即使那些不依赖国家财政支持、但在官方监督下开展活动的非政府组织，也是如此。专业工作者、研究人员、律师、医生、工程师及教师等人士也组织了专业性的团体，有些甚至颇有影响力，但这些非政府组织需要遵循官方确定的方针政策，其自治程度是有限的。尽管中国的企业主阶层与专业阶层正在富裕起来，而且数量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到 20 世纪末，他们还不能发展为能争取自己权利的独立的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

然而，各种在官方监督下建立起来的社会团体及其成员，已经有了在社会上发表自己声音的空间，而不仅仅唯官方的口径是听了。这种情况与 19 世纪末时中国的情况有点类似，当时有许多人及各种组织开始表达自己的观点与要求，以逐渐扩大政治上的影响。事实上，一些与党的主旋律并不完全一致的舆论影响如今已经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占主流的舆论导向。克里斯托弗·内维特 (Christopher Nevitt) 在其有关天津的研究中指出，虽然有许多小商人的团体仍然顺从于官方，但是企业家协会中的那些大企业所有者们，由于比较富有，而且对国家资源的依赖程度相对较少，他们对自己的利益也充满了信心。^①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个人与

^① Christopher Nevitt, "Private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China: Evidence of Civil Society or Local state Power", *China Journal*, No. 36 (July 1996).

社会团体会越来越大胆地争取他们自己的利益。白桂嫻 (Kristen Parris) 曾对特定地区的个体企业所有者进行了描述, 认为温州的个体户在平衡公有成分与私有成分方面就颇有影响力。虽然有些个体户倾向于以不正当的手段谋取私利, 但也有一些业主致力于建设性的目标, 如促进教育、提高社会服务水平等, 从而不但使自身利益有了切实保障, 也改善和提高了工人和雇员们的利益。

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出现社会分化的另一个现象是, 贫富差异正在扩大。在改革前, 国有企业中的工人具有很高的地位, 他们的工资收入也很高, 但改革后出现了工人地位急速下降的问题。如今不仅工人的工资收入没有得到提高, 而且有的还减少了, 甚至出现工资欠发问题, 更有数百万的工人下岗, 然而, 那些被雇于非国有企业或合资企业中的工人收入却增加了。经济结构的转变和社会控制的弱化, 使一部分地区发生了集体抗税、工人罢工、街头游行之类的事件。在农村, 富有的管理人员与乡镇企业职工、农民之间的鸿沟也扩大了。此外, 由于城市的发展速度大大快于农村, 城乡之间社会经济发展不一致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了。这种发展不一致的问题又因地区发展不平衡而加剧, 当沿海地区已经开始致力于国际贸易发展的时候, 内陆地区仍在考虑怎样推进国内贸易的问题。

在毛泽东领导的年代,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 城乡差别有所缩小, 尤其是在享受医疗卫生保健、男女平等、教育等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但市场改革使这些差别又扩大了。以教育费用为例, 城市的教育经费几乎没有增加过, 而农村的教育经费却减少了。尽管在大学、研究所的一些涉及最尖端领域的教育经费是增

加了，但小学、中学的教育经费却减少了，尤其是农村的教育经费减少得更多，从而使社会差别进一步扩大了，特别是城乡差别问题。国有企业原来是国家和党的主要收入来源，但随着一部分国有企业破产倒闭、或生产效益不好，以及省与地方上缴中央的税收减少，意味着国家和党用于解决这些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的资源正在减少，而面临的问题却正在变得严重起来。

由于农村过剩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的种种限制已经放松，加速了社会差异的扩大。到 1990 年代中期，中国的国内流动人口据估计为 1 亿人。^①这些流动人口在全中国都有，但绝大多数人是在沿海经济快速发展地区的新企业、合资企业中做工。非国有企业与合资企业雇佣从贫困地区来的青年，付给的报酬是低的，但却高于他们在家乡时的收入。外来劳工通常将一部分收入寄回家乡去供养家庭，从而使农村的收入有所增加，但从总体上看，农村存在的问题也加剧了。由于青年与男性劳动力外流，农村人口中的老人与妇女比重越来越大了；有劳动力在外地打工的家庭因为无力承担必须缴纳的农业任务，他们的不满情绪也在增加之中，于是出现了针对税收执法人员的暴力行为。也有的农民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批评行动，如向官方的报纸写文章，呼吁关注和保护农民的利益。再就是通过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撤换农民不满的村干部。

中国流动人口的加速也增加了都市社区的紧张因素。苏黛瑞 (Dorothy Solinger) 对此进行了分析，她认为大量经济性流动人口

^① Patrick Tyler, "China Migrants: Economic Engine, Social Burden", *New York Times*, June 29, 1994.

为了寻找工作与经济利益而流入城镇后，增加了城镇社区人口的异质性和分裂性。城镇居民害怕失去因户籍而得以享受到的各种城市人利益，便歧视、孤立那些涌进城市的民工。虽然那些从同一地方出来的民工在城市落脚后往往会建立自己的社区，他们办起小学使民工的孩子接受教育，维持社区内的治安，并推动一些福利项目等，但外来民工很难把自己与都市居民整合在一起。他们绝大多数生活在城乡结合的边缘。如今，有成百万的外来劳工在城市里寻找工作，却有约占国有企业半数的职工面临着下岗。1997年9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要加快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这有可能出现更多的下岗工人。为了减少社会动荡，政府提高了对下岗职工的社会支持力度和津贴。

《中国日报》对北京家庭户拥有金融资产的报导，反映了城市中的分配差异正在扩大之中。北京市最富有家庭平均拥有的财产价值是最贫穷家庭的 7.85 倍。^①高收入者主要是私营企业老板或合资企业管理人员，而失业人员和退休人员家庭的收入为最低。1996年被政府统计为收入处于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者为 580 万人，此数字占人口比重不到 5%，低于 1979 年占 26% 的比重。^②在中国社会转型加快的形势下，由于没有同步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且还存在通货膨胀的阴影，使人民产生了消极的社会心理。

① Xing Zhigang, "Disparity in Assets Widening", *China Daily*, January 8, 1997, p. 3.

② Alan Piaszza and Echo H. Liang, "The State of Poverty in China: Its Causes and Remed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Unintended Social Consequence of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d Fairbank Center, May 23 - 24, 1997.

影响。在毛泽东时代，那些非国有企业职工和失业者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障网络，尤其是农村的老人和妇女面临更多的问题。女性的自杀率是惊人的。人类学家阿瑟·克兰曼 Arthur Kleinman 估计，中国女性的自杀率在世界上是最高的。^①官方的工会与妇联，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已经开始面对这些问题展开工作。它们开展一些法律、心理咨询和教育活动，使那些需要得到帮助的人群知道该怎样缓解面临的压力，并以合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反应，而不是以自杀方式进行反抗。然而，这类对社会弱者进行的教育和援助工作才刚刚起步。现在面临种种困难和问题的人是如此之多，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财政资源又是如此巨大，单靠非政府组织或非国有单位自身的力量是难以为继的。但国家权力的分散化，使政府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也有力不从心之感。

总之，加速的社会变动，以及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多元化，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也在变动之中。虽然市民社会还没有在中国形成，改革已经使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市民空间。随着独立知识分子、专业人员、商贸团体的影响不断扩大，农民、国有企业工人、非国有企业及集体单位职工正在向新的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移动，并开始发出不同的声音。这些不同的社会成分是否能找到有秩序的途径来反映它们的利益，党和政府是否能找到一种合适途径使这些社会成分的不同利益得到调适，将会使社会产生各种异质性，并有可能使中国经历具有建设意义的制度变迁，或可能出现发展僵局。

^① Arthur Kleinman and A. Cohen, "Psychiatry's Global Challenge", *Scientific American*, March 1997.

与社会动荡。

文化多元主义

经济、政治、社会领域中出现的问题 在文化领域中也同样存在。改革使中国的经济和知识结合在一起，并对外部世界有了更多的依赖 于是在政治导向方面加强了民族主义的舆论 随着中国向区域化和多样化方向的发展，中国的领导人又开始强调意识形态与政治的一致性。中国介入国际社会后，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外文化的侵蚀 随着中国接受越来越多的西方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及贸易商品 中国已经受到西方政治理念、西方价值观 以及黄色信息、流行文化的渗透。这些西方的精神产品通过图书、广告、旅游、观光、电话、电影、广播、电视、传真、电子邮件等渠道传入了中国。1983年 有些党的元老和毛主义者曾以“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为由 对异端思想进行了讨伐 他们发出了警告 认为放松对文化领域及日常生活的控制 会导致政治的多元化 动摇党在权力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绝对领导地位。

对此，邓小平发起了一系列的运动：1983~1984年间反对“精神污染”的运动，1987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1990年初的反对“和平演变”运动。尽管进行了这些政治运动，但正如前面所说 在整个1980年代，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曾试图使党逐渐发生政治变动，一些原先的红卫兵分子也企图使变动能在党和国家之外继续下去。直到1989年事件发生前 似乎已有可能在公共领域中对政治问题展开讨论，甚至可以容纳比较独立的旨在形成不

同政治经济政策的思想了。然而除了 1992 年有过一段时候邓小平在重新推动经济改革的同时曾号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党的十五大上也有关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提法，公开的政治异议还是被禁止的。而且还存在着一种思潮 想要恢复对毛泽东的崇拜，并对人民重新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1990 年代中期 党内个别从事理论宣传工作的领导人、一些专业理论工作者和坚持计划经济主张的人曾联合在一起，企图再一次使阶级斗争成为宣传工作的中心，并使集中的经济模式和中央权威得以恢复。

然而 无论是反对‘自由化’的运动 还是想要恢复意识形态控制与权力中央集中化的努力 都不能停止西方理念、价值观和文化的渗透。于是大门又一次向外部世界打开了，只要中国想要实行市场经济和参与国际贸易，门就不可能再被关闭。在邓小平—江泽民的时代，中国致力于使自己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等方面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 而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独来独往 毫不在乎外部世界的反应。现在一批批外国人到中国进行访问，他们热衷于与中国做生意 外国记者对中国事态也频频作出报道 尽管中国当局对不同政见者依然十分严厉，但对西方意识形态则采取了小心和克制的态度。虽然直到 20 世纪末 中国人所享有的政治自由依然有限 但中国人如今能在艺术、学术、文化、专业、经济与个人等方面享受到较之改革前更多的自由，却是毫无疑问的。

当代中国领导人仅仅在口头上说要重视意识形态的工作。由于毛泽东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僵化和扭曲 以及前苏联的瓦解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已经变得更为实际了。江泽民和他的人马为了填补意识形态的真空 像邓小平一样强调了“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这就意味着要反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潮 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他们还号召要宏扬伟大的中国文明 要古为今用 并肯定儒家学说中的某些思想。

虽然中国的领导人要把人民引向一个方向，但新的经济现实却把人们推往另一个方向。领导人和知识界人士已对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道德水平下滑和拜金主义盛行问题提出了批评。虽然他们出于不同的原因——领导人所关心的是腐败蔓延问题，以及社会对中央权威的潜在挑战 知识分子所关心的是传统文化里轻蔑‘自我’的思想正在消失 以及自身经济地位下降的问题。对此 白桂嫻指出 新出现的富有的企业家们已经在重新对‘个人利益’进行定义 他们认为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并不矛盾 个人利益不过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而已。普通大众对公共利益的定义，则较少从国家精神或民族利益出发，而较多地考虑物质福利与消费利益。这种追求的出现 以及异端思想的流入 使党企图对意识形态领域加强领导的努力受到了不利影响 无论这是些怎样的影响 人民大众和知识分子所渴望的是要重新获得他们作为有社会价值分子的地位。中国的经济改革将经济力量从国有成分转向非国有成分，同时也将中国的文化生活从以官员与知识分子为中心转向以广大消费者与观察者为中心。

中国改革的未来

自 19 世纪末以来，改革者们一直期盼使中国富裕和强大起来，但是，这个愿望只有在毛泽东之后的时代实行经济改革与对外

开放政策后才开始成为现实。如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比其在本世纪的任何时候都要好，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准已经有了改善和提高。然而，中国的成功是以社会多元化及党与国家的权力分散化为代价的。所以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也产生了各种新的问题。正如邓小平等人所预见的那样，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已经使社会被压抑的能量和企业家的才干得到了释放。但这些能量的释放也使原先潜伏在社会表层下的不满情绪，不时地公开表现出来。在经济、文化、个人生活等方面，改革虽已赋予了人民相当的自由，但他们也削弱了党和国家处理社会病态的能力。

邓小平和他的继承人承认，经济改革需要使地方当局有更多的经济权力，他们允许地方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行政自治。但他们可能没有估计到，地方经济决策权力扩大后会分散中央的政治权力。由于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取决于地方的积极性、开放性与体制的多样性，以江泽民为首的领导层试图重新实现强大的中央控制并减少地方权力的努力进行得并不顺利。事实上，地方对中央指令负责的程度已经在减少，能直接参与国际贸易的沿海富裕省尤其如此。这些省与相邻地区的经济联系，较之与北京的联系要强得多——如广东与香港、福建与台湾、山东与韩国、黑龙江与俄国。当地方经济利益与中央在诸如税收、贸易等问题上的指令有矛盾时，这些省往往并不十分情愿执行中央的指令。

除了西藏、内蒙、新疆等边疆的地区，90%以上的人口都属于汉族。中国与前苏联的情况不同，在前苏联，俄罗斯族人口只占50%多一点。因此，下放中央权力和扩大地方权力并不对中国作

为一个国家的存在构成威胁。对任何使党和党的领导受到威胁的人或群体 党和国家都会作出必须的反应。但是 对中央作出的有关指示 如反对腐败、缩小社会和地区差异、加快农业发展、加强法制建设、保护环境、减少污染等 地方只是在表面上应付而已 甚至并不落实。到目前为止，中央政府已经控制住了多次出现的通货膨胀问题，但政府采取的措施并不是从宏观经济上对货币供给或利率进行调控，而是依赖简单的行政干预手段。随着中央对地方和个人控制的减弱，中央采用行政干预办法控制通货膨胀的能力也有可能减弱。使中国经济继续生气勃勃地发展，无疑是中央政府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

邓小平已经使中国发生了令世人瞩目的变动，他的任何一位继承者 更不用说江泽民了 如果不重新定义或改变列宁主义的结构 就可能控制不住已经释放出来的巨大社会能量。当前 在党和国家的层面上都缺乏一种基础和制度，对加速发展的地方主义进行有效控制和调整。怎样使地方能对中央的政策有序地作出反应，现在还没有形成有效的程序和制度。除非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起新的制度化的规范关系，否则中央的权威将进一步降低。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阶层从前苏联瓦解的事实中得到一种启示 即认为政治变动将会导致社会不安定 并影响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经济的增长。虽然中国已经在党和国家内进行了一些政治改革，如果没有更大的政治空间接纳经济发展加速后出现的其他产物 如文化多元主义、多元化社会趋向、萌芽的民主化要求等 党和国家就会出现不稳定的问题。确实 只有承认变化 并对变化进行调整 党和国家才能生存下去 而任何的调整 都意味着列宁主义

政党的终结。正如理查德·鲍姆 Richard Baum 和阿历克塞·谢岑科 Alexei Shechenko 所指出 如不对中国政治重新作正式的制度架构,就很难确定党和国家是否能适应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党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需要进行这样的变动。他们更喜欢的是新加坡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模式,因为新加坡并没有经历过重大的政治变动。但新加坡只不过是一个仅有 300 万人口的城市国家 它并不能成为一个有 12 亿人口、而且每年新增人口达 130 万之上的国家的榜样。即使是同样有信仰儒家学说传统的日本、韩国,也不能提供可作参照的现实模式。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独裁政治的领导和中产阶级的支持下,经过几十年的经济起飞和现代化进程后,也已经在逐渐地和平地推行民主政治了。中国有幅员辽阔的国土 有众多的人口 有较多的区域经济 也有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中国的现代史、中国的发展经验以及影响其发展的方式 与其东亚邻国有很多不同 中国没有 100% 的统计识字率 缺乏受过西方训练的管理人才。这些情况使中国的政治无论向何种方向发展都会遭遇较多的困难。

然而 中国的东亚邻居及其他国家的历史和经验已经表明,一个有较高经济收入和教育水准的中产阶级阶层的崛起,迟早会在政治上要求有更多的发言权。虽然有些研究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形成之中,它还没有达到足以在政治问题上独立发挥作用的程度。也有些研究认为 在有些地方及在各种社会团体中 新的群体已经因中央权力的分散而获得了一定的活动空间。总之,随着地方和民间所占有的活动空间的进一步扩大,一个成长中的中产阶级有可能组织起自己的政治力量。

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之一，是推动了毛泽东之后的时代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改革的动力来自官方，也来自人民。改革实行的对外开放与市场经济政策，使中国向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发展。中国人民开始比较富裕了，并要求拥有更多的权利。同时，中国区域差异和社会差异的扩大，人们对改革期望值的提高，也使中国面临新的任务与挑战。

（张敏杰 译）

工人作用的演变*

马丁·K. 怀特

编者按：马丁·K. 怀特 (Martin King Whyte) 在美国密执根大学任教曾达 20 余年，1994 年起至今为乔治·华盛顿大学社会学教授，1997 年起任社会学系主任，兼国际事务教授。他对中国的研究主要涉及中国的家庭模式与经济发展、工人状况及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等课题。近作包括《中国家庭 and 经济发展 障碍还是动力》、《中国都市孝道的式微》等论文和著作 目前正在主编《中国革命与亲子关系》一书。

20 世纪后期，社会主义的发展遭到了重大挫折。1979~1980 年的波兰全国工人运动标志着波兰社会主义开始走向解体，但苏联的威胁及军事管制使其最后的终结被推迟了九年。虽然工人运动仅发生在波兰，但东欧其他国家，甚至包括苏联的无产阶级异

* 本文译自 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 合编的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一书，Copyright ©1999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 of Harvard College。经哈佛大学出版社许可重印于此。

化也是导致 1989~1991 年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终结的重要原因。

在东欧社会主义垮台的过程中，工人阶级所起的作用，多少可以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进行解释。虽然这些事件中起作用的并不是资本积累这一动因，但马克思所提出的使无产阶级意识觉醒的一些条件在某些方面却发挥着作用。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随着服务业的发展，工人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随之减少。而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工人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情况改变甚少。社会主义国家中计划优势产生了大量巨型工厂，通常还建有与之相配套的住宅群及其他福利设施。这些远远大于资本主义国家工厂平均规模的企业及与之相关的服务体系，有利于加强工人的团结。

但在这些企业开创之初 随工业的快速扩张 大规模地从农民中招募工人 以及无所不在的政治控制却起了相反的作用 阻碍了工人自我意识的觉醒。然而，无产阶级专政，甚至延续到第二代、第三代 如在苏联 的专政 却对工人的团结起了加强的作用。在社会制度的宣传中，对工人阶级的特殊性及其使命的不断强调又很可能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团结的倾向。再者，1960 年代以后工人生活水平停滞不前，工人们对于经理、专家知识分子们所享有特权日益敏感，再加上制度专制及言论控制的放松，使工人的团结从一种拥护和支持国家的力量转变成对国家越来越大的威胁。越来越强烈的被剥削感，即使不是被资本家所剥削，构成了团结工会及后来工人反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基础。

中国领导人实际上也清楚并十分担忧因东欧无产阶级专政逆

转所带来的不祥征兆，^①他们担心此类影响会扩散到中国工人中去。此后在 1989 年事件中，针对有人打着工人旗号试图组织独立工会，中国政府采取了十分强烈的反应。1978 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性质经历着复杂的变化，1990 年代这些变化不断加剧。这些变化是否有可能使中国工人也仿效他们的东欧老大哥们，成为削弱中国现有制度的一股力量呢？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工人

为了评价改革时期工人作用的变化，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毛泽东时代的情况，尤其是文革期间中国工人阶级的性质。1949 年后依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经济，大大壮大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1949 年大约只有 900 万工人，其中 300 万产业工人，600 万手工业工人。到改革初期，仅国有工业的工人就发展到 2 900 万，国有企业中的工人在无产者中占有最大的比例。在 1980 年代初，城镇集体工业中有 1 500 万工人，农村集体工业中有 1 900 万工人，城镇和农村的临时工分别为 400 万和 900 万（大多由城镇国有企业雇用）^②

正如这些数字所显示的，毛泽东时代的一个重要遗产是农村工业化的发展——这表现为雇用农村劳动力的小型工厂激增。然

^① Jeanne L. Wilson, "The 'Polish Lesson': China and Poland, 1980~1990",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23, No.2 (1990): 259-280.

^② The preceding statistics are drawn from Andrew Walder, "The Remaking of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1949~1981", *Modern China*, 10, No. 1 (1984): 3-48.

而这些受雇于农村工厂中的工人是最不严格意义上的“工人”。国家政策规定农村工厂中雇用的农村劳动力占全部农村劳动力的比例应控制在 5% 以内，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获取的不是工资，而是通过生产队将报酬转化为工分。由生产队规定这些工人的报酬，目的是尽力不使他们的报酬高于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工分，任何福利的增加（如集体医疗保险）都来自生产队而不是工厂。一些地方还采用轮换的雇佣方式以及定期离开工厂参加收割的制度，以使在农村工厂中工作的劳动力不脱离农业劳动。这些政策的结果使毛泽东时代受雇于农村工厂中的劳动力与其说是无产者（倒不如说仍是耕种者/农民）。

确切地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工人过于集中在城市。1970 年代后期，两个在后毛泽东时代变得重要起来的部门——私营企业及独资或合资企业——几乎还都不存在。此外，在毛泽东时代末期，农村集体企业中工人的劳动条件及待遇已日益接近国有企业的水平，这使改革前这一部分中国工人与国有企业工人已存在某些一致性。

这一时期中国的工业组织及工人生活与苏联及东欧的情况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些重要差别。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中国强调的是物质生产及大型工业联合企业，并提供住宅及其他福利服务设施，这使其无产阶级的人数与同等发展水平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更为众多，而且在空间上极为集中。像东欧一样，工作单位向其成员直接分配一系列的实物及劳务，而且那些受雇于最大、最重要的企业中的工人还享有特权。工人总体上享有很高的工作保障及范围颇广的附加福利，工资水平通常超过级别较低

白领工人及其他从业人员，这与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另一对照。工作保障以及国有企业工人的优厚待遇所形成的‘铁饭碗’成了日后改革的主要目标。像他们的东欧老大哥一样，中国工人阶级的形象也被宣传为国家的领导阶级。

尽管有这些相似之处，中国工人在诸多方面仍与他们东欧的老大哥相去甚远。劳动力缺乏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间断地从农村招募新工人而在劳动力富裕的中国农民转变成工人是极度困难的。城市工厂雇用来自农村的临时工已是例外，而即使这有限的例外也证明了一点农民临时工获得的福利比‘正式’工人少而且要靠家乡的生产队来分配粮食。中国的工业企业还近乎终身雇佣不存在苏联及其他东欧国家那样高比例的流动性。另外中国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它没有真正的劳动力市场，个人即使面临难以忍受的工作状况或待遇，也很难调换工作。这些特征有一种通用的说法叫‘单位所有制’用以描述企业对员工的强有力约束。

在东欧也不曾有像中国那样的对专家、知识分子、经理甚至党的一些官员的歧视，这使得中国工人与其他国家的同事相比，会更严肃地对待领导阶级这一称号。同时，中国工人与其他的城市居民一样，也有一些特有的无奈。1957年以后，大多数工人的工资几乎一成不变，文革十年中，红利、计件工资及其他的物质奖励制度又被取消。这些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不同意味着，多年来中国工人一直辛勤劳动，而不管他们付出多少努力，热情有多高，每月的收入都是固定的和有限的。这种抛弃物质奖励的做法与苏联于1930年代制定的、接着又在东欧实施的工业制度正

好形成对照。

此外，中国对单位制的强调程度甚于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由于对大多数基本生活品及服务没有实行市场分配，中国工人比东欧国家的工人对工作单位有更强烈的依赖。再次，中国的政治控制及对雇员私生活的控制也比其他地方更为普遍，这使个人自主及个人隐私几乎不可能存在。这些特点使工人们更多地依赖于他们的企业及上司，几乎没有“发表意见”或“离开单位”的选择余地。到了毛泽东时代末期，由于顶替制允许工人可以提前退休，可以让其子女来同一单位工作，这使单位对工人的禁锢延伸到了下一代，而这种通过正规途径使下一代人继承工作的体制在东欧是不存在的。但是，中国当局并不像日本公司，甚至不像某些西方的工业企业那样，利用这种对单位的依附来培养工人对企业及企业活动强烈的忠诚之心，而是期望工人忠于共产党和毛泽东。

毛泽东时代后期工人生活的这种社会结构特征对工人的团结及潜在的不满产生了什么影响呢？虽然有一些关于工人罢工及抗议活动事件 1957 年及 1975 年的记录，但从总体上说，安德鲁·瓦尔德 Andrew Walder 的结论是正确的：1949 年以后发生的变化妨碍了造就真正的工人阶级。^①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1949 年以后发生的某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及能动性，尤其是附有住宅区的大型企业使工人大量集中。1950 年

^① 见 Walder, “*Remaking of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一文中的讨论 第 40-42 页。

代后 又几乎不从农村招募工业劳动力 公开强调工人阶级的先锋模范作用等。

然而 另一些因素却阻碍了无产者的阶级意识增强 不同企业工人之间巨大的社会阻隔，与其他社会团体相比工人的相对优越性 工人对上级的极大依附性 以及官方对信息及言论的控制。因此 在毛泽东去世时 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工人会对这一体制构成重大挑战。

改革年代的战略与时机的变化

1978 年后发生的众多变化，使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也随之而变。这些变化可归纳为两类：一是传统的国有、集体企业内部工人阶级组织形式及境遇的变化；二是国有、集体企业外部产生了新的（或恢复了社会主义之前原来存在的）工人阶级间的分割。到 1990 年代，要确定这两类变化的性质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改革增强了地方政府及企业的自主权 使得各类企业在用人、工资、组织、升迁等方式上的差别越来越大。尽管变化的情况很复杂 我还是想先对“新的”准资本主义企业作一番描述 然后对传统的城市国有及集体企业中工人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

中国的准资本主义工业企业

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也许是乡镇企业。农村企业所雇用的劳动力从改革之初的 1 900 万上升到 1990 年代

的 12 000—12 500 万。然而，后一个数字包括的是所有非农企业，而不仅仅是农村工业。1993 年，农村工业企业雇用了大约 7 300 万工人，其中产业工人约有 5 800 万人，占 80% 左右。^① 严格地讲，乡镇企业并不只有一种单一的组织形式，根据所有者或监管者的行政级别（城镇所有制及村所有制）不同，可以分为不同类别。在乡镇企业这一大类中既有集体企业，又有私营企业，甚至还有外资或合资企业（尤其是在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各种所有制在乡镇企业中的比例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绝大多数乡镇企业是由当地干部监管甚至以经营者身份来领导的乡镇集体所有制经济实体，此为一种极端。另一极端是，有人认为绝大部分所谓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名不符实，实质上只是挂集体牌子的私营企业，这样做的目的是便于获得政治保护和银行贷款及其他资源。也有一些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将经营管理权承包给个人，再从私人或国外获得投资，从而使得情况更为复杂。

然而，改革后乡镇企业工人的生活与毛泽东时代在村办企业中工作的农民无疑已经大不相同。人们不再致力于增加非农就业，而是恰恰相反。乡村的领导人努力尽快创办和发展当地企业，即使这意味着企业或田里需要雇用外来的劳动力。工分及生产队随着非集体化趋势而告终，乡镇企业中的工人一般能获得现金奖励，通常是采用计件工资的形式。他们大多没有额外的福利、住房或津贴。虽然据说有些企业会暂时缩减生产或停产，以使工人在农忙时可以回家帮助收割，但乡镇企业工人通常已明显地是无产

^①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94。

者而非耕作者了。

现在有很多文献对乡镇企业的工作条件进行过这样那样的描述 如家长式的统治、恶劣的工作条件等等。在由村干部监管、完全雇用当地居民的真正集体企业中，由于当地社会及政治错综复杂，限制了企业管理者专横地对待或虐待工人。在私有制或私人管理的企业中 尤其是那些雇用外村劳动力的企业中 情况就要糟糕得多。1994 年中国通过了《劳动法》这一法律于 1995 年生效，它对每周最长劳动时间、最长加班时间、最低工资、加班费及其他许多具体事项作了规定。通过起草阶段的大量研讨，劳动法中关于工作条件的规定适用于所有企业，包括那些雇用农村户口的耕作者为工人的企业。然而 现有的迹象表明 这些规定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工资极低，一天工作 12 个小时或更长，一周工作 7 天，加班不给任何加班费是常有的事。在没有任何劳动保护的情况下 简陋的劳动条件和极其有限的安全设备 使企业有利可图。工人因工伤而被他人替换、工人工资被克扣及解雇的现象也很普遍。多数此类企业中，甚至没有一个工会组织或党支部为工人的利益提供一点点保护 相反的是 管理者不受限制地剥削工人 只要他们认为这对增加企业利润有利。

时下有人认为乡镇企业的竞争力大大强于国有企业，原因之一 是乡镇企业能最大限度地剥削工人，从而将工资及福利支出控制在最低限度，这是国有企业无法与之相比的。低下的工作条件常引发乡镇企业工人对一些最为明显的虐待行为的抗议。然而，有两个关键因素削弱了乡镇企业工人要求改善工作条件的力量：一是地方政府大力强调引进新的投资，增加了当地乡镇企业的赢

利；二是存在着的失业大军——其他农村劳动力，他们可以随时补充到乡镇企业中来。所以大多数农民为脱离辛苦的农田劳动，宁愿接受恶劣的企业劳动条件。^①

另一类新的（或恢复的）就业形式与城市私营工业企业有关。起初，城市的大多数私人雇佣出现在一些规模很小的经营单位中，典型地说仅是一些个体户。然而到了 1980 年代中期 此类小企业不断扩张，一些国有企业的雇员也开始纷纷离开或辞职下海经商。这些趋势使中型、甚至大型私营企业的数量不断增加。到 1980 年代末 官方制订法规使这些私营企业合法化 并取消了原来只能雇用 7—8 个雇员的规定。根据官方数据，1992 年城市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从 1979 年的 32 万增加到 840 万人。^② 然而 这一数字看起来是被严重低估了，因为为了得到政治上的保护及资源获得方面的便利，城市或农村的私营企业常常是以集体企业的身份登记的；而且此类企业雇用的农村流动人口在官方统计中常常是忽略不计的。所以，1992 年中国城市私营经济的就业规模要比上述数据大得多 其真实数字大约在 3 600—6 000 万之间。

较不明了的是产业工人在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城市私营企业的经营活动主要集中在商业及服务业，只有少数是制造业。然而即使制造业仅占总数的一小部分，城市私营企业中的工人仍是当前中国工人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① Ching-kwan Lee, "Production Politics and Labour Identities: Migrant Worker in South China", in Kin, Pepper, and Tsui Kai Yuen, eds., *China Review* 1995.

^② Lora Sabin, "New Bosses in the Workers' State: The Growth of Non-State Sector Employment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No. 140(December 1994): 946.

很难评价工人在城市私营企业中的待遇，因为这其中有很大的差别。改革初，私营企业雇员的工资、地位都很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项都在上升，以至到 1990 年代，私营企业雇员的工资水平已经超过了仍在国有、集体企业工作的工人。一些大型的、成功的私营企业已经开始向其职工提供类似于国有企业的一系列附加福利，虽然几乎还没有私营企业能提供住房。国家还鼓励私营企业主要雇用城市居民，但这一政策似乎并不受到重视。调查显示，城市私营企业雇员的 70 - 75% 来自农村的外来人口。^①由于企业的市场地位、农村外来人口所占的比例、企业是否与国有企业有承包合同等因素的不同，工人在这些企业中的待遇也不大相同。尽管他们的待遇有很大的差别，但似乎城市私营企业工人的待遇大大好于乡镇企业，有时甚至好于国有企业。

另一种主要的“新型”工业就业类型是外资及合资企业的就业。从就业方面看，其规模相对较小。据官方统计，1992 年有 280 万人受雇于外资及合资企业。工人在这类企业中的待遇的主要区别并不在于该企业是由外国投资者建立还是与现有企业（通常是国有企业）合作共同建立，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公司的投资究竟是来自西方资本还是亚洲资本。总的来说，在由西方资本建立的独资及合资企业中，工人的待遇比国有及集体企业好一些。在由来自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或韩国的资本建立的企业中，工人的待遇要差得多，也许比乡镇企业中工人的待遇还差。

^① See the discussion in Sabin, “New Bosses in the Workers’ State”, and in Dorothy Solinger,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Enters Urban Labor Markets”.

现有的解释是，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往往会将本国社会的许多传统工业文化带入他们在中国建立的企业，包括规范工人待遇的法规等。就合资企业而言，西方经理们也非常愿意遵守中国的劳动法规，为的是不给他们与工人及中国的合资伙伴之间的冲突提供托词。结果是那里的工资水平通常高于附加福利相当好的同类国有企业。同时，党组织和工会所起的作用也没有国有企业那么有力，国有企业传统文化中的其他特征也被淡化了。在这类企业中，对工人有一套规范的更注重知识能力的升迁程序。因此，到外资、合资企业就业成为其他企业工人所渴望的“美差”。有人也许会争辩说，西方企业在中国投资的原因（如为了进入中国市场，为节约劳动力成本）并不需要管理者为企业的成功过于粗暴地剥削工人。

相比而言，由香港、台湾及韩国投资者建立的规模较小、劳动力较为密集的企业中，虐待工人的情况与上述乡镇企业中的情况近乎相同，有的甚至更为严重。在这些资本家所处的社会中，工会组织或国家对如何对待工人几乎没作什么规定。此外，他们还想尽力节约已经比西方社会低得多的劳动力成本。有关这些企业工作状况的一些报导，描述过那里的工作制度严厉苛刻，劳动时间长，工人受虐待，常被专横无礼地解雇，事故频繁。此外还有一些其他问题。资方往往对工人行为的各个方面，包括着装、上洗手间的时间、因病或因家事请假的程序作了众多复杂的规定，制订了详细的处罚条例，编印成册，强制执行。中国官方及工会媒体经常报导此类虐待行径，还报道了一些政府部门想改变这种状况、并改善这些企业工人工作条件的努力。然而，出于要吸引

更多外资的考虑，出于与香港、台湾和韩国有关的一些政治目的方面的考虑，改善工人工作状况的问题似乎还未被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

这种不平衡的一个例子是 1993 年官方发动了一场在外资企业中建立工会组织的运动(那时据说仅有 20% 的外资企业有工会组织)但是由于只为了仓促地达到一些较低的目的使所建立的绝大多数工会完全被公司的资方所控制。结果，即使是官方的工会也根本不关心工人的福利。

总之 经济改革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非国有、非集体工业企业的内部及企业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一个极端是有些企业中工人的待遇大大差于国有企业；另一极端是有些企业中工人的待遇大大好于国有或其他私有企业。

国有及集体企业改革

改革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型工业企业可以有好几种方法。一种方法是把这些庞然大物看作不可救药，尽力将其出售给私人或外国投资者 或者干脆关闭 同时扶持新的私营企业及企业家。总的说来，这种方法在许多东欧国家被采用过。第二种方法是主要为了政治上的原因而继续经营国有企业——为的是避免由于过多的工人失业而引发可能的不稳定。在这种战略下，国有企业几乎不再雇用新工人 让企业随着工人退休或离开企业去新的、更有活力的经济部门而渐渐萎缩。这第二种方法是以俄罗斯 1994 年的一

些最初经验为特征的，该方法同样也过于简单化了。第三种方法也是较为乐观的方法 就是保留社会主义企业 甚至允许它们继续扩张，同时日益促使它们与经济中的准资本主义部分竞争。如此说来，中国很显然采用的是第三种方法。国有及城市集体企业的就业继续增加，虽然不如非国有企业的就业增长得快。

有必要考虑一下国有及集体企业改革的第三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4 年 着重在工业企业中取消除“文革”中一些做法 第二阶段，1984~1992 年，日益要求企业在市场化的外部环境中经营 面对内部改革仅仅是做了不少试点 第三阶段 即 1992 年至今，开始进行这些企业中内部劳动制度的重大改革。

1978~1984 年期间 肃清“文革”在国有集体企业中的遗留问题的努力最初集中在报酬问题上。对物质刺激的禁令被解除了，各种奖金及计件工资制开始实施 其中许多是恢复了 1966 年前的做法。1957年后对工资的冻结也被解除，进行了大规模的加薪提级。也许是鉴于东欧事件，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了消费者受挫折带来的潜在政治威胁 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缓解城市住房、食品及消费品的短缺。由于这些措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才有可能在 1980 年代后期大大缩减城市生活必需品的配给范围。

虽然对打破工人及雇主的“铁饭碗”的必要性有过很多的讨论 但打破城市居民 包括城市工人 的各种就业保障制度的改革都未真正进行。顶替制在 1983 年就正式结束了 但企业仍需解决对企业有价值的雇员的家属就业问题，这使企业继续陷入由亲属关系所构筑的复杂网络中。虽然尝试进行过削减固定工资，增加业绩工资这种新的报酬制度，但并没有被普遍采纳。在那个时代，

奖金是被一视同仁、平均分配的 而不是严格地根据企业或个人的业绩来确定。

要求所有职工平均分享拖延已久的增加工资的呼声，使管理层在奖金方面很难对职工区别对待。国有甚至许多集体企业的“预算软约束”使这些企业能继续获得财政拨款 其浪费行径也不会受到处罚。同样，对于扩大企业用人自主权及规范破产程序的必要性也有过许多讨论 但除一些试点企业外 其他企业在这些方面并没有改观。这些被提出的变革在上层政界所引起的争论以及工人对这些变革的强烈反对，使人们怀疑根本性的改革是否真正能够在国有企业实施。

1984 年开始对城市经济展开了更系统化的改革。正如前面所指出的，1984 年以后改革的重点是使企业而不是使个人适应更全面市场化的环境。现有企业在国家计划体制外被赋予了更多的自主经营权，一些国有企业尝试将企业的管理权承包给私营企业家，增加企业利润使他们个人能够致富。企业若能成功地发现新市场，获取资源增加生产来满足新市场的需求，就能保留部分利润用于内部开支及职工福利。更为重要的是，管理层的报酬，尤其是奖金越来越取决于企业利润的增加。有些企业成功地与外国企业合资，合资企业的成功经营又产生了可以用于内部开支的资金。尽管如此，现存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仍然很松，企业依旧很容易从银行获得贷款来弥补亏损。由于大多数企业仍在低效经营 几经拖延 最后终于通过的《破产法》（1987 年）几乎未见成效。1986 年开始实施国有及集体企业以劳动合同制为基础的新就业制度，该制度的实施形式表明，原有职工能够保留全套的保

障及福利，他们的铁饭碗不会被立即打破，而将持续很长时间直至慢慢消失；只有新雇佣的职工才会有风险和压力。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需要几十年的时间，等现有的工人都退休了，才能使这种旧的、享有特权的国企工人最终消失。事实上，新的合同制从一开始就看似会成为一种形式。如果所有新雇员的合同期为固定的三至五年，但到了第一个合同期末，不管企业与雇员的业绩如何，几乎所有人又会被重新雇用，这样，铁饭碗只会受到一点点的损伤。

在内部经营中，大多数国有企业仍旧更多地是从提供就业及福利的角度，而不是严格地从以业绩为基础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义务。所增加的用于鼓励工人的很大一部分资金用在了住房及集体福利方面（如卫生保健、娱乐设施等）而不是用于奖励个人。虽然这段时间不断有报导说国有企业工人下岗，但经理们通常还是不愿彻底解雇工人。这些下岗工人常常在很长时间内还能拿到部分工资，或者在企业下属的‘劳动服务公司’或其他分支机构重新就业。而且，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总的模式是企业还要增加新的雇员，而不是裁员。因此，这两种自相矛盾的趋势，使基本适应新的市场需求的国有及集体企业在打破城市工人就业保障的铁饭碗方面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在工人思想及个人生活方面放松政治控制，强调单位在缓解工人长期物质匮乏状况方面负有家长式的责任，这使工人更有能力争取好的待遇，而不管企业的效益如何。一项以 514 个国有企业为样本的研究，提到了工人的奖金从 1986 年的 20% 增加到 1992 年的 27% 这一事实，并将这种增加归功于工人讨价还价能力

的提高。^①

1992 年以前，在中国的城市经济中，由私营及外资企业提供的就业量仍相对较少，国有及集体企业依旧占统治地位。虽然在城市消费、甚至文化领域市场交换日益占支配地位，但是城市居民很少处在被彻底改革、劳动力市场化的环境中。而在非城市地区，改革的影响更为彻底，乡镇企业的工人甚至没有一只“泥饭碗”可供他们依靠。

这种城乡对照产生了发展中国家不同社会团体间观念差异的一种奇怪逆转。在我研究的其他国家中，城市居民，尤其是那些在城市工厂中就业的人，往往比农村居民更具“现代观念”。他们具有较强的个人效率感，更相信通过个人努力可以取得成功，对新经验更为开放，更相信用科学解决问题等等。然而，1990 年我对天津城乡地区的调查发现，农村居民，尤其是那些在农村工业企业中就业的人，在这些方面更具现代意识。城市居民，主要是那些在国有企业工作的人，在观念上却落后得多，他们更为宿命，认为自己没有能力通过努力去获得成功，对新的经验持怀疑态度。这些调查发现表明，1980 年代的改革并没有改变大多数城市居民，包括城市工人的制度环境。

此外，1980 年代末在许多中国城市进行的一系列调查表明，城市居民总体上，尤其是城市工人对 1980 年代改革的心理反应和

^① Athar Hussain and Juzhong Zhuang, “Impact of Reforms on Wage and Employment Determination in Chinese State Enterprises, 1986~1991”, Dited in Margaret Maurefazio, “Labor Reform in China: Crossing the River by Feeling the Stones”,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37, No. 4 (1995): 111-123.

不满是值得注意的动向。在被调查者中，认为改革进展得过快的人从 1987 年 5 月的 27% 上升到 1989 年 5 月的 65% 认为改革的步子恰到好处的人从 49% 下降到 18%。^①虽然到 1989 年大多数城市工人的铁饭碗似乎依然完好无损，但对取消现存工作保障的广泛公开试点以及日益严重的通胀使工人对改革的不满黯然滋生，有些工人认为改革的步子迈得太大、走得太远了。

1992 年开始全面展开了国有及集体企业的第三阶段改革。虽然这一阶段的发动常与当年年初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联系在一起，但在中国改革领导人给一些创新开绿灯之前，有些举措已开始实施，已开始下决心最终打破铁饭碗。这些努力是否成功一直是国外观察家经常争论的话题。与前面的预言相同，一些分析家声称 1993~1994 年的国有企业改革由于地方的抵制而陷于停顿。其他人包括那些长期持怀疑态度的人，日益相信过去国有企业工人所享有的“城市公共物品制度”已最终开始被取消。1997 年党的十五大赋予国有企业总体改革新的动力，但同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却进一步增加了国有企业的竞争压力。

随着世纪末的到来，国有部门就业、保障制度的结构因素在加速消除。虽然我在上面说过，劳动合同制度的分阶段实施将需一代或更长的时间，但认为 1980 年代中期以前开始就业的人能终生就业的假设已不再成立。虽然到 1994 年 12 月为止，国有单位的工人和雇员只有 26% 是合同制的，集体单位职工只有 20% 是合同

^① Wenfang Tang and William L. Parish, “Social Reaction to Reform in Urban China”,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43, No. 6(1996): 35-47.

制的 但有来自中国的消息称 到 1996 年 5 月 合同制工人的数量已上升到了 80% 并预测到年末将 100% 地转为为有限期合同工。然而 中国的另一来源显示 到 1996 年 6 月城市合同工人的数字仅上升至 36%。^① 面对这种统计上的混乱, 将终身雇用的工人转变为合同制工人的进度和广度仍不甚明了。

最近几年中 已出台了一些新的官方政策 给予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更大的自主权, 他们可以不通过劳动部门或监管部门的批准自行雇用及解雇工人 而个人主动获取工作、辞职或调换工作的能力也大大加强, 大学毕业生由国家分配工作的制度也已缩小到一个很小的范围(主要针对那些自己找不到工作的学生), 同时 企业也日益难以拒绝职工调换工作, 已有报导说国有企业用提高工资、增加福利来留住人才。初步的研究表明 这些变化已开始削弱长期以来作为中国企业之特征的劳动力的非流动性。年轻的劳动者已开始形成这样的观念, 即一个人的第一份工作不太可能是一个人的最后一份工作。

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或在私营企业或在外企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 他们从国有或集体企业转入这些部门 从而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被补充到国有及集体企业中。在毛泽东时代, 国有企业雇用的少数来自农村的临时工大多干一些零散的、较脏、较为低下的工作。与此形成对照的是 到 1990 年代 越来越多的农村工人与他们城里的同事们在车床及织机旁一同劳动。这种趋势的出现是

^① 中国新闻社电讯 (Zhongguo Xinwen She news bulletin) 北京, 1996 年 7 月 31 日。

由于某些工厂(如纺织厂)越来越难以在城市中找到工人,因为这些工作既脏、地位又低,不受欢迎。在一些城市及一些部门(尤其是在纺织业中)农村工占了工厂工人的 50%,而在 1995 年他们在国企中所占的总体比例仅为 5%。

1991 年国务院决议规定这些农村合同工应获得与城市工人同等的待遇。然而,由于实际上来自农村的工人的工资及附加福利仍低于他们城市出生的同事,因此有理由相信,在改革追求利润的压力下,一些企业会让城市工人下岗,取而代之以来自农村的廉价工人。此行为的一种变相是城市国有企业缩减生产、解雇工人,而将生产承包给某一乡镇企业。1993 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称国有企业已经“爱上了”农村劳动力,这是对上述行为的一种形象化的说法。^①很显然,1990 年代国有企业工人下岗的步子已经加快。据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统计,1994 年上海、重庆、沈阳的国有企业职工有 17—28%已经下岗,只拿部分的补贴工资,没有奖金,福利减少。其结果使 1996 年城市工业领域的就业有所下降。这究竟是暂时的现象还是长期的现象,还有待于观察。^②

改革正在转变国有及集体企业工人的工资制度及福利待遇。国家给予企业管理者极大的自主权来试验及实施新的工资制度。虽然企业间的巨大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难以统一,但过去占主导地位的那种固定的月工资加奖金的制度将变得不那么普遍。一种

^① 《人民日报》,1993 年 7 月 17 日。

^② Maurer-Fazio, “Labor Reform in China”, p. 7.

替代是计件工资制 有时以不断修改 也即增加 配额作为补充 以刺激个人生产率的提高。一种更为通用的制度是采用复杂的、准“科学管理”的点数方案来确定工资与奖金 点数的评估完全由管理层进行 另一种由此演变而来的制度被叫做“模糊工资”制 即由管理者来决定每个人的工资水平，而每个工人禁止将自己的工资数透露给同事，而在透明的制度下每个工人都知道别人的工资数。这一制度比旧制度应该更能激发生产率，但会激起工人之间的怨恨与不信任。

新一轮的改革还正在改变奖金、津贴及福利的分配方式。据统计 到 1990 年代中期 国有企业职工得到的津贴、福利和奖金大致与他们的工资相当。由于它们也往往是平均发放的，因此仅仅靠改革工资制度所产生的激励作用是很弱的。新的改革的另一个重要考虑是 人们已经意识到给职工 包括退休职工提供如此多的福利及津贴，会给企业造成沉重的压力和负担，这正是大量 40% 甚至更多) 的国有企业连年亏损的重要原因。正是出于这些考虑，才尽力减少工人(以及其他城市职工 享有的福利 有些福利要求部分收费或增加收费 如医疗及住房)津贴与奖金根据业绩发放，而不是平均发放。^①

除胡萝卜外还有大棒——即针对工人的一系列措施，如实施罚款和扣工资制度。在一些见于报端的例子中，是否参加政治会议、储藏柜是否整洁、午餐袋的携带是否符合规定等 都会对获得

^① Solinger, “China’s Urban Transient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and in Davis, “Urban Catch-up”.

报酬的多少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厂方对管理者每月所收缴的罚金数还规定了数额。此外，他们还可保留一定比例的罚金 或到确定自己的奖金时 将为收缴罚金所付出的努力计算在内。有时，一个工人在月末可能倒欠工厂的钱。因此，有分析家认为，改革后的奖励制度并不是完全 甚至并不是主要为了刺激生产率而设计的，而是用来调整劳资双方力量的均衡。在一些此类改革得以彻底实施的地方，管理者似乎已经达到了他们预期的效果，让工人感觉到他们的行为要受制于严格的、专断的管理与控制。

虽然还不能确定国有企业新阶段改革的彻底性，但似乎毫无疑问的是铁饭碗已被大大削弱，即使还没有被打碎。虽然在工厂中这些改革明显地不受欢迎，但工人们还是要面对工作保障、工资水平、福利等方面新的不确定性及竞争。

由于上述改变，以及由于一些国有企业工人离开去外资企业或私营企业工作，而由农民工替代他们原先的工作，不同类型企业工人在待遇方面的差别明显缩小了。随着国有企业工人特权的消失，出现了某些趋同现象。然而完全的趋同即使会出现，也是在遥远的将来。在大多数国有企业以及由西方资本建立起来的外资企业中，工人的待遇仍好于其他类型的企业。

工人的不满情绪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

自 1978 年以来，政策的宽松、外国的投资及惊人的经济增长率，使中国工人阶级的数量有了急剧增加。正如前面指出的，这

一扩张发生在整个国有、集体、乡镇企业及外资企业，尤其是后几类企业中。值得注意的是，大约到 1992 年中国农村工业中的就业量大致达到了国有工业及城镇集体工业企业的就业水平，预计农村中无产阶级的人数会急剧增加，使其在数量上超过城市无产者。

虽然不同的企业内部及企业之间工人的待遇差距很大，但与毛泽东时代相比，普通工人的特权大大减少，就业风险增加。最重要的是在那些激增的新兴或重新恢复的企业中，工人的报酬和待遇与国有企业的工人相比要差。有些工人所受专横对待与被剥削的程度似乎不亚于其他国家旧时代所记载的最为糟糕的体制下的情况。第二阶段的改革涉及到减少国有企业工人的特权。这种减少同时也是第一阶段改革的结果，因为国有企业不得不适应来自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乡镇企业的竞争。虽然 1978 年以来总体工资的增加也有工人的一份，然而总的来说，上面所回顾的迹象证实了一个普遍认同的结论：工人是改革的主要“失利者”。在大多数公众的言论中已经不再称无产阶级为领导阶级了。

中国工人还未能接受自 1978 年以来他们地位悄悄下降的事实。有关资料表明，工业领域的许多冲突正在上升。据报道，针对管理层的个人抱怨，集体请愿、怠工、罢工（1992 年后，罢工自由被宪法取消），毁损财产行为及其他极端行为在近几年中大量出现。国家已经对此作出反应，建立了各级劳动争端调停委员会，在 1994 年又通过新的《劳动法》提倡进行集体协商。然而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国家保护工人的法律规定常被忽视或违背，尤其是在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及外资企业。因此，这些措施并未能

抵消工人在这方面越来越深的感觉，即他们没有一个有效的制度渠道来申诉他们受到不公正待遇时的不满。由于 1992 年以后企业改革在国有企业内部更为全面地展开，这种冲突的可能性还可能增加。

这种日益增强的不满是否表明在将来某个时候，中国工人阶级将对这一体制构成严重的政治威胁？工人地位的下降以及各种类型的企业间条件的趋同是否意味着将来中国可能发生一场工人团结联合起来的运动？虽然对这些猜想很难有明确的回答，但有几条理由使我们难以相信会出现这种事态发展。

最明显的一点是，那些被许多观察家们预言为不会进行的重大的变革正在推进，尤其是打破国有企业的铁饭碗事实上已经在实行。虽然工业企业中的冲突不断增加，但大多数新的改革在进行时没有大张旗鼓，也没有遇到有力的抵制。根据报道，在实施改革的企业中存在着普遍的不满，但对改革总体上是服从的。在工人条件最差的那些国有企业中，由于工人有选择“离开”的自由以及失业大军的存在，未能使工人对不公正待遇的抗议行为上升为反对公司的总动员，更不用说反对国家了。从这方面看，工业领域中这种冲突的上升也许并不预示着一种未来政治上的挑战，反倒表明中国正在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从几十年中工人抗议被看成非法而受到压制，到容忍这些抗议并想办法解决问题，这也许是一种健康的趋势。

认为工人的不满不一定会带来政治上不稳定的另一原因是考虑到中国目前无产阶级的结构特征。即使各种企业的工人最终会趋于一致，但目前中国无产者的主要特征还是多样化的。现在他

们中的农村无产者与城市无产者一样多，甚至城市工厂的工人也有一部分来自农村。新招工的比例越来越大，同时下岗的数目也巨大。小型企业增加的速度比大企业快，企业间的工资福利制度差别很大，管理方式也有很大差异，许多国有企业的方式不相类似。总之，目前中国工人的状况差距很大，有些工人的状况令人羡慕，有些却处于困难境地。

中国无产者内部复杂性的增加意味着什么，对此尚有争议。伊丽莎白·佩里 (Elizabeth Perry) 认为，这种工人阶级的内部差异应被看成是冲突的根源，而非稳定的根源。^①虽然这一分析是正确的，但是这些冲突并不是非常激烈，仍是可以控制的。合同工对非合同工的不满，来自农村的工人对城市出生工人的不满，来自一个地方的工人对其他地方工人的不满，甚至工人对管理层的不满，并不能简单地转化为工人对国家的共同不满。虽然大多数中国工人的境况不佳，但改革时期所发生的变化减少了他们行动起来有力挑战现行体制的可能性。

然而，如果我们不以波兰，而以前苏联或其他东欧国家作为比较的标准，我们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虽然在中国，工人全体动员起来反对国家的可能性很小，但在 1989~1991 年东欧体制崩溃前，我们看到的是与此同样的工人不断升级的不满。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在面临危机时不再能够很容易地从工人那里获得支持。相反，他们要担忧是否能够继续控制日益不满情绪的蔓延。此外，若中国的政治家们再次分裂，保守派也不太可能会谴责对工人的剥

^① Perry, "Labor's Battle for Political Space".

削，以试图赢得工人对他们的支持。如果是那样的话，工人在决定中国的政治未来方面可能起到中心作用。

（杨海红 译）

中国的人口流动

苏 黛 瑞

编者按 苏黛瑞 (Dorothy J. Solinger), 1975 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86 年起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政治学助理教授兼亚洲研究协会中国和南亚理事会主席 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政治社会学院教授。著有《十年动乱中云南的政治：精英们的派性战略和中央—地方关系》、《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策制订的过程》、《1983 年 5 月武汉的“临时居住证”规定》等。1999 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中国都市的市民 农民工、国家与市场的逻辑》。

1980年代初以来，社会主义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入，使原来曾主宰经济活动的国家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发生了转型 朝着相对自由的市场化方向发展 这样 随之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现象 僵硬的围墙打破了 旧的对抗力量消失了 但是不同体制之间的冲突却发展了。这种现象可能发生在某些地区、某些部门或某些行业。中国历来对社会各阶层有清晰的划分，但现在那些

原有的界线变得模糊了 而一些新的群体业已出现 如“流动人口”的出现 就给当今社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体制已对看上去不可动摇的政治体制带来一种挑战，例如，在中国实施多年的城市户籍制度将受到冲击，国家及其统治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弱化。这种潜在的重大变革，尤其明显地表现在具有国家认可的正式户口的城市居民与那些滞留于城市却没有户口的民工——“流动人口”之间的关系上。

为了阐明有关问题的特征和重要性，本文从改革之前的情况入手 剖析有关政策和实践方面的变化 然后揭示市场与国家之间关系所发生的转型。本文认为 如果对这些流动人口放任不管 预计他们在未来将可能与国家关系发生某种疏离，并削弱政府的权威，除非国家把流动人口平等地纳入市政管理体系之中。目前的情况是在城市中出现了两种相互游离的社会阶层，一种是作为国家利益的直接受益者的城市居民及其官员，另一种是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①

改革之前的政策

1950年代中期，中国消灭了资产阶级，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和资源，市场经济基本上被取消，全部生产要素转由国家所有，并由国家指令进行配置。这一过程完成之后，政府又将各种人口

^① Aljjandro Portess and Jaex Stepick, *City on the Edge: The Transformation of Mianm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 8, 210, 213.

纳入一种体系，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为城市人口，另一部分为农村人口。每个人同是国家公民，却被贴上了不同的标签：到 1955 年底，每一个中国人不是拥有城市“户口”，便是归属农村“户口”。

在这之后的十来年时间内，城市地区的人口被束缚在居委会或工作单位，农村地区的人口被束缚在人民公社，这些社团严格地管制着人们，使得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自己的固定位置。1950 年代后期，中国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国家通过对城市家庭实行优先粮食供应的措施，对城乡两部分人口进行明晰的分类，甚至在地图上可以清楚地辨认出一个人究竟是属于“城市”还是“农村”。到了 1960 年代初，每个人都被牢牢地安顿在自己应有的位置上，城市四周也仿佛矗立起既厚又硬的围墙，从此把“农民”与“城市人”阻隔得泾渭分明。城市里的劳动者被称为“工人”，而农村里的劳动者则被称为“农民”，且农民的劳动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轻视。

1950 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经济，政府推行的是如一位学者所称的“循环资源分配体系”^①，即将生产能力较强的沿海地区尤其是上海等地所产生的利润，重新分配给相对落后但资源较为丰富的内地省份。这些省份以天然资源回报给沿海地区，使轻工业地区与重工业地区资源效益互补。这些相互矛盾的部分被联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一体化系统，然后国家通过行政指令来指导

^① Dali L. Yang, “Reforms, Resources, and Regional Cleavag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ast-Interior Relations in Mainland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igration and Floating, Cologne, Germany, May 2-4, 1996, p. 5-6.

资源的配置、资金的使用以及人事的安排等。在这种情况下 甚至连每个人的流动也必须是按计划的、由上级领导指定的。在六、七十年代出现的一些集体迁移，事实上是服从于国家某种目的的行政行为。

中国花了十来年时间形成了一整套治理国家的方针政策，这一系列措施几乎把每个人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不得在市场上自行流动。一方面，城镇居民可以明正言顺地享受国家力所能及的供应和补贴 另一方面 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理所当然地控制城镇居民的行为举止。外来人口未经政府许可 难以进入城市 但文化大革命高峰时期的大串联是例外)国家对城市的绝对控制是不可动摇的。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经济改革伊始。

改革时期的政策

1978 年后 随着市场的开放 各方面的政策障碍开始解冻，一些农村人口尝试着向城市流动。由于农村改革在全国范围展开，政府放宽了人口流动的有关政策，1983 年 4 月份 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城镇劳动力合理流动的规定”允许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市场。于是，农民尽管没有摆脱农村户口，但却拥有了进城的权利。在城镇 进城的农民不像城镇的“正式居民”那样 可以享受国家的定量粮食供应 他们必须自备口粮。

到 1984 年 10 月 国家又出台了一个更为宽松的政策，“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城和居住问题的通知”为农民提供了脱离农村的机会。农民们抓住这个机会 大量的农民“涌入城镇市场”。这些有

关政策虽然改变了国家以往对待农民的态度，但有它的局限性，因为这些政策有利于那些出得起路费、备得起口粮、并能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找到立足之地的农民，而无助于那些在农村兴办企业或在农村企业中就业的劳动者。

1985年7月，中国公安部发布了一个新的“关于城市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即由公安部门负责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这一步骤的最重要意义，也许就是国家已经承认农民进城生活这个客观事实，同时也默认农民出现在城市的所有地点的合法化。这个文件规定，农民进城工作时间在三个月以上者，必须办理在城市的“暂住证”。

1986年，粮食的议价销售在城市成为合法。于是，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可以在市场上买到口粮，这使得农民有条件在城市长期逗留下去。事实上，国家已经认可了来自农村人口在城市里临时安家的权利，然而，国家对流动人口的物质福利条件不承担任何责任。同时，政府加强了对公民的身份证的登记和管理，有关规定要求每个年满16岁的人应办理个人身份证。

1988年，国务院和劳动部发出通知，允许农村人口外出务工，并鼓励经济落后省份的劳动力“输出”。这个通知以及其他的经济改革措施，确定了人口流动的合法性。随着市场行为的出现和国家政策的许可，人口流动便日益增多。

在1989年和1991年，国务院颁布了有关国营企业中临时工管理的条例，条例规定企业可以直接与工人本人签订合同，然后报请当地劳动部门批准备案。国营企业不断招聘民工，自1978年到1987年近十年时间里，已有1000多万民工通过合法手续获得城

市的工作。^①由于统计不尽全面，事实上，在城市获取工作的实际人数远不止于此。

很明显，经济改革开始之后的最初十年，政策导向愈来愈开放。在这种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国家认识到有关决策所带来的发展，与此同时，一旦这些决策开始运作，所产生的市场力量也不是可以轻易阻挡的。然而，政策虽然愈来愈宽松，但国家领导人仍要求监管和规范人口的流动，而且流入城市的农民被视为临时居民。有关的政策定位，决定了农民的地位，在城市中生存的农民只能作为流动民工，非永久性的外来者，国家似乎也不必为此承担过多的责任和财政开支。

除了以上这些政策之外，其他一些经济改革方针和措施，比如农村人民公社宣告解体，优先开放沿海地区，鼓励城市企业创造利润，扩大城市劳动力市场等，也为农民放弃土地进城谋生创造了条件。所有这些政策，使得原来受国家控制的城市人口迅猛增加：在十多年时间里，大城市中的外来农民在1984年平均占12.6%，1987年平均占22.5%，1994年平均占25.4%。随着流动人口的成倍增加，那堵曾经把农民悬隔在城市之外的坚固围墙便自然而然地被冲垮了。

这些相关的经济改革政策，在推动农民进城生活和工作方面，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国家把市场经济合法化，许多经济

^① Jeffrey R. Taylor, "Rural Employment Trends and the Legacy of Surplus Labour", 1978~1986, *CQ*, No. 116 (December 1988): 743.

^② Cheng Li, "Surplus Rural Laborers and Internal Migration in China: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s". *AS* 36, No. 11 (1996): 1122 - 1148.

改革措施为农村外来者在城市落脚提供了多种机会，使得农民在城市生存成为可能。其次，民工的低报酬和灵活性，正好满足劳动力市场的一些迫切需求。

1980年之后的新的财政政策规定，地方政府可以留成一部分税收自行安排，企业可以提成一部分生产利润和自行决定用工制度。这时，建筑业的兴盛需要大量的额外劳动力。据班尼斯特（Judith Banister）统计，从1978年到1988年，全国招收的非农劳动力每年只以6%的速度增加。^①在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地从业的建筑工人增加2.3倍，但来自城市的工人只从1981年的1665万增加到1820万，增长了9%，其余的工人均是外来民工构成。^②

城市不仅就业机会在增多，而且城市人口的择业观念的变化也产生一定的影响。自1978年以来，劳动部放宽了原来的招工制度，于是城市的年轻人也不必被迫等待当地劳动部门的工作分配，他们可以自主择业。随着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国家吸引了许多外商来华投资办企业，城市青年可以找到一些新的就业机会，比如，旅游和外贸等时髦的行业。这些行业毕竟不同于纺织、机械和建材等传统行业。正如有文章指出的：“城市人宁可待业也不肯从事那些诸如挖沟、筑路和修桥之类的工作”。城市人的这种择业态度，自然为民工进城腾出了许多劳动机会。

^① Judith Banister, “China’s Population Changes and the Economy”, in U. S. Con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hina’s Economic Dilemmas in the 1990s: The Problems of Reforms, Moderniza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vol. 1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1), p. 235.

^② 北京市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八大城市的流动人口问题研究报告”，《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3期，第22页。

1979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上山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开始返城。这年夏天，经济顾问薛暮桥建议，为减轻国家安置就业的压力，返城青年可以自筹资金兴办企业。1980年夏天，中共中央认可了城市计划之外的用工制度，这为私营企业奠定了基础。农民兴办的私人企业便随之兴起。

另一个原因应归结为政府官员对待商业的态度的急剧转变。城市中的商业和服务业被遏制了25年，但在1978年后，一旦使之合法化，便引起城市几十年未见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满足了城市对新鲜食物的潜在需要，而且还满足了城市对其他多种服务的需求。

对于农村人口的流动，国家的有关政策起了很大的诱导作用，人口的流动使得经济比较落后的内陆省份的农村劳动力流向东部沿海城市。自1980年开始，国家开放了东部沿海城市，开放政策为吸引外资，尤其是香港和台湾的投资者，提供优惠条件。这使沿海城市得到优先发展，富裕的一代迅速崛起，同时也造成了人口流动的巨大浪潮。

毛泽东时代以后的领导层，有效地推行市场经济政策，也使以往的农民得益，使他们可以离开土地去谋求更好的出路。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抗争，填平原来横亘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沟壑。如今，农村人可以和城市人一起自由地漫步在同一条大街上，去同一个场所用餐，并共同分享城市的建筑和设施。但不无遗憾的是，人们仍然把那些在城市建筑工地或工厂里干活的人，称为“农民工”。至今，虽然不同地区的农民收入差距悬殊，但不管怎样，当前的政策总能为内陆的农民提供一种前往东部沿海地区生存和工作的机

遇。

至此 我们不能不看到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大量农村人口进城所反映出的各种矛盾冲突，以及从前遗留下来的一些根深蒂固的思想障碍。

体 制 冲 突

经济改革一方面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分配结构，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两种体制之间的相互冲突。也就是说，新的市场经济制度为农民提供了自谋生路的自主权，他们可以摆脱土地的束缚离开农村 但这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沿袭几十年的‘户口’制度发生了矛盾。流动人口在两种体制的夹缝之间求得生存：他们带着农村的特征来到城市地区和劳动力市场，削弱了原有城市的排外性质。由于政策上的许可 农民可以在城市长期居住 从而改变了中国已经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城市人口格局 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是 流动人口改变了城市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以及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流动人口与劳动力市场

在改革伊始，农民是通过与城市中的国家企业的合同关系进城的 他们或成为国营工厂的临时工或季节工 或成为建筑工程项目中的重体力劳动者。到 1980 年代中期，为了确保实现“现代化”国家建筑公司大量雇用农村建筑工人和挖沟者 此时的农民劳动力总数约占全国建筑行业劳动力的 1/3。

农村流动劳动力通过合同关系在城市工业企业中的人数继续

增多。随着时间推移，准确的数据难以统计。据官方报道说，在国营工业企业 1993 年初的 10740 万劳动工人中，流动人口为 1280 万 占总数的 11.9%。^①全国各地的情况大不相同。据 1994 年的一个研究显示，在河南省的国营企业中，流动民工的比例占了 30%。^②农民进城的途径不只限于国营企业，民工在城市中谋生的劳动岗位日趋多样。自 1980 年代末期以来 在国营企业的用工渠道之外 城市出现了大量的其他就业机会。这些就业机会包括 销售和服务行业、棉纺印染行业、外资和其他非国有性质的制造业、保姆行业、废旧品回收业等。

总的来说 在这些行业就业的绝大部分人 与国家之间既没有合同的约束 又无多大的关联。大多数农民是通过个人关系 (甚至非正常的手段) 或通过那些设立在城市街头巷尾的‘自发’的劳动介绍所而进城谋取职业的。即使在一些国家所属的建筑公司中，劳动力的安排也是通过一系列非正常手段进行的，因为一些农村工程队通过中介关系获取了经过转包之后的工程项目。一旦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城市的劳动力就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国营企业之外的就业机会

随着大量农民进城 街旁路边的小吃店、杂货店以及其他小型服务业得到快速的发展。以北京为例，据 1993 年初的一则官方报道 在北京 14 万家个体经营店铺中就业的劳动者里，70% 以上来

^① *Business Weekly* (January 10, 1993).

^② Li Ruojian, "Structural Defects versus Migrant Population in the Especially Big Cities in China", *RKYJJ*, No. 4 (1996): 44.

自外地 其中 90% 以上的劳动者通过非正规方式获取就业机会，比如，有通过亲戚朋友帮忙介绍的，有主动上门向老板求职的。^①另有些人 尤其是那些来自南方和沿海地区的人 他们来到手工业和服务业比较缺乏的北京地区寻找挣钱机会，他们或走街串巷承接生意 或在‘自发’的劳动力市场提供他们的技术服务。其中的一些人在陌生之地立足后 便形成同乡组织 以便相互照应。

1980 年代中期兴起的木工行业，由于过速发展和大量同行相互竞争 到 1980 年代末期就很难找到生意了。例如，许多较早年在辽宁落脚的浙江木匠，便转移到宁夏和内蒙古等地开拓新市场。这一事例也说明，这种特殊的劳动力市场充满活力。劳动力市场上的另一种行当是补鞋业 这些补鞋手艺人绝大部分来自浙江 他们联系在一起形成社团。在 1990 年代初 其中约有 1 万人在天津的火车站一带租房落户。^②

在北方抢占市场的另一种行业，是来自南方的成衣加工业。大量的外来者聚集在北京和天津等地，他们工作和生活在这地方 并形成‘浙江服装村’。浙江村从 1983 年开始初成规模 此后迅速发展 到 1987 年 在北京经营服装生意的、经过合法注册的业主中 有 1/3 来自农村 主要是江苏人、浙江人和安徽人 他们的雇工有 90% 是浙江的农民。在 1980 年代末期，这些外来的服务手艺人几乎占领了整个市场。

同期 这些‘村庄’（如北京丰台区的大红门镇）的服装批量生

^① Wang Ju, Shi Chongxin, and Song Chunsheng, “Beijing’s Mobile Population: Current Status, Policy”, *RKYJJ*, No. 4. (1993).

^② 1992 年 8 月本人在天津市进行调查访问的记录。

产程序已经非常成熟，足以摆脱国家的商业渠道。温州人从浙江农村购买布料 然后加工成衣 进行零售或批发 货物的运输也是通过老乡的运输网络进行的。他们相互之间从简单的协作，逐步发展为全面的合作 以便巩固这个行业 但这种关系往往局限于亲戚之间或同乡之间。

民工在非国有企业或外资企业中找份临时工作，也要通过个人关系 有时还要通过官员的关系。据广州的一份杂志报道“，在珠江三角洲的企业中，印染工厂以及乡镇工厂所招聘的工人大部分来自广东、广西、湖南和四川等地 他们主要是通过亲戚和朋友介绍进来的。^① 有两位中国记者曾举例描述过这些非国有企业招聘工人的过程 贵州省毕节县地处山区 人多地少 富余劳力很多 ;1987年 广东省与贵州省达成协议 广东省将以“ 招聘劳工达到扶贫 ”的形式 吸纳来自贵州省的富余劳力 由毕节县的县劳动局负责统一招聘 并规定先由个人提出申请 家长或乡镇推荐 然后进行考试等一系列程序。消息传开后，毕节县出现了激烈的竞争 有的家长为了儿女的出路 不得不送礼拉关系。最后录用的结果是大部分人来自城镇：一方面由于城镇的子女所受的教育程度较高，另一方面录用者家庭都有一定的社会关系。^②

就保姆行业的情形来看，我们发现在正规的途径以外还有两种招工渠道，这两种渠道作用不同。第一种渠道是通过已被雇用

① 王志文 江作中(音),《百万民工到珠江》,《南风窗》1988年第5期第29页。

② Ge and Qu, *Zhongguo Mingongchao*, p. 139 - 140. For a story on Bijie as a poverty prefecture, and as part of a special state program to help such place, see FBIS, June 26, 1996, p. 30.

的保姆之间的相互介绍，因为在某一个城市中许多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保姆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群体。到 1990 年代初期 许多城市中的保姆社团还具有一定的规模，这些保姆社团是以老乡关系作基础 组成较为松散的网络 相互沟通有关工资多少和打工机会等方面的信息。第二种渠道是通过自发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时期的中国城市中 劳动介绍所非常普遍。这种途径虽有风险 所受到的待遇可能不体面 但收入说不定较高。在这种市场交易中 不老成的妇女可能会成为“非法分子”的牺牲品 她们可能被诱骗 遭强奸 或被迫从事不光彩的行当。

最后 我们来看看有关报道所描述的所谓丐帮组织和“垃圾王国”的情况。从事这些行当的人员不像人们在街头巷尾所见到的那样各自为战，而具有相当紧密的组织结构。这些丐帮组织有的以地方势力为基础 丐帮头子专断蛮横 控制着丐帮组织 对下属进行特别分工 自己不需外出乞讨 为了讨好丐帮头子 下属和那些捡垃圾的人必须给他赠送礼物。北京一位独立舆论调查员在 1994 年对该市乞丐的调查表明 近 1/3 的乞丐从属于严密的丐帮组织。^①但并非所有的乞丐和收集破烂者都加盟于组织，有些人完全独立行动，不过他们可能与当地的公安人员拉上关系。

对以上几个行业的阐述，还无法概括由于农村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多样的、充满活力的整个劳动力市场。这些劳动力从原有的体制中解脱出来后 不仅抓住机会迅速涌进城市谋求职业 同时也

^① Lincoln Kaye, “Conflicts of Interes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ugust 4, 1994, p. 26.

改变了过去由国家控制的劳动力市场结构。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状况，使国家愈来愈难以控制和规范整个城市人口的活动。

流动人口与国家：新的“公民身份”

特纳 Bryan S. Turner 曾为公民身份下过一个定义 其中两个要点是 第一 从属于政府认可的社团 第二 享有公共资源分配的权利。^①姑且不论公民身份的权利和特惠，所谓的公民，至少是生活在法律认可区域之中。据此，我们来看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他们虽然离开农村来到城市 但是没有城市“户口”因此他们在城市就谈不上具有公民身份，那么也就无法享受公民应有的待遇。

通过考察自 1990 年代以来生活在城市里农民流动人口的状况 我们可以明显发现 他们在医疗、住房、教育、福利和其他各种城市服务待遇上 与那些拥有城市公有住房和享有公费医疗的“正式”市民相比 存在着极大的不平等。尽管经过了 20 年的经济改革，城市居民仍然享有原有的大部分权益。由于流动农民无法得到与之平等的权益，遂成为中国城市中生活异常艰难的社会阶层。

住 房

政府对流动人口居住条件的有关规定非常严格。流动人口或滞留在亲戚家中，或居住在旅店里，或通过协议租用房东的住房，

^① Bryan S. Turner, “Contemporary Problems in the Theory of Citizenship”, in Bryan S. Turner, ed., *Citizenship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3, p.2.

或由工作单位提供床铺，但都是短期而且需要合法登记的。规定还禁止外来者在城市建房或买房（除非是华侨）或占用土地。但近年来，有关政策有所松动，有些外来者在北京购房或建房，希望在城市落户，并拥有一席之地。

北京丰台区的“浙江村”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到 1995 年底时，约有十万外来者，大约有半数人来自浙江，在此地安家落户。他们购置当地的一些旧房子，既用来居住生活，又用作生产场所。^①在 1992 年，当地政府不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批，便同意当地的富裕人家在“浙江村”集资建起了 40 幢占地面积很大的楼房，其中一些出租给外来者使用。在广州和深圳等地，1990 年代以来类似的各种建筑和简易房不断出现。不过，据一位观察家称，这些建筑均是“违章”的。^②

农民不但不能违章建房，而且还不能租用市政公用房或工作单位的房子。但是，有关规定自 1991 年以来开始有所改变。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参与其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于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那种封闭式的城市政策愈来愈不适应了。有关政策的宽松，给进城农民带来更多选择住房的机会。到 1995 年末，对上海 4 714 位受雇民工的调查发现，有一半人自己租房，1/4 的人住在宿舍，另 1/5 的人住在工地上。^③

然而，也有一些不幸的人们，他们由于找不到工作而没有住

① Xiang, “How to Create”, p. 4.

② Linda Wong, “China’s Urban Migration: The Public Policy Change”, *Pacific Affairs*, 67, No. 3 (1994): 335 – 355.

③ Wang and Zuo, “Rural Migrations in Shanghai”, p. 9.

房，或者因收入低而租不起住房。自 1990 年代中期以来，这类人在城市中还不少，他们只能逗留在街角处、隧道中、车底下或大桥旁。例如，据李成报道，在北京一处 300 平方米的简易房内，滞留着 500 多名外来民工。在另一处，有 6 000 多人共用一个厕所。^①这些简陋住房，往往是用捡来的废铁、纸板盒和木头搭建起来的。

医 疗

中国每个城市都设有医院，对于城市居民尤其是那些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来说，医疗条件是不成问题的。这些医院及医疗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并不是为外来人口提供便利的。即使是政府职能部门也不重视改变流动人口的医疗状况。由于外来人口经济窘迫，要是他们患上流行病或传染病，情况就十分糟糕。因此，流动人口就医往往得自找渠道。

从 1990 年代初开始，至少在某些方面有所改观。比如，一个外来民工假如能在效益较好的国营企业打工，就能享受一定程度的医疗福利。这种医疗待遇，取决于该企业经济效益以及管理制度。另有一些从业于效益很好的大型外资企业的人员，他们不仅享有住房，而且成立集体工会组织，以维护他们在其他许多方面的权益。到 1990 年代中期，生活在北京浙江村的流动人口，建立了自己的诊所和医院，医院的工作人员均是那些在家乡获得了行医许可资格的浙江老乡。据说，许多所谓的“医生”都是未经专业训

^① Li Cheng, “Tidal Wave of Migrant Laborers in China, Part II”, *Institute of Current World Affairs*, CL-10 (1994): 12, 14.

练的混杂人员，他们游医于流动人口中间，治疗性病之类的疾病，并以此谋利。^①

教 育

本迪克斯 (Reinhard Bendix) 指出“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和责任 应该是全国公民必须履行的最为基本的义务”这不仅是政府的责任，同时也是所有拥有孩子的父母必须完成的义务。^②中国的“义务教育法”规定 所有 7-15 岁的儿童必须完成 9 年义务教育。但来自农村的外来人口的孩子不能按规定上学。比如，在北京，1995 年本地 5-12 岁的儿童 100% 入学 而流动人口的孩子的入学率只有 40%。

尽管迫于市场需求的压力，但由于教育支出如同医疗制度一样，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具有当地户籍的孩子的入学问题。在 1990 年代中期以前，至少没有在法律上考虑流动人口适龄子女的入学问题。直至 1996 年底，国家仍未出台有关流动人口子女接受教育的政策和措施。只有少数地方政府开始筹建一些设施简单的临时学校 规格和质量差别很大 但中央政府没有为流动人口进行教育投资。用北京市教委一位干部的话来说：“北京市的教育经费非常缺乏。对付目前在校的 150 万 其中包括 30 万流动人口子女 中、小学生 教育资源已显十分紧缺。虽然中、小学已接纳了三十多万流动人口子女就学 有些家长也交过学费 但所交经费远不能满足

① 《争鸣》，1990 年 5 月号 第 26-27 页。

② Reinhard Bendix, *Nation-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Studies of our Changing Social Order*,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64, p. 102, 87.

这些学生的实际教育费用。……从前义务教育是由儿童所在地区负责承担的，但现在的北京不可能很好地解决 30 万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①

由于流动人口子女的户籍关系登记在农村 因此 城市有关部门在法律上可以不承担使他们在城市接受教育的义务。正因为流动人口子女没有获得城市的居住许可 所以 一直到 1990 年代中期 这些儿童的教育问题没有得到合理地解决。

此外 在 1996 年之前，国家不准私人集资办学。在广州的两个城区 流动人口集资建起了 40 来所“简陋学校” 没过多久却被当地政府下令撤消。在浙江村 外来人口无视当地政府的规定 在 1992 年筹办了自己的学校；高中生未经登记许可办起了托儿所，并聘用老乡做教职员工。^②

服 务

流动人口或滞留在城市，或被工作单位安置，或自行租房谋生 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基本的城市生活待遇 比如在使用水电和公共交通等方面 当然这些便利也是很有限的。然而 那些居住在城市边沿地带如“浙江村”的外来民工 他们已完全做到自给自足，可以根据需要在自己的生活区不断建立起一系列服务设施。他们不是被动地等待北京市政府为他们提供服务上的方便，而是由外来业主出资筹建各种综合服务系统 例如 到 1993 年时，

① Liaowang, in *FBIS*, February 12, 1996, p. 22.

② Xiang, “How to Create”, p. 34.

每天都有长途汽车来往于北京和家乡之间接客运货，还开通了长途电话服务，并建起了许多公共厕所等。在 1992 年建成的北京“浙江村”内，水电、排污、邮电、教育和娱乐等方面的服务应有尽有。^①

社 团

据有关调查发现，早在 1990 年代初期，一些带着技术和工具来到北京落脚的外来者同乡，为维护自身的利益，便开始组织起来，并成立自己的社团。在一直受到严密控制的城市地区，多少年来，官方都在禁止成立各种非政府组织，但对于民间一些互助性质的协会还是不予取缔的。由于流动人群的特殊性，国家不可能像对待那些有固定住所和单位的城市居民那样加以管理。因为，城市的服务体系很难为流动人口提供有效的服务，而且政府的各种协会不可能吸纳他们，指导他们，满足他们的社会需要。

虽然国家的有关部门曾试图着手解决相关的问题，但从来没有成功。一方面流动人口对社会服务有多种需求，另一方面政府却不能提供有关的便利，因此，流动人口一直处于一种尴尬境地。与此同时，国家对待他们的态度略有宽松，尽管程度有限，这些流动人口便能在政府管理机构管辖范围之外，或者在不经意的情况下组织在一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组织由于人数的增多及其自发的过程，逐渐强大起来，这些社团与国家的主渠道几乎没有

雷鸣 (音)，我所看见的北京‘浙江村’。(Ming Lei, “The ‘Zhejiang Village’ of Beijing that I Have Seen”, Zhengming) ,《争鸣》1994 年第 2 期，第 25 页。

任何关联。正如一位研究工作者所说的：“浙江村的人们好像生活在北京以外的社会中。”^①1992年，在对290人的抽样调查中发现，其中83%的人与北京人毫无联系。他们被视为外国人，甚至连他们自己也这样看待自己，一些人还认为由于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外交领地，才使自己的利益得以保护。

总结：市场经济的影响

转型时期的中国，由于导入了市场经济行为，使原来的社会主义形态逐渐发生变化。这样，市场经济就有可能按自身的规律发展运行，使得国家对地区、部门和职业方面的指令性限制逐渐放宽。市场也为那些冒险闯天下的外来者带来机遇。于是，国家原先修筑起来用以禁止外人入内的无形的、坚固的城市围墙，被外来的农民冲破了。

市场行为迫使国家不仅要重视城市的公民，同时也要关注那些非城市的人们，使他们共同成为大家庭的成员，并拥有共同分享社会财富的权利。就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联程度来看，一种多层面的社会结构业已出现：(1)城市居民与国家休戚相关，目前的关联程度虽然有所削弱，但仍能享有基本的权益。(2)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又可分为(a)通过合同或个人关系进入城市工厂的，与国家有一定的联系；(b)在城市里落脚，但从属于自发性的社团，并从

^① Wang Chunguang, "Communities of 'Provincials' in the Large Cities: Conflicts and Integration", *China Perspectives*, No. 2 (November-December 1995): 18.

社团中获取服务的流动人口；(c)一群在城市里四处游荡的外来人口，他们几乎算不上是公民。

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生存在城市‘村庄’（如浙江村）中的流动人口。他们正在改写原有的城市生活规则。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村庄中的人们几乎忘记了自己是一种暂时的、替代的、无政府管辖的城市公民。在物质生活上，大多数人比国家企业的工人要穷些，但比那些茫无着落的流浪者要好些。这些人们的存在，将作为新的公民形态出现在中国。

（沈毅译）

中国的农村改革进程与妇女问题

塔玛拉·杰卡

编者按 塔玛拉·杰卡 (Tamara Jacka) 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亚洲研究院高级讲师, 主要从事有关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变迁、性别关系、城乡流动等方面问题的研究, 发表过许多论文, 其最新著作为《中国农村的妇女劳动: 在改革年代的持续变化》(1997年 剑桥大学出版社)

杰卡自 1989 年以来多次到中国进行以农村妇女为研究对象的系列专题调查, 其研究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等机构的支持 曾在北京、四川、浙江、山东等地取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她对改革中的中国农村妇女问题的研究结果 浓缩在《中国农村的妇女劳动 在改革年代的持续变化》一书中。作者独特的研究视野和分析方法给编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根据编者与作者的商议, 我们将该书第 3 章与第 10 章合在一起翻译处理, 略有删节, 题目为编者所加。在本文中, 作者对中国农村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进行的改革作了全景式的透视和描述, 并就改革过程中的农村妇女问题及劳动中的性别分工现象作了深入分析。

1976年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捕后，邓小平及其他深受“四人帮”迫害的领导人又重新崛起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他们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价值观和奋斗目标又颠倒了过来，大刀阔斧地推行与过去根本不同的经济发展政策和社会改革方案。中国农村自195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因邓小平的改革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国家意识形态的变动

在改革的第一阶段即在1978~1980年间，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把精力主要集中在巩固粉碎四人帮后的胜利成果上，逐步实施社会经济的结构性改革。^①当时，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理论领域已经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邓小平批评过去所实行的极左政策及平均主义，促进社会生活的非政治化，提倡经济的实用主义，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使经济得到平稳的增长。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国家经济平稳增长则是通过确立“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重视农业、消费工业、服务业发展，提高劳动者和干部的素质，使干部队伍专业化，采用物质刺激手段和其他激励机制等一系列做法而实现的。

以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些变化为开端，给进一步的社会经济结

^① Deborah Davis and Ezra Vogel, “Introductio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reform”, in Deborah Davis and Ezra Vogel, eds, *Chinese Society on the Eve of Tiananmen, The Impact of Reform*,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1990, p. 3-4.

构变动奠定了基础。这样 当社会开始转型 各种社会关系面临调整的时候 就已经有新观念和新口号为之鸣锣开道了。这样做，一方面使已经被推动的改革能够获得人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则使改革中产生的某些非预料中的消极后果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抑制。

在本文中，我想要集中研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因改革而引起的“性别”变动问题。在改革中重新认识性别问题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社会变动对现实的性别关系发生了强大的影响，即性别关系必然要受社会结构变动的影 响。然而 我需要指出的是 改革时代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并不仅仅是女性所关心的问题，也为男性所重视 不仅受中央领导的意识形态影响 而且也得到地位不同的各界社会人士强有力的支持。

文化大革命中的“极端主义”分子反对邓小平及广大普通人民群众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认为女性能够在社会生活和男性占支配地位的政治领域中大显身手——这样的女闯将，尤其以毛泽东的妻子、“四人帮”集团的重要成员江青为最典型。现在 江青及“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已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唾弃 江青也被人们形容为一个不安分守己的精力过剩的下流女人 她的所作所为与“自然的”、“合适的”性别角色大相径庭。但是在“四人帮”被粉碎后，存在于中国人中的两重性心态也逐渐显露出来了：一方面人们恨透了“四人帮”另一方面是不欢迎妇女介入公共事务的心态在社会上有了滋长。

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及对“四人帮”的唾弃 使那个年代产生的“铁姑娘”们风光不再了 所谓“男人能做到的 女人也能做到”的口号已遭到了抛弃。在毛泽东时代，妇女被要求像男人一样参与

生产领域和社会生活，而现在女人被认为是不能与男人并驾齐驱的。因为不同的性别有不同的生理特征，应该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不同的作用。正如埃米莉·霍尼格(Emily Honig)和盖尔·赫谢特(Gail Hershatter)所指出的，如今中国有大量的媒体文章及各种通俗文学作品正甚嚣尘上地大造男女有不同生理、心理特征的舆论。^①

明摆着的情况是，性别不平等的问题目前正在许多方面被强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趋势也由于女性本身的赞同而加强，而且出现这种情况并不仅仅是“错误意识”引导所致。对许多女性和男性来说，“十年动乱”(1966~1976)的经历，使人们在遭受极端的社会政治骚动、大混乱和痛苦之后，能欢迎邓小平恢复社会秩序及“自然秩序”的努力。妇女获得了机会从毛泽东时代的禁欲主义中解脱出来，她们开始恢复自己的女性本性，对此她们是持欢迎态度的——她们千篇一律的过时服装被束之高阁，换上了色彩斑斓的现代衣裙，大胆而自由地美容和美发，从而展现了属于自己的美丽形象。虽然，一部分当年的女红卫兵战士们在回首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的造反运动时，仍为自己能从传统女性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获得了自由而激动不已，但是更有许多人认为，文革期间的“男女平等”只不过意味着女性付出了比男性多得多的代价，但只得到了很少的劳动工分，她们的家务劳动价值也得不到应有的承认。

^① Emily Honig and Gail Hershatter, *Personal Voices, Chinese Women in the 1980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1988, p. 14-40.

到目前为止，除了国家及民众对政治极端主义的批判之外，各种与性别差异有关的观点和意见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市场。一方面，中国城市到处可见的宣传广告内容表明，商品经济与消费至上主义的出现，如同在西方社会一样，已经使女性被急速发展的广告业所广泛利用，使她们成为以性来吸引大众、刺激消费的工具。

另一方面，强调女性的母亲角色，以及作为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捍卫者的舆论，已经成为政府肃清“文革”流毒的重要措施。同时，有关方面也试图通过恢复传统家庭道德，缓和年轻人的不满情绪，抑制实行“开放政策”和实行市场经济后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的消极后果。如极端的物质主义、个人主义、“精神污染”等，进而促进形成有利社会稳定和现代化目标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正如曾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在 1982 年所说：“妇女不但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她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也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我看来，1980 年代中国许多关于女性形象的讨论，实质上加强了女性把当好母亲作为第一天职的导向，致使许多国有企业不得不延长了女职工的产假，或者让一部分女职工下岗“回到厨房”去，以缓和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①

造成社会越来越强调性别差异的原因，应归咎于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劳动力分化现象。因为国家试图通过体制改革提高经济效益，使企业能满足各种社会需求，加快现代化的步伐。性别差异也因国家政策及某些经济领域领导人的原故而被加强。例如，实行

^① Tamara Jacka, “Back to the work: women and employment in Chinese industry in the 1980s”,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4, 1990, p. 1-14.

改革后 特别适合农村妇女的家庭副业及“庭院经济”得到国家的大力提倡 此举既提高了农村女性的就业率 也使女性作为灵活的家庭劳动力发挥了充分的作用。在那些从事制造业和纺织业的乡镇企业里 大部分职工都是女性 因为在这些行业中 女工比男工更富有耐心 操作也更敏捷伶俐 而在重工业系统 被雇用的多数是男工 因为他们的体力比女工强 更能承受各种体力负荷。

农村经济改革与管理制度改革

一、生产责任制的推行

根据改革领导人的意见，农村过去实行的人民公社集体制的主要弊端是不能刺激劳动者去提高生产力。因而，在 1978 年 12 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生产责任制”的形式得到了肯定 其目标是将劳动者的报酬与产量紧密联系在一起 提高生产积极性。这种生产责任制形式并不反对“包产到户” 农户通过与生产队签订承包合同 对某项生产的成本、产量定额、工分报酬等作了具体规定 进而独立从事生产经营。而会计核算、计划制订、大型工具使用、水利灌溉、主要的基本建设项目等则继续由生产队负责安排 但承包者内部的劳动者工分分配 则由承包者自己确定。^①在 1980 年代初期，这是农村首先出现的与过去不同的生

^① Andrew Watson, “Agriculture looks for ‘shoes that fit’: The production responsibility system and its Implications”, *World Development*, vol. 11, No. 8, 1983, p. 712;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The Quest for Development Since 194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87, p. 286 - 287.

产管理形式 它被广泛推广 受到了农民的普遍欢迎。

1980年9月 中共中央发布了第75号文件 就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制订了若干条例,文件允许在贫穷和落后地区实行其他两种家庭承包形式,以取代已经实行的生产责任制。按照实行最早的“包产到户”制度 农户与生产队签订包产合同 规定了家庭的土地配置、农户收成后给生产队的产品比例、以及生产队给予承包人的工分报酬等。机器、耕畜等则由生产队管理调度或折价给农户。^①土地通常根据农户家庭中的劳动力数量或人口数量,也有的地方把劳动力和人口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分配。从理论上讲 农户家庭的人口变动 如婴儿出生、家庭成员死亡、女儿出嫁、媳妇进门等,都需要对其承包的土地进行新的调整。然而 这种制度产生了许多管理方面的问题 所以在随后的年份被其他的制度所取代 几乎所有农村都采取这样一种办法 即隔若干年对所有农户承包的土地进行一次评估和再分配。即便如此,仍然有许多尖锐的问题涉及到妇女的土地分配问题,尤以离婚妇女和丧偶妇女的问题最为严重。

第二种生产责任制形式 被称为“包干到户”或“大包干”。农户对生产管理、简单的农田税收、粮食等特定作物的征购任务等承担全部责任,但要向生产队缴纳一定的课税以维持基本的集体开支。

正如在其他方面进行的改革一样,生产责任制并不是作为全

^① Andrew Watson, “Agriculture looks for ‘shoes that fit’: The production responsibility system and its Implications”, *World Development*, vol. 11, No. 8, 1983, p. 717.

国性政策在所有农村统一实行的。甚至在三中全会前，已经有一些地方实行了一些新的生产组织形式，^①而这些形式都被中央 75 号文件认为是一种试验。其后，在推广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各地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实行了不同形式的责任制。有些地方的干部与农民强烈地抵制分散的生产管理，农民希望恢复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耕作形式。在此压力的推动下，中央原来计划实行的管理形式很快又被迅速地调整了。

到 1981 年 10 月，大约有 98% 的集体核算单位实行了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其中 7% 实行了包产到户制度，38% 实行了包干到户制度。到 1984 年末，有 95% 的农村实行了包干到户制度，而其余的地方则实行了其他生产责任制。

如上所述，自从实行生产责任制以来，农村集体并没有完全在经济管理中放弃自己的作用。然而，这一改革的重要结果是，绝大多数有关生产劳动的决定及农活的分配任务等已经越来越成为农户家庭内部的事务。对家庭关系的考察表明，认识性别差异和性别分工现象，对于毛泽东时代以后的改革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政治行政体制的改革

随着家庭承包制度的广泛实行，对公社制度的行政管辖结构的作用重新进行评估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在 1982~1985 年之间，中央领导试图将公社的行政管理与经济管理相分离，减少党委

^① Andrew Watson, "The family farm, land use and accumulation in agricultur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17, January 1987, p. 24.

处理日常管理工作的职能。于是公社的管理责任由乡和镇取代了，并正式地设立了乡镇的党委代替过去公社党委的职能。经济职能则由乡镇政府领导下的经济管理委员会来承担。同样，过去的生产大队结构被改变为行政村结构，由村民委员会承担行政管理职责。在某些地方，则以农工商企业或农工商公司的形式发挥经济管理的功能。而生产队则被改名为村民小组，如果村民小组并不以行政村的形式存在，其存在的作用往往是多余的。

尽管农村的行政管理体制发生了以上的形式变化，在乡镇党委、政府与经济管理委员会之间仍存在大量职责重叠的问题。在人事和具体工作等方面都是如此。一般说来，那些过去担任过地方党委领导职务的干部，在新的管理体制建立后仍习惯于对地方政府和经济管理委员会保持实质上的控制。正如农民所说：“他们是在挂羊头，卖狗肉。”^①

总之，乡镇和村的行政体制及其干部在中国各地都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的变更，在行政管理机构与农民家庭的关系上的变化也是明显的。其结果是，地方干部与农民的不同关系影响了资源的分配与控制。在比较富裕的农村，干部能够做到向农民提供各种生产资源，如提供较便宜的农业生产资料，在本地乡镇企业中安排就业机会等。反过来，农民以缴纳集体事业费用、福利基金，完成派岗任务作为对干部的支持和回报。在贫困地区，地方干部掌握的资源有限，贫困的农户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听命于当地干部的

^① Sulamith Potter and Jack Potter, *China's Peasants, The Anthropology of a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1, p. 281.

指手画脚，以从干部手中获取最低限度的资源。^①

近年来 某些富裕乡镇和村的干部 在支配资源和领导经济方面的权力越来越大了，他们决定村里的农作物生产计划，获取贷款 向乡镇及村的企业进行投资 对借贷与投资进行担保 安排产品和作物的出售 并向农户提出各种有利可图的建议。此外 这些乡镇和村还通过向企业、农业征税的途径 向农民家庭提供福利和子女教育条件，并维持本地的农田水利和交通等公共事业。^②

然而，集体的地位和作用在许多地方已经被极大地削弱了。根据对福建某地 30 个村的调查 其中有 15 个村已没有任何集体的活动了。公共性的工作不再存在，对贫困者的福利帮助和合作医疗也已取消。虽然有 11 个村还有某些集体活动 但其水平已大不如前。

农村集体公共事业的式微对妇女的影响特别巨大。因为集体支持办教育的资金实在有限，许多家庭面对子女教育费用上涨的压力 不得不让自己的女儿辍学回家。此外 由于集体没有婴幼儿照料服务设施，许多有孩子的母亲承受沉重的养儿育女等家务劳动负担。

^① Scott Rozelle, "Decision-making in China's rural economy: The linkages between village leaders and farm households", *China Quarterly*, No. 137, 1994, p. 123-124.

^② Victor Nee and Su Siji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the view from the villag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9, No. 1, 1990, p. 18-21; Andrew Watson, ed. "The manage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the institutional parameters". In Watson, *Economic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s in China*, p. 182-188.

三、价格调整 鼓励农村经济多样化、专业化发展

随着农村行政体制和管理制度改革的推进，农产品价格也发生了变化，农村经济出现了向多样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的趋势。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为了刺激农业生产，国家的粮食收购价格提高了20%对超过定额部分的粮食收购价格则提高了50%，各类经济作物和农副业产品的收购价格也同时提高了。相反农民购买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及其他农业资料的价格则下降了^①。在随后几年中许多商品的价格也陆续进行了调整在1979~1984年间，农副产品的市场价格平均上涨了7.62%在1985~1989年间上涨了13%。与此同时，国家进一步减少了对市场物价和农产品价格的直接控制到1992年底除了棉花、油料和粮食作物外的农产品价格都已基本放开，由市场对价格进行调整。

三中全会重新肯定了农民从事家庭副业的权利，要求地方各级政府支持发展农村工业和乡镇企业增加投资、扩大规模使更多的农民成为乡镇企业的职工。这一显著变化意味着国家放弃了过去以粮食为纲的政策，鼓励农民介入到商品生产与第三产业之中如林业、畜牧业、渔业、加工业、制造业与服务业等。这种多样化的农业生产结构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农村‘过剩’劳动力由以往的单一农业生产方向朝非农化方向转移，并加快了农民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北京周报》，1978年12月29日第52期第13页。

^② Robert Ash,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in China: performance and policy dilemmas during the 1990s”, *China Quarterly*, No. 131, 1992, p. 555.

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流动。

农村经济除了发生多样化的变化外，国家还鼓励农民家庭在农业生产及非农业生产领域发展面向市场的各种经营活动。为了使农民能比较容易地成为“专业户”、“个体户”和兴办“私营企业”，地方政府时常向农民提供平价的化肥和其他农业生产资料，帮助他们发展市场需要的商品生产。此外，国家还制订了涉及雇工和土地转包的法律。中共中央 1983 年 1 号文件容许农民家庭雇工生产；1984 年的 1 号文件则容许农民家庭进行非农产品的生产，容许将土地转包给其他家庭耕种。

四、农村用工形式的变化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及鼓励农村经济的多样化、专业化发展，使农民家庭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和能力并根据市场需要和价格行情决定种植什么、经营什么。农民种植粮食作物的净收入通常低于其他商品性的农产品，因此农民有强烈的愿望种植非粮食类农作物。同样，非农业经营活动如加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的收入也比经营农业的收入要高。这就导致一部分农民家庭或者在农业生产的某一领域进行经营，或者放弃农业生产而从事其他生产活动。但是，这类经营活动可能获得的收益往往被缺乏专门技术、缺乏市场信息和资本等因素所抵消，从粮食生产向商品生产的转变因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对经营积极性产生影响。同时，这些农户还需要完成地方政府分派的粮食征购任务。在中国农村，土地被农民认为是最重要的安身立命资源，他们不会完全放弃土地而投入似乎更有利可图但较不安全

的、非农的产业经营中去。因此，农民面对此种冲突和选择困惑，通常是在家庭里让男人和女人根据各自不同情况，分工从事不同的经济活动。例如，妻子可能在家里管理土地，种植粮食和蔬菜，丈夫经营个体企业或做生意，而他们的子女则在附近的工厂里做工。

农村用工形式就这样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整个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领域向非农业领域流动。据统计，1952～1977 年间，中国非农职业的平均年增长率仅为 2.4% 但在 1978～1990 年间却达到年增长率 13.3%。1977 年，所有从事非农职业的农村人口为 1 732 万 即占全部农村劳动力的 5.6% 到 1990 年农村已有 8 756 万人口从事非农职业，占全部农村劳动力的 20.5%。^①但是农村妇女从事非农职业的人数明显少于男性。

值得注意的是全中国的农村都已经在推行经济改革了 但改革在不同的地方产生不同的效应和变化，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与内地边远地区之间的差异十分显著。在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发展迅速，同其他地区以至同海外市场进行的各种贸易联系也十分频繁，相当一部分已经走上非农化道路的农民和他们的家庭已经十分富裕。可是，在内地边远地区，市场经济和工业仍然不够发达，许多农民仍以农为生 处于相对贫困的境地。

^① Harry Wu, "The industrialisation of China's rural labour force since the economic reform". Working Paper No. 92/6. Chinese Economy Research Unit, University of Adelaide, 1992, p.4 - 5, p.28 - 29.

五、收入分配

1985年前,在中国农村实行的经济改革政策导致了农民收入的迅速增加,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改善。可是1985年后农民的实际收入减少了。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78年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为133.57元,其中用于维持生活的费用为116.06元,占人均收入的86.9%。到1984年,农村人均纯收入增加至355.33元,其中用于维持生活的费用为273.80元,占人均收入的77.1%。随后农村人均纯收入继续增加,但受通货膨胀和生活费用提高的影响,农民用于维持生活的支出也上升了。1988年农村人均纯收入增加为544.94元,用于维持生活的费用人均476.66元,占收入的87.5%。到1993年底,农村人均收入为921.62元,但有769.65元用于生活开销,占收入的83.5%。^①

上述数据表明,农村、城镇人口的收入与消费差距在1980年代初期曾一度缩小过,随后在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又有所扩大。农民与非农业居民的消费系数之比在1978年时为1:2.9,1985年时为1:2.2,到1991年时下降为1:3.0。^②

自1980年代早期以来,农村地区的收入不均问题就一直在发展。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称,中国农村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32减少至1982年的0.22,但随后上升为1984年的0.27和1986年的0.31。另一项由西方经济学家们进行的大规模调查研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2)、(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94,第276页。

②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2)第276页。

究发现,1988年中国农村的基尼系数为0.34。^①

农村人口收入不均的原因,主要因改革过程中地区差异扩大所致。有一项调查认为,1979年中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均收入分别为东部地区的69%和56%。到1988年此数字下降为52%和43%。^②

此外,不同家庭之间与不同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因职业不同而扩大了。富裕的农家主要是各类专业户与个体经商户,这些家庭通常比平均家庭规模要大些,家庭成员受教育的程度也高出平均水平,并且往往与当地政府官员有一定的联系。在衡量家庭与个人的收入不均问题上,工资收入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对那些只占人口10%的最富裕人口来说,大约62%的收入是来自工资;而对占人口20%的最贫穷人口的调查表明,他们只有1%的收入来自工资。

目前,农村女性在乡镇企业或其他行业中获得工资报酬的人数大大少于男性而且妇女的工资报酬也低于男性绝大多数贫困地区的人口由妇女组成。1991年全国妇联进行的当代中国妇女地位调查的资料也反映了贫困人口女性化的问题。该项调查发现32.7%的农村妻子每月的收入为50元或更少,65.2%的农村妇女收入为100元及以下。相反月收入不到50元的农村丈夫占

^① Azizur Khan, Keith Griffin, Carl Riskin and Zhao Renwei, "Household income and its distribution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No. 132, p. 1056. This latter study was based on a survey of 10, 258 rural households in 28 provinces.

^② Hiroyuki Kato,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reform period", in Ross Garnaut and Liu Guoguang, *Economic Reform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China and the Pacific Region*, Allen & Unwin, Australia, 1992, p. 118.

8.6% 月收入为 100 元及不到 100 元的只有 33.5%。另一方面，那些月收入超过 300 元的人中，农村丈夫占 16.4% 妻子只占 4.5%。^①

就农村从业者的工资收入而言，男女之间收入的不平等是明显的，也不是一时性的。根据 1988 年的调查，农村妇女从业者的月工资为 103.8 元 仅为男人收入的 81% (127.9 元)。在城镇地区，女工的平均工资为男工的 80%。这些数字证实，乡镇企业中女职工的收入低于男职工并不是农村独有的现象。

独生子女政策

1978 年中国共产党开始推行独生子女的家庭政策。根据独生子女政策，一对夫妻在生育了第一个孩子后，必须保证不再生育第二胎。如果生育第二或第三胎，则要受到罚款之类的处罚。在城镇，由于已经实行了较长时间的计划生育宣传和教育，并且因为社会一经济的压力，如住房紧张等原因，许多夫妻并不愿意多生育子女，所以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相对要容易些。在农村，这项政策遭到了一部分农民的抵制。

城乡家庭对独生子女政策产生不同的反应，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个原因是农村没有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许多农民在年老丧失劳动能力后，没有养老金保障，于是养老的责任就落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主编，《当代中国妇女地位抽样调查资料》，北京，国际学术出版社，1994 第 232 页。

子女的身上，尤其是儿子（在从夫居的传统婚姻制度下，女儿在结婚后通常离开她所居住的村庄）就成为照料年老父母晚年生活的至关重要的亲属。而那些无亲可靠的老人，则由集体向他们提供“五保”的保障，即提供粮食、必要生活照料、住房、衣服和安葬。然而，在 1980 年代初，年龄在 65 岁以上的农村人口中，只有 3% 的老人有条件享受“五保”待遇。随后，由于集体福利事业的式微及老年人口的增多，享受“五保”的老人比例又下降了。

随着改革的深化，今后老年人缺乏社会保障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会逐步得到缓和，许多农村在 1991 年已经开始推进自愿的养老金保险计划，参加该项保险的农民及乡镇企业职工，每月在工资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钱作为养老基金，年老时就能获得一定的养老金保障。然而，此项养老保险的受益者只局限于比较富裕的农村人口。从 1995 年起，已有 500 万农民被覆盖到农村的养老保险之中。

第二个原因是农民家庭是否能富裕起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家庭能调动的劳动力数量。农村实行经济改革后，农村经济变得多样化起来，劳动报酬与工作实绩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从而使劳动力能被有效地利用来增加收入。同时，农民家庭有了更大的自治权和自由度，而干部对农民进行管理和控制的权力却被削弱了。虽然仍不时有农村干部强行对超计划生育者进行流产和绝育的消息报道，但计划生育工作显然遇到了新难题。

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对性别关系与女性产生了一系列消极的后果。尽管国家加强了宣传教育，妇女仍常因她们生育了女孩而受丈夫及婆婆的虐待。她们是家庭暴力的发泄对象，有些妇女

还被丈夫遗弃。至于那些未能成功避孕的妇女，还面临着来自干部的压力 不得不实施晚期流产。

由于国家只允许一个家庭生育一个孩子，农民尤其希望能第一胎就生育一个男孩子。于是激发了怀孕妇女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愿望 更有甚者 对所怀女胎进行了人工流产。社会上也出现了瞒报女婴出生、遗弃女婴甚至溺婴的问题。

受上述问题的影响，中国政府近年来已在某种意义上对独生子女政策进行了调整。1989后 除四川、安徽、北京和上海等省市外，其余省市自治区已经允许头胎生育女孩的农村家庭再生育第二胎。政策的这种变化，或许能对女婴遗弃或溺婴问题产生有效的抑制。然而 却从另一个方面强化了“男尊女卑”的观念。

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已经给妇女带来了一些好处。实施这些政策后 妇女地位与人口生产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承认 并已经引起了社会对长期存在的男女不平等问题的注意，首先是全国妇联一直与歧视妇女、虐待妇女问题作斗争 并致力于提高妇女受教育水平和就业机会。^①但是，全国妇联的工作和努力因缺乏资源和力量有限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此外，妇女干部在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中未能建立良好的形象，使她们在保护妇女和促进妇女权益方面仍面临不少困难。

对农村妇女的计划生育产生更直接利益的，是减少生育数量后提高了妇女的健康水平；生育较少的孩子也减轻了妇女的家务

^① Elisabeth Croll, *Chinese Women Since Mao*, Zed Books, London and M. E. Sharpe, Armonk, New York, 1983, p. 121 - 123; Davin, "Never mind" p. 87 - 88.

劳动负担。诚然，这种结论并不全是正确的，虽然家里孩子数量少了，家务劳动看起来是减轻了，但在孩子多的家庭里，年龄较大的孩子往往能帮助父母承担一些家务劳动任务。此外，从长远发展来看，要是独生子女政策成功了，将增加了妇女照顾夫妻双方四个老人的负担。

无论妇女因独生子女政策而实际上减轻了多少负担，计划生育政策和出生率的下降对妇女“主内”的家庭角色并没有发生多大影响，妇女仍被认为应该当好母亲和以家庭为重。而且，大众媒介和国家一再宣传这样的妇女形象，即妇女不但应成为好母亲，而且还应是社会道德、社会稳定和秩序的护卫者，这些宣传强化了妇女“主内”的角色形象，使妇女参与经商、从政、管理等社会事务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总之，毛泽东以后时代中出现的性别差异现象，是新形势下国家—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虽然国家通过立法及有关改革，试图更新人们的性别观念，但毕竟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男性与女性的观念与态度。

结 论

中国农村自 1978 年开始的改革，特别是公社制度被取消后，农村经济呈现多样化发展的趋势，严厉的计划生育控制导致了妇女和男人就业类型的持续变化，以及与性别分工有关的价值变动。

改革以来，妇女已经从新的就业机会中尝到了甜头，在与其他人的关系方面，以及在对资源的控制方面，妇女的社会地位也有了

提高。但总的说来，妇女仍没有在改革中获得如同男人那么大的利益，改革也没有导致农村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两方面地位的根本变化。相反，妇女对男性的依赖性在有些方面被强化了，在另外一些方面则被改变了形式。

妇女在改革过程中，面临家外劳动与家内劳动、重活与轻活、技术性工作与非技术性工作的矛盾与分裂，这些问题被强化，并在概念上被重新定义了。在这诸多的矛盾中，家外劳动、重活、技术性工作是与男性联系在一起，而家内劳动、轻活、非技术性工作则与女性联系在一起。这种分裂现象是社会价值观的反映，也被假设为劳动分工与性别特性具有一致性的体现。从而，女性与男性就有了不同的就业类型和劳动分工，就形成了不同的性别身份特征。

改革前，妇女与男人的就业分工在事实上被分别限定在“家内”与“家外”两个领域，并没有摆脱“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模式。这种模式维持了劳动的性别分工，使之合理化，结果是家务劳动与家庭副业被认为是“女人的活”。这类由女性为主从事的劳动，首先被定位为是家内的和庭院范围内的，其次，是多半只与家庭成员生活有关的劳动，仅仅能为家庭带来好处，而与集体和社会无关。

从 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国家曾企图把妇女的劳动从“家内”领域解放出来。这种尝试曾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并不持久，并产生了“家内”劳动被贬值的副作用，使之从属于“家外”的集体劳动。当妇女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后，她们的劳动又被认为不如男人对社会的贡献大。

在毛泽东时代 中国共产党推进了妇女参加‘家外’集体生产劳动和社会政治、经济活动 并促进了妇女参政 但一直到 1970 年代末期 妇女所参与的这些领域活动仍继续被认为是属于‘男人的世界’。

此外 妇女虽然参加了集体生产劳动 但如果从事‘重活’与“技术性工作”她们被认为在能力上要比男性略逊一筹 因此她们的劳动范围往往是与‘轻活’及‘非技术性’的劳动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广大农村 对劳动的这种‘重活’与‘轻活’、‘技术性’与‘非技术性’的分别，实质是男性农民企图保持对女性的支配和控制，并在劳动分配中保持自己的优势。

1978 年在农村开始的改革，使以往的家外劳动与家内劳动、重活与轻活、技术性工作与非技术性工作的割裂被重新作了根本不同的定义。然而 正如我指出的那样 这种割裂已经事实上在妇女身上奏效 并在某种程度上被强化了。这就意味着 尽管改革使不同类型的职业和劳动组织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农村改革既没有打破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也没有能对男女两性的区别作出新的评估。相反 女性与男性的工作内容虽然正在变化 但区别依然存在 女性的劳动相对于男性来说 仍居于次要地位。

经济发展战略的变化 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 特别是基本家庭生活设施的购置与各类消费商品越来越容易得到的事实，已经使妇女从事家务劳动的性质与投入家务劳动的时间也发生了变化，尽管绝大多数家庭仍至少有 2 个孩子需要照顾。家务劳动是“主内”的妇女活的理念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相反 国家在改革中更强调了妇女从事家内工作的意义 强调了妇女作为母亲 以及社会

稳定与伦理道德监护人的角色。改革并没有对家内劳动的低下地位发生影响。虽然母性的价值被舆论罩上了光环，改革后农村经济的多样化也使无收入的家内劳动与能挣钱的家外劳动之间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妇女从事劳动对经济的贡献仍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家内劳动是琐碎的苦活而不是“真正的劳动”的观念依旧十分盛行。如今，被普遍界定为“庭院经济”范畴的家庭副业，仍然被继续当作特别适合于女性经营的“家内活”。确实，在实行联产责任制后，国家鼓励妇女经营家庭副业，以解决认为她们是超出农业生产需要的“过剩”劳动力的问题。

但是，过去 20 年庭院经济的发展确实使妇女得到了一些好处。例如，从事庭院经济生产的妇女比在乡镇企业里的女职工有较多的自主性，有些妇女以她们的家庭副业劳动为跳板向更大规模更有利可图的生产领域转移，甚至进入了男性为主的管理、经商的外部世界。

庭院经济是农村经济最富有生气的一个领域，它得到了全国妇联的支持，而且妇女将来在这个生产领域的发展将会进一步提高她们的经济社会地位。然而我认为，妇女从庭院经济中获得利益的程度，将取决于她们受到怎样的社会支持与专业训练。

1978 年后，农村劳动力中发生的最根本的性别分工变化是在农业关系方面。在改革初期以至今天，在某些较不发达地区，就业机会的缺乏导致了妇女从农业生产领域的撤退。因为妇女被认为体力不如男性，缺乏必要的技术经验，不能从事农业生产，而只能在“家内”承担责任。

相反，在比较发达地区，随着改革深入和工业领域就业的机会

增多 很多男性农民离开土地去寻找各种务工的机会 妇女则留下来负起经营农业的责任。如今 农业劳动被认为是“家内”的劳动了 务农被认为是最不理想的职业 于是就形成了新的性别劳动分工。随着农业劳动的价值被贬低 以及农业劳动被从“家外的”向“家内的”范畴转移 最具讽刺意义的结果是 过去作为限制妇女参与农业劳动、贬低妇女农业劳动价值的女性体力特征 如今被用作妇女适合于农业生产劳动的证明。

在实行改革的新时代，绝大多数农村妇女继续参加各种家庭劳动或在农田劳动 但经济发展已经使农村妇女深受影响 特别是许多年轻的未婚女性已经成为非农产业的劳动者。这些妇女的经历 如同在其他生产领域劳动的妇女一样 受到家外劳动与家内劳动、重活与轻活、技术性工作与非技术性工作的性别分工的影响，而在受雇于城镇的情况下，还要受到农村与城镇差别的影响。年轻的农村妇女在城镇工作 她们当家庭保姆 在个体企业、轻纺工厂当临时工 因为她们比较单纯、温顺、不会抱怨 能被雇主看好利用 而作为从农村来的打工者 她们所接受的工作 只不过是城镇居民不愿干的临时的低报酬的卑微的工作。

只有少数农村女性在城镇工作 然而 她们通常在干到 20 来岁的时候便会返回家乡 以便在农村成家 挑起家务、家庭副业和农业生产等“家内”的担子。在当地乡镇企业工作的妇女，一般只占乡镇企业职工人数的 30—40% 她们集中于轻工业和非技术性行业 只有极少数人参与到管理工作中。

当我在此就改革对农村妇女与劳动中的性别差异问题进行探讨的时候 我曾强调指出了劳动分工的发生及其社会意义 但不能

就此而简单地认为，出现这种分工现象是实行改革的直接后果。因为劳动分工中的性别差异，在几乎所有的性别关系中都存在着，并被认为是正常的现象。例如 根据从夫居的婚姻制度 绝大多数妇女在结婚时都要离开自己出生的家庭和村庄，迁入丈夫的家庭，这就产生了妇女只不过是其出生家庭的临时成员的认识。于是，女孩接受教育的时间通常比男孩少，这一问题近年来随着教育费用的提高而日益严重。妇女婚后迁入新的家庭，成为丈夫家族的新成员，并与新家族成员建立新的关系。这对于她们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只有如此 她们才能在中国农村从事有关工作 取得权力，得到感情安抚和物质支持。她们较低的教育背景以及在当地社会网络中的边缘身份，反过来使她们在诸如受雇于当地乡镇企业等“家外”就业范围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在教育及只有少数人涉及到的妇女参政方面存在的性别差异 是由工作性质、性别身份、劳动的性别差异等因素构成的。因此 妇女的工作主要是在“轻易”的范围 如纺织业、手工业 以及与“家内”劳动相联系的工种 包括家务劳动、庭院经济生产等 于是 也就有全国妇联以农村姑娘为训练对象的职业教育项目，它加强了女性适合于“轻易”的“家内”劳动，而男性则适合于“繁重”的“家外”劳动的性别观念。

在重活与轻活、家外活与家内活之间出现的性别差异现象 在过去 20 年的改革进程中受到国家倡导的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变动的支持。这些变动 通过官方正式的宣告、通过大众媒介的文章宣传、通过教育 已经对那些在“家外”工作的成功女性产生了不利的反应。“男人能做到的 妇女也能做到”的毛泽东时代口号已被

抛弃 大量的媒体文章在宣传性别之间的生理差异与心理差异 而且还认为是经济发展与现代化才造成了劳动的性别分工结果。同时 强调妇女作为母亲的角色作用 是国家在改革过程中企图抑制社会无序、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手段。

对于劳动中的性别分工与其他性别关系的问题，我们必须连同社会、经济与政治变化现象一起进行分析 与其说性别问题是国家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倒不如说它只是国家自上而下实行的一项政策。因此 如果新的价值观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 包括妇女的强有力认同和支持，社会与政治的变革就不可能发生。以家庭副业与‘庭院经济’的出现为例 这是改革中解决农村妇女劳动出路的最重要的领域 不能把家庭副业与‘庭院经济’仅仅理解为妇女是廉价的灵活的劳动力而已，也并不仅仅是男女关系中双方进行较量的结果，虽然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它必须被看作是妇女自身的一种选择 因为妇女们在经过比较后发现 从事家庭副业劳动比参加其他劳动对自己及对家庭更为有利。

在本文中，我使用了一种与文化价值分析相结合的因果分析法研究改革过程中的农村妇女问题及劳动中的性别分工现象。我对中国农村的性别关系和发展中的中国社会两者进行了比较，从而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对经济社会发展与性别关系变迁这两者关系进行分析的新视角。

（张敏惠 译）

西方社会政策理念与 21 世纪 中国福利事业发展

王卓祺 艾伦·沃克

编者按 王卓祺 (Wong Chack-kie) 英国雪菲尔大学博士,1989 年起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现为该校社会工作系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社区工作、社会政策及社会福利比较研究。艾伦·沃克 (Alan Walker) 英国艾色斯大学博士 现任英国雪菲尔大学社会学系社会政策讲座教授,兼任国际社会学学会老年研究委员会及欧洲联盟属下老年及老年人瞭望台 (Observatory on Aging and Older People of European Union) 的主席。沃克教授的研究范围是社会政策及社会老年学。

本文通过阐释西方学者对社会政策概念理解的转变而建构一个社会政策概念架构,并基于经济改革下的中国实际状况,探索其福利发展所面对的问题及社会议程,尤其是针对“再就业工程”及“社会办福利”等问题 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引 言

跨入 21 世纪的中国面对着一系列的社会福利问题。基于经济改革产生的制度性变动，是否会使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与西方接轨，这是一个很值得探索的问题。西方学术界对社会政策的理解在过去二、三十年已经历了不少变化。1960~1970 年代的主流意见认为，社会政策是政府对市民福利有直接效果的政策，如向市民提供福利服务或收入保障，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住房、教育及罪犯的处理等，这是所谓社会行政的传统。到 1980 年代，社会政策被理解为决定不同社会群体的资源、地位及权力的分配，而这些分配是以现行社会制度及再生产的延续发展为基础的。至 1990 年代，社会政策可以说在对 1980 年代有关资源、地位及权力分配的概念的认识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深化。总的来说，社会政策是从资源分配发展到社会关系、地位及权力的分配，而这些分配影响着社会部门（家庭、学校、社会福利、教育、社区等）与经济部门（市场）之间的关系。

在现代社会，只有国家通过政府才具有最后的权力去再分配社会资源及社会关系。最近，欧洲学术界在社会政策的研究中十分重视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的概念。欧洲共同体有关贫穷及社会不平等的研究都把注意力放在增加社会融合（Social Integration）或减少社会排斥方面，而对社会排斥的研究是超越社会资源的匮乏（传统贫穷的界定）放在多层次的不利条件如何使社会内的弱势社群（如穷人、老人、单亲、新移民、失业者等）脱离了主

要的社会及就业环境方面。^①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西方学术界对社会政策概念理解变化的陈述，探讨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福利事业面临的一些问题及其未来发展取向。本文的重点不是历史回顾而在于概念阐释。因此，作者建构一个社会政策的概念架构，在演绎之中带出社会政策的转变（见表 1）。这个概念架构是参考了西方学者的观点而建立的，主要针对制度性问题。蒂特姆斯 R. Titmuss 首先把社会政策概念从社会行政传统中释放出来。他认为，社会福利或市民的福祉不仅是政府提供的各种社会福利服务或待遇，工作岗位雇员的就业福利及政府的财政、税收优惠，也反映不同社群的资源分配结果。戈夫 I. Gough)认为 社会政策是政策输出的一个环节 是国家影响劳动力及住户再生产的做法，而最后结果是个人及社群的社会福利。拉特里斯 D. Latridis 则重视社会政策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及政治制度的安排，它的背后理念是理想社会的意识形态及国家目标 而结果也与戈夫雷同 即致力于福祉 社会福利 的增进。米德格雷 J. Midgley 具体地将社会政策的重要结果（社会福利）操作化为社会问题的控制、社会需要的满足及社会机会的保障。而沃克 A. Walker)则界定社会政策为社会资源及社会关系（地位及权力）的再分配。他把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结合起来 强调社会政策促进经济的积极作用及社会政策本身的内在价值 ^②

^① G. Room, (1995), *Beyond the Threshold*. Bristol: The Polity Press, p. 25.

^② D. Latridis (1995), *Social Policy*. California: Brooks/Cole, p. 87; J. Midgley, (1997), *Social Welfare in Global Context*. London: Sage, p. 4-5; I. Gough, (1996), *Social Welfare and Competitiveness*.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1(2), p. 212-213; A. Walker, (1984), *Social Policy*. Oxford: Blackwell.

表 1 社会政策的概念架构

投入(理想)	制度安排	输出	结果(分配)
意识形态	社会部门	社会政策	社会福利
	家庭、朋辈	社会福利	社会问题控制
	社区、慈善团体	教育	社会需要满足
		就业	社会机会保障
目标	经济部门	医疗	社会平等
	市场	房屋	社会资源
	政治部门	社会保障	社会关系:地位和权力
	国家	财政福利	(经济生产范畴)
		职业福利	社会政策与 经济生产的正面关系 经济生产的负面关系

资源分配及社会关系平等

社会行政传统重视政府行动如何有效地解决市民的福利需要 而社会政策是表 1 中的输出部分 它的具体项目是政府致力的活动 以实现对社会问题的控制 主要是贫穷、贫富悬殊、治安及失业 及保障社会需要的满足 它所关注的主要是国家活动(或活动不足 即资源问题)但存在三个主要缺点 第一,它对社会多元福利缺乏分析。家庭及市场分配的福利可以是市民满足个人基本需要的主要来源。第二,社会行政传统集中于国家提供的公共福利,但缺乏分析社会问题产生或社会需要不能满足背后的结构性因

素。第三是它的非理论倾向。社会行政传统缺乏一套理论，尤其是假设了社会政策或与国家行为本身的价值中立。

蒂特姆斯提出福利的社会分工学说，扩展了社会行政只是研究公共福利的狭隘范畴。他把财政福利（税收豁免及优惠）及职业福利（雇主提供的福利）引入社会政策的分析。显然，蒂特姆斯提出的福利的社会分工仍然是资源分配问题，不过是把它扩展至包括财政及职业福利而已。

西方社会建基于个人自由的传统发展了政治民主，但资本主义市场的初级分配却制造了贫富差距，产生了失业、贫困及治安等市场失调现象，引起了各种社会问题，因而有政府的介入（透过社会政策）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福利国家。政治民主并不一定解决市场失调所引起的资源分配不均问题，因为政府干预经济制度（市场可以解决贫穷问题而不一定能实现社会平等。这就是说，政治民主并不表示政治部门一定要高度干预经济部门，影响初级分配结果。如果政治与经济部门分隔，这意味着政府形象的低下或对市场运作的回避。政府的作用是在市场失调时对社会部门内的不能自助者加以援助。这样，分配结果是集中于维持最低社会需要的满足，响应社会问题的恶化及保障社会机会的平等。因此，政府的目标及背后的意识形态决定政治、经济及社会三个部门的制度安排，这也是社会政策的动力所在。

自由式福利国家是把政治民主与社会部门及经济部门内的民主（平等）分开的。这也就是说，社会公民的政治权利与其在社会及经济部门的公民权利应有区别。从社会政策概念的发展角度看，这种理解是把社会政策放在资源分配的足够与否层次上进行

考虑。但重视社会关系分配的社会政策概念却视社会、政治及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为不可分离的，有较多的重叠性。政治民主是社会关系的前提，但这不足以解决社会关系的不平等。因此，政府要介入市场及社会（如家庭、社区及福利制度），使公民在资源、地位及权力方面达到平等。这种政策目标的驱动力是各种社会平等（性别、种族、年龄、能力、阶级及教育等）的理想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从资源分配到社会关系分配，是对马斯洛（T. H. Marshall）提出的公民权问题的响应，即从契约权利推展到政治权利及社会权利的三种公民权利。^①社会政策的概念演绎是：如果社会资源只集中于社会消费层次，它针对的分配结果可能只是基本需要的满足，但现代社会的公民期望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因此，社会权利的履行要使公民可以从组织上融入社会。社会政策所提供的经济及社会保障（如失业及退休保障、社会救济及医疗保障等）并不完全能解决公民被排斥于主要的社会及工作环境的关键问题。因此，贫穷的物质救济只满足分配结果范畴下的社会福利或社会资源部分，但贫困者可能独居于自己的居所，与社会保持距离而不履行其公民义务。又例如失业者的需要并不限于物质救济，失业地位影响着他们的日常活动模式及承担的社会角色责任。

从公民权利的不同演绎可以看到社会政策的目标、意识形态、制度安排及分配结果的不同模式。艾斯平—安德森（E. Esp-

^① T. H. Marshall. (1965), *Class, 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ew York: Anchor Book.

ing-Andersen) 的量度标准认为, 公民行使社会权利是按公民身份而非市场购买能力区分的。他提出的概念是“解除商品性”即公民得到社会资源的权利是从非商品关系的交易中获得。这种分配模式与自由市场分配、按市场能力的制度分配规则背道而驰。这种社会平等取向与市场主导的能力及金钱取向的观念是两股庞大、但相背的力量, 主导社会政策概念的转变。前者主导的社会政策目标是社会资源及社会关系的平等(永远是相对的, 但是在社会政治共识下达到的可接受水平), 而现在它的体现是消除社会排斥, 促使公民不分社会群体的不同背景, 有基本资源及能力履行其公民义务及权利。后者即自由式福利国家所主导的社会政策是公民纵使拥有契约及政治权利, 但他们应服从于市场规律, 国家只可以透过社会政策输出达到减少绝对贫穷的目的, 社会不平等是创造经济动力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从逻辑上说, 社会关系平等及社会融入的目标自然不存在优先次序, 并应受到排斥。

上述简短的二元分析架构并没有论述到保守型福利国家的情况。由于有关福利国家的研究并不是本文的目的, 以上的讨论只是为了引导出关于社会政策的背后理念、分配结果及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同样重要的是, 这样的论述是为了提出另一个重要的范畴 那就是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 表 1 中结果项目的最下角)它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一个社会政策问题。

再分配范畴和经济生产范畴

戈夫把西方学者对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相互关系的讨论观点分成三种类型：一是认为互不兼容的；二是认为相互兼容的；三是认为偶然性的。^①戈夫倾向于持第三种观点，即社会政策对经济所产生的正面影响或负面影响，取决于不同的偶然性的条件。例如失业保险及公共医疗是对市场失效的补救，公共教育及人力训练则可以提升劳动力水平，但如果福利水平过度或实施不适当的教育或培训就可能对社会资源造成浪费。

在这个社会政策项目下，我们把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演绎为经济生产范畴的分支之下，这是与其他两项（社会福利及社会平等）的再分配范畴有所区别的。从再分配到经济生产的分配范畴是社会政策概念理解重点的转移。

直至 1970 年代初期，西方工业国家是在战后经济成长的背景下发展福利国家的。但石油危机造就了经济对社会政策的压力，而有所谓“福利国家危机”的争论。从表 1 制度安排一项来理解，社会政策是福利国家利用税收作再分配（第二次分配）之用。这样，政治部门便扩大它介入经济及社会部门的程度。西方工业国家发展福利国家的历史经验是在结果项目下（由于市场失效，初级分配）国家才被迫实行再分配。这是笼统的说法，也有国家希望

^① I. Gough (1996), "Social Welfare and Competitiveness",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1(2), p. 210.

通过主动的社会政策输出，解决政治认可性的因素。

无论如何 社会政策属于再分配范畴 理论上是把资源从生产系统转向非生产系统。因此，社会政策的概念转变方向从再分配范畴到经济生产范畴，反映了两者的疏离到融合的关系。具体而言，它的演变是将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从不兼容推移到兼容性的位置。普法勒尔 (A. Pfaller)、戈夫及瑟鲍恩 (G. Therborn) 对西方五个主要福利国家竞争力的跨国研究便是一个较引人注目的工作。^①

把注意力放在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这两者的关系上，也引起了有关社会福利与劳动力市场关系问题的研究。例如，面对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相叠 广大妇女提出了疑问 为何妇女是经济生产的后备军？为何妇女在家庭内的劳动不能获得金钱的回报，但家务劳动却对劳动力再生产有间接贡献呢？为何妇女不能基于其非工作地位而获得应有的福利权利？这些问题引起一些支持妇女解放运动的学者对艾斯平—安德森缺乏性别平等观念的福利国家分类模式提出了质疑。^②

同样，石油危机导致的财政紧缩，1990年代日趋明显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促成了西方学者把社会政策概念转到它与经济政策的关系上。全球经济一体化削弱了个别国家应付国际资金流

^① A. Pfaller, I. Gough & G. Therborn (eds.) (1991), *Can the Welfare State Compet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ive Advanced Capitalist Countries*. London: Macmillan.

^② D. Sainsbury (ed.) (1994), *Gendering Welfare State*. Sage; J. Lewis (1992), "Gend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elfare Regim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2 (3). p. 159 - 174.

动所引起的经济危机的能力。这反映在对社会政策的讨论上，是把注意力从输出项目的各种社会政策内容，转至结果项目下的社会素质的研究并使之成为重要的讨论范畴如社会需要的界定及量度 社会机会、增权或能力提升的界定及量度 社会融入概念的界定及量度，以至基本社会及经济保障的界定及量度等。

无论如何 在处理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关系上 西方学者是把它放在社会资源及社会地位分配的空间上进行研究的。同时，对社会政策的讨论也从社会层面延展到经济层面。可见，社会政策不仅涉及人类社会需要的满足、社会关系平等等问题 它还涉及如何提升经济能力的问题。这样，社会政策便不再被局限于再分配的范畴，也不再被认为是公众的沉重负担了。

对中国福利发展的启示

中国的福利制度正面临经济改革的冲击。从表 1 可以看出，中国式的福利体系主要表现于职业福利的社会分工上（根据蒂特姆斯的分类）中国一度流行的说法是 企业办福利 企业办社会，“小而全”等。如果将此福利模式与西方福利国家的分类模式来比较 中国类似于欧陆的保守型福利国家 但中国是在计划经济及国有经济制度基础上实施职业福利的。中西职业福利的不同之处是其背后的理念及其制度安排。计划经济及国有经济制度下的职业福利并不以追求盈利为主要的分配标准。但在西方福利国家，追求盈利是一个前提，因此工会的介入及政府的介入是决定职业福利的重要因素。

不过 中西间的相同之处是福利制度背后的意识形态 都强调社会地位决定资源分配。中国的情况是城乡分层、单位地位分层及职位分层决定福利资格及待遇。西方保守主义思想同样强调社会地位的重要及国家（宏观集体）对公民的福利承担。除此之外，这两者同样强调社会（小社群 如企业、单位及家庭等微观集体）对个人的重要性及优先性。在意识形态及制度安排上，个人的福利只有依附于社会才能得到体现。从这点看，表 1 中的意识形态及政策目标给人以这样的启示：中国的社会主义理想与国家的具体发展目标，体现为经济改革下的社会政策。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因为，经济改革引入了市场机制、市场原则及其背后的理念 它对社会主义理想具有破坏性的影响（这可能是经济改革的原意）它同时也对中国传统家长主义的福利观有所冲击。这些问题的提出是企图界定中国社会所追求的理想及其量度指标，从而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表 1 结果项目下公民所获得的分配。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在于 在清晰的理想及目标之下 社会政策的制度安排及输出项目（具体政策）便可以确定它们的选取方向。例如 瑞典是追求社会民主的国家，失业者通过政府的积极劳动市场政策被引入劳动市场 而英美等自由式福利国家 在意识形态上把失业者看成是依赖福利的懒人，故只是单纯地向他们提供社会救济来解决问题。欧美不同国家处理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关系，正如戈夫的分析所指出的那样，这些西方福利国家所实行的社会政策并非是从同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再就业工程的启示

基于以上分析，比较西方与中国的社会政策便显得极有现实意义了。虽然中国与不少西方国家的体制不同，但西方国家不是铁饼一块。以就业政策而言，中国像北欧瑞典一样，倾向于利用积极的劳工市场政策创造就业、减少失业工人对社会福利的依赖。所谓积极的劳工市场政策，就是通过再培训及就业调配等计划为失业工人创造就业机会。在中国，下岗工人为对象的再就业工程便是成功的方向。例如在 1998 年，中共中央及国务院便要求使下岗职工（包括当年新增的）再就业率达到 50% 的水平。^①作为一种政策取向，以中国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实现这种水平的再就业率应该是可能的。而且，中国的大多数企业仍然是国家所有（集体企业亦属间接所有）因此行政指令仍有相当的作用。其次，中国的再就业工程方案比较全面，如下岗工人、社区居民服务业可在头三年享受免交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及行政性收费等财政费用的优惠。

不过，西方社会政策的经验是在肯定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之余，仍然坚持基本社会保障的不可替代性。这是基于部分长期失业工人再就业确实有许多困难，失业工人的再培训及就业选配等计划的实施还存在所谓的樱桃效应；因此，失业救济仍然很重要，甚至不可替代。可以说 无论如何 失业工人所面对的困难不会因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就业工作的通知”，1998 年 6 月 9 日。

政府强调道德制约及削减福利的主张便可以解决的。这正如在中国有所谓‘就业困难户’的提法，他们理应是再就业工程的重点帮助对象，但矛盾之处是对他们的帮助效果却并不理想。这个例子的政策含义反映了政策设计的复杂性及其背景脉络的重要性。由此我们得出两点政策启示：

其一 政策策划要考虑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及服务对象等背景因素。正如中国的‘单位办社会’的福利制度，只有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背景下才会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但是，现在对‘单位办社会’的批评并不表示当时实行这种体制有什么不对。明白了这一点，便可以清楚政策规划或分析的基本考虑。然而，中国大陆有关西方社会政策的文献，在分析西方的福利制度时往往存在简单化的问题，认为西方的福利制度是‘大包大揽、骑虎难下’。这种观点的背后是推论西方国家的福利体系是养懒人的制度。正如本文所述，社会政策涉及到许多方面的因素，西方福利国家在平衡资本与劳工利益矛盾中累积的智能及经历的失误，应该有值得参照的价值。总而言之，社会政策往往是因事制宜的，人类的经验及智能应是相互分享的。

其二，政策的计划与结果之间存在很多策划者事前不能预知的变量，而产生政策实施的非预期结果。这点对中国尤其适切，因为计划经济的惯性是由上而下、以长官的良好意愿推动的。例如经济改革的一个目标是增加下层的空间，因此中国在推动政策改革的同时也应经常对政策进行检讨，尤其是在政策实施的时候更应内置检讨机制。在缺乏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前提下，政策检讨以至强调‘用者参与’可以增强人民对政策及政府的认可性。这即

是说中国应在社会政策的策划层面将检讨机制制度化。

“社会办福利”的政策及配套问题

在制度安排方面中国的政策是加强社会及经济部门分配福利的责任，而弱化政治部门的责任。这种制度安排与西方讨论社会政策的理念转变是背道而驰的。西方国家是从再分配范畴向经济生产范畴转变，因而加强了政治部门与经济部门的紧密关系。然而经济改革下的中国例如在民政部门提出的口号是“社会福利社会办”这即表示把政治部门与社会分开并依赖经济部门的市场规律界定社会政策的对象及待遇。部门之间关系的再界定，自然影响社会弱势社群的分配结果。但是，中国目前的社会部门显然没有能力负起“市场失效”或“国家失效”引起的社会问题。

现实的考虑是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是政府财力萎缩。表 2 比较中国与欧盟 12 国的社会政策开支从中可以看到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其介入社会的经济力量居然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况且中国的有关统计数字已包括了物价补贴。可见中国的国家力量主要是依靠政治及行政手段。即使就中国的整体财政开支而言也赶不上欧盟的社会政策开支比例。令人忧虑的情况是中国政府介入社会及财政的实力正每况愈下。从这一点来看，“社会办福利”有其客观存在的依据。

另一方面是社会部门的实力问题。中国在解放后实行的社会主义体制基本上是以政治为主导的，政治压倒一切，而社会（包括经济）部分却缺乏相对自主性。经济改革释放了社会部门的能量；然而，它的成长及独立自主是需要培养出来的。这即是说，“社会

办福利”存在国家支持的问题。不然，在缺乏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承受市场经济洗礼而牺牲的自然是社会内的弱势社群，即那些缺乏市场力量的民众。

表 2 中国与欧盟社会政策开支 * 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之比较 (%)

年份	欧盟十二国平均	中国	(中国政府总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比率)
1985	25.9	4.96	(18.89)
1990	25.2	7.32	(17.87)
1993	27.7	5.26	(13.72)

资料来源：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1995) *Social Protection in Europe*, Brussels-Luxembourg, p.61; Walker & Wong, (1996).

* 社会政策指四项社会福利项目 即教育、医疗、房屋及社会保障 中国有关资料还包括物价补贴 但排除单位福利开支。

以上谈及的两难选择反映了中国福利改革的困难及其相关的发展策略。这个两难选择的解决途径是要引入适当的机制，如实施旨在增加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税务改革等。这样，政府才可以通过财政补贴，使社会部门有能力承受市场失效引起的社会问题。西方福利国家的情况 是由于社会部门不能承担这样的任务 政府才被迫介入（当然，介入后产生的制度引力又是另外一个问题）。鉴于中国劳工的福利开支一直居高不下（从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来看）工人的保障待遇 如养老 受到了限制 因此西方福利国家通过税收再分配的机制实行成本控制是有根据的。从表 2 看，所罗列的社会政策开支比率较高，社会福利或劳工福利是一项社会负担 然而 其抽取资源的不同机制是会影响经济成本的。西方

福利国家通过税收再分配解决福利问题却不直接影响成本，因为它是在企业获得盈利后才进行的。这显然有利于减低企业成本，尤其是亏本企业的营运成本。新加坡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立刻减低中央公积金的供款，以增强该国企业的竞争力。这是个很有启发的例子。

总之，对于财政力量仍然很薄弱的中国政府，需要客观评估西方福利国家的运作机制及其背后理念。另外，社会部门办福利的先决条件是其内部具备类似政府的力量及实施的机制（如服务的公平及持久性），要避免使最缺乏能力、关系及资源的弱势社群成为社会的排挤对象。为此，社会服务专业化和中介组织提供福利是不可或缺的两项条件。这两者应具有既相对独立于政府、又依靠政府的特征。例如，医生及法律专业要政府立法维持其自主能力；民间福利机构要依靠政府财政资助才可提供具备规模的福利服务。

中西福利制度走向聚合： 经济与福利的整合

不过，政治部门影响的削弱有其正面意义，它增加了社会及经济部门的生存空间，有助于公民社会的出现及巩固。从长远来看，这些空间将成为发展社会权利的基础。但是，中国的福利体系是依靠初级分配的职业福利，这是不同于西方国家主要依靠社会福利的再分配能力。因此，经济改革的目标是改革初级生产系统。在理论上，这并不排斥职业福利继续发挥它的经济及社会保障作

用。因此 经济改革激活的福利变革的较好发展方向 可能是加强职业福利的社会性质。这样，一方面是保持它的经济及社会保障作用；另一方面也减低职业福利造成的社会不均结果。同样道理，由于政治部门正从初级生产部门退却，政府更应该介入社会及经济部门 即加强资源再分配 如税收制度)尤其使社会部门有能力解决经济改革引起的‘市场失效’问题。

从西方学术界对社会政策概念理解的转变来看，我们可以预见，经济改革下中国的社会政策议题将愈来愈与西方相似。不同社会群体所面对的资源及社会关系的社会平等诉求，亦将随经济及社会发展而提上社会议程。对于决策者来说，开放政策仍将是他们在 21 世纪需要坚持的方向。

总 结

本文阐释部分西方学者对社会政策的理解，并建构一个概念架构。它比较全面地显示出社会政策在福利制度中的位置。制订社会政策不仅是属于政府的行为(主要为社会福利、财政福利及职业福利)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不同社群的分配结果(资源及社会关系)左右社会政策产生不同结果的是社会、经济及政治部门的制度安排。我们发现 强调经济部门独立运作的福利制度 认为社会政策会对经济生产产生负面影响。因而，它依赖社会部门的力量解决社会福利问题。相反，强调政治部门对经济及社会部门的介入 会正面看待社会政策对经济生产的作用 并通过分配及再分配实现社会公平及社会融入的目标。社会政策是福利制度的输出

部分 它的意识形态及国家目标投入是起重要作用的。不过 我们要指出，这个概念架构内项目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

本文也试图用这个概念架构来分析中国的福利制度。鉴于我们对中国的认识不深 所提的看法会有不周之处。但是 政策比较方法是通过比较相同及相异的现象，再把它们放到社会背景上加以分析。我们所用的概念架构是以经济部门实行市场机制为假设的 因而 社会政策主要是在再分配的范畴内进行运作。在经济改革前的中国，经济部门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国家所有及以计划经济为指导。从这点看，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制度上与西方合轨。若从社会政策的概念架构来看，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在福利制度的投入及结果部分需要更新其理念及量度指标呢？这应该是国家重建工程的一个重要部分。不过 可以断言 在以职业福利及其背后的工作道德伦理为主要理念的中国福利制度下，有关的政策项目等将会继续受到重视。我们看到，西方学者对社会政策的理解愈来愈重视其对经济生产的正面贡献。西方学术界辩论“福利国家危机”也是重新肯定福利国家全面就业的假说 而对“就业就是最好的社会政策”的看法也没有多大异议。然而西方学者也注意到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限制。另外 中国一度提倡的‘社会办福利’反映了它所处的两难局面。一方面政府财力减弱 但另一方面‘社会办福利’存在配套及增加企业生产成本的弊端。

总的来说，本文通过对社会政策概念理解的转变来比较中西福利制度。比较政策的好处是它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分析了个别社会或文化所声称的独特因素，以确定其普及或独特的性质。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社会关系平权化及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下 我们

可以说，比较政策的努力是对这些结构性改变以及知识领域中加强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回应。

（王卓祺 译）

中国乡村的文化生活： 以川主庙为例

约翰·弗洛尔 帕米拉·利奥纳

编者按 约翰·弗洛尔 (John Flower) 社会人类学家 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东亚史副教授。帕米拉·利奥纳 (Pamela Leonard) 社会人类学家,1994 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人类学教师。两位作者多年来致力于中国西南农村地区在社会转型时期价值变迁的社会人类学研究 曾在四川省农村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实地调查 本文便是他们在调查研究中取得的一项最新成果。

本文以四川某地川主庙的复兴为个案,阐释了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民对国家、社会、个人三者关系的思想观念 特别反映了农民面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急剧变化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冲突与道德困惑。文章认为,中国正处于信仰危机与强烈的价值变迁的阵痛之中,当经济与文化生活上的控制被削弱后,文化多元化已经开始重新出现并填补价值的真空。这就是说,一方面某些地区未能适应社会的巨大变迁 以致在改革进程中放弃了以辩证唯物主义对人民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

另一方面却是各种具有民间宗教色彩的迷信活动影响的扩大，让唯心主义打着发展经济的旗号大行其道。从这个意义上看，本文所揭示的现象和问题足以引起人们的警觉。

许多当代中国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了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传统文化生活正在复兴。自 1981 年农业开始非集体化后 农民家庭再次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农民享有了为市场所需的各种生产自由。但国家对农民的日常生活仍具有强大的影响。经济改革和文化开放使社会关系出现了各种新的形式。农村和作为农村社会变迁发动机的‘乡镇企业’有了惊人的经济增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备受关注。在纯粹的经济领域之外 还出现了以增进村民利益为目标的‘群众组织’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这些表面上具有自愿性质的组织和相对自主的经济实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构成一个初生的‘市民社会’这个问题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正如中国人所说 这个现象似乎是从专断的社会生活‘后退’其实体现了中国农民在更大程度上对自己的事务有了把握。

有人乐观地认为，一个新的中国人的公众环境正在商品化和远离国家控制的发展过程中形成。对这种乐天观点产生怀疑的理由确实大量存在。研究表明 中国贫富地区的分化日益扩大 乡镇企业的影响有限 在‘神奇繁荣’圈之外还存在一个不发达的内陆地区。‘商品化’自身被很多中国农民视为一个复杂的神赐 既带来繁荣，也带来不安，并消蚀着农村生活的社会纽带。更有甚者，即使自愿的‘非政府组织’可被视为在国家控制下进行活动的 它

们实际上是“政府组织下的非政府组织”。^①

然而我们在四川西南一个山村的生活经验表明国家组织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地方空间正在中国农村形成，这一空间可视为是经济发展加速后带来的商品化社会的产物。我们将以实地调查了解到的一个地方复兴寺庙的个案为例说明农民们在面对经济、社会、道德和政治的急剧变化后是如何以一个自发、自愿的组织作出反应的；其中心问题是对地方寺庙复兴这一现象应如何作出界定。有些官员试图把它作为封建迷信活动而加以严惩；而寺庙活动者们则称之为合法的宗教表达。虽然在学术研讨中，有人认为农民的这种信仰活动是一种反对国家垄断权力的表达方式，但我们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作用，并认为二者之间有一种相得益彰的关系。透过一个地方复兴寺庙的个案现象，我们看到村民们对自身社会定位与自我定位的重视；从而理解在寺庙自发复兴中起推动作用的动力，以及国家对之加以控制与引导的意义。

政治和经济背景

我们进行实地调查的村庄，是一个从省会成都出发需乘车约三个半小时的“山区”按时下中国的标准被认为是一个贫困的地区。陡峭的山坡、高地山谷和深石峡构成为主要的地貌。在陡峭的坡地上种植的作物主要是玉米。村里几乎没有稻谷田，农民们每

^① Liang Congjie, quoted in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newsletter (March 1995).

年都必须花钱购买大米，或以玉米交换大米。在过去的 20 年中，采石（主要是基建用石头）和饲养奶羊等副业在村里已有所增加。解放后 农民生活水平总体上有所改善 农村经济改革后有了更快速的发展 因为农民能够更充分地种植新型的混合作物 并增加了打工挣钱的机会，扩大了新的牛奶市场。尽管这个村的经济水平一直落后于水稻种植区和邻近大城市中心的郊区农村，但自集体化解体后取得的实际成果还是开始受到侵蚀，因为通货膨胀开始吞噬缓慢增长的收入了。

就在村民们开始感到通货膨胀的压力时，他们也看到城市和沿海地区发生的巨大的经济繁荣，以及伴随政府放松经济控制后铺张浪费与腐败现象的增加。农民对官员腐败与税收增加是深恶痛绝的，腐败、乱收费都在掠夺地方和农民的收入。邓小平于 1992 年 1-2 月的“南巡”是对实行更自由更开放的经济政策 对沿海地区的进一步发展的有力推动。邓小平认为，市场经济有利于中国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的牌子需要更加普及。为此，1992 年中共中央发出了重要的“二号文件”。这一文件甚至允许政府雇员寻找“第二职业”也导致了政府的重组 使镇政府在行政管理方面拥有更大的权力。

在这个地区，地区政府把县镇行政部门的重组当作控制县政府某些税基的一个机会，因此县政府不得不削减了其工作人员标准收入的 25%。然而，这些减少了收入的国家干部，因被允许以机关和个人从事赚钱的商业活动而稍有补偿。由于这个变化，县政府局机关的工作人员（如林业局、畜牧局、农业局等）几乎在一夜之间停止行使自己的职业角色，而从事其他行当。有些官员无所

事事 在办公室里花很多时间喝茶、闲聊、看报甚至玩牌。与此同时 在自由的新气候下有许多新企业被建立了起来 有些企业并不致力于发展生产性的经济事业，而仅仅希望在进一步划分现有市场的过程中得到好处。新的彩券销售点、便民商店、酒店饭馆顿时布满县城大街。还有很多单位投资房地产，甚至兴建豪华宾馆。他们还设法利用其官方权力牟取特殊收入。于是，产生了部分公共资源向私人转移的情况，公共经费被挪用或通过相当不规范的途径转化为投资资金 使某些城镇居民大获其利 而农村则陷入了发展的困境。

例如 镇里不能支付水利灌溉的常规修复费用 因灌溉水渠失修导致了水稻插秧时节的水荒，以及水渠下方局部坡地的水土流失。公共经费大量非规范使用于各种生意活动，导致了严重的银行危机，农民贷款被收回，许多村民发现他们缺乏现金投资生产。国有企业的重新定位使一部分农业生产资料出现短缺 化肥、种子等基本投入的质量也受到了影响。在我们居住的村庄前曾建有一条道路，但由于交通局的腐败，建路时用沙子代替了水泥，结果 1993年春的一场大水冲毁了整个路面，致使农民不能及时通过这条道路把新鲜牛奶送到奶粉厂去加工，使养牛的农民蒙受了很大损失。这些情况都反映出了农民面对的困境。政府官员的管理失误和腐败、通货膨胀和犯罪案件增加 都引起了农民的抱怨 高税收和偿还政府贷款的压力，也扩大了农民的不满。

在此期间，我们从四川的很多地区耳闻目睹了农民与地方官员怒目对峙的大量事例。在一个镇上，农民们非法拘禁了一个县里的官员达 12 小时之久 直至当地政府承诺将把一笔从出售农田

而筹集到的资金管理好之后，这位官员才获释。另有国际上的报道称 仁寿县的愤怒居民 采取行动反对官员以建设高速公路为名征收附加费的做法。^①这些政治、经济现象，成为一些村庄复兴寺庙的直接背景。

本地人的担心：寺庙的情形

“ 二号文件 ”宣布加速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 不少地方出现了重建寺庙以及寺庙数量增加的现象 在“ 发展旅游业 ”的伪装下 ,1992 年和 1993 年开始修建或重建的寺庙遍布于我们进行实地调查的地区。这一趋势 因坐落在乡政府所在地的“ 川主庙 ”的复兴而得到特别加强 并因在寺庙入口处树立了一块巨大的“ 游客中心 ”公告牌而达到高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当地政府对寺庙活动的复兴提供了支持，当地村民因有官方的允许而大兴寺庙建筑，并通过寺庙活动表达自身的利益。

当我们在 1991 年底第一次到达该村时，供奉川主的神庙是荒芜的，仅保留着一些小寺庙的遗迹：曾经是神像一部分的一把剑一只鞋以及在一个石板台子上的一些旧雕刻等，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具有明显的意义。有意思的是，正是在邓小平南巡之时 当地居民请人雕刻了川主的木头像 并且川主庙被正式重新开

^① Lena H. Sun, “China’s Peasants Hit Back; Rising Rural Unrest Alarms Beijing”, *Washington Post*, June 20, 1996, p. A1, Col. 5; Kuo-Cheng Sung, “Peasant Unrest in Szechuan and Mainland China’s Rural Problems”, *Issues and Studies*, vol. 29, No. 7, p. 129 - 132.

放。这并没有得到政府的许可，完全是一个自发的事件。

在解放前 当地每逢农历六月廿四 都要在川主庙举行每年一度的节庆，来自邻近村庄的村民也一同分享这个节庆。在这一天，川主的神像传统上被护送到建在乡所在地的第二座寺庙，川主在那里度过整个夏天和雨季。在 1992 年 7 月 本来没有计划庆祝川主节 因为这个庙仍然是“非官方的”并刚开始被筹建。无论如何 当地政府是不赞成“封建迷信”行为的 并明确意识到当地村民已经开始积极策划复兴川主庙的活动，便决定在川主节前两天砸毁寺庙里的川主新塑像。这一行动揭开了一系列发生在川主庙的“奇迹般的事件”。首先 两个乡干部走进川主庙并试图烧毁川主雕像的衣服 但他们没能把火点燃。然后 他们动手敲掉了雕像的头，并取走其残缺不全的遗留物，放在乡政府地下室里。第二天，即川主节前一天，一场大洪水肆虐了这一地区 冲毁了我们住的村里的三间房子 这场大水还冲垮了这个乡的高中校舍 学生不得不迁到乡政府办公楼去上课。

川主庙供奉的神——川主 是一个历史人物 他被认可的身份就是先秦的“正直官员”李二郎^①。他通过建设一个巨大而复杂的二千年后仍在使用的灌溉系统“缚住苍龙”并把四川盆地从容易发生水灾的洼地改造成为今天肥沃而稳定的农业地区。随袭渎川主庙而来的发生在川主节前夜的这场洪水，足以加强当地民众恢复川主庙的心理。而且 川主是一个“正直官员”的事实 与乡政府

川主即民间信仰中的二郎神，传说为战国时秦国蜀守李冰的第二个儿子。据有关文献记载 川主信仰 在五代十国时已出现。“蜀人奉二郎神 谓之川主。……盖李冰之子也。”——译者注

查禁重建川主庙的决定 以及一些地方官员的‘不正直’行为形成了对照。因此，川主庙的自发恢复，乃是对政府权威的内在挑战：它是一个‘自发’和没有控制的挑战 是一个以对缺乏权威的‘好政府’理念形式下更加微妙的挑战。这一结论被同时出现的其他‘异端’现象所支持。例如 在川主庙里流传着一个手印本 吁请人们忏悔恶行 追随慈悲之祇 即观音菩萨 从即将来临的可怕时代中解脱出来。^①

市场经济日益加剧的变化明显地使一部分人感到失落。市场经济还造成一部分群众对政府的不满，并或明或暗地反对党的领导。在一些极端的例子中，一方面是村民试图挑战权威，另一方面则是地方官员企图查禁‘封建迷信’活动。我们曾与一位乡长进行过有关讨论。对这位乡长来说，生产中起作用的主要动力是以‘科学’反对‘迷信’。他以所谓的风水思想为例证说道，同样一亩地可以有不同的收成，一个能干的人可以得到很好的收成，另一个懒惰的人不努力工作就没多少收成，但他却不责备自己的懒惰，而是责怪土地的风水不好。这位乡长抱怨农民因封建迷信而抵制科学新观念，并导致了农民的保守性和落后性。他显得很激动，在谈话的

^① 这本名为《观音菩萨救谕文》(Guanyinpusa jiu yuwen) 的手抄本 源于一个相信观音菩萨并虔诚念经的河南妇女的故事。这个妇女离开人世后，因为有虔诚的信仰，所以死后七天被观音带出地狱，返回人间生活。这个故事描绘了善良可以摆脱邪恶、灾难和不幸。这篇手抄本的内容预示了恶人将面临危机，即使是富有的、高高在上的、强势的、有学识的人也不被赦免，勇士和将军被毁灭，医生将不能治好他们的病。最后，十八层同心坑将吞没恶人，他们将被压石磨中间，变成鬼怪。天启将升到灾难的高潮，他们先看到自己被疾病折磨得奄奄一息，第二年的灾难则更加残忍。——作者注

三分钟里给农民扣上了一顶又一顶的帽子 愚蠢、保守、迷信、不科学、懒惰、落后思想、不接受新思想和新方法、短视、近亲繁殖和不听话，等等。从他的观点上看，特别是最后一点——农民“不听话”是地方官员们的一个共同抱怨，并常与坚持‘封建迷信’相关。“封建迷信”是一个既脱离党的领导又直接挑战党的领导的思想范畴。因此，川主庙的自发恢复和被查禁，招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和极恶劣的影响。虽然川主庙被拆毁了，那些表示不满和不听话的农民也遭到了批评，但这些举措都被证明无济于事，于是只剩下一个可选择的解决方案，这就是把川主庙置于党的控制之下。官员们确实采取了这个策略，但它涉及到从‘迷信’到‘宗教’的转化，并试图改变民间宗教自发恢复的性质，使川主庙具有被认可的地方身份，成为被官方化和国家支持的寺庙，为发展旅游业服务。

重新界定与控制：一次关于 川主庙的会议

那场洪水之后，乡政府的领导发生了变化，新的高书记走马上任。高书记一反前任对川主庙的态度，决定支持恢复川主庙。塑像被搬回川主庙后，高书记前往检查，当他靠近去看塑像的鞋子时，刚好塑像倒在他的头上。此时，有人将这一偶然现象解释成为一个吉兆：川主向高书记叩头以感谢他的支持。

在一个组织川主庙领导机构的公开会议上，高书记对他支持川主庙的态度进行了解释，他尽量不说自己的动机，而是根据‘正统’原则进行发挥，即根据党的领导和党的宗教政策，以及根据‘二

号文件精神”党号召我们“要发展经济和发展旅游业”。他说道：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干部会议（原话如此！）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进行迷信活动。有些人可能会胡说八道，说我们正在进行‘封建迷信活动’，但我们的活动符合党的宗教政策。我要强调这一点。除此之外，我们有一个七人管理小组专门负责川主庙活动。”

“首先，我想说建这个庙不是我自己的个人决定。它是由上级政府批准的。而且，有管理、有领导、有纪律。最重要的是，绝对没有进行封建迷信活动——没有‘神怪’也没有‘妖术’。如果有人搞封建迷信，我将要重重地惩罚他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现在，为什么乡政府支持川主庙？有些谣言说是政府想要钱。我保证政府决不拿走一分钱。所有庙里的收入都属于庙。政府不仅不拿庙的钱，而且还增加你们收到的钱。川主庙有党的领导、组织和支持，所以不要担心。现在每个人都走出去结交更多的朋友。朋友越多，建设越快。因此，通过艰苦努力，我们就能够实现政府交给我们的任务。这里所有的一切，土地、树木都是属于国家的。我们所需要的是吸引更多来自外地的人，更多的旅游者，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改善这里的经济环境。经济建设对你们有好处 你们应该‘开放’。只有一个重要原则 每一件事情都必须符合党的宗教政策。……从金峰寺来的两位师傅（负责川主庙的佛教女尼）都熟悉宗教政策……你们有全国人大代表王市长的强大支持。这并不只是我，也并不只是我狂想

建这个庙 它的重建符合政策。”

在高书记的讲话中，他反复强调了两点：庙必须有党的领导，“迷信”将被“严惩”。另外，他将建庙提到“发展旅游业”的高度。“遵照党的宗教政策”意味着把庙的身份改变成为符合国家支持的佛教寺庙。这些是当局试图赋予寺庙恢复以其自身意义的基础。高书记对庙的经费问题特别敏感，因为庙是由当地村民捐献钱、建筑材料和义务劳动而恢复重建的。许多村民对政府来得太迟的参与表示出愤怒，感到“挣钱”新伦理将引导政府剥削他们的庙，以及他们投入其中的现金与劳力。高书记想缓和大量群众的担心，只要他们停止“封建迷信活动”，并接受政府对庙的界定，即认可旅游业发展要以宗教活动为载体，在佛教徒的参与下，政府将同时为庙的恢复与更多旅游业的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高书记联合寺庙领导小组成员，积极进行游说工作，以争取更多人的支持与合作。其中最为主动的是一位来自县委统战部的郑姓女士。郑是把川主庙身份从民间宗教改变为佛教这一运动的先锋人物。她继高书记之后讲话，提出了许多事实上促进川主庙自发恢复的意见：

“现在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了。我们确实遵照宗教政策做事情。我们将开放……川主庙需要吸引群众。如果我们吸引群众，我们就能挣钱……这对我们的经济有好处……如果经济好了，地方的农民就会有钱。这样的话，当乡政府要你们交税时，你们就不必那么忧心忡忡，因此，建庙是一个好事情。

它对国家有好处；它通过给群众信仰而使他们以一定形式帮助国家。所以，我们不要太自私。我们大家来到这里是为了一个更好的生活，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一个更好的生活。‘天心不顺，民心不安’。今天的社会有许多丑恶的东西，如长途汽车上有年轻人进行持刀抢劫，造成社会不安定。我们重建寺庙的一个原因就是纪念像二郎（川主）这样的好官。通过纪念他使人民受到教育告诉他们什么是‘善’并‘挽救’坏人使他们到这里来并转变为好人。如果每个人都有信仰，那么就有利于维护家庭与国家的和平。因此，它是有利于家庭和国家的。”

她强调信仰是治疗社会腐败的一剂抗毒药的言论，反映了大多数与川主庙有关的村民的态度。他们之间观点的真正区别在于当地群众想保存寺庙的原初身份和性质而郑则想建一个寺庙（佛寺）想把川主庙吸收进更广泛的佛教机构。为了这一目的，郑设法取得一些高级佛教女尼的支持，并说服她们参与对寺庙的管理。

在调查中我们想要知道川主庙原初的属性便问道：“它是像当地人所说的是道教吗？”一位尼姑很不耐烦地回答说：“这宗教，那宗教 这些寺庙决没有任何宗教 道教 哈！……道教实际上不是一个宗教，它关心实在。佛教更文化和博大精深。这就是为什么国家支持佛教的原因。”她还补充说“历史上佛教总是‘牵着道教的鼻子走’，控制着道教。她公开显示出既蔑视一般的民间宗教，也蔑视特殊的道教。更有趣的是她还说：“我们在五台山吃的东

西太好了 但在这些小寺庙——实在令人讨厌极了!”这尼姑在当地受到了尊重的礼遇，究其原因，这个尼姑还是地方的政协委员。后来，我们看到她被领导小组和党委书记护送到庙里。

国家接受佛教是出于如下一些原因：佛教是容易控制的宗教组织，它被视为一种“世界宗教”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消极的道德说教。中国的宗教政策允许与共产主义目标保持一致条件下的宗教自由，官方文件已经认识到宗教在维持秩序和吸引经济发展中能起的潜在的建设性作用，^① 强调统一领导下一个单一宇宙传统观念的共鸣。这样的活动是被宽容的，甚至是欢迎的，只要它与官方政府的机构保持一致并接受其领导。

寺庙在中国农村是一个初生的“市民”机构，独立于国家，但仍有一种相互合作关系下与国家相关联。这一关系只有根据强调其动机并在寺庙复兴的特定时间关系下才能被理解。改革期间，中国的“宗教复兴”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不仅包括寺庙建设，还包括以家族为基础的祖先崇拜仪式，供养“灶王菩萨”^② 以及散布于各地神庙中供养“土地神”的仪式，特别是在中国东南部，祠堂和地

^① 参见 James Thrower ed. “Article 36 and ‘Document 19’ : Religion and the State in Contemporary China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Islam in the Xinjiang-Uighur Autonomous Region”. Thrower 对中共中央 1978 年 19 号文件所提出的宗教政策作过仔细研究，该文件的英译本于 1982 年出版。19 号文件为所有层次的干部所制订。第三节评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往宗教政策的失败与成功，特别注意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主义错误，号召全体宗教信仰者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团结一致；第十节说明世界三大宗教对于国际交往的作用。文件阐述了不同于“迷信活动”的“宗教活动”是合法的，但宗教组织要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原则。

指灶神。——译者注

方性节日又重新开放了。^①在我们实地调查的地区，地下宗教崇拜活动吸引了一些群众参加，主要是在家庭祭坛、墓地和土地庙烧香、烧纸钱。这类活动即使在集体化时期也在暗中进行，并在 1980 年代后期更加公开地进行。不过，在我们所调查的地区，较小的地方寺庙在 1992 年才重新活动。

根据调查，早在 1980 年代，中国许多地方都在大兴土木进行寺庙建设。寺庙为何在此时“恢复”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一个可能的回答是，市场经济在特定水平的繁荣引发下，通过各种捐赠活动，使传统的社区势力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投入，进而刺激了寺庙的重建。同时，寺庙与地方性节日也为经济发展、为做生意打基础的关系网提供了难得的机会。甚至以“粗俗化”的宗教仪式后果为代价，刺激了寺庙重建。如此看来，在经济更发达的地区，如邻近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的东南沿海地区恢复寺庙活动，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在更遥远和贫穷的地区，如四川，寺庙建设的时间滞后可能反映了经济发展的时间差。这一解释置于邓小平南巡和“二号文件”的背景下，似乎更具说服力，其目的在于通过鼓励群众以沿海经济繁荣地区为榜样，如学习深圳（邻近香港）的经验来刺激内地经济的发展。

川主庙的重建似乎符合这一模式，市场经济与寺庙建设之间的关系耐人寻味。准确地说，重建川主庙背后的动机并非出于关系或经济原因，而是反对随市场而出现的商品化关系。人们可能

^① Heien F. Siu,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从中稳妥地得出结论说，市场改革可能与寺庙恢复的时间相关联，尽管这一关联并不能告诉我们为何一个具体的寺庙正在恢复，毕竟中国是一个大国家，各地条件千差万别。这就是说，中国东南地区表现出的宗教复兴与经济动机的混合是一个特例而不是规律，这是十分可能的。辽阔内地的大多数地区是一个不同于广东省那些迅速繁荣的农村的世界。事实上，我们讨论这一财富的不平等是基于市场改革的现象之一。这点燃了四川人的不满之火，不满就表现在对当地建设寺庙的反应中。

可以说，当地村民恢复和重建寺庙的动机是自发的，从而有别于那些主要出于政府要发展旅游事业的动机而重建寺庙的行为。虽然后者通常供养着教职人员，并为崇拜信徒与观光者所造访，它们的宗教活动是国家认可的（绝大多数是佛教，尽管四川有一些中国最著名的道教宫观，特别是成都的青羊宫、青城山道观），其更强烈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文化—民族的精华或遗产的创造，而并不在于其宗教。与此相反，地方寺庙是中国“民俗宗教”或“民间宗教”的中心，或者如更少同情而更通常所说，是“封建迷信”的中心。正如我们的分析所指出，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观点区别，这种观点引导人们进入围绕文化民族主义、现代化讨论以及与此交织着的“农民”与“知识分子”话题进行更广泛的探讨。对于目前的讨论来说，地方寺庙是一个具体社区的历史记忆，它或明或暗地表达着目前的道德判断。更进一步说，“封建”与“民间”之间的分类和冲突，反映了国家与地方社区相互关系中的矛盾。由于这些原因，国家直到1992年都视各地新建寺庙为一种不祥之兆，并一直试图阻止民间的寺庙活动。这加强了我们的论点，即寺庙恢复的时间对于

理解其背后的动机乃是至关重要的。

川主庙在 1991 年最早出现活动时，当地官员感到这是有理由加以处罚的“封建迷信”的不祥之兆。到 1992 年高书记根据“二号文件精神”决定，把自发的动机引向经济发展。在那场洪水之后民众对川主庙的支持达到了关键的多数，这无疑使上述决定更易作出。不过，它也反映了“挣钱热”正吸引着整个国家，以及高书记明智地估计到公众的不满程度最好“顺从民意”。这就是恢复川主庙背后的关键之处——使政府顺从人民的意愿。尽管政府把寺庙转变成挣钱的建议的基本理由，正是寺庙活动者不赞同的真正倾向的讽刺性表征，但它提供了双方和解的相互合作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当地群众对政府介入重建寺庙的事务并不表示震惊，这是重要的。相反，舆论对政府参与其事持有欢迎的态度。地方相当欢迎郑女士筹创的佛教仪式，但提出为佛教“观音菩萨”建立一座分离的建筑，并坚持不遗弃寺庙的传统名称与身份。

和解状态可能是对金钱利益的相互期望的一个产物——寺庙希望在政府的同意下取得建设资金，而政府则期望从潜在的旅游发展中得到回报，但存在着他们分享共同利益词汇的另一个领域。如果没有确实相同结论的话，那就是变化着的价值的领域。官员们从他们的立场来看，希望恢复寺庙通过“精神文明”的发展有助于制止上升的犯罪率。与此相似，农民们普遍抱怨如今每件事都以钱为饵，而不是出于人性之爱。通过这一点，人们可以发现，寺庙恢复既是对社会变迁的一种广泛批评，同时也是对现在蔓延的官员腐败的含蓄批评。在一个更积极的意义上说，村民们在寺庙中创建了一种社区文化，他们不顾国家把它吸纳为旅游业和官

方佛教的‘混合’领域的努力 而强调寺庙所具有的地方身份。

村民们对川主庙的反应

若认为全体村民都主动支持川主庙恢复，这将误入歧途。大多数村民的生活都是忙忙碌碌的，以致人们除了去凑几天节日的“热闹”之外 难以再去参加其他活动。同样 把恢复川主庙归结为怀旧 这同样将误入歧途。实际上 川主庙充当了对村民们生活其中的变化着的世界表达意见、声明自己重要的价值取向的公共场所。

一些村民对川主庙甚至怀有敌意 视之为迷信 或者更常常愤世嫉俗地视之为挣钱的另一个政府规划。曾与我们谈话的一个中年前村干部对政府参与寺庙恢复，以及宗教回报政府的服务特别感到厌倦。首先，为回答谁是川主这个提问时，他把这个庙神与“省委书记”相比较 并且补充了相当蔑视的发现 即“他被期望为一个神 但他却是一个人！”他说：

“地方领导变动后 他们决定开放川主庙。党的十四大号召‘发展文化’ 所以他们随之前进。他们发展它 收门票并从中挣钱——那就是关心‘文化发展’的内容——一个去挣钱的策略……的确 它是‘建设精神文明’的一部分 但它确实意味着告诉群众，控制他们。菩萨告诉群众要如何行为，这是非常有用的。……你们的国家有学位，我们则有权威以及长长的权威主义历史……权威对于公共秩序与社会稳定都是重要

的。”

虽然多数人并不持这样一种愤世嫉俗的观点 如上所述 川主作为一个正直官员的身份使他与今天官员之间的关联十分平常。在许多情形下，评判官员在于他们与川主庙有着怎样的关系。在川主节举行期间，有一个农民是这样对我们解释这种关系的：

“乡长和书记今天都到这里来，他们当然都叩头了！他们是官，但他们仍是群众的一员。对于一个官员来说，表明他是群众中的一员，就像我们一样，是重要的。一个官员需要群众的支持。官员与群众应该相互尊重。农民有文化，农民中有知识分子，农民中有乐手和能读经的人，这都表明农民具有文化知识。”

这一谈论既揭示了一个好政府的理想，同时也揭示了一种强烈的自豪感 表达了常被官员、城市人和知识分子看作二等公民的农民的本质价值的声明。后来，那个人还称赞书记和乡长团结并尊重群众 表现在他们对川主的尊重中 同时抱怨以前的官员（他们试图查禁川主庙）以及他们从农民的收入中扣税的不公正与无礼的行为。

我们听到了关于党的官员及其对川主庙的管理失误的许多抱怨。在这些批评中 主要抨击并非反对共产党领导 而是对一些党员缺乏党的崇高理想表示不满——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在同样的场合 另一位妇女说她正要到川主庙来时 在村里遭

到别人的阻止：“他们反对我到这里来，但我说：‘你们不能阻止我。’他们反对我，因为他们说这是‘迷信’。但他们应该更明白什么是迷信，这是中国的宗教信仰……”说到这里时，她的话被一个男子打断：“他们是党员，党员不相信这些……”她回答说：“但这是宗教信仰。”

当然，这是文化界定的关键问题。川主庙的活动是迷信还是宗教？^①正如我们已经看到，国家支持的寺庙活动是合法的；自发恢复的民间宗教也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并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但当地村民不作如此区分。对于他们来说，宗教信仰是抵御风浪变化的一个重要的锚；当他们发现自己周围是被那些似乎一无所信者所刺激的混乱包围时，宗教提供了他们信仰的价值。

结 论

在毛泽东以后的时期，中国处于一个快速变化的过程之中。随着共产主义作为一个总体的合法的意识形态信仰正在被淡忘，中国正处于信仰危机与强烈的价值变迁的阵痛之中。当经济与文化生活上的控制被抽离后，长期查禁的言行方式已经开始重新出现并填补价值的真空。川主庙的个案表明了村民们对经济、政府、社会中发生的变化之反映。通过川主庙，村民们试图重建权威、公

^① Ann Anagnost, “Politics and Magic in Contemporary China”, *Modern China*, 1987, vol. 13, No. 1 (January), p. 40 – 61; Stephan Feuchtwang and Mingming Wang,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or a Contest of Histories: Representations of Chinese Popular Religion”,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vol. 16, p. 251 – 272.

正与自由等价值之间的“和谐”并试图声明地方性身份以反对国家控制文化界定的努力。

一个处于国家与家庭之间、并外在于市场的‘公共领域’正在中国农村出现，而川主庙自发的自我组织乃是其明显的重要例子。支持川主庙的村民们表达了他们对其周围变化着的世界的混乱和社会腐败的不满。通过川主庙，他们批评社会上的腐败、不公正和价值及行为准则的缺乏，他们提出公正的好政府的理想，以及与权威之间的正确关系。川主庙同时还是当地自豪、身份与文化表述的一个重要来源，为此村民们抵御着放弃这一地方性身份的压力。在此意义上，川主庙的恢复加强了理查德·马德森 (Richard Madsen) 的思想，即“市民社会的联合并不只是利益群体，而是社区。而社区是历史形成的，它们是‘回忆的社区’。”^①

作为一个从回忆中重建的习俗，川主庙实现了解放前曾发挥过的一些功能，特别是地方社区中心的功能。这一理念的重要性在于，川主庙是村民们获取某些不应被低估的乐趣的地方。正如韦勒 (Weller) 所看到的，中国民间宗教的热闹活动形成了潜在意义的一种厚实聚集，浸透着大量可能的诠释。川主庙的情形充分表明了冲突着的意义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孤立地把川主庙阐释为社区身份的一种表述，以强调村民们遭遇那些如商品化、科技进步之类全球化术语时的地方特色。正如在中国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极为参差不齐，各地村民对由商品化所引发的社会转化的

^① Richard Madsen, “The 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and Moral Community: A Research Agenda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Modern China*, vol. 19, No. 2, p. 183-198.

反应也变化多端。我们认为，在社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似的方式，可以通过相互合作协商达到矛盾的解决。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国家管理公众事务的权力是全面专政的。因此，可选择网络必须被视为是初始的。列维曾强调提出，在晚清中国，社会力量对冲击社会组织的变化着的社会、经济力量的反应比官僚机构更为机敏。在当前急剧变化的时代，有许多社会力量将通过鼓励普通民众中的这种冲动而获得，需要格外小心地确保国家的机构以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利益为由，而视村民们的政治、宗教冲动为无知与落后，不要过分损害这些动机。地方社区与国家机构之间的“利益”区别常常被我们试图描述的共同合作过程所掩盖。然而，共同合作却使双方的力量都被削弱了。在宣称抵御混乱的道德秩序中，农民们发现了如何既与政府保持一致，又独立于政府的方式。而且，如同川主庙所表明的那样，自发的“市民”组织通过与国家的共同合作，并不必定被村民们所拒绝。共同合作并不意味着市民社会总是无效的。事实上，在地方政府设法接管川主庙后，村民们更能表达他们的利益。他们一方面根据政府倡导的“发展旅游业”方向使建寺庙的动机获得了合法性，另一方面又把寺庙作为表达他们评判政府领导的一个公共场所。

农民与国家机构之间的利益分歧，点明了比腐败或剥削更为基本的差异，即城乡居民之间的价值差异。中国知识分子在促进自身发展的进程中，容易摒除地方利益，坚信他们自己的办法是现代的、进步的、理性的、有效的，并因此优越于那些封建的、迷信的和落后的农民。至少在指称“农民”的消极意义上，国家机构和知识分子有着相同的原因。在我们实地调查的地区，无论

如何，一种正发展着的农村城市化和‘理性化’的乐观预言 不仅似乎是虚假的，而且还基于可能被中国知识分子和国家机构广泛支持的利益与价值，而这些利益与价值却是与农民相异甚至是相敌对的。

因此 在恢复川主庙的这个个案中 我们看到农民们在表达着他们自身对理性浮夸的限制感也就不奇怪了。理性的经济发展的正统性，已经使农民的利益被大大地忽略了。像川主庙这样的非政府网络，为在正式的政府机构中缺乏的民众思想提供了某些可选择性和回应。而且只有通过增加对普通民众需要与渴望的理解 才能创建真正成功的政治、经济结构。川主庙个案中最重要之处或许在于，在试图理解社会组织与私人利益之间正在出现的空间时，我们最好超出经济来观察。川主庙担当着许多重要的社会功能。对川主庙的捐献是展示‘体面’的方式 并在社区中建立了地位。为修建与维护川主庙而出工出料，是社区自发自愿的行为。

（陈永革 译）

改革中的山西省——山西的 第三次现代化建设*

大 卫 · 古 德 曼

编者按 大卫·古德曼(David Goodman) 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历史学家 现为悉尼技术大学国际学院院长 澳大利亚外交部顾问 著有《邓小平政治评传》、《改革中的中国省市 阶级、社区和政治文化》、《中国的崛起》等著作。

大卫·古德曼教授从 1996 年开始，主持了一项关于山西省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的课题，并得到了澳大利亚政府的资助。为此 他多次到山西实地考察和访问 除了对有关山西的文件和资料进行分析外 还对山西省内的 120 多位干部、企业家和管理人员进行了访问和座谈。在此基础上写下了这篇论文。

山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内陆省份。人们普遍认为山西是中国的一个贫穷的农业省。产生这种看法的部分原因可能是由

* 本文是澳大利亚政府资助的关于山西省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的项目。山西省档案馆、当代山西研究所等机构对本项目研究给予了协助和支持。

于山西地处内陆 交通不便 思想比较保守。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 中国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而大寨就是山西东部太行山区的一个模范生产大队。这无疑更加深了人们对山西是农业省的看法。虽然山西的贫困农民所占比重较大，据说大约占全省人口总数 12% 的农民生活在贫困地区；但实际情况是，自 1920 年代以来，山西一直是中国工业发展较早的省份之一。

山西最早建立的近代工业始于清朝末年。当时建立了生产火柴、机器、电灯的工厂和炼铁厂 开始使用机器采煤 并修建了正太铁路。但这些工业的规模都很小。辛亥革命后，山西在阎锡山的统治下，把发展军火工业作为巩固其政治地位的战略措施。从 1920 年代开始，山西兴起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工业建设高潮，陆续建立起十几个兵工厂及相关的企业。到 1930 年代 阎锡山为了实现山西工业的独立体系 大大拓宽了产业结构 发展了较多的重工业和军火工业。山西第二次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高潮的兴起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主要内容是发展重工业，特别是煤炭工业。据估计，山西的煤炭储量占全国的 30% 而且高质量的无烟煤和动力煤占很大比重。山西的第三次工业化运动开始于改革开放时代，然而山西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是比沿海省份落后了。部分原因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政治问题 同时还有山西在早期经济发展中重工业比重过大，生产负担过重的问题。另外人们的思想僵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到 1990 年代 山西省的发展战略有了巨大转变 这个战略对推动山西的发展已初见成效 并将对山西的未来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不仅确保了山西自身的整体利益，而且有利于全国经济的发展。这个战略的关键是要实现

山西人思想观念的转变。自 1992 年以来，这一举措的实施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煤炭生产在山西现代化建设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全省 110 个县中有 94 个县发现有煤田 占山西省土地面积的 40%。在 1990 年代之前，原煤的开采在以第一产业为主导的山西经济结构中一直独占鳌头。1992 年以来，山西改变了发展战略：由过去单一的采煤和出口初级产品转向对初级产品的深加工并加大技术含量和产值，同时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就煤炭工业而言 要大力发展以火力发电为基础的山西电力工业 将输煤变为输电。1990 年代的这些发展变化，完全可能是 1980 年代前几任省委省政府领导所制定的规划的延续。然而不同的是，1990 年代以来的省委省政府领导人的能力更强、思想更解放 而且大部分是山西人 这样他们就会更充分地认识到山西的优势与劣势 能扬长避短。现在的省委、省政府领导无疑对山西的发展将会起到更大更深远的作用。

山西在中国的历史地位

研究山西的发展，很有必要强调山西是中华民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山西人也深知其悠久的历史并为此而感到自豪。在中国，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有关汉族文化的遗址，山西占了 1/4。山西的简称是“晋”它是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山西境内的晋国的简称。山西也经常被称为“三晋”这是因为在战国时期 晋国曾被一分为三 分成了韩国、赵国和魏国。中国历史上很

强大而且对外影响很大的朝代——唐朝，就是由李氏家族以山西为基地出兵征战而建立的。在清末，山西成为中国的商业与金融大省，山西的经济又繁荣起来了。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山西是北方较早推翻清政府统治的省份。抗日战争时期山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进行抗日斗争和扩大其影响的主要基地。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敌后建立的几个抗日根据地，都是以山西为出发点建立起来的。20世纪山西省的领导人和人民总是愿意把自己视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守护者，这也是山西人思想观念中的一部分。由于山西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近年来新拍摄的不少反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影视作品是在山西境内进行的。例如著名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是在山西祁县的乔家大院拍摄的。90年代，为了增强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感，在山西境内拍摄了两部反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未来发展关系的电视政论片——《东方：一个伟大文明的剖析》和《农民》。把山西选为拍摄有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影视作品的外景地，是因为山西在民族传统文化方面有独特优势。山西有大量的文物古迹，有许多著名的庙宇、寺院、宫殿、古塔、壁画、雕塑。这些古代艺术帮助人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此外还有许多文物古迹至今尚未对外开放。在已开放的文物古迹中最著名的有大同的云岗石窟、平遥的古城、晋祠的陶瓷人物塑像、晋南的永乐宫壁画以及佛教圣地五台山等。然而，山西境内落后的交通严重妨碍了旅游业的发展。否则，它会成为中国又一个旅游热点。

山西省及所属各地区的特色

山西各地区的文化与经济差异不大，没有集中聚居的少数民族。各地的经济地理也差不多。地形以山区为主，大多数人口集中于平原和盆地。全省各地区都有煤矿，采煤工业在各地都有分布，但各地煤质有所不同，以大同和阳泉的煤质量为最好。山西以旱地农作物为主，水稻很少。生产的粮食大部分是谷子、小麦、玉米、高粱和燕麦。山西人以面食为主，面条、馒头和烙饼是饭桌上常见的主食。土豆也是山西的主要农作物，山西人也很喜欢吃。这就是人们喜欢把山西的文学家称为“山药蛋派”的原由。山西人除了喜欢吃面条外（其实是各种形式的面条）还有一个最有名的饮食习惯——吃醋。山西的醋在中国很有名，醋在山西的消耗量也很大，已成为山西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山西主要由四个地区组成，各个地区都有其明显的地方特色。山西的西南部被称为“晋南”或“河东”（因这一地区位于黄河的东部而得名），东南部被称为“上党”。这一地区以长治市和晋城市为中心，包括长治平原和太行山区，现在的长治市是其毗邻的河南省与晋东南地区的一个重要商贸中心。过去这里一直是富饶的产粮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促进了清末上党地区金融业的发展。山西省的省会太原市位于山西中部的晋中地区。该地区地处太原盆地和汾河流域，南面与临汾地区接壤。河东、上党和晋中大致上是春秋战国时期三晋的所在地区。山西省的第四部分是晋北地区。这一地区主要是大同、朔州和忻州地区，平原占很大一部分。山西北部的山区是唐朝时代的

山西与蒙古和中国北部各国的自然疆界，这一地区是北魏时代的中心（在 5 世纪时北魏统治着华北地区）直到 14 世纪这一地区才并为中国的一个诸侯国大同市自 1949 年以后是这一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在 1952 年之前，大同一直是当时察哈尔省的一部分。山西的各地区都有一种代表各自特色的地方传统习惯，这些习惯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文化、语言及烹饪方面。山西各地的传统戏曲也各具特色。在晋南有蒲剧，在晋东南有上党梆子和上党落子，在晋中有中路梆子和祁太秧歌，在晋北有北路梆子和二人台。全省各地的语言在语音、语调、语法及词汇方面也有明显的差异。总之，不是山西各地区的人不愿把他们认为是山西人，而是他们对所在村、县和地区有很强的乡土观念和地方特色。这种情况是由下而上表现出来的——先是村、县和地区，然后才是山西省。对此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在 1913 年至 1917 年间，晋南人起事反对当时的山西军阀阎锡山，其目的并非是要分裂山西，而是反对阎锡山的专制统治和经济利益上的分配不公平。^①

外界对山西的影响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山西人看成是保守的和内向的，还有人把山西人有保守观念的原因说成是对其过去辉煌时代的留恋与自豪。山西人的保守及内向无疑是由于山西的特殊地理位置及其他

^① Donald G. Gillin, *Warlord Yen Hsi-shan in Shanxi Province 1911 ~ 1949*,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p.43.

一些原因造成的。在阎锡山统治时期，山西人的保守观念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这方面具有戏剧性的例子是阎锡山在山西修筑的铁路用的全是窄轨，与国家通用的宽轨铁路不一致，想以此来抵制外界对山西的影响。

古代的山西曾是一个与外界接壤的边缘省份，也是通往亚洲北部一些国家的要道。所以山西不仅是军事上的战略要地，而且也是对外交往的商贸通道。同时更由于山西商业的兴盛发达，山西商人在外地开设的分支机构的金融结算日益频繁。这些因素促进了山西金融业——票号的形成与发展。山西票号产生于明末清初，当时往返于中国东西部地区的商人路经山西晋中的平遥、祁县等地。这些商人需要一种兑换货币和信贷的手段，于是票号就在这里应运而生了。过去，山西的金融家遍布全中国，并且与蒙古、俄罗斯、朝鲜和阿富汗等国建立了频繁的商贸往来。

由于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山西成为基督教传教活动的重要省份，山西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得到进一步扩大。由英国传教士提摩西·理查德领导的中国内地传教团在太原建立了总部。提摩西后来还卷入中国的戊戌变法运动中。传教团特别热衷于教育卫生事业，对山西大学的发展及山西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曾发挥过一定作用。义和团运动时期，太原有一些外国传教士被杀，这一血案成为轰动一时的国际事件，由此引发了外国武力干涉，迫使清政府赔款。后来使用这些赔款完全以牛津大学的模式重建了山西大学。

在 20 世纪初，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传教使团相继来到山西，传教士与阎锡山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他们的活动主要

集中于教育和卫生事业上，并在太原修建了许多教堂。现在的山西省政协办公的地方就是当年修建的一个教堂。传教士除了在太原市活动外，还在晋中地区及其他地区活动，而且在这些地区也建立了许多教堂。由于传教士的入晋，给山西带来了西方文化。同时，山西一批知识青年从 1903 年起开始出国留学，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为山西引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潮。其中赴日本留学的就有 50 余人，阎锡山是其中之一。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成为 1911 年领导山西辛亥革命的骨干。另外，1920 年代在北京上学的山西籍学生中，有许多人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接受了共产主义，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把共产主义介绍到山西。山西共产党的创始人高君宇就是其中的卓越代表。

阎锡山及其保守的现代化

阎锡山是 1911 年至 1937 年统治山西的铁腕人物。他在历史上的地位现在似乎正在被重新评估。1930 年以前阎锡山和国共两党都有矛盾，所以长期以来有的人对阎的评价总是过大于功。当时中国国内由于军阀混战，不可能集中进行社会的治理与经济的发展。1931 年至 1937 年期间，由于日本人的入侵，山西更不可能有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搞建设。然而，阎锡山却通过一些较好的政策，特别是 1920~1926 年和 1931~1934 年期间，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为山西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为计划经济的运作积累了一些经验。

阎锡山统治山西达 38 年之久 他的改革与发展战略并非是始终如一的。特别是从 1931 年开始 他实行了一些激进的措施 似乎和苏联共产党的做法有点相似。比如，他在文化教育方面也搞政治化。总的来说，阎是一位曾国藩和康有为式的保守改革派人物。作为一名职业军人 阎在日本受过教育 是孙中山的同盟会会员 他想利用西方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建设山西 但是从他的论著与讲话来看 他通过向民众灌输孔子的礼教 强化封建的传统思想意识，最终达到在山西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目的。

1920 年代，阎锡山在教育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普及初级教育和扩大中等教育的同时，大力向民众灌输阎锡山关于社会发展的思想。为此 阎建立了“洗心社”其目的是鼓励人们的自省和自强。

1920 年代，阎锡山在太原开始建立兵工厂，使兵工厂的工人很快发展到 1 万多人，成为全国的三大兵工厂之一。还创建了硫酸厂、机械厂、钢铁厂、炼焦厂和水泥厂 在轻工业方面 建立了面粉厂、织布厂、造纸厂和卷烟厂。阎在 1920 年代还制定了发展交通建设的计划 该计划对山西交通事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然而这个计划直到 1930 年代才实现。在 1929 年华北地区的大饥荒中 山西与毗邻的几个省相比 由于有充足的粮食储备 顺利地度过了这次饥荒。^①1932 年阎制定的现代化计划《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是按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制定的 并且具有保护主义的

^① Donald G. Gillin, *Warlord Yen Hsi-shan in Shanxi Province 1911 ~ 1949*,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91.

特点，是在独立自主，不要外援的情况下进行的。截至 1930 年代中期 山西兴建了许多新型的现代化企业 这些企业的所有权几乎都归阎锡山的山西省政府所有。他在 1920 年代开始的宣传鼓动和思想教育运动到 1930 年代仍继续进行 并且又开始强调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1930 年代，由于大量的投资和军事援助促进了山西工业的发展，同时又新建了许多煤矿。从 1930 年到 1934 年 煤的产量翻了一番。太原兵工厂附属工厂也发展成能生产系列化各种主要武器装备的工厂。化学工业和钢铁工业在太原和山西东部也有了新的发展。在太原又兴建了一座现代化的轧钢厂。阎的十年计划还兴建了皮革厂、造纸厂、印刷厂和酒厂 同时还建了许多重工业的辅助性工厂。在电力工业方面也有了很快的发展，兴建了三个发电厂。铁路建设方面，主要依靠阎的军队修建了一条从山西省东北部横贯晋中地区，到山西省西南部的同蒲铁路。电话通讯也比原来扩大了三倍。

山西的农民与山西省的农业

阎锡山对农业的发展计划是激进的。但是由于日本人 1937 年的入侵，使他的计划没有实现。1937 年 阎和共产党为了共同抗日实现了全面的联盟 允许共产党在山西建立革命根据地 后来这些根据地变成了数个边区政府 即山西省东北部的晋察冀、晋西北的晋绥和晋东南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①这三个根据地为争取

^① Lyman van Slyke,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Chapter 12, p. 609.

抗战胜利和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的今天。

抗战时期共产党在山西的积极活动，不仅在农村发展了抗日根据地，而且建立了新的社会基础。由于阎锡山与蒋介石的矛盾，国民党在山西的影响微不足道。阎锡山在政治上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山西的城市地区而不是农村。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进一步巩固了与农民的关系。就是到了 1990 年代，许多农民仍然为曾经当过“土八路”而感到自豪。抗战时期，共产党在山西吸收了大量的党员，并培养了一大批干部，因此在 1949 年之后，全国各地有许多领导干部是山西人或曾经有过在山西工作的经历。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革命者，主要来自党的早期根据地——湖南、湖北和江西等省。在抗战期间入党的那一代人，主要来自华北各省，特别是山西省。这就意味着在 1949 年后，有许多山西人会担任各级领导工作，文革前的四川省委领导班子就是一例。衡量山西在政治方面对全国有潜在影响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有三位共产党资深的高级领导人和山西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是邓小平、彭真和薄一波。其中彭真和薄一波都是山西人，另一位是邓小平。他在抗战期间是晋冀鲁豫根据地党的高级干部，在改革开放时代他的许多顾问和助手都曾在这个根据地工作过。^①

在 1949 年之后，除了人事任命之外，在全国能够感觉到山西政治影响的一个最明显的方面是农村发展与农业政策。土改

^① David S. G. Goodman, *Deng Xiaop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outledge, London, 1994, p. 44.

后山西的农业生产合作化先于全国一步，在 1951 年底就已开始进行了，特别是上党地区搞得轰轰烈烈。1950 年代在共产党内展开的关于搞不合作化的大辩论中，山西搞合作社的作法受到毛泽东的支持并在全国推广。1964 年，毛泽东主席表扬了晋中地区一个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生产大队——大寨，并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大寨运动高潮，由此使山西在全国的影响也达到了顶峰。

尽管山西的农业政策在全国受到表扬，但是在山西省内部却产生了一些矛盾。矛盾的起因主要是对不同地区的资金分配问题。按国家规定的政策，山区和老区能享受此特殊待遇。所以各地都想把自己列为山区或老区，以致当时山西 100 个县中，竟有 64 个县为获得额外资金和援助被列为山区和老区。在 1960 年代乃至 1970 年代，全省范围内的“学大寨”运动中也产生了一些不实事求是的问题。因此，许多人在某种程度上把“学大寨运动”当作了过去的“大跃进运动”，出现了不少盲目冒进和浮夸现象。

重工业的发展

由于阎锡山实施了工业发展计划，解放前的山西已有了相当大的工业规模。在大同和阳泉也已建立了良好的煤炭工业，日本人统治时期把阎锡山的一部分窄轨铁路换成了标准的宽轨。所以 1949 年后，山西已具备了作为国家重工业基地的条件和基础。由于 1949 年以前山西大部分工商企业是国有性质的，因此山西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比其他省要容易些。

解放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山西的工业通过中央的大量投资开始了新的起步。中央在 1952 年至 1957 年对山西的投资总额是 162 500 万元人民币，大约相当于 1957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56%。^① 投资的重点集中在太原市和煤炭工业上。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仅太原就得到全省投资总额的 1/4。这些资金主要用于改造和扩建太原钢铁厂，使该厂成为中国的主要特殊钢生产基地。机械工业的主要发展内容是采矿机械，在煤炭工业方面主要是发展大同的动力煤，在那里重开和新开了大约 30 座煤矿，此外是发展阳泉的无烟煤。

1950 年代山西的工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在 1952 年到 1959 年期间是以每年 34% 的速度递增。山西的这种特殊情况和这样速度的增长对山西的未来发展带来了一些短期和长期的问题。短期的问题是缺乏一套必不可少的社会基础结构来支持和保障快速发展的工业劳动生产率与已经扩大的城市规模，长期的问题是水资源缺乏和交通落后，消费品和轻工业生产没有得到相应发展。此外，由于山西的许多工业是国家投资建设的，由此导致了这些企业在经济上对国家的过份依赖。山西的经济结构中相当大的比重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截至 1957 年全省工业生产总产值的 30% 是由中央所属企业生产的。只要中央对山西的工业发展继续提供支持，山西的发展就不会滑坡。反之，山西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例如，1965~

^① 有关在山西的投资资料参见《山西日报》，1958 年 5 月 12 日第 2 版；1949 年以来的山西 GDP 资料参见《山西统计年鉴 199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 第 20 页。

1975 年期间，中央根据毛泽东关于建设大三线的战略部署，决定把国家的财力和工业重心转向西南部，这就对山西不利了。由于三线工程建设的实施使山西无法获得继续发展所需的援助，中央直属企业在山西的数量从 238 个减少到 49 个。^①“文化革命”期间的派性斗争更严重影响了山西的经济发展 特别是影响了工业的生产。从 1965 年到 1976 年间山西的工业增长平均每年不到 1%。总的经济增长也不乐观。

“文革”和“文革”以后

令人不解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山西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似乎成了“文革”中山西失宠的主要原因。山西是第一个由造反派夺了省委领导权的省。1967 年 1 月“上海公社”宣布成立不久 中共山西省委就被夺了权 取而代之的是由造反派组成的“三结合”领导小组 包括群众造反组织代表、人民解放军和部分干部。这种“革命的三结合”作为“文革”夺权的形式在全国进行了推广 毛泽东甚至还公开发表意见 告诉上海的领导人以山西为榜样 搞“革命的三结合”。山西在这种夺权的过程必然留下很难愈合的创伤 在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两大派长期搞斗争甚至搞武斗 而且地方利益和国家利益也发生了冲突。此外 山西还存在许多地区差异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城乡之间的矛盾，山区和平原之间的矛盾 诸如此类一系列的问题对“文革”后的山

^① 《山西统计年鉴 1995》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 第 265 页。

西领导班子必然产生影响。同时,1957 年以来极左思潮的影响也消除得比较慢。比如山西个体经济的发展比其他许多省就慢得多,起步也晚。尽管在三中全会后的 1979 年取消了大寨式的管理模式,然而,替代集体生产的家庭承包制直到 1983 年底才在山西获得成功。随着‘文革’的结束和国家政策的开放,对山西某些方面的发展产生了有利的影响,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央增加了对山西重工业的投资,使 1980 年代山西的经济有了较快的恢复,企业的数量及其经营的范围和产量都有大幅度增加。1984 年,工业产量比上一年增加 19%,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 21%。中央在山西的大型企业从 1980 年到 1984 年翻了一番。以煤炭工业发展为先导,扩建和新建了许多煤矿,其中包括世界最大的露天煤矿——平朔煤矿。此外,还新建扩建了一些火力发电厂(主要是把煤变成商品电输送到外省),太原钢铁厂成为中国特种钢生产基地,新起步的铝工业发展也很迅速。由于山西的铝矾土储量丰富,约占全国总储量的 42%,所以在山西兴建了中国最大的铝工业企业。截至 90 年代末,山西已成为中国的铝都和煤都;中国 78% 的外运煤来自山西;中国 40% 的不锈钢和 33% 的硅钢是由太原钢铁公司生产的。然而,山西的经济状况虽然在原有基础上有了复苏和发展,但丝毫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山西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在第七个五年计划执行期间,国家把投资重点转移到沿海地区,山西的经济发展速度又一次慢了下来,并且越来越落后于国家的平均发展速度。

经济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经济发展的起步相对来说是缓慢的而且又受到前两次工业化运动的负面影响。一般来讲，大部分内陆省份的经济发展与沿海地区，特别是华南地区相比普遍都落后。此外，由于历史的原因，山西的经济结构极不合理。1982~1984年由于国家重新对发展山西第一产业的重视导致了经济总量有了两位数的增加但是从1985年至1989年以及进入1990年代初期，山西省的发展速度大大地减慢下来，每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落后于物价的增长，其主要原因是中央把发展战略的重点又一次转移到沿海地区，同时山西的发展规划跟不上全国的改革开放步伐。自1992年以来，山西全面调整了规划，省委省政府制定了一个充满活力雄心勃勃的新的“赶超战略”。事实也已证明这个发展战略是行之有效的和成功的。

产业结构不合理

1980年代末山西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新问题，而是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的老问题，诸多问题中最根本的就是在经济发展中受到过多的国家行政干预，产业结构不合理。自1920年代以来山西的工业几乎都是地方国有的，工业的发展重点一直侧重于大型重工业。尽管在1980年代中央下放了权力但是山西的经济结构中有很大大一部分不仅是国有的，而且还是中央直属的企业。中

央在山西的企业有 100 个 这些企业都是大型企业 它们分布在煤炭、电力、邮电、铁路、有色金属和军工等部门 铁路和军工工业完全由中央管理。煤炭工业中七个大型煤矿采煤产量的 1/3 交中央。据估计中央在山西直属企业的产值约占全省总产值的 25%，这可能是中央直属企业在一个省的经济中占比重最大的。^① 山西依靠中央投资发展国有企业固然给山西带来了许多好处，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不利因素，例如三线建设时期和 1980 年代后期 当中央把财力和投资转移到其他地区时，山西的经济便明显地陷入困境。此外，由于地方和企业缺乏自主权，发展方针偏重重工业，导致山西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山西有许多国有企业技术陈旧，效率低下。在 1990 年代初 山西共有 340 个大中型国有企业 其中有 200 多个是 1950 年代中期前建立的，有的甚至是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建立的。由于设备落后和开工不足，加上其他各种原因 这些企业经常亏损 甚至在山西经济发展最好的 1990 年代中期也有大约 19% 的国有企业亏损。这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的矛盾与经济转轨时期的一系列问题造成的。山西经济结构的核心是计划经济，全省大部分的经济运行是由国家计划决定的。然而，企业竞争的成败却是既要依赖于市场又要执行国家的价格政策，而国家制定的价格往往赶不上市场的变化。在山西有个明显的例子 就是在醋的生产过程中 醋的价格是由国家制定的。在醋的生产成本由于通货膨胀和市场的变化而大幅度上涨

^① 根据 1996 年 7 月 12 日在太原访问山西省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马加军的谈话记录。

时，生产醋的厂家却无权提高醋的价格，虽然他们明知将要亏损，但也无可奈何！山西的许多重工业产品的价格是由国家控制的，特别是煤和其他能源的价格偏低，山西人总是强烈地要求提高这些产品的价格。因此，价格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投资结构也应变革，这意味着要较少地依赖中央投资。山西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还表现在山西的基础设施落后，供水严重不足，缺少精加工工业和消费品工业。水资源的缺乏一直是制约山西工农业发展的主要问题。特别是缺乏有效的水利灌溉设施，所以山西的农业生产一直不稳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业用水的大量增加，水的供应进一步恶化，并导致了环境的污染。山西在 1950 年代中期就有了缺水的问题，当时的省领导曾提出过引黄河水入晋的设想，但未实施。到 1970 年代末，由于水资源的过度开采带来了许多不良后果，流经太原市中心的汾河变成了水渠，在许多宽敞的大桥上可以看到下面是干涸的河床，这种情景在全省许多地方都可见到。估计山西的水资源有 56 亿升，但仅在山西的中央企业每年就需要用水 71 亿升，山西 11 个大中城市每年超采用水就达 70 亿升。^①

交通也是长期制约山西经济发展的一大问题。阎锡山统治时期修建过一些公路、铁路和通讯设施，为山西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然而阎锡山的政策似乎是故意要把山西与外界隔开，加之山西多山的地理位置形成的天然屏障阻碍了与外界的联系，因此要外运山西的主要产品，特别是煤，就必须大力发展山西的交通。然

^① “山西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山西经济发展导报》，1996 年 4 月 12 日 第 2 版。

而令人不解的是，中央对山西交通事业的投资却不像对重工业的投资那样积极、数量那样大。由此导致了山西开采出的煤炭大量积压，采煤的经济效益不高；虽然对煤炭进行深加工是个较好的办法，然而山西一直没有做到这一点。到 1980 年代才新建了一些火力发电厂向华北地区输电。另外在 1980 年代还建设了一条太原至石家庄的电气化铁路。这是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这条铁路的建成对山西煤炭的外运起了一定的缓解作用。总之，过分地重视发展重工业，导致了加工业、轻工业和消费品工业的落后。甚至晋南生产的棉花，虽然占全国棉花生产总量的 7%，但对这些棉花的加工并不完全限于本省，有相当一部分原棉还要运到外省去加工。山西消费品工业的落后并不是新问题，民国时期就已存在。当时山西主要是出口初级产品，大量进口的是轻工产品和机械设备。由于山西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及其他一些原因，导致了山西经济发展的速度落后于其他省，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通货膨胀的问题。^①

赶 超 战 略

由于山西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到 1980 年代后期又出现了新的滑坡。山西省委省政府为改变这种状况，在 1991 年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八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提出了兴晋富民的奋斗目标，1992 年又确定了加快山西经济上新台阶的决策。在

李玉英、张传春，《山西通货膨胀的走势与对策》载于《战略与管理》，1995 年第 6 期，第 115 页。

“八五”期间，省委省政府坚持把中央的方针政策与山西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探索具有山西特色的加快经济发展的路子；1993年在高举改革开放和艰苦奋斗两面旗帜下，狠抓了煤、电、水、路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山西的国民经济在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在这基础上于1995年制定了《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九个五年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人们对这个“九五”计划和远景目标统称“十五年赶超战略”。这个赶超战略分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1996~2000年）山西要发展成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强省；第二阶段（2001~2005年）山西要赶上全国经济平均发展水平；第三阶段（2005~2010年）超过全国经济发展水平。“赶超战略”的每一个阶段都用数字表明具体的奋斗目标：第一阶段山西的国内生产总值要以平均每年12%的速度增长，到2000年要达到2400亿元人民币，人均收入将增加到7500元人民币，相当于1980年的三倍；第二阶段的目标是山西的国内生产总值将继续以平均每年大约11.8%的速度增长，这个速度大约比全国的增长速度高出四个百分点；第三阶段除了国内生产总值继续保持稳定的增长速度外，人均收入要比2000年高两倍。在实施赶超战略中，省委领导人指出了山西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山西是一个思想较封闭的内陆省，市场经济发展较慢，资金和人才短缺和工业的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等；为此，省委省政府下决心要解决农业生产不稳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低、国有大中型企业不景气、环境污染、某些领导干部的保守观念和一些党员干部的腐败行为等一系列问题。赶超战略不仅要实现经济的长足发展，而且还要

全面调整山西的产业结构、改变经营机制，其主要内容概括起来就是继续抓住“三个基础”、“四个重点”，全面打好“四大战役”。这几句话已成为 1990 年代山西各级领导人讲话中经常使用的字眼。“三个基础”是加强农业基础、加强基础设施和加强基础产业；“四个重点”是挖煤（包括煤的深加工和系列化生产）、修路（陆、空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通讯设施的建设）、引水（指引黄河入晋、南水北调和蓄水等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发电（指生产商业性的电）；“四大战役”是指控制通货膨胀、加强农业的发展、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增加山西省的地方财政收入。这个赶超战略的正式实施虽然是从 1996 年开始，但是它的大致规划和基本原则在 1992 年以来就已基本成形并初步进行了实施。为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省委省政府又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和措施：继续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以国有企业改革作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增加劳动就业等。特别强调科教兴晋的发展战略，并把科技、教育作为加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以此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优秀人才。此外，还广开资金来源，即除了中央投资及自筹资金之外，还要大量吸收来自外国、外省的投资。

由于实行了上述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山西经济在 1994 年至 1995 年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势头。1994 年山西的经济增长率与全国的平均水平持平，1995 年比 1994 年增长了 11.4%，并第一次超过了全国的增长水平，1995 年山西的国内生产总值是 1088.9 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 3 557 元。外贸进出口总额在

1993 年是 2 亿美元,1994 年增加到 8 亿美元 到了 1995 年增加到 13.7 亿美元。也许,1995 年对于山西省的领导来说感到更满意的是 在近十年中 山西全省财政首次实现了收支平衡。农田基本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 200 多万亩水上流失面积初步得到治理 新增基本农田 227 万亩。在公路建设方面,1992~1995 年的两年中 新建的公路是前十年的两倍多。“希望工程”使贫困老区 4 万多名辍学儿童重返校园学习,8 826 个村庄的饮水问题得到了解决。

尽管煤炭工业在山西经济结构中仍占主导地位,采煤和煤的深加工工业约占 20% 还有与煤相关的工业占 10-13% 但是山西正在努力建设多元化的支柱工业体系。在重工业方面,重点开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和市场急需的新产品。积极培育以特种钢和铝为主的冶金工业、以重型机械和载重汽车为主的机电工业、以化肥和精细化工为主的化学工业、以水泥、玻璃和耕型建材为主的建材工业。在乡镇企业中,多元化经济结构的发展最令人注目,在那里加工业和消费品工业,特别是食品与纺织工业取得了巨大成就。截至 1996 年,乡镇企业的生产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大约 33%。

在 1993~1996 年期间 山西开始或完成了若干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现在的在建项目中,也许最宏伟的是解决山西水资源缺乏的万家寨引黄入晋工程,这是建国以来山西最大的建设项目。尽管煤是山西经济的主导产业 但是由于交通运输的落后 山西煤的经济效益受到极大的影响。因此“赶超战略”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变输煤为输电。山西平均每四分钟就要向外省发一列

运煤列车 除此之外 山西在本省还建了许多火力发电厂 将发出的电输往外省。在 1980 年代山西神头发电厂已经向京、津、唐送电了 北京用电量的 1/4 来自山西。电力工业的迅速发展使山西成为全国发电量最大的省，现在还有一些新的远距离输送商品电的电厂正在设计或建设中，如正在建设的年发电量为 2.1 亿千瓦小时的阳城电厂就是计划向江苏供电的。

在山西不仅煤需要有良好的交通运输，在其他方面也需要有一个优越的交通运输条件。1996 年山西取得的若干成就中比较突出的是旅客与货物运输设施的改善。在这方面完成了太原火车站与太原机场的改造工程。火车站建成了舒适、宽敞、设备良好的高架候车室，机场新建了可以降落国际大型喷气式客机的跑道，并装置了先进的导航设施。1996 年 5 月太原首次开通了直飞香港的航线。更令人注目的是，1996 年 6 月 25 日开通了穿越太行山区的从太原到旧关的四车道高速公路，现在乘公共汽车通过太旧高速公路从太原到北京只需 120 元的车票钱 行车时间用不了六个小时，加快了山西与外界市场的联系。这条公路的建设用了不到三年时间，因成为山西改革时代的模范工程而受到国家的表扬 该工程所需投资的 40% 来自中央 其他的来自省政府和全省的各行各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党政机关和各界人民群众的‘自愿’捐款。

社会的变革

“赶超战略”在 1992 年山西经济发展中就产生了影响 但是在

此之前的 1980 年代，改革开放已给山西的社会发展带来了一些变革 特别表现在农村。1980 年代中期非集体化的生产形势开始对农村社会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既表现在社会结构与人们观念的变化上，也表现在是否应继续维护传统价值观念的争论上。这种变与不变的对立倾向，在经济改革与由此导致的政治变革过程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原有的一些社会基础不断发生变化，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消费现象，并产生了一些以追求物质利益为目标的实用主义价值观。

党政机关职能的转变

山西在解放前有许多革命根据地，在新中国建立后是国家的重工业基地，所以在山西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在社会结构中的统治地位。虽然改革时代已经使山西的政治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党政机构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恰恰相反，在山西城乡的各级党政机构一直是推动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像其他省一样，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集体所有制经济得到发展壮大，地方政府的权限也得到扩大。自 1980 年代中期以来，山西的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一直以每年平均 20—25% 的速度增长。截至 1995 年 山西的集体企业在工业生产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与国营企业大致持平，都是各占 40%。另外山西的集体企业的发展与其他省有所不同 在其他一些省 集体企业的发展形式是多样的，有的是由私人企业和个体所有制企业发展而来的，有的是与外商合资的。这些集体企业的发展及国有企业的整顿与改革基本上是靠市场作用推动的；而在山西却主要是

党政机关领导的影响发挥作用。

山西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即乡镇企业)大部分集中在一些城市及其郊区县,改革时代乡镇企业的发展反映了山西省经济发展的总趋势。1980年代建立的乡镇企业主要以煤炭、化工、建材和重工业为主。比如在太原、大同和阳泉的郊区就有许多焦化厂和化工厂。到了1990年代,开始由能源重化工业向纺织、加工和消费品工业转变,这些新的工业也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以传统方式建立的,但同时它们的管理和运作又必须服从市场的调节。党政机关特别是省委省政府在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全省各级党政机关对发展集体企业最有兴趣最有积极性。省政府制定了许多发展集体企业的计划,其中包括对企业的技术改造。山西大部分集体企业中的厂长经理,在他们走马上任前就已经是共产党员了。这与浙江的情况完全不同,因为浙江省大部分集体企业中的厂长经理是在获得成功之后才入党的。

城市集体企业的发展更明显地带有党政部门参与的迹象。在城市建立集体企业,最典型的做法往往是某一国营企业或党政机关或某一社会实体(如学校、医院或大学)使其下属的某一企业走向市场、自负盈亏,或者另外建立一个下属的经济实体。因此,城市的集体企业所经营的范围比农村要大得多,城市中的集体企业除了与重工业相关的企业外,还包括许多纺织企业和大量服务性行业,其中还有一些金融机构。从山西共产党员的总人数来看也反映出在改革时代党政机关的领导仍然在社会中起着中心主导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山西党员的总人数无论在实际数字还是在与人口的比例方面都有很大增长。截至1995年底,山西党员的总人

数为 160 万人 占山西 3 000 万人口总数的 5.3% 而在 1950 年代中期 山西党员总人数是 45 万 占全省总人口的 3%。^①山西共产党组织在全国也算是最大的一个，1994 年全国共产党员占总人口数的 4.5%。尽管党员的人数增加了许多，但是党员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山西省委注意到社会风气的下降，并十分重视加强道德建设和纪律整顿 特别是在党组织内部 因此自 1992 年以来开展了一系列党员思想建设和纪律整顿工作。1990 年代期间 省委开展了广泛的反腐败运动并已取得明显的成果：到 1995 年底查处约 28 866 名党员干部，其中开除党籍的有 3 076 名 追回人民币 3 470 万元。虽然揭露了这么多腐败行为，但大部分是一些小案件。这些案件要么是工作中一些以权谋私的问题，要么是在市场经济中行贿受贿或吃回扣等问题，再有一些问题是干部超标准使用豪华小轿车、多占住房、对学生和农民乱摊派乱收费。看来有许多地方当局把乱收费当作增加当地财政收入的手段，由此发生了许多不合理不合法的问题，引起了群众强烈的不满。

新的消费现象

改革开放对山西最明显的影响之一就是出现了新的消费现象。城市街道上最显著的变化是商业化的气氛浓了，不仅有越来越多的零售商店，而且还有随处可见的广告牌。在一些较大城市还新建了许多诸如天龙大厦这样的大型百货大楼，入夜街上灯火

^① Frederick C. Teiwes, "Provincial Politics in China: Themes and Variations", in John M. H. Lindbeck (ed) *China: Management of a Revolutionary Societ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72, Table 9—Party membership by Province, p.165.

辉煌 呈现一派现代化都市的气象。在大同“文革”中建起的展览馆现在除了很少一部分展厅供展览外，其他大部分已成为百货商场的营业厅了。

这种消费现象的最重要作用是使山西省与外省的交往增加了，由此促使了外省对山西的投资和贸易。虽然不知道山西与各省之间的贸易额有多少，但是在山西的宾馆和街上可以看到的来自外地的商人明显地多了 特别是太旧高速公路开通后 外地的商人来得更多了 与此同时 外省来山西打工的人也不少 由于山西的失业率比较低 仅有 4%，1996 年外地在山西的民工大约有 80 万人 他们大都从事各种体力劳动。

来山西的人除了搞经济贸易之外 还有来旅游观光的 许多游客来自外省和外国。旅游业在山西并不是一个新的产业。山西的旅游景点很多 大同、大寨和五台山长期以来是中国主要的旅游景点 但以前这些地方的交通和服务设施很差。以五台山为例 这里是中国的佛教胜地，从五台平原到海拔 3 000 米的高山到处都有塔和庙宇。五台山与太行山脉东部的河北省接壤，台怀镇是五台山旅游区的中心 从太原乘小轿车到这里大约需要五小时 从五台县火车站乘汽车到这里大约也要两、三个小时。1980 年台怀镇才有了第一家宾馆 而且是非商业性的 直到 1988 年才有了商业住的宾馆饭店 到了 1990 年代 这里发生了很大变化 修建了一条高等级的直达太原的公路，并有一些服务良好的公共汽车或旅游面包车从太原或山西的其他城市定期在这里运行。台怀镇的宾馆、饭店也有很大改善 除原有的许多旅游宾馆外，一些党政机关在这里也修建了宾馆饭店 除供本系统的人开会或度假外 同时对外营

业。所以，现在到五台山旅游的交通和食宿都很方便。

山西人旅游消费的增加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的发展，一部分人的收入有了很大的增加。像中国其他省一样，随着人们收入的不断增加，山西人对消费也产生了新的需求。大的消费主要用于结婚、建造或购买住房等。此外，私立学校和娱乐业的迅速发展，也是太原市的新消费热点。1990年代，非官方办的中小学校猛增，截至1995年底，这样的学校在太原大约有40所，在其他地区有18所，在校学生总数达1.5万人。在这些学校上学虽然都需要自费，但这些学校并不完全私立，因为它们大都挂靠在某一机关或群众团体；这类学校的课程设计和教学运作都是经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和统一管理的，除此之外，学生的毕业文凭也是由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审核发放的。有些高等学校要么是这类学校的合作伙伴，要么给这类学校提供师资力量。例如1994年建立的南洋国际学校，在自己的校园内已有几座教学大楼和办公大楼，现在该校已有1800名学生和200名教师，许多骨干教师来自山西大学。目前在太原、大同和阳泉都有鲜艳夺目的迪斯科舞厅和流行音乐歌厅，这与广州、北京、上海没有什么两样。此外，太原市的卡拉OK歌厅近年发展得非常快。1993年以前，太原市没有一个卡拉OK歌厅，但是到了1995年9月，卡拉OK厅已发展到一千多个。粗略地对比一下，北京市的人口是1000万，而太原市的人口只有270万，然而在1994年，相当于太原市人口四倍的北京市，歌舞厅和咖啡酒吧却只有三百多个。^①

陈育，《卡拉是否OK？——太原歌厅市场扫描》载于《北岳风》，1996年第1期，第41页。

物质丰富后的社会观念

外界除了对山西所产生的新消费现象及纯经济的价值观表示关注外，同时也对物质丰富后的社会观念表示关注。这包括人们对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和基督教在城乡的发展。对环境保护观念的加强很可能是由于物质生产发展带来的影响。目前对山西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讨论已成为各级党政领导和社会上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人们不仅关心经济的发展，而且对环境、人口资源问题也引起了注意。山西的这些问题在 1990 年代以前就发现了。由于过去农业上的一些激进措施，破坏了生态平衡，特别是山西作为能源重化工基地后，使山西的环境受到很大污染，耕地面积和水资源也大量减少，而人口的增长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大量占用土地，使山西人均耕地面积由原来的 4.8 亩减少到 1.8 亩。山西的城市上空由于煤粉尘和废气的大量排放，大气污染十分严重，所以山西肺癌的发病率高于其他省。太原和大同城市大气中的粉尘悬浮物每立方米超过了一千毫克，超过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最低标准的 15 倍。山西的水资源不仅缺乏，而且也受到了严重污染。

山西对环境问题有各种反映。许多人，包括一些领导人在内，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问题上存在着侧重点不同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侧重于经济的发展，强调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保持经济的继续增长；另一种观点侧重于对环境的保护，强调保障未来生活质量的重要性。一些舆论所表达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例如，有家报纸发表论述解决大同水资源缺乏的文章，强调的是费用问题，打深井的费用、开采水资源的费用、净化水的费用、地下水下降后重新打

井的费用。在另一家杂志上报导太原钢铁厂的文章，则强调该厂是如何综合利用废渣获得经济效益，论述了利用废物再生产出水泥和化肥的经验。文章最后说：“环境保护确实是一种可获得经济效益的产业。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它是一个通过投资而具有高回报率的产业。”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另外一家杂志在有关太原的文章中，对太原市的污染进行了评论。该文含蓄地批评了太原市钢铁厂和一些大的化工厂设在太原市逆风的位置，该文还列举了许多污染严重的例子，并且还报导了在 1980 年代中期，美国人造卫星误把山西孝义市农民开办的焦化厂所产生的烟雾当成森林大火的趣闻。最后，该文告诫人们：“美好的生活依靠大自然，但是更重要的是依赖人们对大自然的保护意识！”^①

改革时代基督教在山西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虽然精确的信教人数还不太清楚，但是估计经政府批准的耶稣教和天主教教堂中大约有 30 万教徒。例如太原和晋中地区教堂就不少。在晋中地区很多乡镇有教堂，基督教在这里好像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信教是一种传统。而在太原，许多人之所以信教似乎是一种时髦，有的是把基督教看作一种西方生活方式而刻意模仿，有的甚至认为基督教是和现代化有联系的。

在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中，还可以发现有关山西传统观念的一些事例。比如在 1984 年，山西省政府建立了出国留学学生奖励基金，该基金每年有 150 万美元。截至 1996 年，享受这个基金资助的留学生大约共有 1 100 人，他们分别去美国、加拿大、英国、德

阿季，《大气污染忧思录》，《政府法制》，1996年第 1 期，第 11 页。

国、法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留学。同样在中国其他地方也有这种基金资助学者出国留学，但是引人注目的是山西公派出国的留学人员回国率比其他省高得多。另外一个例子是山西的一些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很少发挥广告的作用，比如汾酒和陈醋是山西两大名牌传统产品，尽管产品质量很高，但是一直很难打出娘子关外，占领外地市场；据说这些企业的经营者只是利用他们产品的固有优势，却很少注意更新产品的包装与进行广告的宣传。

前进中的山西

在山西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矛盾和冲突。从山西共产党的历史上看，山西人在本省党政领导机关中占主导地位。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历届书记、副书记、省长和副省长共有 56 人，其中山西人有 39 人，占 70%。在这一时期，山西省最高领导人——省委书记共任命过五人，省长任命过四人。五位省委书记是王谦、霍士廉、李立功、王茂林和胡富国，其中只有王茂林一个是外省人；四位省长是罗贵波、王森浩、胡富国和孙文盛，其中只有胡富国一人是山西人。在所有这些人中，除孙文盛之外，其他七位在担任山西最高领导职务前曾在山西有过相当丰富的工作经历，所以他们对山西都有一定的感情，工作上轻车熟路。

1992 年后，山西的政治领导风格产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同时，也展开了对山西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讨论和有关政策的调整，这些最终导致了山西经济赶超战略的形成和完善。特别是 1993

年后，省委领导人的政治活动变得更大众化更受群众欢迎了。现在省委省政府领导很注意树立他们自己的和山西省的良好公众形象 并愿意谈论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他们的公开露面 不仅只限于共产党的会议上 也不只是宣读一些事先拟好的讲话稿了 而主要是通过报纸和电视反映他们到基层去和老百姓在一起的活动及没有讲话稿的即兴演讲。尽管山西的老百姓对某些领导人总是有一些这样那样的看法，但领导干部的实干精神与紧密联系老百姓的作风，使党和政府官员与群众的关系变得更好也更密切了。

山西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要实现的目标通常可用四个字来概括 就是“兴晋富民”。这口号早在 1991 年制定山西的发展战略过程中就被提出来了，自从 1992 年以来，通过对加快山西经济上新台阶的大力宣传，这四个字早已成为一种大众化的口号，在山西不管是当地的党政干部，或者是老百姓，也不管是中央来的领导干部，或者是厂长经理以及潜在的外国投资者，都知道这个口号。为了实现“兴晋富民”这一目标 必须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以激发人们为之奋斗的力量。1996 年 1 月山西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省委工作报告就很有号召力和感染力 报告中说：“全国解放快半个世纪了，我们有什么理由还让群众过这么苦的日子，山西资源条件得天独厚，人民又是这样勤劳善良，我们有什么理由长期贫穷落后，山西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对全国作出了巨大的奉献和牺牲，我们有什么理由让他们得不到应有的报偿？难道还能让我们的人民戴着贫穷的枷锁进入 21 世纪？”

“兴晋富民”的计划就是要把一个贫穷不发达的山西建设成一

个富裕而又发达的山西，不仅要提高山西的经济实力和生活质量，而且要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加强山西人民的凝聚力，提高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威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山西领导作风的变化反映了改革开放的需要，也反映了改革时代山西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新风貌。

山西省的领导人积极致力于建设一个兴旺发达而又具有地方特色的山西，这就必须首先改变山西的封闭状态和保守观念，所以必须大力加强以修路和改变交通落后为先导的物质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省委省政府的许多领导人总是特别强调山西的整体而不强调各地区的或根据地的地方特点。据说有的省委领导人曾关注过山西的许多饭店缺少山西的烹饪特点，而不是强调山西某个地区的地方风味。因此，1990年代在太原出现了许多以各种面条、馒头和烙饼为主的山西风味的饭店，这些食物都是山西各地老百姓家饭桌上常见的饭。同时，现在山西所进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并不像原来那样的作法，以某一地区传统或典型作法为模式，强求其他地区仿效。与毛泽东时代在农业发展政策方面的作法相反，1990年代山西的赶超战略对其政策范围清楚地进行了说明：山西各地要根据本地区不同的实际情况来发展当地的经济。赶超战略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区域性发展政策，就是以县为单位，在山区、平原、城郊、工业区或矿区按当地的实际情况来发展自己，实施一种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不是一刀切的发展模式，尽管这样做会给省委省政府领导带来更多麻烦。正像一位厅局级领导干部所说的那样：“改革的难点就是要解决为了满足不同的利益集团所进行的权利再分配问题。”

在即将进入 21 世纪的时候，我们希望看到山西省在改革的道路上清除障碍 再创辉煌。

（李学谦 译）

海南岛：加速发展的边陲

傅 高 义

编者按 傅高义 (Ezra F. Vogel)，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现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1958 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1963 年起在哈佛大学任教。从 1967 年至今在哈佛大学任社会学教授，曾担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 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日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等。他一向致力于从宏观的角度研究东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 重点研究东亚国家取得成功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东亚诸国对西方社会的挑战和美国的对策等。有关中国的主要专著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首府的神话和政治，1949～1968 年》、《社会变革 农业中国的问题》、《专题报告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研究时的经验》、《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1949～1968 年》等。本文是《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中的第九章。

改革开放以来，海南岛的发展受到了国内外的密切关注，然而，在国内一直缺乏有关海南岛发展的详细、周全的报告，傅高义教授的这篇关于海南省的文章虽然以 1980 年代末的

资料为据，但内容全面，分析透彻，而且文字生动，引人入胜，在今天仍具有极大的文献参考价值。

海南岛与广东省西南部海岸遥遥相对，距离雷州半岛 30 公里，是个热带岛屿，所存在的问题与山区县份相类似。全岛面积 3.4 万平方公里，略小于中国的另一个岛屿——台湾。台湾的成就促使北京在 1980 年代加速海南岛的发展，并于 1988 年独立建省。海南的气候比台湾炎热，夏天气温经常高达 40℃ 冬天气温很少在 15℃ 以下，只有海拔较高的地方例外。海南的山脉也比台湾多，大部分集中在中部和南部地区。岛上 2/3 的人口住在北部约 1/3 强的地区，而这些地区也是干旱贫瘠，崎岖不平。每年从 11 月至次年 5 月 岛上大部分地区无雨 严重缺水。^①

虽然海南岛一向被誉为“宝岛”而且苏东坡曾在琼山县五公祠住过。他那些伤感的诗篇使海南更为人们所熟悉。但在 1980 年代，连本地人都承认海南依然非常落后。海南的建筑物和商店与广东省其他地方大同小异，只是更加破旧。人们衣着简朴单调，到了 1980 年代后期甚至还有补丁。戴手表的人不多，甚至玻璃制品、锅碗瓢盆、塑料水桶之类的用品也比其他地区短缺。1988 年，海南的人均年收入，甚至包括城市和国营企业在内，仅有 400 多元 比广东省其他地区要低得多。海南的公路、电话、收音机和卡

^① Catherine Schurr Enderton, “Hainan Dao: Contemporary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Treasure Island” (Ph. D. dis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1984). 由于有关海南的英文历史资料极少，我在这里使用的历史背景资料相对广东其他地区要多一些。

车数量都比广东的大多数地方少。到了 1980 年代后期 当广东省大部分地区都使用小汽车作出租车时，海南的大部分地区还继续使用摩托车带边卡载客。岛上许多地方连自行车也不通，更不用说机动车辆了。有些地方仍然没有电力供应。由于西方对海南的特殊情况不大了解，需要用些篇幅来描述它在 1978 年以后的变化。

一、1950 年以前的边陲

北京一向把海南看作是地处领土边陲的社会，要从大陆派军队去驻守 派官员去管理。中国历代帝王都派军队去海南 但无法派出足够数量的军队去守卫整个海岛。因此，他们像对待其他容易遭袭击的边陲地区一样 派出士兵。这些士兵在当地退伍时 分得足以维持其生活的土地，并随时准备，一旦需要便挺身保卫国家。

在近代的皇朝 海南的首府设在最北部的琼山县 行政官员从大陆派往该地设立衙门。有才华的青年人在衙门附近的学府攻读多年，准备应考当官。该学府以后成为师范学校的所在地。

17 世纪明朝灭亡时，第一批汉族移民来到海南。成千上万的残兵败将从福建和广东的东北部乘船逃亡到海南岛东北部的荒野岭中。这些移民把原居住在岛上的少量苗族人和大部分黎族人赶到山区去。^① 移民讲福建南部的方言——闽南话。以后当地接

参见《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概观》，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受了这种方言，发展成为海南岛的主要语言——海南话。地处南渡口的海港城市——海口市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文化之都琼山，就像大陆的潮州为汕头市所取代一样。

19 世纪末，海南的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耕地资源。这就促使人们从人口较稠密的东北部向外迁移。当台山和其他大陆县份的华人在美国建设唐人街时，海南岛文昌县及其附近县份的青年也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建设唐人街。

国民党政府与以前的历代帝王一样，在海南岛维持驻军和退伍士兵以保持太平。他们得到当地地主一定程度的支持 包括最知名的地主——文昌县的宋氏家族。宋家在 19 世纪末生了三个女儿，一个嫁给了孙逸仙 另一个嫁给了蒋介石。

日本人占领海南岛仅六年时间 即从 1939 年到 1945 年。他们来不及推进农业现代化或建立工业基地 而 1895~1945 年间日本人在台湾时却这样做了。日本人来到海南岛后，便开始掠夺海南的资源，建立了几个重要基地，以支持他们向东南亚的军事挺进。他们在海南中西部的昌江县石碌镇开采铁矿石。由于没有港口 日本人不惜从香港动员了 2 万名工人 建造了一套能吞吐 10 万吨大型轮船的运输设施。继而修筑了 150 公里铁路 把矿山与港口连接起来。从 1943~1945 年 约 40 多万吨优质铁矿石从石碌出口运到日本，以满足战时对钢铁的需要。

日本人继续从八所镇沿着海南的西南部修筑铁路直通三亚，这项工程到战争结束时已接近完工。在三亚和海口，日本人建设了现代化的港口和小型军用机场 虽然日本人没有修筑公路 无法深入到海岛的腹地，可是日本人建造的基础设施直到 1980 年代改

革开始时仍旧完好无损，但也没有多少改进。

1950年，海南的琼崖游击队是广东唯一的共产党游击队武装，其历史可追溯到1927年。由于海南山区的交通极为不便，游击队才得以幸存，并不断地骚扰敌人，先是国民党，后是日本人，最后又是国民党。1950年4月，共产党正规军队进攻并驱逐了国民党军队。没有共产党正规部队的有力支援，6万游击队员是无法取得胜利的。胜利后，共产党也像以前的帝王和国民党一样，调去大批军队驻守，以维持长期的安定。有着光荣历史的海南游击队也同以前的地方武装一样，被整编并入外来军队之中。海南岛人口稀少只有100万人。作为特殊的边陲，又调来许多高级官员，它成为广东省的一个行政区，其地位介于地区专署和省之间。

二、橡胶、垦荒和国营农场

1949年底，毛泽东到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在谈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未来时，他们考虑了所需要的战略物资。苏联拥有丰富的资源，足以满足本国对钢、铁、能源的需求，但缺少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橡胶。随着朝鲜战争开始和美国的封锁，橡胶变得更加奇缺，因为中国失去了从马来西亚进口的渠道。因此，毛泽东和斯大林决定在中国发展橡胶生产，因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唯有中国的气候适合种植橡胶。他们了解到橡胶树从种植到割胶要5-7年时间，便着手拟订一项长期的发展规划。

专家们计划开发四个最有发展前景的地区：福建、云南、广东

的雷州半岛，特别是海南岛。由于海南岛的气候较适宜，未开垦的土地较多，有些从马来西亚归国的华侨于 1919 年已经在那里建立了小型的橡胶园。1952 年，华南农垦局（有时译作国营农场管理局）在广州正式成立，以指导这四个地区的橡胶种植业发展。

1951 年，二十多位苏联顾问到达海南，帮助发展橡胶工业。由于苏联本身并不具备亚热带气候条件，也没有橡胶工业，这些苏联专家均来自林业和农业部门。他们只是在总体管理和机械化上提供援助。他们被派往海口和儋县的农垦局，与当地的专家们紧密合作。

1952 年，原先负责林业生产的第四野战军的两个师，即林一师和林二师（每个师约 3 000 人）从广西调往广东，开始垦荒种植橡胶树。第二师调到雷州半岛，第一师调往海南岛。第一师派出两个旅到那大和琼海两地原有的橡胶园，建立橡胶场场部，再划分为 12 个管理区。他们以管理区为据点招收民工，开始种植橡胶树。

1953 年，中国人在湛江成立了自己的热带作物研究中心，由天才的林业专家何康担任领导（何康以后是北京的农业部长）。1958 年，该研究中心迁到国营农场高度集中的那大附近，以加强与直接从事橡胶种植的人们的联系。他们还建立了一所大学，以培养种植橡胶的专家。当苏联专家在 1950 年代末期撤离后，中国人更是发奋图强。

部队的工程师们在 1950 年代铺设了第一条公路，从海口市穿过全岛中心地带的的所有山区，直到三亚。许多新建的国营农场便沿着这条公路建立农场场部。这些工程师们开辟的这条公路并不

是畅通无阻的平坦大道，也远未达到先进国家所能接受的标准。然而就当时的困难和技术而言，这条公路却不愧是英雄般的丰功伟绩。工人们用手凿，用桶和扁担肩挑污泥，有 100 多名工程师和工人因塌方、蛇咬和各种疾病而献身。

毛泽东对于建立橡胶农场给予高度重视，大力宣传“加强国防、巩固海南”这一口号。政府提供初期的设备和资金，帮助农场开始创业。在土地已清理并种上橡胶树后，国家又给部队战士和工人送来粮食和其他食品。但是在橡胶树开始产胶之前，国家负担不起维持全体工人七年的生活重担，而农场的人也希望尽快开始种植自己的稻米和必需的其他作物。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以短养长”，意思是在等待橡胶树长成的漫长时期，应当生产速生作物如木薯、茶叶等以增加收入。最早开始种植橡胶树并得到发展的 12 个区已成为国营农场的核心。有些农场经营失败，便作为一个分部合并到其他农场中。到了 1970 年代中期，国营农场的管理也如全岛的管理一样，分为两大部分：北部和少数民族众多的南部。在 1970 年代，北部有 44 个农场，南部有 46 个，人口总数超过 100 万人。

附近的本地人称为“农民”，但国营农场的雇工则称为“农工”，而国营农场在建国初期意味着较先进的社会主义阶段。大多数工人分配去管理橡胶树，有些工人管理树苗，另一部分工人则从长成的橡胶树上割胶，通常隔一天割一次。

在国营农场建立之初，来自当地农民的阻力不大。由于人员稀少，土地不适于一般农作，运输和通信手段十分原始，当地居民愿意让军队进驻。他们希望找到工作，在电力供应和交通运输方

面坐享其成，并使其子女能在军队办的学校上学。

从 1952 年到 1954 年 农场不仅从本岛 而且也从广东其他贫穷地区如汕头、梅县的老百姓中招收工人。但退伍军人仍旧是工人中的核心力量，他们保留了国营农场生活的模式和作风。在 1954~1955 年 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 有大批军人复员 有机会回乡与亲人团聚并过上好日子的士兵不会考虑在别处安家。但来自较穷地区且习惯了集体生活的部分士兵却选择海南为安家之地。据估计 总共约 7 万复员军人安置在直属农垦局的海南国营农场内。到 1950 年代中期，在国营农场的工人中，复员军人占 54%，本地人占 23% 外地人占 22%（原文如此——译者注）。

与附近公社的个体安家户相比，国营农场保留边陲前哨的军事作风。在农场建场初期 每天起床和上工仍吹军号 衣服和必需品是配给的。工人主要为男性 劳动时保持部队编制 并按军队纪律一切服从命令。人们住在类似军管的宿舍里，营房有一个中心大厅 用作食堂、会场和娱乐活动的场所。国营农场 甚至连中国的工厂和大学 也都与军营一样 是一个完整的小社会。他们有自己的学校、医院或医务所、商店、市场和电影院。他们将自己的武器也妥为保存，一旦需要便准备保卫海岛。没有什么理由使工人离开农场 事实上他们很少会这样做。

1952 年 中国接纳了 700 名持不同政见的马来西亚归国华侨，他们因支持共产党的活动而被马来西亚政府驱逐出境。他们的祖辈原是从中国极端贫困的地区移民去的 直到 1950 年代仍没有回老家的机会。由于他们来自气候温暖的地区，其中有些人当过橡胶工人，便在海南岛东南部万宁县的兴隆华侨农场安家。

1960年代中期，兴隆农场向受迫害外逃的印度尼西亚华侨敞开了大门。在1960和1970年代期间又接受了3000名越南难民。这些难民也如海南岛其他国营农场的工人一样，主要种植橡胶。但由于具有特殊的难民身份，他们得到政府的特别安置和帮助。继兴隆农场之后，海南岛又成功地建立起四个由归国华侨组成的农场。华侨农场虽然不像其他国营农场那样具有军队作风，但是许多集体主义的特点仍然是共有的。这些华侨农场的主管机构曾经多次变更从侨务委员会到生产兵团，又到农垦局，以后又归到海南行政区域的农委，但其发展的基本模式并未改变。

许多国营农场很难规定通用的语言，也难以建立共同的文化。在同一个农场内，都有大量说潮汕话、客家话、普通话和海南话的农工，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很难协调。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每个农场选择一种语言，通常是普通话作为通用语言，但问题仍然十分尖锐，特别是在客家人和汕头人之间。1954年和1955年，当复员军人可以就近安置以补充劳力需要时，许多早期招工而来却又不断闹矛盾的潮汕人和客家人被遣返回乡，尽管那里人口也过剩。

复员军人也并不都是理想的劳动力。许多北方人难于适应亚热带的气候。1950年代后期，橡胶工人仍然短缺。为了满足需要，几个军分区于1960年设法给海南调派10万名志愿人员，但只动员到6万人。在这6万人中，许多人感到气候恶劣和条件艰苦，要求调离，官员们起初不予批准。但是，当年年底有些坚持要调离的人造反了，不得不把农垦部长王震请来海南谈判，结果有1万人被批准返回北方。

1950年代中期，到海南落户者开始结婚并生儿育女。有些士

兵通过家乡的亲友找到妻子 而有些人则在海南 特别是在人口一向过剩的文昌县找到配偶，国营农场的性质便逐渐起变化。1954年，食品和日用必需品的供给制开始转变为工资制，给人们发工资 让他们购买日用必需品 并允许单独开伙。虽然家庭生活取代了兵营生活，但其组织形式仍旧与国营工厂一样，以生产队为单位 领取固定工资 享受国家的福利待遇。

与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国营农场周围的经济社会 1955年实现了农业集体化，1958年实现人民公社化。1961年以后 生产队被定为基本经济核算单位。周围地区一般农民的生产形式是集体所有制的，这一点与国营农场的农工不同。农民的收入取决于生产队的收入 不向国家领取固定工资 也没有国营所有制的一切福利保障。

从国营农场和农垦局的观点看，国营农场对国家的贡献比附近的农民大，因为他们生产紧缺商品，并完成了大面积的开荒任务。对于海口市农垦局官员的素质，一般认为比海南岛行政区的政府官员要高。在国营农场的工人中，超过小学文化水平的人很少 但与附近公社的人相比 教育程度普遍还较高。国营农场不仅拥有拖拉机和机械，还有懂得驾驶和修理的人员。他们有电力供应和电工，而附近的生产队却没有。管理橡胶树要求工作特别细心，还要掌握肥料和害虫的知识，学会使用农药和防治病害，附近农民种植的橡胶树不如国营农场的好，所以国营农场的干部并不鼓励农民种植橡胶树。

随着国营农场的继续扩展，他们开始占有更多的土地。附近一些农民认为 这些土地是理想耕地 而国营农场则辩解说 这些

土地上本来并未种植任何庄稼。但附近的农民说，他们可以用这些地来养鸡和养猪。如果农民或其子女被国营农场招工雇用，有些矛盾本来是可以解决的。可是农场并不缺劳力，也没有能力吸收更多的人。在土地使用上产生的争端日益激烈，这也反映在国营农场内部当地人与不讲本地话的外来人之间的根本分歧上。其他如水源使用、当地漂亮女人的婚嫁看不起本地人等问题上的纠纷不断。在海口市较高一级的领导层内，这些争端则反映在管理普通农民的海南行政区政府，与几乎可与区政府力量抗衡的农垦局之间的分歧上。

这些争端因文化大革命的无政府主义泛滥而越发加剧。特别是在 1969~1974 年当国营农场和附近的公社合并为兵团时农民感到自己的土地被国营农场无偿侵占，他们便滥用法律，愤怒地砍掉国营农场的橡胶树，而农场的警卫则焚烧或袭击周围的村庄，有时甚至杀害或打伤附近的农民，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农民便要求赔偿。1980 年双方的争执太激烈了，以致包括王震和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等高级官员都曾到海南来调解。经过好几年的争吵，终于在 1982 年达成了两项协议：禁止国营农场再扩大其占地范围，农场尽量向附近的农民招工，在种植橡胶和其他可供市场销售的作物方面，给予农民技术咨询和帮助。以后虽然小矛盾仍然不断，但大的对抗已经平息。

国营农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无须补充劳力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有任务吸收原在城市待业的十万红卫兵和知识青年。1968 年以后，为了恢复城市秩序，军管会要控制红卫兵和造反派干部，要找一个地方遣送他们。大学当时尚未完全复课，但国营农场尚

有土地未曾完全开发，可以接纳更多的农工。海口的农垦系统领导负责给农场分配知青的具体工作。

有些知青虽然也愿意为国效劳，但他们去海南却是因为别无选择。许多人发现那里的生活条件太差。他们一度曾以参加红卫兵为荣，如今却受到了严厉的制裁。当他们被送往农村时，一切幻想均已破灭。农场食品不足，品种单调，往往不合口味。泥地的住房，蚊叮虫咬，卫生条件很差。除了毛主席著作，没有任何可供阅读的资料。体力劳动并不轻松，劳动量有时太大，而天气又非常炎热。大多数知青想回城，许多人因曾经读过书而灰心绝望。当1977年举行十多年来第一次的大学入学考试时，有些知青仍在农村，他们因无机可乘适当准备投考而愤恨。许多人感到自己的事业被毁了，看不到一点前途。

在国营农场内，兵团官员和本地干部对待知青有时过于严酷，对女知青也有辱骂行为。不过有些干部和工人对他们很友善，而多数知青都同情处于原始生活条件下的当地工人家庭。在送往海南的知青中，多数人从事农业生产，也有些人被提拔当教师，以提高农场的文化教育水平。尽管他们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1970年代允许他们回城时，实际上所有知青都离场而去，很快便与在海南的朋友失去联系。只有极少数与当地入结婚或有特殊原因的人继续留在海南。知青回城后，并没有给农场调入新的知识分子来代替他们。事实证明，农场以后很难保持在知青帮助下学校达到过的较高的教学水平。

从根本意义上看，海南岛国营农场的文化大革命与广东省其他地区不同。由于越南战争，海岛西部不到半小时就有飞机骚扰，

十年前退伍到海南的士兵力量不足，需要增援部队以加强力量。1968年军事管制委员会进驻农场，以审查领导干部的思想。这种做法与其他地方一样。但在1969年，便从广州军区直接调派军管人员去检查农场的战备情况。每个农场进驻了几百名军管人员。他们接管了整个农场，包括生产管理。由于橡胶被认为是急需物资，原先每隔一天割胶一次，现在有时一天割胶几次。农垦干部知道，从11月到3月这段时间在海南岛是不能割胶的，否则会伤害橡胶树，但兵团军管人员对此置若罔闻。结果，橡胶树日渐衰弱，经不起台风袭击，大量的橡胶树毁于台风。这是大跃进浮夸作风在局部地区的重演。对科学技术无知而又急于求成的人们掌握了权力，执行了不符合现实的政策。到了文化大革命末期，他们已经破坏了国营农场的经济，引起了当地居民，包括已成为农场工人的上一代士兵的痛恨。

三、改革前的黎族和苗族

根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黎族有81万人。黎族人和海南汉族人的关系，在许多方面与海南与中国大陆的关系相类似。黎族人较穷、较落后，教育水平较低，作为国营农场工人是不受欢迎的。黎族人得到过外界的帮助，但很少人成为干部，即使当上干部，也没有实权。虽然汉族干部诚心诚意地努力搞好与黎族人的关系，把帮助他们列入工作的目标之一。但实际上，大多数人看不起黎族人。而黎族人反过来又看不起更为落后的苗族人。根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苗族有4.1万人，多半居住在海南岛更遥远的高山

山腰地带。

在部队工程师修通贯穿海南中部的公路之前，黎族人与其他地区基本上是隔绝的。他们采用先砍树后烧草的办法，在南部的旱地上种植一种甜稻米，勉强赖以生存。他们在一个地方从事耕作 4 年或 5 年，直到土壤肥力枯竭，就把家当打成捆，迁到另一个地区。烧野草给土壤作肥料，再种几年庄稼，然后再次搬家。每隔 20—25 年，他们回到原先耕种的地方，重新开始轮作。当地气候温和，他们不需要燃料过冬。只须搭间茅屋或利用山洞保护自己，不致遭受风吹雨打。

黎族人长期受到汉族统治者的压迫，不少黎族人参加了共产党游击队，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直到 1949 年得到解放。共产党游击队曾经深入到黎族人居住的五指山区建立根据地，与黎族人紧密合作多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1950 年后，共产党在海岛的南半部建立起黎族苗族自治州政府，把营根旧城定为自治区首府。部队工程师开辟了新公路之后，共产党将首府迁到西南方向离三亚不远的公路旁的新地方。正如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一样，共产党认为，在一个新建的城市建立领导核心要容易些，因为不必去处理那些传统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新城市通什首先成为自治州的行政中心（据 1982 年统计，全自治州人口 190 万）以后逐渐成为商业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除了自治州官员外，农垦干部也迁到通什去管理自治州境内的国营农场。1974 年当海南北部单独成立农垦局时，农垦干部的人数便增加了。不过，通什的党政官员虽然负责管理海南南半部，但同时仍要接受海口的领导，因为海口官员要对海南整个岛

屿全面负责。

1950 和 1960 年代 大量汉族干部涌入通什 也有少数到自治州其他县份。当地共产党给予原来的黎族游击队干部一定的地位和荣誉。游击队员和黎族头人的子女被送入学校 入团 送党校培训。有些子女还被送到通什、海口、广州的民族学校 接受担任领导干部的培训。然而 到了 1950 年代中期 许多黎族干部感到 他们继续受到施舍般的恩赐 但一涉及真正的权力问题 总是受到歧视。黎族子女也没有同等的上进机会。为此，他们十分苦恼。在 1957 年反对地方主义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某些强硬政策下，问题更加严重。而汉族官员则说 已经给予黎族人一些特权 允许他们多生孩子 允许少数民族以比汉族低的分数录取入技校和大学 但黎族人根本不具备担任领导职务的条件。

在 1950 年代当汉族人在黎族地区推行积极政策时 曾试图让黎族人放弃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定居并从事农业生产。这是较先进的和易于做到的生产方式。他们在一些地方帮助灌溉新的农田 发展水稻生产。有些黎族人接受了新的生活方式。但是 尽管黎族人有可能分到水稻田 许多人仍旧偏爱‘山腰甜稻’的味道 继续用传统的方法种植甜稻。到 1985 年 通什已有 4.5 万人 少数黎族人在这里找到了新的发展机会。而在不断发展的县城里，有些黎族人当上了服务员或小商贩。但住在较偏远地区的多数黎族人，仍继续在贫瘠的山腰上过着勉强糊口的生活。

四、建立基础设施

海南的改革和开放起步较晚。即使在 1980 年开放之后 海南仍与外界隔绝，思想比较保守，经济也较为原始。1970 年代初期中国与越南发生冲突时 北京担心海南易受袭击 就比广东其他地方进行更加严密的封闭。海南原来就已十分落后，隔绝封闭的后果更可想而知。1960 年代后期和 1970 年代初期，海南仅有的几间工厂也迁到偏远山区。迁厂后 由于缺乏专家和运输条件差 虽然努力生产，结果比广东工业迁往韶关的损失还要惨重。

然而 为了和平统一台湾 北京官方认为 他们有必要表明自己能够把海南管理好。^①到了 1970 年代后期 台湾已经成为经济高度发展、生活与教育水平高、通信运输现代化和工业实力雄厚的橱窗，而海南却谈不上什么橱窗。1980 年代初期 北京把海南比作经济起飞前的台湾，实在是低估了海南的不利因素。1950 年代的台湾，已拥有日本人留下的基础设施，有普及基础教育的居民，又有美国的大量援助 还有 100 多万外地人 包括数万名受过良好教育的官员和几千名美国顾问。而在 1980 年代初期 海南干部的教育水平低下 对组织现代化毫无经验 更谈不上对现代化工业的了解了。不过 北京也意识到 海南缺乏得力的领导 不可能突然发展市场经济，海南需要外界援助和改进基础设施。

但是 海南官员却不大愿意接受外来帮助 对外地人长期抱着

^① 《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

憎恨情绪。他们知道自己落后 能力不如别人。他们对待其他‘中国人’的态度 与殖民地对殖民主义者的怨恨不无相似之处。从海南的观点看 外地人拿走了石碌的优质铁矿石、国营农场的橡胶和莺歌海盐场的食盐，并没有给予补偿。海南虽然接受了一些外来经济援助 但却少得可怜 无补于海岛的发展 反而使经济依赖于外来力量。他们认为 大陆派了一批投机取巧的人到海南 这些人凌驾在当地游击队之上，打击地方主义以及他们的抗日英雄冯白驹。尽管许多外地人都承认 对冯的处理过于严厉 但冯的名誉一直没有恢复。

海南的规划和改革落后于其他地区。1980年7月初 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很长的海南问题会议。会议决定首先改善国营农场和公社之间的关系，巩固农业基地，再着手新的建设。1981年开始的第六个五年计划中，大幅度增加了海南交通运输和通信基础设施的预算。1982年，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任命雷宇为海南行政区第一把手。雷宇是任仲夷手下的得力干部，当年随同任仲夷一起从辽宁调来广东。雷宇年纪不过40来岁 与海南本地干部合作良好，给海南带来了生机和动力。他的意见也明显得到省领导人的重视。以前的领导干部都带一大批外地人去上任，而雷宇与他们不同，基本上是单枪匹马到海南的。所以大多数本地干部觉得 雷富于同情心 都愿意与他合作共事。

1983年1月，又一次关于海南发展问题的会议在海南举行。会后的两个月内 北京的其他主要领导人——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农垦系统领导人王震，还有奔走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谷牧都视察了海南。继这些讨论之后 党中央和国务院于1983年4月1日发

出指示 号召加快发展海南的农业、林业和橡胶业 并制订工业发展计划。由于有了投资计划和免税办法，又有北京和广东的帮助，为工业发展计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海南的商品经济基础薄弱 所以 海南基础设施的发展优先于市场的发展，这一点与广东内地不同。1970 年代中期 在原来部队修筑的公路的基础上，开始铺设从海口到三亚的双行道公路。在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时，东部和西部的沿海公路大部分也修建好了。主要公路的施工一直不断，弯道和高坡逐渐拉直削平。这些公路供一切大小运输工具使用 徒步、自行车、摩托车、摩托三轮车、小汽车、面包车、拖拉机、卡车、公共汽车等。从海南的一端到另一端，1949 年时需要走几天时间，到了 1980 年代 除遇意外的事故拖延外 乘车只需 8 小时。

连接铁矿区和八所港口的那条破旧狭窄铁路，现已重新换上了宽轨，而且还可从八所沿着海岛西南部延长至三亚。港口设施已经现代化了 可以同时容纳几艘 2 万吨级的船只。海口港口的淤塞一度十分严重，1980 年广州的正常客轮入港往往要 1 小时。1980 年代中期，对港口进行了疏浚，水深加至 8 米。新码头于 1987 年竣工后 港口可以停泊两艘 5 000 吨位、两艘 3 000 吨位的船只和一艘客轮。海口新机场的跑道也延长至 2 500 米 可供 150 架的客机使用，并开始为飞往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国际航线服务。三亚的小型军用机场也改为民航，44 座的小型飞机每周有几个航班飞往海口。

通信设备则由日本电气公司和香港大东电报局合作提供。1987 年 7 月，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微波电话系统，海口和香港可

以直拨通话，并可接通日本和美国。海口和三亚之间 940 条频道可同时启用，使海南的主要城市与 17 个县城中的 8 个县之间的电话畅通无阻。预计到 1980 年代结束时 其余各县都将引进直拨电话系统 扩大通信服务。

基础设施中最落后的是电力。1987 年初 海南的 37 万千瓦的发电量中（台湾当时的发电量为 1 200 万千瓦），90% 靠水力发电。海南缺乏大水库 随着用电需求的不断增加 使得干旱季节时的缺电情况非常严重。

在 1980 年代 海南投资总额的 1/3 左右集中在海口市 虽然该市人口仅占全岛的 5%。1980 年海口还没有一间大宾馆，但到 1980 年代末已有五间现代化宾馆、几间现代化干部招待所，还计划或在建十间宾馆。1980 年海口还是个杂草丛生的贫穷市镇，但很快便初具现代化城市的规模 街道宽敞 两旁绿树成行 工厂和办公大楼数以百计，原来小小的工业基地也大规模扩建了。除了深圳、珠海和佛山以外 广东没有一个城市在建设规模上变化如此之大 但探究其变化的缘由 则多半是来自国家投资 而不是来自改革和市场的力量。

五、海南汽车事件（1984～1985）

海南得到上级的特别许可 允许进口各种汽车和其他物资 但只供海南本地使用。1984 年初，行政公署主任雷宇批准下属单位进口 1.6 万辆面包车 雷宇当时是海南的最高政府官员（由于海南的特殊地位 这个职务也很特殊），从 1949 年到 1984 年 除了卡

车以外 海南只进口了 1 万辆汽车。不过，随着财政预算的增加，凡是想要拥有单位专用车的各部门，现在都可以得到可载客 8—10 人的面包车，在新铺的马路上奔驰。

这些面包车是由一位香港的中国商人向日本丰田公司购买并用船运到海南的。汽车陆续运达时，海南的所有下属主要党政部门均纷纷向上级递交购车申请，行政区几位政府官员也开始批准额外进口汽车。正如雷宇完全按规定办事一样，行政区官员签署批条也是他们职权范围内的事。

问题在于，一些买车单位发现把车转卖给广东内地及其他不许进口汽车的地方可以牟取暴利。即使在海南内部，上级领导也很难查出哪个单位将汽车转手倒卖。早些时候也曾获得特许进口汽车和其他物资的佛山等地区也转手倒卖过这类东西，但没有受到处分。海南的许多干部相信，北京和广东的领导人既然在财政预算中无法给海南保证充足的发展资金，他们至少也默许过可以寻找其他途径。而转卖汽车和其他物资所得的利润，将有助于海南的发展。

在转卖汽车上，海南的单位可能赚到的钱远远超过他们以往的想象。对于某些人，这种诱惑是不可抗拒的。有些单位资金极为短缺，确实将所赚的钱用于刚刚开始的基础设施方面，但也有把款项挪作他用的，包括纳入个人腰包。这些情况开始传到上级领导那里。接近领导机构和消息灵通的单位首先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大捞一笔。党、政、军各单位，国营农场、工厂、商店、旅馆、学校，甚至幼儿园都迅速行动，以谋取自己的一份利润。几周之内，远离海口的穷单位也来要求分得一份。在第一批获准进口的汽车

中有 2 300 辆于 1984 年上半年运抵海南 另外 1.3 万辆于同年 7 月抵达。到了 9 月份 当广东领导人命令坚决停止汽车进口时 批准进口的汽车已达 8 万辆。从海南的发展水平看，这是一笔巨大的支出。但海南领导人对停止汽车进口犹豫不决，一方面是担心那些条件本来已经够差而又远离海口的单位有意见，认为海口又一次只顾本身利益；另一方面也担心那些靠借债订购汽车的单位，如果得不到他们订购的汽车便无力偿还债务。

人际关系在中国一向十分重要，而海南又比其他地方更甚。朋友登门要求以个人名义购买汽车，官员们感到人情难却。当然有些朋友购车是自用的，但大多数都是用于倒卖牟利。海南职位最高的本地干部是陈玉益 担任海南行政区副主任 主管对外经济工作。他的家乡琼山县的朋友，以及他曾担任县委副书记的琼海县的单位都登门求助，经陈玉益亲自审批进口的汽车就达 7.3 万辆之多。由于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其历史根源，对于一个外地人——年仅 49 岁的海南最年轻的高级领导人雷宇来说 处境十分为难。他要批评其副职陈玉益 就得冒破坏他与本地干部关系的风险。当雷宇为了执行省的命令，最终不得不到码头，制止船只将汽车运往大陆内地时，他遭到了本地干部的强烈抵制。甚至在上级 9 月份正式下达禁令之后的两周内，地方干部仍然利欲熏心 明目张胆地违抗命令 又批准进口 8 900 辆汽车。

海南购买汽车事件引起了危机。他们花掉了中国辛辛苦苦赚回来的 10 亿美元外汇 不仅使外汇短缺 影响今后购买必需品 而且这种非法牟利的行为恶性膨胀 失去控制 引起国内甚至国际的关注。北京感到必须制裁 除此别无选择 因为那些一向反对给予

广东自主权的高级官员正准备使改革者难堪。如果他们不采取行动，中国的社会秩序和国家声誉将会受到危害。北京的高层领导人处理这个问题时十分谨慎。1985年初，他们从北京和广州派出100多名干部到海南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彻底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进口汽车基本上不符合国家利益。即使有必要，也应以更有利的条件进口，不该通过许多经纪人，而且要根据有关规定，确认售往何处，售给何人。

这样一来，上级不再允许进口面包车，并要求把已进口但尚在海南中间人手中的车辆以低价出售。但对于已经转卖了，由于不可能追查，只好承认事实。这样做意味着有人要蒙受损失，而有些单位却发了横财。雷宇被撤去第一书记职务，降职为县委副书记，先是在花县，后来在增城县任职。1988年，他再次被提升为广州市副市长，负责广州市新兴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雷宇是忠诚清白的，他所接受的礼物全部交公，甚至拒绝送给他的香烟。他每次去香港访问时也不买物品。上级正式宣布他个人没有投机倒把行为，只是犯了失职的错误。少数违反纪律、情节特别恶劣的干部被判入狱，而多数人仅受到批评。处分决定在调查后即行宣布，以便有关单位能够转入更重要的工作。

雷宇却因此意想不到地成了一位英雄。他曾经提拔了一批精明强干的干部到海南各个重要岗位上，使当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气。因此，海南岛以外的很多高级官员认为，为了保持海南的发展速度，这次事件应当从宽处理。1986年5月，北京的166名年轻干部，其中许多人参加了对海南汽车事件的调查，联名上书，请愿要求恢复雷宇的海南行政公署主任职务。本地官员更是不

安、难过 因为雷宇虽然倍受压力 仍然不肯打击本地干部 宁愿自己承担一切后果。此外，本地干部也满腹怨气，认为海南又像在 1957 年那样，受到不公正的惩罚。佛山也有过类似行为，但并没有受到处理。既然是错误行为，为什么不处分那些购买汽车的人？有人说 处理雷宇 就好比等公牛逃走之后 才去把牛圈捆扎起来。对于那些认为受到外地人压迫的本地人来说，雷宇成了他们的象征。

这次事件最可悲的后果，是海南失去了改革动力。海南过去没有一个土生土长的强有力的领导层 正当这股力量在发展时 就因汽车事件而被扼杀于萌芽状态之中。干部们害怕冒风险，不再主动出击。1986 年 1 月中央领导视察海南时，宣布拨款资助建设 24 项大工程 允许出售 1984 年已进口的汽车和其他物资 而且向忧心忡忡的干部保证，只有极端恶劣的违法行为才会受到刑事处罚。他希望借此消除海南干部的忧愤和失望情绪。^①

六、国营农场的农工、 技术进步和市场

中国改革计划的目标之一 是让知识分子有职有权 使他们在技术进步中起作用。中国唯一的热带作物研究所自 1958 年迁到海南后 继续取得很大进步。虽然 海南是中国最理想的橡胶种植区，但气候却不如马来西亚暖和。马来西亚的橡胶树一年到头可

^① 《广角镜》香港，1986 年 3 月号 第 18-19 页。

以割胶 在海南却很难找到每年有 8 个月以上收获期的品种。各种虫害和地方性疾病影响橡胶树的生长，最严重的是 8-9 月间的台风 经常摧毁大片橡胶林。

所长何康吸收了一批精明能干且富有献身精神的人员到热带作物研究所来，其中包括原任教于南京金陵大学的青年科学家黄仲道，还有黄原来的学生潘燕清。他们在中国这块偏远的农村土地上花费了 30 年的时间 培育出适合于当地自然条件的橡胶树品种 也培育了桉树及其他树木的新品种 种在橡胶树四周 防护幼弱的橡胶树苗免遭台风的袭击。到 1980 年 他们已基本解决了虫害问题，接着他们便集中力量培育高产良种。

文化大革命期间 研究工作中断 人员下放劳动。国营农场与研究所之间的紧密联系基本上中断了 特别是在 1969~1974 年兵团领导时期。改革开始之后，黄仲道当上了研究所所长和附属学院院长，潘燕清任党委书记。由于国营农场要着手恢复文化大革命期间无人管理和遭受毁坏的橡胶树，便派出干部到学院去接受专门培训。虽然在直属北京的研究所、国营农场和海南农业干部之间的关系尚待改善，但已有一批热带作物学院的毕业生分配到大部分海南国营农场 以及雷州半岛、云南和福建的橡胶种植场担任生产领导工作。

由于海岛南部的国营农场比北部的农场建场较晚，新的高产品种培育出来之后，南部的农场都种植了这些高产的橡胶树。新品种虽然生长季节较短，但产量可与马来西亚的品种相媲美。文化大革命以后，北部的农场也开始用新品种来代替老树。影响这项工作进度的主要障碍是电力不足，不能及时锯掉老树，卖掉木

材。这个瓶颈问题经过努力，以后也解决了。

在改良树种和改进管理方法之后，海南的橡胶产量从 1978 年的 5 万吨提高到 1986 年的 12 万吨，占全国产量的 60%。由于国内需求量大，在 1980 年代后期仍然要进口数量几乎相当于本国产量的生胶。不过，科研人员有信心使中国在 1986~2000 年期间将生胶产量翻一番，从每年 20 万吨增加到 40 万吨，这与海南橡胶生产的增长速度大致相等。

根据 1984 年世界银行与中国签订的一项协定，预计将会在增加橡胶生产和提高效率方面发挥很大作用。世界银行将提供无息贷款 1 亿美元，用于发展广东的橡胶业，为期 10 年。其中 20% 将用于广东内地，80% 用于海南。这项协定生效后，各类外国专家纷至沓来，帮助海南引进外国设备和新的管理制度。1987 年，泰国向中国出售橡胶每吨只要 5 000 美元，而中国生产 1 吨橡胶的成本却要 6 100 美元。中国实行低工资制，但国营农场所负担的福利费用，包括教育、医疗保健以及其他福利都十分沉重。有关领导正在参照国际做法，改进管理和责任制，以便缩小国内和国际橡胶生产成本的差距。

在 1970 年代，国营农场的收入实际上全靠以固定价格向国家交售橡胶。海南农垦局的重点一直是橡胶生产和加工业。国家的收购价格虽然逐渐提高，但农场只出售未经加工的原料橡胶，收入极其有限。改革开始后，为了提高生活水平，国营农场努力扩大多种经营，增加能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种类。到了 1988 年，农垦局除了 92 个国营农场外，还拥有 2 个研究所、34 个独立公司和工厂。工业生产在 1970 年代还微不足道，但 1988 年工业产值已占全农

垦局产值的 15% ,而且正在稳步增长。海南农垦局这时已获准在其生产的 14 万吨生胶中自留大约 3 万吨,因此他们办起了小工厂生产轮胎、胶靴、运动鞋、橡胶手套和体育用球类产品。老橡胶树的木材便加工成模压木板,用来制造家具或织布机梭子。农垦局还建立了自己的水泥厂、陶瓷厂、大理石加工厂、机械厂以及菠萝罐头厂和果汁工厂。如以国际标准衡量,这些工厂在 1980 年代后期规模仍然很小,操作落后,但农垦局正在计划使工厂现代化以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

在 1980 年代海南岛的生活仍然是高度的集体化 学校教育、卫生保健、文娱活动等设施都是属于集体的。然而 为了调动国营农场的积极性,除了公有制之外,已经允许集体和个人所有制存在。这种变化与 1960 年代便已开始的家庭生活个体化的自然趋势是一致的。1987 年发给每个工人补助费 700 元 帮助每个家庭修筑住房。当时建一户房屋平均约需 5 000 元 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三口人当工人,一家所得的补助费就够支付建房费的 1/3。这样一来 国营农场内掀起了建私房热 新房屋代替了集体宿舍和小型公寓楼。

1987 年 给职工家庭划分了 3 万亩土地,用以种植自己食用的稻米和其他作物 360 万亩用来种植橡胶 20 万亩种植甘蔗 10 万亩种茶。个体家庭的积极性大大促进了各种热带作物的商品生产 如咖啡、可可、胡椒、椰子、槟榔以及各种中药材。此外 国营农场每年生产的近 3 万吨猪肉 事实上都是各家各户提供的 其中约 40% 在市场销售。允许个人购买企业的股份,有些人还在附近的市镇上投资 甚至培育橡胶树苗、割胶、管理树木等工作都由各

个小组承包 有时还实行以家庭为单位承包。

国营农场的年轻一代，是在几乎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即使到了 1980 年代后期 他们还没有看过电视 对海南的其他地方均一无所知，更不用说全中国了。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 除了参军以外 农场人口不准迁居流动 到了 1980 年代后期，迁移调动仍很困难。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只能像他们的父母那样 将来成为农场工人。一直到 1980 年代初期 开始允许私人企业发展之后，才有一些年轻人从事更具有商业性的独立手工业活动。他们在国营农场的入口处开设商店，以后发展成购物中心。有些人开始出售农产品和自制小件日用品。允许私人购买拖拉机和摩托车之后，少数有办法弄到资金的人，便经营起个体运输业。一些有头脑的青年慢慢感觉到，在农场外面做买卖也是有发展机会的。根据 1988 年的粗略统计 农场的家庭收入中有 1/3 来自个体收入 农场工人的收入每年增长约 200 元 大部分也是来自个体收入的增加。

七、农民和以生产为动力的市场 (1983~1988 年)

海南在 1980 年代虽然也曾努力填平国营农场与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鸿沟 但是直到 1980 年代末期，这二者基本上仍旧是两种独立的经济体系 各自为政。大家公认 农垦局的生产活动 包括国营农场在内 要比岛上其他经济部门计划得更周密 其从业人员的素质也较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由于国营农场经济主要依赖于橡胶 其价格又是用行政手段规定的,在 1980 年代后期,其他经济反而发展得更快。从 1950~1982 年,中央政府在海南的投资总额为 53 亿元 而在 1983~1987 年的短短的四年内就投资了 48 亿元。^①农垦局所属各部门,包括国营农场在内的工农业产值在海南所占的比例 这几年却从 1/3 降到 1/5,而且还在继续下降。相反 非国营农场的人均收入却迅速提高了 尽管其 1988 年的人均收入仍比国营农场约低 80%。

随着地方干部对世界经济的更多了解,他们也开始考虑海南在国际经济上所能发挥的作用。海南岛离香港太远,港商不可能在海南大量投资建立加工厂。海南也太穷,地方企业的实力太薄弱 不可能指望一旦允许私人办企业 就会在短期内给经济带来大发展。

很明显 海南的作用就在于发挥自身优势 即发展热带作物生产、开采矿产原料,并在外力的帮助下利用这些资源发展地方工业。既然海南太穷 本身的需求不大 就应从生产外界所需的产品入手。市场具有推动生产力的作用,海南的规划者在 1980 年代中期也在考虑食品加工业在引导和推动农业生产的反作用问题。尽管海南西部的土壤多半并不肥沃,但 1987 年海南尚有 80% 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 农业产值达 41 亿元 远远超过 24 亿元的工业产值。因此,增加农业收入必须成为海南发展的核心。

^① 《海南岛的投资环境》海口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咨询公司等编,1987 年 12 月,第 44 页。

蔗糖生产就是一个好例子。1980 年代初期 甘蔗的国家收购价格没有及时调高 使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对种蔗失去兴趣 从而导致这个地区的糖厂原料供应不足。而海南农民却乐意生产甘蔗，并对收购价格也感到满意。不过 甘蔗的运输费用很高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关闭珠江三角洲的糖厂，而在海南建立糖厂。事实上，1980 年代海南的每个县都建了糖厂，到 1987 年共有 39 间 每年生产食糖 30 万吨 占广东总产量的 1/6 相当于海南 1983 年糖产量的 2.5 倍。考虑到海南运输落后 资金不足 便选择了建小厂的办法，但这些小厂的设备和效率却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有些农民在糖厂找到工作 更多的农民种植甘蔗 以满足糖厂对甘蔗日益增长的需求。

有了从丹麦和意大利进口的机器设备，海南开始扩大咖啡生产。1987 年生产咖啡豆 350 吨 生产和销售都在迅速增长。海南很多地方都计划种植‘兴隆’和‘富山’咖啡豆 这是海南自己培育的优良品种。此外 海南还得到世界银行一笔少量贷款 用于发展菠萝罐头生产；另一笔世界银行贷款则用于扩大茶叶生产。到 1987 年 茶叶产品已达 440 吨 占广东出口量的 1/3 海南的国内市场需求虽小，但却能促进其他作物的生产，特别是胡椒和中药材。不过，由于生产成本和运输费用高昂，无法在国际市场上竞争。

椰子生产是市场销售首次告捷的成功例子。椰子盛产于海南岛东北部 离海口不远 约一半椰子树在文昌县。该县的商业也比海南其余地区发达。1983 年初，每个椰子一般只售 0.2 元 但到了年底 由于糖果厂迅速增加 椰子价格随之上升。到 1984 年 椰

子价格达到顶峰，每个售价达 0.8 元，很多糖果厂因无法单独竞争而合并。1987 年，椰子价格回降到 0.5 元。当时还出现了一批椰子中间商，他们从农民手中收购椰子，集中运往工厂。中间商在农民与工厂之间两头讨价还价，从中牟利。直到 1980 年代中期，椰子壳都是作废料处理。但从联邦德国引进新设备后，椰子壳可用来制造椰丝垫，同东南亚各国的做法一样。文昌县最成功的椰子糖果厂下属的椰丝垫分厂，是由几间农村小型椰子厂合并而成的。到 1987 年，该厂雇用的工人达 500 多名。1983 年，农民开始种植一批新椰树，一般需要 7 年才能结果。据估计，椰子树将从 1980 年的 2 600 万株增加到 1990 年的 6 000 万株。

沿海南岛东部海岸和淡水养殖的鱼类、螃蟹、虾类及其他水产品的生产才刚刚起步，但发展潜力很大。

海南人一向抱怨说，海南的贫穷落后，是因为岛上的资源到处被人无偿侵占。海南最高领导人也努力干实事，以平息这种怨愤。利用天然橡胶建厂就是良好的开端。某轮胎厂 1980 年生产 14 万条轮胎，到 1987 年已扩大到年产 30 万条，其中包括 5 万条卡车轮胎。工厂从日本横川属下的神户钢铁公司进口部分机器设备，同时改进了原有的国产机器（大部分为大连制造），计划到 1990 年生产轮胎 40 万条，到 1995 年生产 60 万条。这个数字还不到 1987 年全国年产轮胎 1 400 万条的 5%。这一目标对于海南并不算高，因为海南生产的天然橡胶占全国的 60%。在全国生产的天然和人造橡胶制品中，有 25% 的原料也是海南提供的。其他不属农垦系统的工厂也引进了新机器设备，生产自行车胎和橡胶手套。

为了奠定金属工业发展的基础，国务院于 1987 年批准海南建

立一间年产 35 万吨的钢铁厂。厂址设在石碌铁矿附近，燃烧用煤则从岛外运入。同时用 800 万美元从菲律宾福特汽车厂购进一批旧机器设备帮助海南建立汽车零件厂以便利用石碌的金属产品。福特厂的工程师到海南帮助安装机器。当时全岛只有 15 间小规模修理站从事修理和装配汽车、拖拉机、柴油机等零部件。此外海南还有 43 间机械厂。海南希望把其中一些修理站扩展成为汽车零件生产厂，而这些厂反过来又可促进海南机械工业的发展。

除了针对海南本地资源建立相应的工业以外，海南的规划者实际上推行了初步的‘进口替代’政策。改革开始时海南大部分居民买不起工厂生产的成品。但到了 1980 年代中期除了边远地区外，人们不再用手工缝制衣服了。继新会县化纤混纺厂取得成功之后广东获准建立几间同类工厂其中一间就建在海口。该厂引进联邦德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设备，1984 年开始规划，1986 年 11 月正式投产。工厂用电受到优先照顾，生产从不中断，用其世界水平的设备和每年 5 000 吨的速度生产化学纤维。

1985 年 12 月在化纤厂附近建成了另一间纺织厂，1986 年已生产了 1 000 万米化纤布料。1987 年秋天另一家印染厂也开始投入使用年产量为 2 100 万米。该厂还有一附属车间生产棉纱出口赚取外汇。两间工厂都是全自动化的，使用国内各地生产的现代化设备不仅吸收了当地 3 000 人就业而且使海南能够生产自己所需的布料。

在橡胶、钢铁、金属、化纤、纺织和汽车零件生产上的突破都需要外来的资金、技术和管理制度。只有热带作物的加工则大部

分由本地公司管理，并随着一批土生土长的领导力量一起成长。

1980年代后期，海南地方工业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仍旧受到限制。究其原因，不仅是由于本地官员缺乏远见，习惯于静态经济，对市场经济缺乏经验，基础设施也存在问题。当电力不足时，有些国营工厂享受最优惠的照顾，正常供电，有些国营工厂享受一定的照顾，实行有限供电，而一些不在国家计划之列的工厂则供电很少。因此，许多工厂难得有机会去利用合法给予他们的自主权。对于海南是否有能力和技术发展乡镇企业，并对市场机遇作出反应，本地人和外地人可能持有不同意见。但在获得更多的电力之前，是无法确定孰是孰非的。

八、早期改革影响不到之处： 少数民族

海南岛的新建工程。工业发展和市场活动几乎全部集中在海口，其次是三个较小的海港城市——洋浦、八所和三亚。国营农场组织严密，纳入农垦计划，他们的新体制也很快感受到发展的影响。但是自1978年以来，十年改革还未触及到海岛上很多地方，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偏远地区。

在少数民族地区虽然实行了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也受欢迎，但是这种变化比起广东内地山区还是迟了一些。1982年国营农场与附近农民的冲突平息之后，农户包产责任制才在乐东县试行，以后才推广到其余地区。不过，少数民族地区的集体生产一向组织松散，所以实行非集体化也没有带来多少变化。市场经济仍

然毫无发展机会。

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的人口虽然约有半数少数民族，但新州府通什市的所有职位都由汉族人担任。1988年通什市的4.5万人口中黎族和苗族还不到4000人。五个少数民族的县和行政村与外界仍旧毫无联系，甚至连一条通往外界的土公路也没有。因为与其他群体隔绝靠原始耕作为生黎族人不可能突然改变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思想方法以及与其他群体的关系。就是到了1980年代末期，很多黎族家庭从不参与商品经济，甚至进城也很不自在。一些居住在市镇和公路附近的少数民族家庭，顶多只是种些芒果、菠萝、香蕉或采集中药材到市场出售。他们之中没有人有自行车也没有钱乘公共汽车运到市场出售的商品仅限于肩挑手提的物品。海南汽车事件与黎族没有牵连，因为他们消息不灵通而且太穷几乎没有一个黎族单位买得起进口汽车。

少数民族没有人买得起收音机，更不用说电视机了。他们的文化水平非常低，几乎无人阅读报纸书刊。据黎族领导人估计，1988年在12-40岁的黎族人中，文盲大约占50-60%，40岁以上的则90%都是文盲。当时虽然95%的黎族儿童都上了小学但能读到小学毕业的不到60%。即使小学毕业了水平也很低。父母无力负担其子女购买课本和学习用品的费用；教师的工资从地方预算中支付工资标准要比其他地区低所以没有知识分子愿意到这里任教。每个教师平均每月只有5角钱购买教学用品经常不得不自掏腰包去买最起码的课堂教学必需品。各县都有一所中学，少数优秀学生还可以进入民族学院上大学。但自1950年以来，尚无一个海南的黎族人接受过大学水平的技术培训。

没有几个汉族干部为改善少数民族生活起过较大作用，而少数民族领导人也无力改变现状。例如，万宁县的黎族人口占 16%。但黎族干部只占 0.5%。1988 年为了统一行政管理 取消了自治州，原来自治州的大部分地区划入三亚市管辖。黎族干部认为 少数民族自治州及其州府取消与否并无多少区别 因为他们以前也没有得到过多少好处。

在 1980 年代中期，采取了一些扶助贫困地区的措施，规定每个国营农场都要扶助一个邻近的穷村，每年拨出 10% 以上的利润用于扶贫项目，如帮助穷村种植具有市场潜力的热带作物。这与内地扶助山区县的计划是同时进行的。这个扶贫计划对海南南部地区特别重要 因为那里的农村最穷困 黎族村落也最多。这项工作虽然规模不大，但也有助于减少国营农场与附近农户之间的差距和对立情绪。

据黎族领导人的估计，1982 年在 81 万总人口中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黎族人约 50 万（以每年人均收入低于 120 元 粮食不足 200 公斤为贫困线标准）到 1988 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减少到 40 万 标准提高到年人均收入 200 元 略高于物价上涨，然而 无论以什么标准衡量 大部分黎族人仍然过着最低最穷的生活 居住在改革影响不到的偏远地区。即使像通什、三亚、洋浦和海口等城市中心区 到 1980 年代发展仍然有限 未能从贫困的山区吸收劳力。

九、三亚旅游业

海南的冬季气候温暖 在考虑发挥海南的潜力时 人们自然会想到旅游业。而位于海岛南端鹿回头半岛附近的三亚市，是发展旅游业最有前途的地方。鹿回头半岛因一传奇故事而得名。相传有一位猎人 追逐一头小鹿到了海南岛尽头 小鹿一回头变成了一位少女并与猎人结为夫妻 从此半岛得名“鹿回头”。三亚以其美丽的海滩出名 海滩沿着岛的海岸延伸 30 公里。附近是陡峭的岩壁 巨石千姿百态 巍峨壮观。且树木成林 青翠一片。那里空气清新 海水清澈 鱼群五彩缤纷 使这一带成为吸引人的游泳和潜水的理想去处。距三亚不到 1 小时的路程 就是黎族苗族自治州，也是颇具吸引力的旅游胜地。

1950 年以后，鹿回头一带成了北京和广东省高级领导人的冬季疗养地。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都曾来过。叶剑英元帅 1980 年初曾在此小住过一段时间 他们都了解三亚的潜力 因此积极支持将此地开发成旅游区。

1980 年代初期，三亚建设有了一些进展。开辟了一处疗养地，为干部提供一个幽静的环境，并将鹿回头大部分地区对公众开放。中央领导还决定，把榆林的海军基地向东移数英里，以便于在此处发展旅游业。三亚的军用机场也对民航开放，还批准兴建几家小旅馆。对原琼崖县政府进行了改组，起初改为市级行政单位三亚市，到 1988 年又升为地区级。三亚的设施虽然较差，但 1986 年已吸引了 4.9 万名外国游客和 18 万名国内游客来此

度假。^① 拥有 1 000 间客房的 5 家新宾馆计划将于 1989 年落成。

有些人已经开始讨论更加宏伟的计划——在 2000 年前要增加到 1.5 万间客房和每年接待 250 万游客。但是，从 1983 年制订海南规划到 1988 年海南建省这段时期，当地还没有人具备足够的经验、远见或权力去计划和协调旅游业的开发项目。各个风景区，甚至负责建筑旅馆和其他旅游设施的机构，都分属不同的组织领导。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基本的用电、电话和其他服务都几乎是无法保证的。

1987 年三亚旅游局局长张山，就是一位致力于加速旅游业发展的杰出人物。在宣布海南建省后，更多有才干的大陆干部愿意调往海南工作。但是，甘愿放弃舒适的物质生活及优越的工作条件，为建设落后地区而来的人为数不多。张山是这少数人之一。他是在宣布海南建省前就到此地的。当他作为北京官员派往海南调查汽车丑闻时，就对三亚的潜力留下深刻印象。于是他与几位北京的青年干部草拟了一份有关海南发展前景的报告，并且毅然奔赴三亚，以实现这个计划。在那里，他为推动事业的进展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②。直到海南省成立，外界的领导人通过自己管辖的系统了解到海南的情况后，才开始给予更多的支持。三亚尽管具备这样的潜力，但在 1988 年以前还是一个赤贫的小镇，其三万居民的文化水平低下，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附近的农民，包括黎、回、苗等少数民族常到镇上出售产品，并买回最廉价的生活必需

^①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ong Kong), June 1, 1987.

^② 首都青年知识分子支援海南建设联合会，《关于建设三亚国际旅行城的总体构想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北京，1986 年 5 月。

品。而目前旅游业尚未能够大发展，不可能给当地带来比其他贫穷乡镇更多的财富。

十、海南省：目标宏伟，障碍重重

1887年，清朝为了加速台湾的发展，曾将它划为一个省份。一个世纪之后，1987年8月28日，海南建省被提到中央议事日程，目的也是如此。广东为了加速海南的发展虽然作了许多努力，但北京认为广东省太大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太多很难给予海南为加速发展所必需的关注。海南官员也欢迎这一决定。因为从广东分出来他们有更大的独立性级别和工资会更高还可从北京得到更多的支持。^①

北京和海口的官员都忙于制订有关体制改革、开发海南和外部投资的新指导方针。许多计划虽然与1983年以来所制订的大同小异但对各个方面都经过重新考虑并加快了实施速度。1986年，一个由运输、建筑、采矿、金融、农业、旅游和能源等方面的21名日本专家组成的代表团与国务院直接领导的专家合作拟订了一个详细的综合发展方案，共11部分，于1988年5月发表。^②不过尽管该方案所提供的广泛背景材料很有用但当这个方案一发

① 《海南岛的投资环境》海南省筹建小组，《海南省南海的明珠》海口，1986。

② This report is presented in Nipponkoku Kokusai Kyooryoku Jigyoodan, Chuuka Jinmin Kycowakoku, Hainantoo: soogoo kaihatsu keikaku choosa (Hainan Island,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search report on an overall development plan), 11 vols. (Tokyo, May 1988)

表时就被认为过于保守了。1988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组团赴海南两个月，就日本专家没有考虑到的体制改革和人事制度问题提出全面的建议。同时，美国兰德公司也受委托进行一项研究，探讨海南体制改革后如何适应与外商合作的问题。

官方希望海南在体制改革上比其他经济特区更为特殊。它将成为“小政府、大社会”就是说国营企业尽量少，政府控制减至最低限度。要像香港那样，拍卖土地使用权，租赁期为70年，允许外汇自由兑换并按市场运行规律运转。

1987年，一批有才能的外地干部组成了海南建省筹备小组，待正式建省后担任相应的职务。这批干部包括省委书记许士杰、省长梁湘和副省长鲍克明。许士杰是深受尊敬的城市改革者，潮州人，1956~1971年在海南岛工作，先后担任过肇庆专区和广州市党委书记。梁湘也曾在广州工作，后来在担任深圳市长时起了创业开拓的作用。鲍克明原是北京民航的高级领导，在政界很有威望。除了这个高层领导班子外，海南各政府部门还拟订了一份省内职务所需人员名单，于1988年中期公布。由于海南尚无合适的人选，暂存空缺职位4500个。

海口成了一个热闹而又奇特的小城市。连续数月，每天一船船的人涌向海口来寻找机会。有些人只逗留几天，填写一份谋求职务的申请表，约见面谈后即离去。有些人预计到海南迅速发展的可能性，想来开办企业。还有许多单位想租用土地，可能想自己办企业，或者等地租上涨时再将租用权转让给别人。

中央政府对海南发展的直接贡献虽然不多，但鼓励各省派代表去海南，鼓励大型国营公司到海南建立公司，也支持银行给予贷

款。到 1988 年底 估计有来自大陆各地的 1 500 家公司在海口派了常驻代表。一般的做法是派出两三人到海南，派出人员保证在 1-2 年后上缴一定的利润给总公司，他们便在海南千方百计寻找一切发展机会。虽然有些人是把重点放在与公司主要业务有关的生产和服务方面 但也有人十分灵活 凡是有利可图的事都干 包括买卖紧缺商品 这样 便创造了大胆积极的经营气氛。对此 保守的领导人提出了批评，认为带有投机倒把性质。

当海南建省时 北京和海南的政府各部门拟订了 250 个项目，准备在今后几年内吸引外资。^① 这些硬项目包括基础设施、工业、农业和旅游业各个方面。他们计划在海口、洋浦和西部发展工业；在东部发展农业；在未受到污染的南部和东部发展旅游业。数以千计的海外商人从香港、日本、美国、东南亚 甚至台湾 到海南来进行调查研究，但在决定投资时却非常小心谨慎。1988 年 已有少数外商决定投资 但大部分可能的投资人认为 明智的选择是等待。等到更多的基础设施建成使用，以及有关海南省体制改革的许多决策付诸实施以后 再作考虑。

海南对沿海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勘探寄予厚望。其中以美国大西洋富田公司在 1980 年代后期发现的液化天然气最有希望。海南的规划者希望把液化天然气引到莺歌海附近的盐场，以发展石油化学工业 包括制造海南和广东都缺乏的化学肥料 而不是用管道送到香港。因此，如能和大西洋富田公司达成一项双方都满

^① 海南省计划发展委员会主编，《海南省投资指南》，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

意的协议，这项数十亿美元的工程最终将使正在考虑中的开发项目相形见绌。

很多人认为，旅游业很可能首先起飞。如果管理得当，到1990年代初期，旅游业的收入将会有助于扩大对基础设施和工业的投资。1988年初，国务院在上海同济大学组织了一个城市规划小组，派到海南两个月，负责拟订一项旅游发展规划，作为年底审核计划的基础。规划小组将东部沿海的万宁县和战浪湾，以及东南部一些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地区都列入发展规划之内，但三亚仍是旅游业的中心。国际机场预计在1990年代初建成，到时飞香港只要1小时。改进基础设施的计划也已完成，预计在本世纪前，三亚将会成为亚洲一个主要的冬季旅游点。

但是，负责这项发展规划的领导人也面临着一些根本性的障碍。困难之一就是克服在他们权力控制范围以外的官僚主义。例如，国营农场仍然是在海口农垦局下面的一个独立系统。农垦局尽管也准备改革以适应市场，但并不打算放弃对国营农场的控制。而且国家对橡胶的需求事关重大，使许多人对开放橡胶市场犹豫不决，担心橡胶价格失控，也担心工厂发展过快，对上海等地的国营高级橡胶厂的利益造成威胁。国家其他主要机关也不愿意完全开放海南的关键性物资，如石碌的铁矿、东部沿海的钛矿和莺歌海的盐场。然而，这些作物和资源是海南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果仍受计划控制，那就很难出现当地规划者所希望的自由经济。同时，允许外汇自由买卖和进出口贸易自由，也有可能被其他省份想逃避当地控制的人所滥用。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争取足够的资金来建设基础设施。 1987

年海南工农业总产值只有 67 亿元 约占广东产值的 5% 难于筹集增加基础设施所需的大量资金。1988~1989 年 马村火力发电厂竣工投产 增加了 35 万千瓦 电力短缺状况略有缓和 但仍远远不足。连接海口和石碌的铁路正在建筑, 预计可在 1991 年完成。这样 海口就有铁路直通三亚。不过 海南第一个真正的集装箱码头最快也要在数年之后才能建成。从海口到三亚的第一条高速公路 1988 年才开始修建 而且由于资金不足 三线车道的路面只能先铺一半。尽管已有新的微波线路可接通国外, 但海南岛内却仍有许多地方不通电话。就算住在同一城市, 互相通电话也不容易。有些县银行考虑到资金回收问题 宁愿到珠江三角洲投资 也不把资金投在本县。

外地干部虽然陆续到海南来工作, 但海南又面临另一个障碍, 即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团结问题。先进和落后地区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在 1988 年仍然很大, 一旦 1987~1988 年的‘海南热’降温之后 珠江三角洲和北方城市中很多有技术专长的人 即使分配到海南 也不打算前往。原来到外地工作的海南人 没有几个愿意返回家乡。有些人同意到海南去是为了快点升官发财, 他们对可能遇到的困难毫无心理准备。少数人除了海口市, 哪里都不愿去。还有的人想来, 原单位又不肯放。例如 1988 年 8 月 海南选定 3 800 名第一批申请来的外地干部中, 只有 1584 人获得原单位的批准 其中又有 200 人决定返回原单位。

许多海南人并不隐瞒对外来干部的不满, 而外地人也不掩饰对本地人的轻视。很多本地干部担心新来的干部抢走他们的饭碗 或者干扰他们的办事习惯 虽然他们会讲普通话 但在处理业

务时都讲海南话。新到海南的外地人觉得本地干部思想保守、心胸狭隘 对外界缺乏了解 死气沉沉 排外对立 使人难以忍受。这种鸿沟是不容易填平的。

同早期一代又一代到海南来的内地官员和士兵一样，1988 年来的外地人所面对的是一个落后的边陲社会。所不同的是，前者到海南是为了实行政治统治和保卫边境安全，而后者却是首次为了集中力量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促进贸易和工业的发展。他们的宏伟目标在建省早期是否能够实现 是值得怀疑的 因为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这里与珠江三角洲不同，三角洲有财力基础和办企业的力量 又有附近地区的市场需求 这都是该地区能够迅速繁荣的条件。而海南则相反 改革早期同样允许贸易自由 却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不过，展望未来几十年，在中央政府的积极引导下，海南无疑将会经历重大的变化 内部市场将会扩大 与全国各地和外界的经济联系将会加强。

（凌可丰 译）

少数民族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个案

奥特·卢娃

编者按 奥特·卢娃 (Outi Luova) 芬兰图尔库大学东亚研究项目研究助理，博士候选人。她曾在德国汉堡、中国成都等地学习汉语，并在芬兰外交部短期工作过。自 1994 年以来她在芬兰一些大学讲授中国政治、经济和历史，曾参与中芬环境研究工作项目等。她的主要论文有《中国的新经济领域》、《中国农村分配不公愈显严重》、《1990 年代的中国边陲：转变中的中国政治经济与亚洲》等。

《少数民族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个案》是作者有关中国朝鲜族区域研究系列论文中的一篇。作者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少数民族区域也被卷入到了发展的洪流中，使他们在地方自治中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加强。但是，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阻碍了他们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少数民族必须在改革中寻找适合于本地的发展路子。在这方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利用民族关系网

络，推动了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具有本民族文化特征的发展动向。

引 言

在中国实行改革政策的过程中，那些有较多少数民族人口集中居住的地区似乎处于比较不利于发展的境地。经济改革使沿海地区的发展先行了一步，而居住着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的边陲地区却不得不等待它们的发展机会。然而，许多少数民族自治区并没有被动地等待自己时来运转相反它们从实际出发制订了适合于本民族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遍布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网络的形成与运用，是这些发展战略中最为成功的模式。

延边是吉林省的一个朝鲜族自治州，与朝鲜和俄国接壤。改革以来延边的朝鲜族居民充分利用和开发自己的民族资源以改善生活水准和吸引外资。本文将对当地群众及朝鲜族自治州如何实施它们的发展战略进行分析研究以便显示不同的、自下而上的发展战略，以及地方政府为实现发展目标而自上而下建立的民族网络和经济发展战略。本文也对延边的成功之道提出一种假设性的分析架构，因为延边成功的意义超越了地理、政治和文化的设定。可以说，本文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边疆地区在改革和转型时期的发展进程。

中国的朝鲜族

朝鲜族是中国 55 个少数民族之一。根据 1990 年的人口普查 中国有 190 万朝鲜族人口，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居住在东北的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特别是在吉林与朝鲜接壤的延边有较高密度的朝鲜族人口，延边因而设立了朝鲜族自治州。在 1994 年，它的朝鲜族人口总数为 85.5 万人，占全国朝鲜族人口的 39.7%。但是 随着延边汉族人口的增长，朝鲜族人口所占比重开始相对减少。在 1994 年，延边的汉族人口已经过半，占 57.4%。

主要的发展

传统的陷阱

1978 年中国开始实施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改革政策，同时也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后制订的民族政策有了新的变化。新的民族政策为朝鲜族人民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使他们在地方自治中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加强，而且更能表达其民族的文化特征。然而，自治权的提高并没有使他们的经济地位得到相应的提高，原因是朝鲜族的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阻碍了他们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

伯纳德·文森特·奥利维尔 (Bernard Vincent Olivier) 在研究中国东北的朝鲜族时，对改革和转型时期朝鲜族人民所面临困难的原因进行过分析。朝鲜族人民在种植水稻作物方面富有经验，从

而能保证他们可以过上较好的生活。然而，许多朝鲜族人民没有抓住改革给予的新机会 如生产专业化的商品 从事副业生产 进行技术革新等 而且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 许多朝鲜族农民变得无所事事了。

之所以出现这些困难，原因首先是朝鲜族人顽固地坚持水稻种植 他们不愿意从事其他商品经济活动 并且对经营副业生产及学习新的技能缺乏兴趣。^① 其次，许多朝鲜族人深受重农轻商的儒家价值观的影响，他们缺乏商业精神，少有经营有方的企业人才 传统的朝鲜族农村社区较之汉族社区 因缺乏商业传统和商业经验 所以更没有被商品化。再次 朝鲜族人对以往的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已经习以为常，他们并不愿意从过去安全的集体制度下后撤，从而在面临自由市场为导向的新制度的激烈竞争时无所适从。^② 改革前，朝鲜族人往往自认为自己是比较成功的少数民族 但改革开放后 延边的汉族人灵活地抓住机会而获得了发展 汉族人的收入水平逐渐超越了朝鲜族人。事实上 延边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吉林省的平均水平，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因改革而进一步提高。^③

如果认为儒家的价值观是一种精神包袱的话，那么朝鲜族人传统中的另一个特点却使他们能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动。作为近代的一个倾向于流动的少数民族，他们并没有深深地把自己扎根于

车哲玖(音),《论延边发展外向型经济》载于《延边大学学报》,1989年第
期 第 16 页。

同上,第 17 页。

③ 同上 第 16 页。

一个地方。历史上的朝鲜族人 当他们面临经济及其他困难时 往往会迅速地从 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他们最初从朝鲜迁移到中国 在‘大跃进’时期 有一些朝鲜族农民和知识分子为躲避饥饿与政治运动而逃往北朝鲜 后来许多人又在 1964 年前返回了中国。

中国的朝鲜族人为了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准，渴望迁往富有生气和发展前景的地方。他们寻找新的可耕地或向城市流动。在 1982~1990 年间 在东北的朝鲜族人有 10% 以上曾经为寻找新的就业机会而流动过 与此同时 居住在城市的朝鲜族人口数量增加了 40% ，城市对他们具有特别的吸引力。而且，他们的流动目标并不局限于东北的城市 许多人往南方移动 迁往经济欣欣向荣的广东、海南、山东、河北与江苏等沿海地区 以致这些地区的朝鲜族人口在 1982~1990 年期间比原先增加了三倍多。然而 由于居住在这些地区的朝鲜族人数原本就很少，现在出现的这种人口增加现象并不特别引人注目。例如在 1982 年 山东省的朝鲜族人口只有 939 人 而广东省只有 154 人。在北京的 7 700 朝鲜族人口中 占半数以上是在 1990 年代才进入北京的。^①

如此规模的人口流动现象是在人们获得自由流动的权利后才出现的。当人们去国外探亲旅行也成为可能的时候，流动的范围又进一步扩大了。在 1980 年代中期的‘出国潮’中“，‘出国热’也使朝鲜族人受到了影响。在延吉的被调查者说，有些商社需要招募

金光世、朴阳春(音)，中国朝鲜族人口的发展、构成及其特点”，《朝鲜族研究论丛》第二辑，1989 年 延吉 延边大学出版社 金秉高(音)，中国朝鲜族人口发展和分布变化的趋势”，《民族研究》，1992 年第 2 期 第 17—18 页。

工作人员前往苏联 或有可能去北朝鲜时 朝鲜族人就紧抓机会不放 为了赚钱而果断地涌向边界 这些被调查者还认为 朝鲜族人较之那些留恋乡土的汉族人更加义无反顾地选择外向流动和迁移。

朝鲜族人热衷于向外流动似乎与奥利维尔所称的朝鲜族人的保守态度相矛盾。事实上，这种情况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朝鲜族人的一个特点 即所谓‘随大流’的特点。一旦有足够数量的社区在开发或经营某一特定项目获得成功之后，几乎所有的其他人便会紧随其后 争相仿效。于是 随着有些朝鲜族人在邻国做小生意或工作而交了好运“；出国营生”不久便在朝鲜族人中达到了狂热程度。

中国的改革使朝鲜族人打破了原先缓慢的生活节奏，对外开放的政策使他们看到了新的利益资源。他们有流动的传统，有超国界的民族联系 于是出国成为他们走出困境的一条新路 也为社会流动打开了新的大门。

延边的开放

“对外开放”政策在延边的实施 总的来看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区域经历的情况是相同的 在开始时 地方政府并不情愿实行改革，而当地群众却热切地希望能尽快地跨越边界去争夺经济发展的机会。然而 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 延边在执行对外开放政策方面存在政治方面的阻力。

在刚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时候，延边的企业和商社只能

够与那些同中国有良好关系的国家进行接触。到 1988 年 延边已经与 15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关系。^① 对延边来说 最自然的合作伙伴是北朝鲜，意识形态和民族方面的纽带促使双方都愿意建立合作的关系。双方在官方层次上的经济合作，带动了民间的经济联系活动。在 1980 年代，前往北朝鲜探亲的延边朝鲜族人持续增加 根据一项统计资料，1983 年约有 8 000 名延边朝鲜族人去北朝鲜探亲 到 1987 年 此数字增加到 10 万人。虽然朝鲜当局视生意买卖为非法，但探亲者们仍设法零卖一些随身带去的商品以支付旅行费用。由于朝鲜的货币不能与人民币兑换，探亲者不得不用手头上的朝鲜货币在当地购买朝鲜商品，带回中国后再卖掉。那些对中朝两国的市场行情熟悉的人通常能因此赚到好些钱，于是通过探亲所赚来的钱便成为许多延边朝鲜族家庭收入的一种来源。

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延边的商人不能与在经济上极具吸引力的韩国建立贸易和交往关系。自 1953 年朝鲜战争结束到 1974 年中韩开通邮政、电信业务之前 中韩两国之间的直接接触始终处于冻结状态。1974 年后，中国允许少数人去韩国探亲，但在好几年的时间里被批准的人数极为有限。由于延边朝鲜族人去北朝鲜探亲时 可以通过出售中国商品来挣回旅费 有些富有心计的人不久就意识到 诸如中药材之类的东西在韩国拥有巨大的市场 而将韩国商品带回中国出售更是有利可图，因为韩国的商品在延吉受到欢迎。根据一些报道 自 1980 年代中期以来 韩国的服装、收录音

车哲玖 音 庄编，《吉林少数民族经济》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 年 第 104 页。

机、卡拉 OK 播放机等东西在延边成为了抢手货，这种现象反映了延边和韩国间的非官方贸易在 1980 年代中期以来就已经持续发展了。

由于中国和韩国仍没有正式的商务关系 也没有政治关系 大部分贸易是通过第三者进行的。在中国，这种贸易关系不是在东北的朝鲜族居住区进行的，而是由沿海省份那些享有对外贸易特权的商务机构引导的。但 1988 年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年份 随着中国对韩国态度的转变，中韩间的直接贸易和韩资引进在这一年成为了现实，中国参加在汉城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也是这种转变的明显标志。

然而，延边的工商企业界仍未能从中韩关系变化中得到好处。人们认为 其主要原因是存在着中央政府的政策限制 中央有意让沿海地区首先参与国际贸易，再让其他地方紧随其后。但延边的朝鲜族人民却突破了限制，开展了对韩国的贸易。

首先 当地行政部门曾试图回避参与到国际贸易关系中去 在过去的几十年的时间里 国外影响在延边一直受到封锁 地方领导人在对外关系方面也一直采取怀疑、保守的态度 在中韩国家关系正常化以前 地方领导对发展双边贸易关系持保守态度 但公众在发展对韩贸易关系方面则存在各种不同的想法。有些人希望与韩国开展贸易 他们既妒忌沿海开放地区能先行一步 又为自身所受束缚而产生一种说不清楚的挫折感觉。也有些人认为与韩国建立的任何关系都意味着是对朝鲜人民共和国的背弃。由于有亲戚在北朝鲜的延边少数民族干部的人数要大大地多于有亲戚在韩国的干部 与朝鲜的关系要比与韩国的关系密切得多 而且这些干部通

常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在推动对韩关系方面发挥过作用。

但是，冷战时代的结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边境地区的地位，延边也是如此。随着中国与周边邻国友好关系的建立，以及旅游和贸易在边境地区的开放，实施对外贸易的开明政策也扩展到了边境地区，而且中央政府开始对边贸活动采取鼓励态度。中央政府开始支持不同类型区域经济圈的发展。这些区域经济圈把中国的边境地区和周边国家都包括了在内。延边就是“大东北亚经济圈”（包括俄国的远东、日本、朝鲜、韩国和中国的东北）的组成部分。

1991年是延边发生根本性转变的一年。中央政府重新评估了与延边有关的一些政策和问题。1991年中韩在对方首都互设了贸易办事处，同时根据图们江地区发展计划在联合国发展署的支持下召开了东北亚经济合作研讨会；1992年中韩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事态的出现都使延边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延边开始由一个封闭的后院向一个国际合作的中心转变。

这些变化反映了地方政府在国际关系的取向上，对韩国的政策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如今，在为什么延边不能同韩国发展经济关系的问题上再也不存在任何国家设定的原因了。中央政府或许曾指令延边要迅速与韩国的企业建立关系，以吸引对图们江地区发展项目的投资，因为韩国被看成是投资图们江项目不可缺少的资本资源和技术资源。因此，延边的官员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中央的推动下前进的，不管心中是否情愿，他们开始与韩国的投资者和商人建立关系了。同时，中央政府还提议使延边成为民族自治

区的一个发展样板，^① 从而促使延边必须在改革开放中取得最好的成绩。

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

延边把促进对外经济联系列入了政府的议事日程，其一系列活动的主要目标 就是要激活当地朝鲜族人民的网络联系 使之变得生气勃勃起来。

政府公开鼓励朝鲜族人民出国探亲，并争取与国外的亲戚建立业务联系。中韩建交后不久 官方的《延边日报》就发表一篇文章，强调这种亲戚和家庭关系具有的巨大的经济潜力。^② 延边当地的研究者曾对有这种亲戚关系的家庭数量和“质量”进行了调查，发现有海外关系的家庭占了延边家庭总数的 23% 其中有将近五万户家庭有亲戚居住在北朝鲜，有 3 799 户的家庭有亲戚在韩国 还有 442 户家庭有亲戚在朝鲜半岛以外的其他国家。这份调查不仅统计了有海外关系的家庭数量，这些亲戚在海外所从事的职业情况也得到了反映。^③ 根据调查，占七成左右的海外亲戚从事工商业活动 他们的经营规模估计达到了 100 万美元 这无疑

金中国(音),《吉林省边境民族地区朝鲜族与国外朝鲜民族关系问题》见孙云来、沙云忠(音)主编,《吉林省边境民族地区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与对策》北京 中国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第 237 页。

② 《做好边境贸易这篇大文章》,《延边日报》1992 年 8 月 28 日。

金中国(音),《吉林省边境民族地区朝鲜族与国外朝鲜民族关系问题》见孙云来、沙云忠(音)主编,《吉林省边境民族地区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与对策》北京 中国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第 239 页。

对推动延边朝鲜族人利用这种关系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当地还提出了诸如“探亲带项目 通信引项目”之类的口号 反映了政府对加强国际间的亲属网络联系的重视。^①

官方推动的各种促进引资的活动中，十分重视利用朝鲜文化作媒介，其中有些以文化为名进行的活动具有纯粹的经济意图，也有一些活动旨在使海外的朝鲜人看到高度凝聚的中国朝鲜族社区的力量，从而促进建立互惠合作的伙伴关系。^② 1992年8月 延边州政府在北京举办了朝鲜族文化节，就是这类文化活动的成功范例。当时，组织委员会邀请的海外宾客来自十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具有朝鲜族背景的外来宾有 500 多人 他们在文化节期间与延边的企业、公司进行了业务谈判，并达成了 40 多项协议。这种文化节的组织理念也从“文艺搭台、经贸唱戏”的口号中得到了体现。^③

对外友好团体是一种有组织的国际联系网。这类机构的作用主要是促进中外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然而，也有一些对外友好团体致力于推进中国少数民族与其他国家的同族人民间的关系。在 1991 年 中国共有九个对外友好团体以进一步增进中国的朝鲜族人民与外国朝鲜族人的经济、文化、技术交流为目标。^④

齐凯威 音），《关于延边州进一步发展同朝鲜半岛贸易经济技术合作的讨论》，未发表的论文。

金中国 音），《吉林省边境民族地区朝鲜族与国外朝鲜民族关系问题》见孙云来、沙云忠 音 主编，《吉林省边境民族地区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与对策》北京 中国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第 243-244 页。

同上书，第 248 页。

《积极促进延边经济文化对外交流合作，延边海外联谊会召开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见《延边日报》，1991 年 12 月 24 日。

但是在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中 朝鲜族人并不处于最被重视的地位。延边州政府认为朝鲜族人的海外关系是一种有用的资源，但并不是当地吸引外资的主要资源。在探讨延边经济发展战略的有关文章和书籍中，研究者对本地朝鲜族人的作用往往并不十分重视，有些人还把延边与联合国发展署的图们江项目所构成的地理态势 只看作是有利于吸引投资和扩大贸易 因为图们江项目对当地朝鲜族人的作用并没有作任何明确的定位。

为了激活朝鲜族人的联系网络，促进海外朝鲜族人的投资和贸易 地方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 但绝大多数的举措与活动并不是在官方的经济互动的‘高层次’领域上进行的。当地朝鲜族人所追求的只是个人的、实际的经济目标。他们或利用已存在的社会网络 或建立新的对外关系 目的只是为了迅速赚钱 扩大社会声誉，而他们的朝鲜族背景则是赢得机会的关键。

基层的战略

中国在 1980 年代中期放宽了出国旅行的限制，刺激了朝鲜族人的‘出国热’。起初 他们出国只是为了探望那些已有三十多年没有会面的家人和亲戚，后来他们开始以经济为目的而出国了。^① 有些人像小商人那样在两地间穿梭往返，也有些人不顾自己在国外是否有合法的身份而打工挣钱，滞留国外逐渐成为某些人的谋

参见金东华 音 筹主编《当代中国朝鲜族文化研究》 哈尔滨 朝鲜民族出版社，1996 年版 第 140 页。

生手段。

最先对朝鲜族人产生吸引力的是北朝鲜和前苏联。北朝鲜是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到那里去找活干是难以获得利益的。1987年后，当通过正式途径向苏联远东地区输出劳动力刚刚开始的时候，有数千中国的汉族人和朝鲜族人蜂拥而去，因为那里不仅很接近延边，而且还严重缺乏劳动力。由于在苏联远东地区已有许多朝鲜人，所以前往做小生意的人可以很容易地在亲戚朋友家里住下来。但是在苏联远东地区做买卖只有小利可图，并且有各种风险的威胁，而北朝鲜则因为变得越来越贫穷，到那里做生意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后来，随着前往韩国成为了可能，“流动的”朝鲜族人便设法要进入韩国；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中国的朝鲜族人前往韩国成了热潮。^①

1992年是中国朝鲜族人出国寻找机会的关键年：前往苏联的中国人数量显著地下降，而去韩国的人数却上升了。究其原因，首先是中国与韩国在这一年建立了外交关系，从而方便了人们去韩国探亲访问，其次是随着中国工人和生意人在远东的增多，俄国人对他们的态度变得越来越不友好，当地的环境对中国人也越来越恶劣了。^②

1992年，留在苏联远东地区的中国朝鲜族人尚有两万人，到

① 同上 第 139-140。

② Pavel A. Minakir, "Chinese Immigration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Region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in: Jeremy R. Azrael & Emil A. Payin (ed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mplications for Migration*. CF-130-CRES, Rand, 1996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rand.org/publications/CF/CF-130/> [1997, April 13].

1994 年只剩下 2 000 人了，而前往韩国的人数却达到了两万人次。^① 韩国的报纸称，1992 年在韩国被非法雇用的中国朝鲜族人达 2.3 万人；1994 年这一数字超过了 4 万人，他们在韩国形成了人数最多的非法外国劳工群体。^② 据韩国司法部统计，到 1994 年 3 月已经有超过 12 万人次的中国朝鲜族人到过韩国。^③

为了获得前往韩国的签证，申请人必须有在韩国亲戚的邀请信。由于中国朝鲜族人在韩国非法打工的情况比较普遍，有些人即使在签证过期后仍滞留在那里，韩国方面加强了入境的管理控制。1992 年后，只有那些在韩国至亲并且申请人年龄在 60 岁以上者才有可能获得入境旅游签证。随后，申请人入境者的年龄限制又放宽到 55 岁，签证的有效期也被限定为 30 天。尽管有这一系列的严格限制，前往韩国的合法或非法的旅行者人数仍然继续增加。

那些不能得到前往韩国签证的朝鲜族人，为达到目的而不得不在延边寻找韩国人建立关系。在延吉的韩国记者报道说，当地有许多朝鲜族人想与从韩国来的旅游者、学生或商人结交朋友，有些人请求他们帮助在韩国介绍工作，还有些人攀认他们为“亲戚”。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韩国人对中国朝鲜族人的蔑视，绝大多数非法打工者所干的都是肮脏、困难、危险的活。

参见金东华（音译）主编《当代中国朝鲜族文化研究》哈尔滨朝鲜民族出版社，1996 年版第 139 页。

^② Choe Seung-chul: “Government, Lawmakers Create Measures for Ethnic Koreans in China”, *Korea Herald*, 14. 12. 1996; “60 Percent of 210 000 Foreign Workers in Korea Found to Be Illegal”, *Korea Herald*, 5. 3. 1997.

^③ 同注。

有些想在韩国找活干的人 因为没有个人关系 或不能通过正式途径获得工作，便在黑市用钱购买签证，或用钱请人介绍工作，这在韩国是众人皆知的情况。有许多韩国的私人职业介绍所派人进入中国的朝鲜族聚居区域 向当地人许诺工作安排 也有一些韩国婚姻中介机构以婚姻介绍和签证为诱饵。很显然，这些机构是不可靠的。在 1995 到 1996 年期间，有许多骗子和欺诈事件被揭露 上当受骗的家庭达 10 400 多户，这些家庭多数居住在中国东北 他们因为轻信中介人有关签证、工作或婚姻的许诺而耗费了所有积蓄。据估计 被诈骗的钱约合 4 100 万美元 约有 600 名韩国人被涉嫌到这些诈骗案中。^①到 1996 年深秋 多数诈骗案已经大白天下，有很多报纸报道了东北三省朝鲜族人的愤怒。韩国国内的舆论也迫使政府采取积极措施，以保护中国朝鲜族人的利益。韩国政府在法律、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采取了若干措施 以重塑韩国人对中国朝鲜族人的形象。^②韩国政府还实施了其他一系列特殊措施，并与中国就控制非法入境问题进行了合作。^③

中国朝鲜族人的‘出国热’与中国人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现象是同步出现的。成千百万的中国农民涌向城市去寻找工作机会 尤其以涌向沿海地区为最多。同样 中国的劳动力输出也增

① “Action Urged Against Fraud Victimized Korean-Chinese”, *Korea Herald*, 19 11.1996; “Crackdown Starts on Korean-Chinese Fraud Cases”, *Korea Herald*, 3. 12 1996; “Group Starts Drive to Aid Ethnic Fraud Victims”, *Korea Herald*, 5.12.1996.

② “Measures Worked Out for Ethnic Koreans in China”, *Korea Herald*, 5. 12 1996.

③ “Crackdown of Illegal Aliens Intensified”, *Korea Herald*, 14. 7. 1997; “Korea China to Hold Consular Meetings”, *Korea Herald*, 22.5.1997.

加了，^①许多学者发现，海外是输出劳动力的主要方向。刘欣认为在改革的中国“人们因流动而获得不同的发展机会从而使经济差异现象比以前更加明显了。”^②社会流动已经成为了现实，选择合适的流动方向愈显重要，人们根据心目中的地方富裕程度确定自己该奔赴何方。

对延边朝鲜族人来说，他们的流动是根据资源的可能性而定的。开始时，他们被苏联、韩国、沿海和本地城市的富裕所吸引。去这些地方的人不但可望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同样能得到提高。在韩国，中国的朝鲜族人发现了新的先前不可思议的挣钱机会；民族网络和朝鲜族的背景为他们提供了争取机会的灵活战略。

中国的朝鲜族人从他们的流动自由中得到了实际的好处，在中国各民族中曾经出过国的朝鲜族人数比例处于较高的水平有1/4的延边朝鲜族家庭收到过其在国外工作的家人汇款；^③许多家庭还安装了先进的电信通讯设备，如移动电话、传真机及因特网，频繁地与国外进行业务通讯和个人联系。

然而，并不是所有朝鲜族人都从这些新机会中得到好处。一方面，有些社会弱者不得不用一些可疑的甚至非法的办法去牟取

① Trish Saywell, "Workers' Offensiv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FEER)*, 29. 5. 1997.

② Xin Liu, "Space, Mobility, and Flexibility: Chinese Villagers and Scholars Negotiate Power at Home and Abroad", in Aihwa Ong & Donald M. Nonini (eds.) *Ungrounded Empir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 105.

③ 访问中国朝鲜族研究人员的记录。

财富;另一方面,有一些打工者则从事着受剥削的、肮脏、困难、危险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赋予每个人的机会并不均等,其后果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

少数民族资源的经济意义

要评估少数民族资源的直接经济意义是困难的。在对外贸易和投资的统计中,投资者或商社、企业的民族背景并不能得到反映,一般情况下只列出了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因此,人们并不知道由朝鲜族人所控制的日本投资、加拿大投资所占的比重,也并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外国在中国朝鲜族区域的投资决定是与该地的民族背景相联系的。同样,中国朝鲜族人在国外工作期间到底挣了多少钱也是难以估计的,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涉及到在国外做生意与非法工作的问题。

金中国(音)是一名延边的朝鲜族研究人员,他曾计算过在延边的“韩国企业”数量。根据统计,1992年延边共有三资企业212家,其中131家有国外的朝鲜人资本投入,来自韩国的资本投入占了最重要的部分,达72家,有北朝鲜资本投入的为10家,其余49家企业则由在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的朝鲜人部分投资或全部投资兴建。^①

1994年是韩国对延边投资额上升的具有意义的一年。从

金中国(音),《吉林省边境民族地区朝鲜族与国外朝鲜民族关系问题》,见孙云来、沙云忠主编,《吉林省边境民族地区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与对策》,北京:中国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第242页。

1993到1994年底,韩国在延边投资的企业从72家增加为321家,绝大多数是小型及中等规模的企业。^①对延边投资的第二次飞跃出现在1996~1997年,获得韩国投资的企业上升为393家,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许多投资为大型项目;在此期间,实际到位使用的外国投资比前一阶段增加了2倍;到1997年底,韩国投资高居延边全部外国投资之首,占外资总数的53%。^②

1990年代初,延边吸收的外资在吉林省内只占微弱的份额,到1996年,延边吸引的外资已占吉林全省外资量的30%;1997年随着延边人口在全省的比重变化,延边吸收外资比重又减少为23.5%。珲春市接受的外资占延边州总数的1/4,为9800万美元,此投资的大部分用于对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开发。然而与吉林省的其他经济开发区相比,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的状况尚不理想。例如,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到1997年已登记的外国投资价值为1.22亿美元,在吉林省的绝大多数韩国投资是直接投到长春市。此外,当具体考察韩国在中国的投资地点时,情况更是令人不安。韩国对中国投资的大部分是在山东省和辽宁省,到1996年9月底,山东省位居韩国在华投资的榜首,为7.54亿美元,其次是辽宁省,为2.98亿美元。^③

① Yanbian. *China's Tumen River Area. A special guide on the conditions for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Yanbian Kore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Jilin Provinc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IDO sponsored report, 1995, p.3.

② *China's Tumen River Area. Investment Guide. Yanbian/Hunchun*, 98. UNIDO sponsored report, 1998, p.5-7.

③ *Changchun Economic &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chinarainbow.com/english/cckfq/kai.htm> [1999, March 8]; "Korean Investment To China Increased Sharply" *Digital Chosun Ilbo* 1996.12.09.

表 1 实际使用外资统计 单位:100 万美元

年份	吉林省	延边自治州	(占吉林全省的%)
1992	75.3	0	
1993	275.3	30.1	(10.9)
1994	318.4	67.6	(21.2)
1995	408.0	78.3	(19.2)
1996	451.6	133.9	(29.6)
1997	402.3	94.5	(23.5)

资料来源:Yanbian. *China's Tumen River Area*. A UNIDO sponsored report, 1995.

《改革开放十七年的中国地区经济》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中国统计概览 1998》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

延边自治州与韩国之间的官方贸易数量仍然不多,根据官方统计从 1990~1994 年,延边与北朝鲜之间开展边境贸易的价值高于在正常信用证与现金交易下的外贸价值。与北朝鲜的易货贸易在 1993 年达到了高峰。这种情况可以解释为在 1990 年代初,延边政府虽然已经与韩国建立了新的经济联系,但北朝鲜仍是其亲密的盟友,韩国还没有成为吉林省的最大贸易伙伴。到 1993 年吉林省的商品主要仍是向香港、北朝鲜、日本和俄国出口。

总的来说 延边所分担的吉林省对外贸易量仍然是低的 不到总数的 10%。可是,1990 年代初吉林省的边境贸易量却几乎有一半是由延边分担的。

表 2 对外贸易及边境贸易的统计

单位 :100 万美元

	吉林省对外贸易	吉林省边境易货贸易	延边自治州		延边自治州	
			对外贸易	占吉林省外贸的 %	边境贸易 * 与朝鲜	占吉林省边境贸易的 %
1992	1922	547			266 * 145	48.7
1993	2981	1079	233	7.8	443 * 307	41.0
1994	3263		136	4.2	343 * 225	
1995	2887		133	4.6		0
1996	2476					0
1997	2470		228	9.0		0

资料来源:《吉林统计年鉴 1994》,《延边统计年鉴 1995》;《中国统计年鉴 1997》。

可从网址获得: <http://www.cei.gov.cn/sicnet/a/db/97yearbook/1997-16-12.htm> [1998, June 26] 《延边统计年鉴 1995》北京。

China's Tumen River Area. Investment Guide. Yanbian/Hunchun, 98. UNIDO sponsored report.

有一些不完全的证据表明,延边的朝鲜族人民通过民族联系的网络推进了国外投资者在延边的业务。首先民族的亲合力促使一些投资者选择延边为投资目标。有一个韩国商人曾对我说,他之所以在延边进行投资主要是当地朝鲜族人与他“有共同的民族认同”。我在延边对外贸易与经济合作办公室访问政府官员时,他们也认为,民族认同感是韩国人在延边投资的主要原因。当我

提出民族联系对于延边的经济发展是否重要的问题时，人们都感到很意外，因为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此外，1980年代规划的中国东北发展蓝图显示，韩国企业界对支持中国朝鲜族聚集区经济发展有浓厚的兴趣。

除了民族的亲合力外，相同民族背景是韩国商人在延边投资的实际的重要原因。由于双方有相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民族价值观，所以在商贸交往的每一阶段都比较容易接触。所谓“跨文化交流”障碍对他们之间的业务谈判并不构成障碍，企业中的雇员可以不经翻译便明白自己的职责，并且可以使用同一种语言进行管理。某些曾经对中韩贸易问题进行过讨论的韩国人认为，延边的朝鲜族人对韩国投资者来说是有利的资源。也有人认为，文化接近已经对韩国的中小企业主向中国朝鲜族地区投资产生了刺激，如果他们投资于其他国家，将要承担更大的风险。^①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投资指南对这一理念也表示赞同，它断言韩国的投资受到了民族、语言和市场等因素的推动。^②

延边是好些著名的朝鲜族商人的家乡，这些商人有广泛的国际商业联系。然而，延边州政府吸引人才的努力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尽管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联系网络十分活跃，其能量却并不必然地满足进行大规模国际商贸的需要。如同奥利维尔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朝鲜族人的生活背景是农村，他们并不具有经商的

^① Jang Won Suh, "South-Korea-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Trends and Prospects"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4 (1994), p. 26.

^② *China's Tumen River Area. Investment Guide. Yanbian/Hunchun*, 98. U-NIDO sponsored report, 1998, p. 7.

传统 绝大多数想要从事商业活动的人 并没有长远的目标 而只想在短期内尽快致富，他们认为投资长远项目是得不偿失的。

到 1990 年代中期，延边朝鲜族人与北朝鲜的紧密联系仍是进一步与韩国发展贸易的障碍。据对延边一位朝鲜族人的访问，他说那些想要保持同北朝鲜做生意的人，通常是一些找不到韩国合作伙伴的人。虽然与北朝鲜的贸易已越来越无利可图了，仍有许多延边的朝鲜族商人为了保持与北朝鲜公司的伙伴关系而避免同韩国人接触。可见“左的影响”仍是进一步扩大与韩国经济贸易联系的阻力。^①

尽管延边自治州已经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中国其他地区却吸引了绝大多数的韩国投资。据韩国方面在 1996 年所作的中韩贸易研究 在没有提到图们江地区的情况下 认为长春市所吸引的韩国投资在吉林省占了大头。最受韩国投资者欢迎的地方是山东省和辽东半岛。辽东半岛与韩国相邻，两地各位于黄海的两岸。到目前为止，虽然延边朝鲜族人民所构筑的经济网络在吸引外资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实际到位的外资并不使延边州政府和企业界感到满意。

朝鲜族网络对于促进延边的家庭经济似乎比对企业界的推动更具有意义。朝鲜族人之间长期来所形成的关系以及新建立的联系 使延边朝鲜族家庭的收入得到迅速增加 那些在韩国工作的家庭成员 即使有的人是非法打工 但他们一个月的收入就相当于在

金中国(音),《吉林省边境民族地区朝鲜族与国外朝鲜民族关系问题》见孙云来、沙云忠主编,《吉林省边境民族地区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与对策》北京 中国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第 251 页。

中国 2-5 年的工资总和 这对一部分家庭而言是一条特别容易改善生活的捷径。

要估计延边正式对外输出的劳务情况是有一定困难的。据有些文章的研究 自 1989 年到 1993 年, 延边人与外国企业正式签订的劳务合同约有 7 000 个。由于在此期间, 输出劳动力中的一部分人在国外同时被雇于多家企业, 延边居民实际在国外受雇的人数要少于 7 000 人。一位研究人员声称, 90% 以上在国外工作的延边人是朝鲜族人。^① 在这四年间, 延边通过正式的劳动输出而收到的汇款达 1 400 万美元, 这就意味着每份劳务合同的平均价值约为 2 000 美元。

1992 年前, 未记录的中国朝鲜族劳动力在国外的人数尚未被估计过。1992 年, 一项估计认为在韩国约有 2.3 万名中国朝鲜族非法劳工 假如每人每月的打工收入最低为 1 000 美元的话 那么他们的总收入至少是每月 2 300 万美元。^② 以此为基础进行计算, 1992 年在韩国有 1 万名未登记的中国朝鲜族人, 并不是所有人的劳务收入都能寄回家乡的, 虽然根据有关资料对他们在国外打工时间的长短及汇款回家的数量的多少进行估计是困难的, 也是不可能的。但与 1992 年延边实际的国外投资资本积累为 1 亿美元相比较 毫无疑问的是 这些人寄回家的钱构成为延边重要的外汇收入。

对非正式民间贸易的价值进行估计, 同样是不准确的。据当

① 同上注 第 242 页。

② Trish Saywell, "Workers' Offensiv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FEER) 29. 5. 1997.

地政府主管外贸部门的计算，每年延边与北朝鲜之间的民间贸易价值有可能超过 1 200 万美元，与韩国之间的民间贸易价值则在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尚不得而知。

1995 年，延边自治州的年人均消费量为 2 803 元人民币 在吉林省地市级的行政区域中为最高。与吉林省其他县镇的城镇人口相比 延边的城镇人口花起钱来就简直不当作一回事 他们平均每年每人消费 4 589 元。这一数字比吉林全省城镇人口的年平均消费量还要高出 800 多元 在全省排第二位。^① 由此可以假定 延边人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消费能力，很可能是受到其外汇收入的支撑。所以 从钱的意义上看 延边朝鲜族社区因其民族背景而在改革中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利益。

对外开放的社会文化后果

那些在国外工作或从事小规模贸易的朝鲜族人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很高的教育背景，许多人原先是农民 或是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下岗失业的工人 离开家乡的人以中年人为主 年轻人与老年人在外出者中只占很少数量 而且流动的女性人数要多于男性，也很少有具有干部身份的人想方设法要出国。身份的稳定性及具有一定文化教育背景是干部出国人数少的主要原因 第一 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改革使缺乏教育和训练的农民和工人面临社会转型的挑战，干部则因有较高的素质而

^① 《吉林统计年鉴 1996》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 第 198-199 页。

较少发生身份和职业的变动 第二 干部与那些受过教育的朝鲜族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较坚定的信念，他们往往是北朝鲜的支持者。因此，文化教育程度高的人较之低的人对社会主义制度更拥护 他们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国土去其他国家寻找新的营生 尤其不愿意去韩国这样的国家。然而，年轻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却渴望离开延边这个地方 不过他们的流动目标不是韩国 而是中国沿海的大城市。沿海地区较之延边以及韩国，能向他们提供更有吸引力的工作机会。

改革不但产生了具体的经济后果，那些去过国外的延边朝鲜族人也带回了新的文化观念、科技知识和闲暇生活方式。许多人都提到了因有出国体验而扩大了延边朝鲜族人的眼界，并对他们的事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效果。也有人指出，延边朝鲜族人因在国外工作过而提高了自己的经营能力和技术水平。他们因在国外而使自己的能力有了提高 并增加了个人财富和积蓄 从而有条件在回国后建立自己的企业 如商店、饭馆、美容发廊等。韩国对延边自治州首府延吉的商人、企业家的影响是明显的 韩国式的饭店、卡拉 OK 酒吧、桑拿浴室等场所构成了延吉的主要街景和城市生活内容 以致有人称延吉为“小汉城”。

然而，最近有关延边的文献却少有令人激动的信息。与韩国的密切关系不再被完全地肯定了 迅速对外开放所产生的消极、负面的结果已日益显露。

根据在北京及东北发表的文献 有许多例子反映“出国热”使延边出现了一些不良的倾向。如大多数去韩国的人事实上对如何使自己取得新的职业技能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迷恋韩国的生活

方式和消费方式。在逗留韩国期间，他们学会了怎样花钱，怎样去过上比在中国时更放纵的生活。在返回延边之后，他们凭借自己在国外打工挣来的钱，可以不工作而过上一年、二年手头宽裕的生活。这种倾向对延边人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价值观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因此，有些文章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现在，对金钱和对地位的崇拜已经取代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并导致一些朝鲜族人采用非法的手段去追逐金钱，如买卖假的婚姻文件与工作文件，制造和出售假药，以色情活动与卖淫牟取暴利等。总之，财富积累与价值创造及贡献并不一致，相对贫困者与暴发户在朝鲜族中同时并存，妒忌与贪婪心理产生了社会的不稳定问题。按人口计算，延边的犯罪率比吉林省的其他地方要高，^① 延边的朝鲜族人尽管在改革中获得了直接的经济利益，但这些利益是以社会不稳定为代价换取的。

延边的对外开放是与其经济社会变动同步进行的，延边所走过的发展道路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发展趋势是相同的。然而在北京看来，延边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个民族自治的地区，跨越边界的联系并不仅仅是经济联系，更是一种民族联系，这种联系及联系网络包含了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内容，对延边朝鲜族人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和推动。

韩国文化影响的增加使人们不得不对延边“朝鲜族”的文化状况深表关心。此种关心的一个具体例子，便是韩国卡拉 OK 录相在延边十分流行。这类录相的内容通常充满色情与暴力的镜头，

^① 《吉林统计年鉴 199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 第 267 页。

令人感到可畏，尤其是对当地青年产生不健康的影响。为了回应这类流行的卡拉 OK 录相节目，图们市的文化部门决定制作出版含有‘中国朝鲜族’内容的卡拉 OK 录相节目，它们因为维护和促进了民族文化而受到国家的表扬。^① 一些学术刊物也对中国朝鲜族文化的走向表示了忧虑。有一篇文章说朝鲜族人如今不再以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为自豪了；作者称朝鲜族人已经抛弃了自己的文化盲目地接受韩国商业文化的消极内容。他呼吁要有选择地介绍韩国的文化，要重视复兴中国的朝鲜族文化。^② 表面上看，这种呼声代表了官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非官方的群众观点。正如作者观察到的那样，韩国的流行文化并没有将延边的朝鲜族人民截然地分成狂热追随者与坚定反对者两类。相反，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民似乎都从韩国流行文化中选择了某种可以接受的东西，如音乐、卡拉 OK 录相、电影、朝鲜文杂志等。

这些例子显示出，跨国界的民族联系在延边大体上产生了以朝鲜文化为重点的文化内容，并在相当程度上引起了人们对本地朝鲜族文化保护及发展的关心，这种发展同时也使中国朝鲜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之间产生了明显的文化分界。

朗育山(音),《图们市朝鲜族文化活动》见金中国、金昌浩、金善德主编,《中国朝鲜族文化活动》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 第 153 页。

^② Kim Chuksan, “‘Hanguk-y __lgwa’ Minjok Munhwa __i Palchon.” (“Korean Fev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norities’ Culture.), in: Kim Dong-hwa & Kim S __ng-ch’ __l & Yi Hong-u (main eds) *Chungguk Chos __n Munhwa Hy __nhwang Y __ngu*. (Research on the Contemporary Korean Chinese Culture.) Harbin: Heilongjiang chaoxianzu chubanshe 1996, p.130 – 135.

结 论

在 1980 年代，延边的朝鲜族人民也被卷入到了中国的经济与社会改革的洪流之中，他们在改革进程中不得不寻找新的发展路子，重新获得一个民族的幸福地位。国家对人口流动及出国旅行政策的放宽为朝鲜族人提供了能改善生活水平并具有本民族文化特征的发展手段。延边朝鲜族人继承了本民族喜好流动的传统，在其邻近的周边国家，尤其是在北朝鲜和韩国获得了各种可赖以营生的发展资源。他们为获得新的财富资源，利用了原有的民族联系，构建了新的联系网络。随着延边自治州在中央政府的鼓励下参与到国际贸易业务之中，当地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扩展朝鲜族人的民族网络关系，探索如何利用这种关系促进本地经济。例如，延边州政府为了吸引来自朝鲜半岛以及海外朝鲜工商界的投资，组织以朝鲜族为内容的国际商贸洽谈活动。直到 1990 年代中，绝大多数的关系和网络已经在基层构成。这种关系主要是以迅速争取经济利益为目标，而不在于建立起跨国家的长远而持久的贸易关系。虽然延边朝鲜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改革开放中有了显著的提高，但经济上取得的成就也与各种社会问题相伴随。已经过时的传统习俗又死灰复燃，分配不均问题日益严重，犯罪率上升；与韩国的密切联系也对延边朝鲜族人的民族认同发生了影响。

从基层开始形成的朝鲜族人联系网络的运作似乎正处于转变过程之中。首先，韩国的各种骗子乘中国改革开放之机浑水摸鱼，使许多朝鲜族人因被诈骗而在经济财产上蒙受了巨大损失，从而

导致他们对韩国人的认同发生了危机，许多朝鲜族人已经开始反思自己一度对韩国的着迷。其次，延边朝鲜族人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后，也产生了新的社会经济问题，于是批评的声音已经在延边的朝鲜族人中回响。第三，作为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后果，韩国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资源已经明显地萎缩了；由于韩国不再可能像过去那样向流入的中国朝鲜族人提供工作机会，延边朝鲜族人为保持住现有的生活标准，不得不寻找新的营生手段和发展机遇。总之，无论他们是否能继续依赖传统的流动方式去海外寻找新的希望，或他们是否能在中国找到新的发展途径，北朝鲜在未来最终可能实行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的政策，将为中国的朝鲜族人提供意想不到的新的挣钱机会。

（张敏杰 译）

后 记

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①。这也就是说，中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具有在社会主义制度内对旧体制作根本性变革的性质。这场改革不仅反映了领导人的改革意识，而且体现了亿万人民群众的广泛发动和积极参与。这场改革使中国的经济有了迅猛的发展，使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的提高。在改革进程中，市场经济无疑是发展生产力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和强大推动力量。

中国的改革与开放是人类在 20 世纪影响最深远的事件之一，它不但使占世界人口 1/4 的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动，而且对其他国家发展的影响也不可估量。20 世纪最后十年，西方学术界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关注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西方学者群体在扩大，研究成果在不断增加，学者们的交流与合作也越来越频繁。

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我有幸多次赴北美、西欧一些国家的著名大学、研究机构进行过较长时间的学术交流和研究合作，从而使我有条件比较广泛地接触到一批居于研究前沿、学力资深、备受重视的西方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对中国怀有真挚而友好的感情，对当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 113 页。

代中国的研究也持有比较客观与坦诚的态度 他们的生活环境、文化教育背景、政治观点、思维方法以及遣词用语等方面与我们有许多不同之处 他们的某些观点也不能完全为我们所接受 但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乏深刻、尖锐之处 有不少颇具启发性的观点和独到见解 这些无疑都是值得我们回味、重视和借鉴的。

为了使中国各阶层的读者们能了解西方中国问题专家们对当代中国的研究情况，特别是能了解西方学者们对中国改革开放所作的研究成果 我在有关专家、机构和同事们的支持下开始了这本文集的选编工作。其间曾与三百多位国外学者进行过直接联系，处理了大量信件与文稿 投入之专注 付出之艰辛 唯熟人所知也。

在本书付梓之际，我衷心感谢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把此书列入了科研规划 感谢商务印书馆和侯玲等编辑对此书出版的支持 感谢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把最新出版的中国研究著作寄给我，并提供了翻译出版的授权。

我感谢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教授，他在调阅了全书英文原稿的基础上，欣然为本书写下了重要的序言 他对我的鼓励使我倍感压力。

我感谢经济计量学的先驱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宾州大学的劳伦斯·R·克莱因教授 (Lawrence Robert Klein)。他 年事已高，仍为本书提供了经过精心修改的论文。

我感谢分布在美国、德国、澳大利亚、芬兰、英国、香港的各位作者们的信任与合作 没有他们的慷慨支持和中文翻译授权 就不可能有此书的出版。

我感谢参加本书文稿翻译的各位朋友们 他们按姓氏笔画排

列)是刘志慧、李学谦、张敏惠、沈毅、周翼、陈永革、杨海红、钟少凤、凌可丰、黄桂兰、蒋琳虹等。我恳请读者指出本书存在的问题，并允许我承担有关的责任。

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她为本书作出了诸多方面的贡献。

最后，我要向读者们致以新世纪的崇高敬礼！世界进入了新的千禧之年 中国的发展将更加激荡人心 人类的前景将更加和谐美好 让我们携手走向未来。

张敏杰

2000年 9月